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
散文选

刘季星　李鸿简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刘季星 李鸿简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½ 插页 4 字数 217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412-1/I·2154 定价:15.00 元

内 容 提 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著名的俄国作家。他于1844年开始文学生涯。作为小说家,以其《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鸿篇巨制早已享有世界性的盛誉。而本书汇其游记、随笔、抒情散文、评论、演说于一集,以不同时期的不同体裁、题材、风格,异彩纷呈地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散文创作上的非凡成就。

本书系第一部中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集。选译二十九篇力作,约二十万字,其中绝大部分篇章为首次译成中文。

目　录

彼得堡纪事

一

4月27日

不久以前我还绝对无法想象彼得堡的居民必定穿着睡袍，戴着小帽，关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以不可推卸的义务每隔两小时服一汤匙什么东西。当然，不完全是生病。义务不准许某些人生病。另外一些人则有他们魁梧的体质守护着。于是到最后，太阳出来了，这件新鲜事毫无疑问比其它任何东西更有价值。大病初愈的人正在犹豫，考虑到要整饬仪容，不大放心地脱去小帽，终于同意出去走一走。自然是要全副武装，穿上绒衣，皮大衣，套鞋。暖和的天气，街上人群中某种节日的气氛，轻便马车在坦露的路面上行驶的震耳欲聋的响声，使他感到惊异和愉快。最后，在涅瓦大街上，大病初愈的人张大嘴巴竟把新的灰尘吸了进去！他的心开始跳动，他撇了撇嘴，好像是微笑，他的嘴唇一直紧闭着，表示怀疑和不信任。清除了大量的污泥及湿气之后，彼得堡最初的灰尘是甜美的，当然，不比家乡炉灶上冒出的古老的炊烟逊色①。散步的人脸上的疑虑消

① 此处套用杰尔查文的《阿尔法》(1798)一诗中的句子："祖国的烟尘使我们感到甜蜜愉快"。格里鲍耶陀夫在《智慧的痛苦》中也引用了这句诗，后演变为一句成语。

失了，最终决定欣赏春天的美景。一般地说，凡决定欣赏春景的彼得堡居民，他身上都有那么一种天真纯朴的东西，似乎与他的欢乐不可分割，甚至当他遇见一个朋友的时候，会把平日不离嘴边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吗？”忘掉，而提出另外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天气怎么样？”当然，问完天气以后，特别是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彼得堡最令人难堪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新闻吗？”我经常发现，当两个彼得堡的朋友在某地相遇，双方互致问候以后，异口同声地提出一个问题：“有什么新闻吗？”在他们的声音中有那么一种直透肺腑的苦闷，无论谈什么话都有那样一种声调。确实，彼得堡的这个问题笼罩着绝望的阴影。但是最令人感到可耻的是，经常这样提问的人却是一个完全冷漠的人，他在彼得堡土生土长，完全了解本地的习俗，事先知道人家不会回答他的问题，知道没有什么新闻，即使不多不少提出一千遍，也毫无结果，因而早就不以为怪。但他仍然要问，似乎很感兴趣，似乎是某种礼节迫使他也参加一种社会活动，具有共同的兴趣。不过，谈到共同的兴趣，……我们是有的，我们没有人表示异议。我们大家都热爱祖国，热爱我们亲爱的彼得堡，有机会也喜欢玩一玩。总而言之，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但是我们更流行的是“小团体”。甚至每个人都知道，整个彼得堡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不可胜数的小团体的大聚会，每一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礼仪，自己的法律，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神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产物，这种性格对社会生活还有点不习惯，眼睛常往家里看。而且参加社会生活需要艺术，需要准备很多条件，总而言之，待在家里更舒服

些。在家里比较自然，不需要艺术，更清静些。在小团体里大家会很爽快地回答你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吗?"问题立即有了个人的意义，你听到的答复或许是一种挑拨，或许是哈欠连连，或许是那些会使得你像白发苍苍的老朽一样也不知羞耻地打起哈欠来的东西。在小团体里，可以用最平心静气和最愉快美满的方式，在哈欠和挑拨声中延长你的有用的生命，直到流行性感冒或者腐蚀性的热病踏进你的家门，你将硬着心肠离家而去，处之坦然，而且你不知道会遇到这一切，为什么会遇到这一切，实在幸运。你将在黑夜中，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在没有一线光明的流泪的白天中死去，完全不明白这一切安排得能使你活了一辈子（似乎活过），活到了一定的岁数，因此现在就不得不抛弃这个愉快而平静的世界，移居到更好的地方去了。其实，有些小团体对事情的讨论是很激烈的；几个有文化而好心肠的人热情地聚在一起，用极端的手段取消一切无害的如同捕风捉影的议论和纸牌之类的娱乐（当然，不是在文学小组里），并且怀着难以理解的兴致谈论各种重要的话题。最后议论完了，话讲完了，几个对大家有利的问题也解决了，所有问题彼此都说通了，整个小团体就会处于某种激动状态，某种不愉快的涣散的状态。最后互相怒目而视，说出一些尖锐的实话，暴露出某些急躁和粗鲁的个性，结果闹得四分五裂。大家都心安理得，积累了大量生活经验，于是渐渐地形成了上面最初所描绘的那种性质的小团体。当然，这样生活是愉快的；但最后又会感到苦恼，苦恼得难以忍受。比方说，我对我们那个古板的小团体感到苦恼，因为这个小团体里经常会弄出一个最叫人讨厌的家伙。先生

们，你们非常熟悉这些家伙。他们的人数多得不得了。这些家伙只有一副“好心肠”；除了“好心肠”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年头有一副好心肠，好像是一件稀奇的宝贝！最后，小团体是这么需要他，仿佛他是个永远不变的“好心肠”！这个家伙既然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品质，他进入上流社会时就完全认定他的好心肠肯定会使他永远心满意足和幸福。他坚信自己会成功，因而忽视为人生道路上所准备的其他一切手段，比方说，他一点也不知道约束和克制。他坦白直率，事无不可对人言。

这个人突然之间非常愿意对人表示好感，爱和人交朋友，并且完全相信大家也会立刻相应地喜欢上他，只是因为他喜欢大家。他那颗善良的心从没有想过，光有热爱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必定被人喜爱的艺术，否则，一切都会落空；否则，无论是他那颗爱人之心也好，被他天真地选中作为他的热爱对象的那个不幸的人也好，都会失去蓬勃的生气。如果这个人交上一个朋友，那么这位朋友会马上变成他家的用具，变成痰盂之类的东西。就像果戈理所说的①，“无论内心里面有什么卑劣的想法”，统统都会从舌头上滚滚流向朋友的心里。这位朋友必须每一句话都听，都得表示同情。这个家伙在生活中是否受了骗，是否上了情妇的当，打牌时是否输了钱，他都像个笨蛋一样，毫不犹豫地一五一十硬往朋友的心里装，不论是否欢迎，滔滔不

---

① 在《关于〈死魂灵〉的四封信》的第三封信中，果戈理解释，由于想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他把这些缺点“转移”到他的人物身上。他写道：“我在人物身上写了它们原有的卑劣之外，又添上了我本身的种种卑劣的行为。”

绝地倾吐自己所有不值一提的小事，常常觉察不到朋友由于本身所操心的事而头痛欲裂，他的孩子夭折了，妻子遭到了不幸；最后也觉察不到他本人，怀着一颗爱人之心的这个家伙，像洋姜一样惹得朋友厌烦，人们终于使用巧妙的方法暗示他天气是多么美好，大可趁此机会独自一人赶快去散散步。即使他喜欢上一个女人，也会以他天生的本性弄得她千百次地受到羞辱，在他那颗爱人之心发现这一点之前，在他发现（如果他能够发现）这个女人由于他的爱情而显得萎靡不振，同他在一起感到厌烦、可恨之前；在发现他那颗爱心中穆罗姆族人①的习性毁坏了她的生活之前。是啊，只有在离群索居独处斗室之内，最多也只是在小团体里，才能制造出这种美妙的天然产品，像美国人说的，这种“我们的原料做出的样品”。其中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全部是天然形成的，纯属无拘无束的天生之物。这样的人以他的天真无邪忘记了，而且也并不认为，生活是完整的艺术，生活意味着把自己造就为一件艺术品；他的宝藏，他的资产，他的善良的心，只有在普遍的关心之下，在对社会大多数人和他们的直接需求表示同情的情况下，才能琢磨成为光辉灿烂的真正价值连城的钻石，如果大家对此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使得群众分裂，因而独立去应付，那是不可能办到的！

我的天啊，先生们！古老的情节剧和长篇小说中那些古老的反面角色都躲到哪里去了？要是他们还活在世上的话，该有多么高兴啊！那是因为身旁立刻会出来一个有德

① 公元初居住在奥卡河流域的一个部落。

之士，他到最后会保护天真无辜的人，并把恶棍绳之以法[①]。这个反面角色，这个身不由己的暴君，天生就是以暴除暴者，完全是神秘而不可理解的，命运所注定的。他是暴虐的化身，他在娘肚子里就是施暴者；而且他的祖先似乎预感到他将要来到人世，故意选择了与自己未来的后代的社会地位完全一致的“姓氏”。有一个姓你们已经听说过，这个人身怀利刃，经常杀人[②]，随便杀人，不为一文钱，天知道为了什么。他像机器一样地杀人放火。这算是好的！至少还能让人看得明白！而现在，天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来这么一个结局，一个有德之士，还是最不善于施暴的人，突然变得十分残暴，连他自己都觉察不到这一点。而最可悲的是没有任何人觉察到这一点，并且告诉他。而且你瞧，他活了很久，受人敬重，而死后所获得的哀荣和赞扬，更令人羡慕不已；而且经常有人真诚地为他哀哀哭泣，最可笑的是，哭泣的人正是他的受害者。虽然天底下有时会遇到这种通情达理的事，但你简直不明白，它是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发生的？在闲得无聊的日子里，为了人们的幸福，发生了多少这样的好事啊！我想随便举个例子，近日出了这么一件事：我有一个很熟的人，名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他从前曾经关心过我，甚至多少还保护过我，他打算结婚了。老实说，超过了适当的岁数是很难结婚的。目前他还没有结婚，距离婚期还有三个礼拜；但他每天晚上都穿上白色的马甲，戴上假发，挂

① 作者在这里概括了欧洲情节剧和长篇小说的特点，寓有讽刺之意。
② 1831 年普希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嘲笑俄国描写风土人情和道德讽刺的小说所具有的这种特征。

上所有奖章，买上一束鲜花和糖果，去讨他的未婚妻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欢心。她是个十七岁的姑娘，一片天真，完全没有什么坏心思，一心想着目前的境况，对着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那张甜蜜的嘴巴笑个不停。不，到这样的岁数结婚才快活呢！依我看，如果年纪轻轻的，即在三十五岁之前，总在说这种事，甚至办这种事，那是不成体统的。那是转瞬即逝的冲动！而这里，此人已年近半百，老成持重，彬彬有礼，举止大方，体态丰满，思想圆熟——好，真是好极了！多么妙的主意！一个人活着，活了那么久，终于得到了……因此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前几天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每到晚上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两手放在背后，一脸的忧思和闷闷不乐的神色。那是那种官员特有的表情，如果他们坐在同一个办公室的角落里，奉命办理一大堆紧急的事务，哪怕十分乏味，而只要他的保护神看他一眼，转瞬之间，他立刻会变得无精打采。我直到现在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甚至都不愿意叙述；这种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是不必去惊动高尚的善于思考的人们的。在戈罗霍夫街临街的第四层楼上，有一套住宅，以前我还想把它租下来。现在租着这套住宅的是一个陪审官的妻子；就是说，她以前是陪审官的妻子，现在却是寡妇，是非常动人的年轻的太太，样子非常可爱。于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整日坐立不安，他在考虑用什么办法在结婚之后照样地，哪怕次数少一些，每天晚上去索菲娅·伊凡诺夫娜家里去，和她谈谈她在法院的案子。索菲娅·伊凡诺夫娜自从提出诉状已经有两年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是她的辩护人，他的心肠是非常之善良的。他

苦思焦虑，那一表堂堂的前额都出现了皱纹。最后他又穿上了白色的马甲，拿了一束花和糖果，装得高高兴兴地坐车到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家里去了。回忆起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时，我想："一个人是常常有这种幸福的呀！一个人虽已上了年纪，却在精力充沛时找到一个完全了解他的女朋友，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刚从寄宿学校出来一个月，天真无邪，又知书识礼。这个人他一辈子过的是多么满足多么幸福的生活呀！"我真羡慕呀！那一天天色阴沉灰暗，我在塞纳街上走。但是，诸位，我是写小品文的，我必须告诉你们刚出炉的最能"轰动视听"的新闻——我不得不使用这个古老而可敬的修饰语，这个词之被创造出来，可能是指望彼得堡的读者因听到某个轰动视听的新闻而高兴得发抖之故，譬如说，珍尼·林德上伦敦去了①。对彼得堡的读者来说，珍尼·林德又何足道哉！他本身还有很多这类新闻……但是，先生们，本身没有新闻，绝对没有。我在塞纳街一边走，一边想着应当写这一类事。我很苦恼。这天上午潮湿，有雾，彼得堡显得凶狠，怒气冲冲的样子，好像一个对昨晚的舞会恼恨在心而气得脸色发黄的贵族小姐。彼得堡从头到脚都是气鼓鼓的。是它没有睡好；是夜里它体内的胆汁汹涌而出，不成比例；是它受了凉得了伤风；是它像玩童一样通宵地玩牌，直到早上起来输得两袋空空，为傻乎乎而娇宠惯了的妻子，懒洋洋而粗暴无礼的孩子，为一群没有刮脸的冷淡的仆人，犹太的债主，卑鄙

---

① 珍尼·林德（1820—1887）：瑞典女歌唱家。1847年在伦敦演出梅耶贝尔的歌剧《魔鬼罗伯特》，全城都为"瑞典的夜莺"发狂。1856年移居英国。

的谋士，以及各种造谣诽谤挑拨离间的家伙而懊恼不已——是不是这样，很难说；但它气得只顾忧伤地看着它那湿漉漉的高墙，看着它那些大理石、浅浮雕、塑像、圆柱，这些东西似乎也对恶劣的天气表示愤怒，由于湿气太重而全身发抖，几乎冷得牙齿要捉对儿厮打；它也在看着人行道上光秃秃的潮湿的花岗石，在行人的脚下好像由于怨恨而裂成几块。它最后看着行人，他们铁青着脸，皱着眉头，不知道为什么满腔怒火；大多数人脸孔刮得整洁，细心，急急忙忙地四处奔波去履行他们的职责。彼得堡的地平线看起来是这么暗淡，这么暗淡……彼得堡情绪恶劣，看来它非常想把自己所有的烦恼发泄在某个偶然出现在眼前的不相干的第三个人身上，就像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一触即跳的先生们所做的那样，同他们大吵一场，同他彻底分手，严加痛斥，然后拔腿就跑，说什么也不愿再在英格曼地方寒冷的泥潭上呆下去了[①]。甚至太阳，它由于地球另一半居民某些必不可少的理由要离开一夜，露着十分亲切的笑容，怀着十分深厚的爱，热烈地亲吻了自己体弱多病娇生惯养的孩子，匆匆走了，却在半路上停了下来；它不解地遗憾地看了看这个不知满足满腹牢骚的家伙，这个好出怨言体弱多病的孩子，忧伤地隐进了铅色的乌云后面。只有一线明亮的快活的光芒，好像被准许降临人间，霎时间从深紫色的尘雾中敏捷地飞了出来，在屋舍上活泼地闪耀着金光，在阴暗而潮湿的墙壁上一掠而过，化成千万个光点散入每一

① 英格曼地方是十二至十八世纪伊若拉人所居住的地方，原址在涅瓦河与芬兰湾沿岸，包括彼得堡在内。

滴雨珠中，便消失了，似乎为自己的孤独而感到委屈。——它消失了，像突如其来的欢乐一样，偶然飞进了多疑的斯拉夫人的心灵里，他们的心灵立刻感到羞愧，还没有认清楚它的面目，欢乐就消失了。寂寞的暮色立刻在彼得堡上空笼罩下来。敲响了午后一点钟，城里钟楼上带音乐装置的时钟似乎自己也弄不明白，人们根据什么理由迫使它在这样的夜色中敲这样一点钟。

这时我遇到了一队送葬的行列，我作为小品文作家，马上想起感冒和热病几乎是彼得堡的现实问题。这是个豪华的葬礼。整个马车队的中心人物躺在华丽的棺材里，严肃庄重，彬彬有礼，两脚向前，出发到天底下最舒服的住宅里去。长长一列的嘉布遣会的修士[①]用沉重的靴子踩碎撒落在地上的杉树枝，使整条街散发出树脂的气味。放在棺材上面的带羽饰的帽子合乎礼仪地向行人表明高官的官阶[②]。放在枕头上的勋章，紧跟着棺材缓缓地移动。一个白发苍苍的上校在棺材旁边痛哭失声，无法劝慰，他大概是死者的女婿，也可能是堂兄弟。按照通常的情况，在轿式四轮马车的长长的行列中，有时会露出紧绷着的悲伤的面孔，传来唧唧咕咕地说着永远不会绝迹的流言蜚语的声音，带着孝的孩子们的嬉笑。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感到悲哀，苦恼。我绝不是要责骂任何人，我只是摆出一副狠狠地骂人的脸色，甚至装成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向一匹无精打采疲惫不堪的马所提供的效劳致敬，这匹马四脚落地温驯

---

① 嘉布遣会是天主教圣芳济各会的一支，修士穿僧衣，戴尖顶的风帽。——译者注

② 旧俄时代五等文官官员戴有羽毛装饰的帽子。

地站在队伍里，早就嚼完了从旁边大车上偷来的最后一束干草，由于无事可做决定说几句俏皮话，也就是挑出一个极其冷漠和忙碌的行人（它可能把我当作这样的人），轻轻地抓住他的衣领或袖子，拖到它的身边，然后，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在我这个由于上午悲哀的思绪而受到震动并清醒过来的人面前伸出它那副鞠躬尽瘁而胡子拉碴的嘴脸。可怜的一匹瘦马呀！我回到家里，坐下来写我的纪事，可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却翻开了杂志，开始读一部中篇小说。

这部中篇小说[①]描写的是莫斯科缺乏教养的中层社会一个家庭的生活，书中也议论了爱情，不过爱情的故事我不爱读，先生们，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似乎一下子来到了莫斯科，来到了遥远的故土。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这部小说，那就读一读吧。实际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比它更好更新奇的东西能告诉你们呢？什么涅瓦大街到处是新的公共马车啦，什么涅瓦河整整一个礼拜成了大家的热点啦，什么各个沙龙在开放的日子里还一直无人光顾，焦急地等待着夏天的来临啦。就是这些东西吗？然而，先生们，这些东西早就使你们感到厌烦了。你们想必读过关于北方的一个上午的描写。是不是，那够沉闷的吧？在阴雨连绵的时刻，在同样阴雨连绵的早上，你们去读这部描

---

① 此处指库德里亚夫采夫（涅斯捷罗夫）的中篇小说《斯博耶夫》，刊登于《祖国纪事》1847 年第 3 期，描写一个莫斯科官员的家庭生活，别林斯基在《1847 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一文中认为书中人物伊凡·基里洛维奇的妻子安娜·伊凡诺夫娜的性格写得特别真实和细腻。但爱情冲突是失败的。男女主人公的个性似乎不自然。

写莫斯科一个小家庭，描写打破了祖传的镜子的中篇小说吧。我好像早在我的童年时代就看见过这个可怜的安娜·伊凡诺夫娜，这个家庭的母亲，我也知道伊凡·基里洛维奇。伊凡·基里洛维奇是一个好人，只是在高兴起来的时候，无拘无束敢于放肆的时候，才爱开各种玩笑。比方说，他的妻子得了病，一直害怕死去，他会当着众人的面取笑她，并且开个玩笑，拐弯抹角地说，一旦他成了鳏夫，他要再讨一个老婆。妻子忍着，忍着不笑，终于忍俊不禁笑了起来。有什么办法，丈夫就是这么一种性格。有一次，把茶壶打破了；说实话，值不了几个钱，但当丈夫怪她笨手笨脚时，在别人面前依然觉得很不好意思。谢肉节[①]到了。伊凡·基里洛维奇不在家。大女儿奥连卡的许多年轻的女伴约齐了悄悄地来玩一个晚上。家里也有许多年轻的小伙子，许多活蹦乱跳的孩子；另外还有一个叫作帕维尔·鲁基奇的，不由得叫人想起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这个帕维尔·鲁基奇弄得大家不得安宁，并提议大家来捉迷藏。病体未愈的安娜·伊凡诺夫娜似乎有一种预感；但是，她被大家的要求说动了心，同意他们玩捉迷藏。啊，先生们，正好是十五年前，我也玩过捉迷藏！多么有趣的游戏呀！这个帕维尔·鲁基奇呀！难怪萨申卡，奥连卡的这个黑眼睛的女朋友，紧贴着墙，等着他来捉，全身在颤抖，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帕维尔·鲁基奇的样子很可怕，他却是被蒙住眼睛的。结果出了这样的事：年纪最小的孩子都躲到墙角的桌子底下，挨着镜子在叽叽喳喳地叫嚷；帕维

① 大斋前的一星期。——译者注

尔·鲁基奇朝着吵闹的地方冲过去，镜子摇晃了一下，从生锈的铁钉上掉了下来，没有碰着他的头，落在地上，摔成碎片。瞧！当我读到这里时，就好像是我打碎了这块镜子呢！好像都是我的错。安娜·伊凡诺夫娜吓得脸色发白；大家大惊失色，四散而逃。后来怎么样呢？我惴惴不安地焦急地等着伊凡·基里洛维奇回家。我在想着安娜·伊凡诺夫娜。直到半夜里他醉醺醺地回来了，在台阶上出来迎他的是蛇一样长舌头的老奶奶，是莫斯科古老的典型人物，她悄悄地说了几句，大概说的是家中发生了“不幸”吧。我的心开始急速地跳动，于是突然间下起了雷雨，起初是吼声连连，雷声隆隆，后来风停雨歇，云散雨消；我听到了安娜·伊凡诺夫娜的声音。后来怎么样呢？三天后她卧床不起，一个月后因严重的肺结核而去世。就因为打破一面镜子，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难道会有这种事吗？是啊，可她到底是死了。对于这个渺小的温顺的生命最后几分钟的描写，倾注了多少狄更斯式的温情啊！

伊凡·基里洛维奇也真好。他几乎发疯了。他亲自跑药铺，和医生争吵，总是哭着说，妻子丢下他，有谁来照看呀！是的，许多事情浮上心头。彼得堡也有许多这样的家庭。我个人知道的只是一个伊凡·基里洛维奇。可是这种人遍地皆是，相当的多。何况，先生们，关于这部小说，我一开始就说过，我自己也打算给你们叙说一个故事……不过，下一次再说吧。现在正好来谈谈文学。我们听说许多人对冬天这个文学季感到非常满意。没有叫喊，也没有特别热门的话题和以牙还牙的争论；尽管出版了几种新的

报纸和杂志①。似乎所有的事都办得更严肃更谨慎；各方面都更加协调，更加成熟，考虑得更加周到，意见也更加一致。不错，果戈理的书在初冬引起了许多议论②。在方向上历来背道而驰的所有报纸和杂志，几乎毫无异议地对这本书作出了完全一致的评论，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对不起，把主要的东西忘记了。上面说过，平常一直记得，结果还是忘了。恩斯特又开了个音乐会③，其收入将捐赠济贫协会和德国慈善协会。不用说，剧院将座无虚席，我们相信这一点。

二

5月11日

先生们，你们知道吗，在咱们这个幅员辽阔的首都，口袋里经常装着一些还没有人知道的独家新闻，而且还掌握着甘心情愿地去传播的天赋的，这样的人有多少？依我看，他可以算是一个大人物；显然，口袋里装着新闻，比装着大把钞票更得意。一个彼得堡人打听到了一条难得听到的消息，飞也似地去传播，这时他预先体验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他的声音变小了，并且高兴得发抖；他的心似乎沉浸在玫瑰油里。但这时候，当他还没有把消息说出来，当

---

① 1847年出版了几种月刊，其中有《公益知识杂志》、《音乐世界》、《教育新丛书》、《女红大全》，另有《莫斯科市民小报》。

② 指《致友人书简选》(1847)一书。后来别林斯基在萨尔茨布隆给果戈理写信给予严厉批评，赫尔岑、鲍特金、格拉诺夫斯基、安宁科夫等人以及一些报纸也对这本书进行了批评。

③ 亨利希·恩斯特(1814—1865)：德国作曲家，小提琴手。1847年3至5月在彼得堡举行音乐会。

他穿过涅瓦大街向朋友家奔去的时候，他所有的烦恼一下子都无影无踪了；甚至（据观察）各种顽疾都不药而愈，甚至连仇人都宽宏大量地饶恕了。他显得仁慈而伟大。可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一个彼得堡人在这样庄严的时刻将会认识到自己的全部价值和重要的意义，给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不仅如此。先生们，我，还有你们，可能都知道，有许多来访者（如果不是真有紧急的事务求见的话），你们是绝不会第二次把他们放进接待室里来会见您的秘书的。可耻啊！这位来访者明白是自己错了，简直像一条狗，垂着尾巴和耳朵，等待着情况改变。突然也有这种时候，同样是这个来访者，他大模大样有恃无恐地揌您的门铃，在惊异的仆人面前走过，怡然自若，容光焕发，向您伸出手来，您立刻会认识到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他有消息，有传闻或者一些非常开心的事；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位来访者是不敢闯进您府上来的。你们听了以后不无满足之感，虽然同那位可尊敬的大户人家的太太也许完全不一样，她对任何消息不感兴趣，但是别人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有个做妻子的按照英国方式教育孩子，而用鞭子抽自己的丈夫，她却听得津津有味①。

先生们，听听流言蜚语是有趣的！我经常想：如果咱们彼得堡冒出这么一个天才，他能够发明一种为别的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新花样，以活跃社会生活，那么，实在不知道这个人会赚去多少钱。可是，我们总是靠逗乐的、吃白

① 果戈理的《片断》（1842）中萨巴奇金给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讲过这个笑话。

食的和寻开心的那些上不了台盘的家伙打发日子。能人是有的！人的本性生得是多么的奇怪呀！突然之间，而且绝对不是出于卑鄙无耻的目的，一个人不成其为人，而变成了小蚊子，一只最普通的小蚊子。他常常变换面孔，脸上涂着一层液体，又不像液体，而是一种特殊的发光的油彩。他的身材突然变得比您矮得多。完全失去了独立性。他死死地盯着您的眼睛，像一条哈巴狗，等着您丢给它一块骨头。而且，虽然他穿着质地最好的燕尾服，在社交活动中当感情激动起来时仍然会躺到地板上，高兴地摇着尾巴，尖声叫喊，舔自己的身子，没等说“吃吧！”，绝不吃那一块骨头；他不屑一顾犹太人的面包。而最可笑，最有趣的是，他丝毫不失自己的尊严，即使按照您本身的信念来看，他也是神圣不可侵犯地保持着他的尊严，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之自然。当然，您是诚实正直的雷古卢斯，至少是阿里斯提得斯[1]，总而言之，您要为真理而献身。您看透了自己家的仆人。从他这方面来说，他相信自己完全是心地光明的。——而事情也进行得非常顺利，您觉得很好，您的仆人也不失尊严。先生们，问题在于他在恭维您呢[2]。当然，他当面恭维您是不好的；令人遗憾，是卑劣的；但最后您发觉，这个人恭维的手法很聪明，他说的正好是您本身自以为最得意之处，因而有头脑，有分寸，甚至有感情，有

---

① 雷古卢斯，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的政治家，英勇地为国捐躯。阿里斯提得斯，公元前五六世纪间雅典的统帅和政治家，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② 这里所描写的谄媚者的性格，由来已久。古希腊哲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品格论》中即作过描写。

知人之明；因为他甚至能在您身上发现可能被上流社会拒绝接纳的借口，那自然是不公平的，是由于嫉妒。也许，您终于会说，我怎么会知道他是不是在吹牛拍马，只不过是过于天真和出于真诚；而且，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否定一个人呢？——而这样的人会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的，就像那个恳求老爷别买他的货物的犹太人一样：别买！干吗要买？——只要老爷能看一眼他的小包裹，哪怕往他这个犹太人的货物上吐几口口水走开也行。于是犹太人把货物在地上铺开，他想卖什么，老爷就统统买下来。可是，咱们京城里的这个仆人完全不是出自卑鄙的目的。为什么要说假话！绝对没有卑劣的用心；——他的心地是聪明的，可爱的，合群的，是有所希望有所追求的，是高雅的；不错，稍为超前了一点，但总归是一种心地，——我不说它同大家一样，同许多人一样。如果没有它，没有这种心地，大家会苦闷而死，或者会你咬我，我咬你，所以天下才这样太平。两面派，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伪装，都是卑鄙的，我同意，但是，假如此时此刻所有的人都露出真面目，那么，老实说，情况就更加糟糕。

当彼得堡来到夏园和涅瓦大街，披上一身新的春装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产生了这些有益的念头。

天哪！单是在涅瓦大街遇到的事真可以写成一大本书。但是，先生们，根据你们愉快的经验，你们对所有这些事全都清楚，依我看，用不着写什么书。我倒有另外一个想法，这就是在彼得堡挥霍起来是吓死人的。我很想知道，彼得堡那种要什么能弄到什么的人多不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什么都不缺的那种人多不多？不知道我是否正确，但

是，我经常把彼得堡想象成（如果允许打个比喻的话）一个深受尊敬的父亲所娇生惯养的小儿子，而这位父亲又是旧时代的人物，家财巨万，慷慨大方，通情达理，外加一副菩萨心肠。父亲最后不管事了，退隐乡间，并且很高兴能在他的世外桃源穿他的黄布大褂而不失体面。可是小儿子要走向社会，小儿子必须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小儿子必须成为年轻的欧洲人，而且这位好爸爸，虽然只听说过教育的事，但必定是希望自己的小儿子能成为知识渊博的年轻人的。小儿子很快学会了表面上的一套，开始生活了。他穿起了欧洲的服装，唇上蓄起小胡子，颏下又留起山羊胡子，而做父亲的却根本没有发觉这个时候小儿子已开动了他的脑筋，积累经验，开始独立生活了；也没有发觉他想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自己去过日子，甚至在二十岁的年纪所体验的比生活在古老的风俗中见识了一辈子的人懂得更多。他看到一撮山羊胡子就心惊肉跳，看到小儿子从父母亲肥大的口袋里大把大把地捞钱就心惊肉跳；最后，当他发觉小儿子生了异心，另有算计——他不满，生气，责怪教育，也责怪西方，而主要的是抱怨“鸡蛋开始教训母鸡了”。然而小儿子需要生活，于是他又开始着急起来，您不由自主地会想起他年轻时的麻利劲。当然，他跑起路来腿脚是相当快的。

又比方说，冬季过去了，从日历上看，彼得堡起码是进入春天了。报纸上开始一长栏一长栏地刊登出国旅行者的名单。您马上会惊奇地发现，在彼得堡，健康比钱袋更容易受到损害。坦白地说，当我把这两方面的损害进行比较时，我突然感到失魂落魄的恐惧，以至于我开始认为自

己不是住在首都，而是躺在医院里。但是我又马上作出判断，我的担心是白费力气，住在外省的好爸爸那又宽又大的钱袋还是装得鼓鼓囊囊的。

您会看到，别墅里住满了人，盛况空前；小白桦树林子里闪现着各色服装，五彩缤纷，不可思议，人人心满意足，幸福无比。我甚至完全相信，如果一个穷人看见大家都很高兴，也会很快感到满足和幸福的。起码他可以无偿地看到在我们幅员辽阔的国家里任何城市无论花多少钱都看不到的景象。

这里就来说一说穷人。我们觉得，在种种可能出现的贫穷之中，最可恶、最叫人讨厌、最不体面、卑劣而肮脏的，是上流社会的贫穷，尽管很少见。这种贫穷是挥霍完最后一分钱的贫穷，但是还必须乘着四轮轿式马车四处奔走，把泥浆溅在那些以诚实的劳动而获取面包的满脸汗水的行人身上；虽然已落到这步田地，手下还有打着白领结戴着白手套的听差。这是一种耻于乞讨、但是不耻于用极为厚颜无耻、极为卑鄙龌龊的办法去接受施舍的穷人。但这种肮脏的事不想再说了！我们衷心祝愿彼得堡人在别墅里过得快活，少打几个哈欠。大家都知道，老想打哈欠在彼得堡已成为流行病，就像流行性感冒、痔疮和热病一样，这种病在咱们这里长期以来还没有办法医治，连彼得堡时髦的治疗方法都无能为力。彼得堡早上起床打哈欠，办公时间打哈欠，睡觉时打哈欠，而在化装舞会上和歌剧院里则更是哈欠连连。其实咱们的歌剧已臻于化境，令人叫绝的歌唱家们的歌声是那么清晰宏亮，在我们整个辽阔的国土上，在大小城镇和农村，都得到愉快的回响。每个人

都知道彼得堡有歌剧，每个人都心向往之。然而彼得堡仍然觉得有点枯燥，到了冬末，歌剧在它眼里显得像……比方说，像冬季最后一场音乐会那样枯燥无味。而对于恩斯特出于美好的慈善的目的而举行的音乐会，却绝对不能把最后的一条批评意见送给它。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剧院里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为了保住性命决定到夏园去散步①，当时这个花园似乎特地破天荒地为游人开放，因此音乐会就显得有一点稀落，但这绝对不是由于什么误会。为穷人募款的箱子塞得满满的。我们听说许多人把捐款送来，本人却不到场，就是因为害怕拥挤。害怕是十分自然的。

先生们，你们无法想象，和你们谈彼得堡的新闻，为你们写彼得堡的纪事，是多么愉快的义务！我更要说，这不是什么义务，而是最高的享受。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的快乐。但是，说实话，这样地聚在一起，坐一坐，聊一聊社会上的趣事，是非常愉快的。当我走进社交圈子里，看到温文尔雅、望之俨然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谈论什么事情时，我有时简直高兴得想放声歌唱，而丝毫不失自己的尊严。至于谈论什么事情，这是次要问题，我有时甚至忘记去听大家的谈话，完全只满足于合乎社交礼节的一种情景。我的心充满了最大的喜悦。

但是，我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来得及深入领会咱们上流社会社交界人士——人士，不是小团体——他们谈话的

① 此处指恩斯特于1847年4月26日上午举行的音乐会，当时池座和一楼厢座的听众较少，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欣赏艺术；楼上几层和顶层楼座的观众却爆满，万头攒动，掌声如雷。

意思，内容。天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当然，不容争辩的那是难于理解的美妙的东西，因为这都是些老成持重而可爱的人，然而一切似乎都无法理解。看起来，似乎谈话刚开始，似乎乐器正在定弦；你坐上两小时，演奏就开场了。有时听起来好像谈论某些重要的话题，引人思考的话题；但到后来，当您反问自己他们在谈论什么，那么您怎么也不明白他们究竟在谈什么[①]：是谈手套，谈农村的收成，还是谈"女人的爱情能持久吗"？因此我坦白地说，有时候好像苦闷忽然袭上心头。就像是，比方说，您在天黑以后回家，脑子里空落落的，闷闷不乐地四处看看，而突然听到音乐的声音。舞会，一点不错，是舞会！明亮的窗户上闪动着人影，听得见沙沙声和嚓嚓声，好像听到了令人神往的舞会上的耳语声；深沉的大提琴在嗡嗡地响，小提琴在刺耳地尖叫，人群，灯光，大门口站着武装警察，您从门口走过，高兴，激动，您的心里升起了一种愿望，一种追求。您总觉得好像听到了生活的声音，可是您随身带走的只是生活的一个苍白而平淡的旋律，一个思想，一个影子，几乎什么也没有。您走过去了，好像对什么也不相信，听到的是另外的东西，您听到我们日常生活一个平淡的旋律中传出另一种强烈而持久不歇的忧伤的声音，像在卡普列特家里举行的柏辽兹的舞会[②]一样。苦闷和怀疑啃啮着心，使

---

① 果戈理的中篇小说《涅瓦大街》(1835)写的就是彼得堡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

② 柏辽兹是法国作曲家，乐队指挥。1847年4月在彼得堡举行两场音乐会，演奏戏剧交响乐《罗米欧与朱丽叶》和交响乐《哈罗尔德》片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罗米欧忧郁的音调和卡普列特家里舞会上快活的音乐短句能够交融在一起。

人心碎，如同俄罗斯悲歌中绵延不绝的曲调所透露的那种苦闷，响着亲切的呼唤的声音：

仔细听听……传来别的声音……
灰心绝望，惨雾愁云……
那里是强盗在高歌一曲，
还是姑娘在分别时哀哀啼哭？
不，那是割草人荷镰而归……
是谁为他们编的歌？是谁
看看周围：森林，萨拉托夫草原……①

这几天是悼念亡灵的节日②。这是俄罗斯民间的节日。人民用它来迎接春天，在全俄辽阔无垠的大地上都在编制花圈。但是彼得堡天气寒冷，一片沉寂。下了雪，小白桦树还没有发芽，而且头一天晚上冰雹把树木上的幼芽都毁了。天气简直像十一月，那时大家都在等待着初雪，涅瓦河被风吹得巨浪汹涌，大风呼啸着，尖叫着，扫荡着街道，把路灯刮得劈啪响。我一直觉得彼得堡人在这样的季节里非常爱生气，也很忧郁，我的心连同我的小品文都紧缩成一团了。我一直觉得他们都烦闷得要冒火，却懒洋洋地各自待在家里，有人以播弄是非来解闷，有人以同妻子针锋相对地争吵以消磨时日，有人把自己埋在公文堆中克制怒火，有人整夜玩牌，一觉醒来又是新的一局。有人在他那

---

① 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俄国诗人迈科夫（1821—1897）所著长诗《两种命运》（1845）第七章中的诗句。原诗本还有最后一行："穷困和忧伤，和思索，和镣铐"。"镣铐"二字已被检查官删去，这一行诗也未引用。

② 民间悼念亡灵的节日。复活节之后的第七个星期四。

个怒气冲天的孤单的角落里煮厨娘的咖啡，立刻在咖啡壶里沸水奇妙的咕嘟声中入睡。我觉得街道上的行人对节日和社会需要不感兴趣，我觉得在那里淋雨的只有一颗瘦骨棱棱的忧心，还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乡下人，他在雨下淋似乎比在太阳底下晒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围着海狸皮的绅士，在这么寒冷潮湿的时候出门，也许只是为了安排他的钱财吧……总而言之，先生们，不妙啊[①]！

三

6月1日

现在，当我们不知道时序究竟进到哪个季节，心里一点也不发愁时，只相信这时候过的不是第二个秋天，而是春天，它到后来必定要摇身一变成为夏天的；现在，当最初的新绿慢慢地把彼得堡的居民都吸引到别墅里去，到泥泞季节重新来到为止，咱们的彼得堡将剩下一座空城，塞满了废弃物和垃圾。它在建造房子，在清洗，好像稍作休整，好像暂时停止活动一个短时期。白色的粉尘在赤热的空气中形成厚厚的一层。一群工人，拿着石灰、铁锹、锤子、斧头和别的工具，在涅瓦大街上发号施令，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仿佛他们把这条街买下来了。行人、闲逛的或者看热闹的人就倒霉了，如果他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去当个罗马狂欢节中那全身撒满面粉的小丑彼耶罗的话。街道上的生命沉寂了，演员们到外省去休假，文学家们在休息，

---

① 此处行文受果戈理的影响。果戈理在中篇小说《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争吵的故事》结尾中写道：“先生们，在这个世界上太寂寞了。”

咖啡馆和大商店门可罗雀……那些被迫留在首都过一辈子夏天的市民，还能干些什么呢？研究房屋的建筑，观察城市是怎样更新和建设的？当然，任务是重要的，不错，甚至是大有教育意义的。彼得堡人一到冬天就不愁打发日子了，他有那么多的消遣，事务，公差，牌局，小道消息，以及各种各样别的娱乐，此外还有那么多的乱七八糟的泥浆，所以他不一定有时间来观察一下四周，更加仔细地瞧一瞧彼得堡，研究它的面貌，在这些石头堆里，在这些堂皇的建筑、宫殿、纪念碑式的大厦中间，把城市乃至咱们整个时代的历史读它一遍。他也不一定会冒出一个念头，要把宝贵的时间消磨在这种无可指摘但增加不了收入的功课上。彼得堡有这样的居民，他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走出自己的街区一步，他们只认识到机关去上班的一条路。也还有这样的居民，他们没有去过艾尔米达什①，没有去过植物园，没有去过博物馆，甚至没有去过美术学院，甚至没有坐过火车。话要说回来，要研究一座城市，确实不是一件没有好处的事。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曾经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书②，从头至尾讲的是对当时俄罗斯的看法。当然，外国人对俄罗斯的现状能有什么看法，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好像至死不屈，至今不肯让欧洲人的尺子来量我们的高低。不过，尽管如此，这位臭名昭著的旅客写的这本书却

① 艾尔米达什是美术博物馆，1866年前被认为冬宫的一部分，参观者须穿文官制服或燕尾服，戴帽子和手套，持票入内。彼得堡的第一条铁路建于1837年，通向近郊的皇村。

② 此处指法国作家阿·居斯蒂纳（1790—1857）所著《俄罗斯，1839》一书，因攻击沙皇尼古拉一世被禁，但在俄国秘密流传。

风靡了整个欧洲。附带说一句，书中提到彼得堡的建筑是最平庸的；建筑中毫无特别引人注意的特点，毫无民族特色，整座城市是某几个欧洲都城滑稽可笑的大杂烩。于是他又说，彼得堡，就算在建筑一个方面，是如此奇怪的大杂烩，使得你每走一步路都要摇头叹息，大惑不解。希腊建筑，罗马建筑，拜占廷建筑，荷兰建筑，哥特式建筑，洛可可式建筑，现代意大利建筑，咱们的东正教建筑——所有这些东西，这位旅客说，统统搅在一起，揉成一团，弄成非常滑稽的样子，结果看不到一所真正漂亮的房子！因此咱们这位旅客对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说了一大堆好话，由于克里姆林宫的缘故说了几句辞藻华丽故作高深的话；他为莫斯科的民族风格叫好，却把四轮轻便马车大骂了一通，因为它们与古老而淳朴的无篷马车相去太远，所以，他说，俄罗斯本土的和民族的东西已消失殆尽。结果就是这样的意思，俄国人羞于见到自己的民族特点，因而不愿意按照从前的方式乘车，他们担心坐在古代的马车里一下子就把灵魂颠出来是有道理的。

这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也就是与差不多所有的法国人同样聪明的法国人，但是属于皮相之谈，独一无二，愚蠢之至。凡是非法兰西的东西，他一概嗤之以鼻，无论是艺术，文学，科学，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等领域内，都是如此。而主要的是，由于存在着另外的某一个民族，有它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民族性以及自己的发展道路，他居然敢大发脾气。可是，这个法国人，显然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的思想与某些，不敢说是俄

国的，但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闲聊的想法，却不谋而合①。现时有很多人都希望从废弃的旧字母、落伍的思想、一大堆仿佛可以缅怀古罗斯的石头，以及向着绝对是老祖宗的古物盲目地忘我地献出的热情之中，见到俄罗斯的民族特点。是的，这个法国人也是这样做的。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是早已消逝的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应当重视的纪念品。这是稀世的奇迹，应当出于一种强烈的求知的愿望和敬仰的心情去看待它，但它全身都是民族特点，这里面的缘故，我们竟一点也不明白！有这样一种民族文化遗物，它们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它们也就会失去民族特点。有人说，俄罗斯人民知道莫斯科有克里姆林宫，他们是信教的，就从俄国各地涌来向莫斯科那些神灵转世的能人的遗骸献上一个吻。好的，但这中间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人们也成群结队地去基辅、索洛维茨基岛、拉多加湖、圣山②、耶路撒冷等地朝圣。但他们知道莫斯科的圣徒圣彼得和圣菲利普的经历吗③？当然，不知道，因而对俄国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时期就毫无所知了。有人说，我们的人民一直在悼念埋葬在莫斯科天使长大教堂里的俄国古代的沙皇和王公。很好。但

---

① 居斯蒂纳认为俄国人抛弃了某些古老淳朴的风俗习惯，因而逐渐丧失民族特点，本文作者在驳斥居斯蒂纳的同时，也批评了俄国斯拉夫派的观点。

② 索洛维茨基岛在白海内，岛上有同名的修道院，建于十五世纪。圣山位于希腊东北部伸入爱琴海五十公里的圣山海岬上，是希腊北部希腊正教教会所在地，山上有二十多所修道院。——译者注

③ 彼得（? —1326）：古罗斯的总主教，曾支持莫斯科大公伊凡·达尼洛维奇反对特维尔大公，从弗拉基米尔迁居莫斯科，以提高莫斯科公国的地位。菲利普先后任莫斯科和古罗斯的总主教，俗名费多尔·斯捷潘诺维奇·科雷切夫（1507—1569）：因触怒伊凡雷帝而被绞死，后遗骸迁葬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内。

是罗曼诺夫王朝以前的俄国沙皇和王公中间，我们的人民能知道谁呢？他们叫得出三个人的名字：顿河王德米特里、伊凡雷帝和鲍里斯·戈都诺夫[①]（后者的骨骸存放在圣三一大修道院）。但人民之所以知道鲍里斯·戈都诺夫，仅仅因为他建造了一座“伊凡大钟楼”，而关于顿河王德米特里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说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事，简直一句也没有听说过。多棱宫[②]的珍宝他们也毫无所闻。俄国人民中间这种对于本国历史文物的无知大概是有原因的。但是有人说，人民又怎么样？人民是愚昧的，没有受过教育。于是他的手指向上流社会，指向受过教育的人。可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于本国的古文物有一种狂热的心情，有忘我的追求，我们总觉得是被风刮起来的，是头脑里冒出来的，是罗曼蒂克的狂热，书斋里的狂热，因为咱们这里有谁懂得历史呢？历史故事倒是很熟悉，而历史现在成了最不普及、被关闭在书斋里的东西，成了学者们的领地，这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未见的；他们争吵，讨论，比较，至今还不能就几个主要的观点达成一致的看法。他们在寻求能够解释几件历来最令人困惑的史实的途径。我们不怀疑，任何一个俄国人对本民族的历史都不可能漠然置之，无论他们的历史表现为何种形式，但是要求他们仅仅为了几件具有古文

---

① 德米特里（1350—1389）：是莫斯科公国的大公，1380年在顿河上游库利科沃一役中大败金帐汗国的军队，被称为顿河王。伊凡雷帝即伊凡·瓦西里耶维奇（1530—1584）：俄国第一个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1551—1605）：1598年即位为沙皇。下文提到的伊凡大钟楼，是他于1600年下令改建的，现仍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

② 多棱宫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一座建筑，其中藏有皇室的珍宝及外国元首赠送的礼品。

物意义的东西而忘记现实，把现实丢在一边，那是极其错误而荒谬的。

彼得堡并非如此。在这里每走一步路都可以看到、听到、感觉到现代的气息和现代气息的思想。也许在某些方面是一片混乱，是个大杂烩，有不少地方可能是画漫画的题材，但这毕竟是生活，是运动。彼得堡是俄罗斯的首脑和心脏。我们先来谈城市的建筑。即使它的建筑包容了各种特点，却表明了思想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这一片荷兰式建筑的房子，使人想起了彼得大帝的时代。这座富有拉斯特列利[①]格调的房屋，使人想起叶卡捷林娜的时代。这些属于希腊和罗马风格的房屋，是晚近的建筑，但都能让人回忆起彼得堡以至全俄欧洲式生活的历史。彼得堡至今仍然尘土飞扬，垃圾遍地，它还在兴建房屋，改变面貌；它的未来还在构想之中，但是这种构想是从彼得一世开始的，它逐渐成形，充实，每天在深入发展，不只是在彼得堡这块沼泽地上，而且在整个俄罗斯的土地上。全俄罗斯都在关心彼得堡。大家都切身地感到了彼得一世所确定的方针产生的力量和利益。各个阶层都被动员起来为贯彻他的伟大的思想这一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因而一切都开始有了生命。一切——工业、商业、科学、文学、教育、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结构——一切都有了生命，并且从彼得堡得到了营养。即使不想去思考的人，也听到了并且感觉到了新的生活，去追求新的生活。你看，人民在某些方面无意中忘记了已成为过去的古老的年代，而尊重、重视现代，即

---

① 瓦·拉斯特列利（1700—1771）：俄国著名建筑师。——译者注

他们前所未有地开始生活的时代，有谁会去责备他们呢？不，我们在现代的追求中看到的并不是民族特点的消失，而是它的胜利，它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似乎一遇到欧洲的影响就轻易地消失。按照我们的看法，热爱现代、生活在现代的人民，是健康无恙的，他们对现代也能够理解。这样的人民能够生存，他们将会拥有永久的生命力和信念。

关于现代的趋向、现代的思想等等，从没有像现在、像近来这样成为热门的话题。文学和任何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也从没有引起过这样大的兴趣。彼得堡冬天多事而又特别多产的季节，直到现在，目前这时候，即五月底，才告结束。这时有最近出版的书；学校里的课程结束，举行考试；外省新来的居民大批涌到；每个人都在考虑下一个冬季和今后的活动，什么样的考虑都有：把考虑付诸实行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如果你们能深入了解彼得堡所经历的最近的一个季节，你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社会上普遍地在重视现实。当然，不能说我们现代的生活如同旋风、如同风暴一样向前疾驰，叫人喘不过气来，感到可怕，没有时间回头看一眼。不，不如说我们更像是忙着到哪里去，像一个人出远门似的正在收拾东西，捆扎行李。现代的思想向远方飞驰的时候不可能不回头看一眼，而且走得太快它也有点害怕。相反，它好像要在中途稍为停一下，到了它的一定的地段它要四周围观察一番，前前后后把自己看一看，全身上下把自己捏一捏。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在分析研究这个社会，分析研究对方和自己。每个人都用好奇的眼光观察四周，打量对方。似乎到了一个普遍进

行忏悔的时刻，大家又说又写，在社会面前反省自己，常常怀着痛苦的心情，感到切肤之痛。那些从不怀疑自己持有某种观点的人，面临着千百种新的观点。有一些人想，那些行为不轨、不安份守己乃至流氓地痞之类的家伙，由于心怀不满和仇恨，正在蠢蠢欲动，进行攻击。他们想，进行这种攻击的只是社会中的某些阶级，他们造谣生事，百般指责，在公众中散布流言蜚语，但现在这种错误的行动也已破产，大家不大去责怪它了；大家理解，也明白：分析研究对于分析研究者本身也是不可能手下留情的，因而最好多了解自己，不要去向作家先生们发火，他们毕竟是最平和的人，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不过有些先生感到最苦恼的是好像没有人理睬他们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被迫与公众之间造成麻烦，关系不明朗，不愉快。总的来说，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不明不白的、至今无法解释的小插曲；不错，如果把这些插曲看成是这些深受委屈的先生的一种生理现象，那是非常有趣的。这是非常有趣的特殊的典型。其中有些人大声疾呼，反对普遍的道德败坏，礼教废弛，其原因盖出于奉行一条特别的守则，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论牵涉到什么人均不闻不问。为什么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听任这本书出版，于我都不相干。另外有人说，即使是这样，世界上仍然存在着美德，在许多劝世和说教的作品中，主要是在儿童读物中，都详细地作了叙述，雄辩地作了证明，因此大可不必过虑，不必去呼吁，利用它的神圣的名号也是徒然。当然，这样一类先生，是非常需要美德的，他们好像置身在去年结的橡实里面（同时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想到谈美德问题）；可是在

听到第一个人叫喊一声以后，这位先生开始担心起来，行动起来，自以为是不道德而开始大发脾气。这时另外有一位先生，也有一副非常令人尊敬的外表，一直过着安宁平静的生活，他看着上面所说的那位先生，突然之间毫无来由地激动起来，也大发脾气，到处宣扬他为人正派，受人尊敬，他不允许别人侮辱他。还有几位这样的先生甚至经常反复宣称自己是正直的高尚的人，他们本人极其严肃地认为自己所说的那些机智玄妙的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假如他们有一天认为他们可尊敬的大名被随随便便地念了出来，没有给以应有的尊重，那他们是要最最严厉地发怒的。最后出来第三个人，他已到中年，心地善良，甚至非常通情达理，他突然四处散布说，他历来奉为最高美德和行为规范的种种，不知道为什么转眼之间变了质，既非美德，也非规范，而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但绝不是好东西；干这些事的就是某某、某某这些人。总而言之，许多人，非常多的人，感到十分痛心，他们敲响警钟，奋起斗争，大肆鼓吹，奔走呼号，最后弄得连自己都为这种呼号感到羞愧。现在这种事倒是少多了……

近年来几个慈善团体和学术团体的成立，文学和学术领域内富有成效的活动，科学界和文学界几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新的名字的出现，几种新书和新的刊物的出版，有力地吸引了并且继续在吸引着公众的注意，深获他们的好感。责备我们的文学在上一个季节里毫无作为，毫无成绩，是极不公正的。几种定期出版物上发表的几部中篇小说和长

篇小说，大获成功①。杂志上也登出了几篇好文章，主要是学术论文、文学批评、俄国历史和统计学等方面的文章，也出版了几种历史和统计方面的单行本和小册子。斯米尔金②出版俄罗斯古典名著的计划已顺利实现，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并将不断地进行下去。克雷洛夫的全集③已经问世。报刊和其他出版物的订户大幅度地增加，各个阶层普遍有了读书的要求。艺术家们的铅笔和刀也没有闲着，别尔纳尔兹基和阿庚两位先生美妙的事业——《死魂灵》的插图——即将完成，对两位艺术家精益求精的态度无论怎么赞扬都不能说是过分的④。有几幅插图极为精致，很难要求有更好的了。米·涅瓦霍维奇⑤是我们目前独一无二的漫画家，孜孜不倦地在继续画他的《混乱》。刚开始时，这种出版物以它的新奇罕见引起了普遍的强烈的兴趣。确实，很难设想有比现在更加合适的时机造就出作为艺术家的漫画家来。社会中所涌现和流逝的思想不计其数，虽然我们常常听到有人问：能说些什么又能写些什么呢？但在题材上是用不着伤脑筋的。越是有才能的画家，他向社会表达思想的手法也就越丰富，他面前不存在障碍，没有常见的

---

① 作者此处所说的“上一个季节”是指1846年秋天至1847年6月这段时期，其间发表的中篇小说有作者本人的《普罗哈尔钦先生》，格里戈罗维奇的《乡村》，长篇小说有赫尔岑的《谁之罪》，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等。

② 亚·斯米尔金（1795—1857）：俄国的书商。

③ 伊·克雷洛夫（1768—1844）：俄国作家。此处指他的三卷本全集，1847年圣彼得堡出版。

④ 亚·阿庚（1817—1875）：俄国画家，为果戈理的《死魂灵》画成一百幅插图。叶·别尔纳尔兹基（1819～1889）：俄国木刻师，阿庚所作的插图由他刻在木板上。

⑤ 米·涅瓦霍维奇（1817～1850）：俄国画家。

困难；对他来说题材是取之不尽的，俯拾即是。在这种时代，画家无论想要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养料，一切都可以议论。何况每个人都有以某种方式表达意见的要求，每个人也都有听取并且了解别人意见的要求……关于涅瓦霍维奇先生的漫画，我们下一次更加详细地来谈一谈①……这个问题比初看起来要重要得多。

四

6月15日

六月，时当盛暑，全城空无一人。大家都住在别墅里，享受着大自然的乐趣，醉心在新的感受之中。当咱们的彼得堡似乎出其不意地突然显示出它的神威和力量，披上一层翠绿的颜色，长出嫩叶，浓妆艳抹，繁花似锦时，大自然中却有一种天真得不可理解、甚至令人感动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时候想起一个女孩子，病体虚弱，面容憔悴，你看着她时有时会觉得可惜，有时会生出一种怜爱之心；有时你根本没有注意她，她却在转瞬之间出乎意外地突然变得非常美丽，叫你无法形容。你在惊奇之余忍不住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得她这双总是忧郁的如在沉思的眼睛放射出灼热的光芒？是什么东西让她的热血涌上这苍白的脸颊？是什么东西使得她的柔和的面容洋溢着激情和希望？为什么她的胸脯这样高高地耸起？是什么东西这样突然地唤起这个少女的力量、生命和美，并形之于色？是什么东西使得她的脸上露出这样的微笑，并以这种光明灿

① 以后作者没有再谈。

烂的笑使她充满了活力？你在四周围打量了一番，你在寻找什么，你想解开这个谜……可是过一会儿，也许到了明天，你见到的又会是同样忧郁的如在沉思的失神的目光，同样苍白的脸孔，同样已习以为常的温顺而腼腆的举动，疲弱无力，无法排遣的苦闷，以至因片刻的激动而遗留下来的极为痛苦的悔恨的痕迹。但是比喻有什么用！现在有谁想要它？我们住到别墅里去，是为了消极无为地过几天日子，不作比较，不带先入之见，没有什么考虑；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休息休息，尽量放松自己，把一些不必要的忙忙碌碌的生活小事和无关紧要的东西搁进过冬的房子里去，到适当的时候再说吧。可是，我却有一位朋友，前两天认为我们肯定不会很好地放松自己，我们的休息也会弄得十分辛苦，不会享受，反而心神不安；我们的休息会忽冷忽热，提心吊胆，愁眉苦脸，不能叫人满意；同时我们又会进行分析比较，又会疑惑不定，背后又另有想法，手上又总有永无休止没完没了挥之不去的生活琐事。而最后，如果我们准备去休息，去放松自己，就会像去办一件忍辱负重的大事一样；如果我们，比方说，想要去享受大自然的乐趣，那么好像在上一个星期就已经安排进了工作日程表：哪一天几点钟，我们将去享受大自然的乐趣。这实在使我想起了一个刻板的德国人，他从柏林出来的时候，极其平静地在记事本上写了一句："路过纽伦堡城时，万勿忘记结婚。"当然，这个德国人的脑子里首先有一个体系，他感觉不到事情如一团乱麻，他尊重这个体系；然而实际上不能不认识到我们的行动有时是没有任何体系可言的，结果就弄成好像是按照东方的宿命论观点来办似的。我这位

朋友的看法有部分是对的，我们好像在拉生活的缰绳，尽自己的义务，费了很大的力气，已经不能支持了，一认识到全身无力，疲惫不堪，只会感到羞惭。难道我们真的想去别墅里住着休息，去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吗？先请你们看一看吧，哪一样东西我们能不带出城门去的。过冬用的旧物不仅不能辞退，何况多年来劳绩卓著，相反，还要补充新的，把岁月寄托在回忆往事上，老掉牙的流言蜚语，多年前的生活琐事，都会当作新闻。否则就觉得寂寞，否则就得体验体验露天里听着夜莺的鸣啭声打牌的滋味，看会有什么事发生。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大适合去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加上咱们的大自然也好像深知我们的天性，不记得把世界安排得更美好些。比方说，在我们身上养成这么一种顽固不化又极叫人讨厌的习惯（当然，在咱们共同的行业中，这种习惯也许能算是有用的）——经常的，每时每刻毫无必要却出于无意识地去查对自己的印象，不厌其烦地反复加以考虑，有时只考虑眼前的和今后还没有到手的享受，估算它的得失，过早地为此感到满意，想入非非，陶醉在虚幻的想象之中，到后来自然不能拿它当作实有其事。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摘一朵花在手里揉着，把它弄碎，想尽情地闻一闻它的香气，可是事与愿违，我们却只闻到一股恶臭，于是就口出怨言了。其实，如果一年中这几天不归我们支配，不用五彩缤纷的自然现象来安抚我们那永远不能满足的直接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的欲望，很难说我们会发生什么事。好像要从打油诗里去发掘韵律那样不停地去追求新的感受，因渴望直接参与外界的活动而苦恼，最后又对自己的幻想，自己头脑里奇怪的想象，自己的愿

望，自己目前为力图改善萎靡、空虚、灰暗的日常生活而使用的一些补充的办法害怕得要命，这样下来我们怎么不疲倦，怎么不弄得筋疲力尽呢。

而渴望参与外界的活动，在我们这里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已经无法再忍耐下去，因为大家都想要认真地干，许多人热烈地希望去做好事，为民造福；并且逐渐开始认识到幸福不在于社会允许你闲坐着不干活，为了体现多样化而养成个身强力壮的勇士，假如天上掉下来这种机会的话。幸福在于长期不倦地为事业献身，在实践中发挥我们的特长和全部聪明才智。比方说，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所谓献出一颗爱心，勤奋地去工作的。据说咱们俄罗斯人好像天生是懒汉，遇事爱往后退；如果硬要叫咱们去干什么事，那么咱们做起来全不像是那么回事。够了，是这样吗？而咱们这种不值得羡慕的民族性，有谁凭他的亲身体验可以证明是事实呢？我们近来总是在叫喊什么全国上下无人不懒惰，无所作为，每个人都发动别人投身到健康有益的事业中去；说实话，只发动别人。因此大家都抓不住把柄也没有言辞可以去责备自己的同事，除非因为他不那么好咬人，像果戈理曾经描写过的那样①。但是，先生们，为了投身到健康有益的事业中去，请你们本人迈出一步试试看，请你们说一说这件事是什么样子，随便说几句都行；请告诉我们你们做的事情，主要是让我们对这件事情也发生兴趣，也让我们亲手来做成这件事，发挥我们每个人的创造力。光

① 果戈理在中篇小说《外套》中描写了一个名叫巴什马奇金的小书吏，他一生受尽同事们的挖苦嘲弄，却不敢还嘴，即所谓"咬人"。

去发动别人的先生们，你们能不能这样办呢？不，这样办就没有什么责备的话可说了，否则只是白费唇舌而已！问题在于咱们这里的事情好像常常是自动找上门来的，事情好像是外在的，并不是咱们内心特殊的好感所引发的，而且立刻表现出了纯粹俄罗斯气派的才干：事情办得很吃力，又很糟糕，毫不惭愧，最后如同俗话所说的，就破罐子破摔了。这个特点鲜明地描绘出了咱们的民族习惯，随处可见，即使在日常生活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比如，如果我们没有条件像贵族一样住进琼楼玉宇，或者像绅士那样、像大伙儿（实即一小撮人）那样穿得整齐体面，那么我们的栖身之所常常就会弄得像一个狗窝，我们身上穿的简直就像是破烂，连脸面都不顾了。如果一个人心里不满意，又没有办法发泄，不能表现他身上的优点（不是由于自尊，而是因为人类天生的一种需要，必定会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实现并约束自己的这个“我”之故），那么他立刻会落入极不愉快的境地；不客气地说，他会变成个酒鬼，或者赌棍和在牌桌上进行诈骗的家伙，然后寻衅闹事①，直至为了维护自尊心而发疯②；同时他在心里又完全瞧不起自尊心，甚至因维护自尊心这种区区不屑一顾的玩意儿惹来闲气而感到苦恼。——你瞧，你不知不觉地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可以说是错误的，甚至是叫人难堪的，但看来是非常可能的，即：我们对自身的价值认识不足，我们缺乏必要的利己之心，以及我们不习惯于办成了事而得不到任何报酬。举一

① 屠格涅夫曾写过短篇小说《寻衅闹事的家伙》。

② 关于这一方面，作者在中篇小说《双重人格》（1846）中有比较多的描写。

个例子。有这么个一丝不苟又按部就班的德国人，你交给他一件事去办，这件事与他的志趣格格不入，不过你告诉他办好了这件事会使他摆脱困境，比如说，不仅本身不虞温饱，而且还可以养活他一家子；会使他在社会上立定脚跟，实现他所追求的目标，如此等等。这个德国人二话不说，动手就干，绝对地唯命是听，直到把事情办完；甚至在办事过程中还制订出一套新的特别的工作程序。不过，这种情况好吗？有一点不好，因为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走到了另一个非常可怕的极端，走向冷漠，麻木，有时候心目中完全没有人，只有他的程序、责任、公式和无条件地按老祖宗的规矩办事，即使老祖宗的规矩已经不合时代的潮流了。彼得大帝的改革在俄罗斯开创了自由的事业，如果民族性中有这种成份，这种常常显得天真烂漫而有时又极其可笑的成份，那他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大概德国的男子在五十岁以前都是独身，在俄国地主家里当一名家庭教师，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攒钱，最后才正式结婚，同他的以可歌可泣的忠诚等待着他并把头发都熬白了的老处女明馨成就其好事。俄国人没有这种毅力，他不是变心，就是堕落，或者闹出别的什么乱子——这里反用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谚语倒是相当合适的：德国人得了它长寿，俄国人得了它要命。咱们俄国有多少人是有钱又有心认真地在办自己的事情的，因为无论办什么事都要求办事的人有兴趣，有热情；要求他集中全副精力。因此，有多少人找到了事情做？有的事还要求先预备一笔钱，要有担保，可是有人对有些事又没有兴趣——不屑一顾，你瞧，事情就弄糟啦。结果，热望做一番事业，热望投身于实际生活，热望面对

人生，但又软弱，腼腆，畏缩不前，这样的人就慢慢染上一种称之为幻想的东西，一个人最后不成其为人，而变成了一种奇怪的中性的生物——幻想家。先生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幻想家吗？这是彼得堡的瘟疫，这是罪恶的化身，这是悲剧，是无声的、隐蔽的、阴沉的、粗野的、伴随着浩劫和惨变的、有开头有结尾又有波折的悲剧。——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开玩笑。你们有时会遇见一个精神恍惚的人，目光呆滞，脸色常显得苍白、憔悴，好像永远有办不完的非常麻烦叫人头痛得要命的事；有时又疲惫不堪，痛苦之极，仿佛刚卸下一副重担，但事实上他什么事也没有做。——幻想家的面貌就是如此。幻想家总是很苦恼的，因为他变化无常，不可捉摸：他一会儿高兴得要上天，一会儿悲伤得要落泪；一会儿出言不逊，一会儿殷勤周到，彬彬有礼；一会儿自私自利，一会儿又慷慨大方，乐善好施。这些个老兄在工作中绝对是不顶用的，尽管他们也去上班，仍然什么也干不了，只会耽误事情；说老实话，耽误事情比闲坐着不干活还要糟糕。他们对于形式上各种繁文缛节都有极深的反感，尽管如此，——实在是因为他们心地温和，宽厚，害怕被人冷眼相看，——他们却是最注重形式的人。但在家里他们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们常常离群索居，住处十分偏僻，好像远远离开芸芸众生，离开人间而蛰伏在地下似的。一般地说，当你最初见到他们时，你眼前甚至会出现一种情节剧里的情节。他们郁郁寡欢，不爱与家人说话，独自沉思默想，却十分喜爱懒洋洋的、轻松的、可供静观的、能够轻轻触动感情或引发一种感觉的东西。他们喜欢读书，随便什么书，即使是严肃的、专业方

面的书也都读，但通常翻了两三页以后就把书丢在一边，因为他已经感到尽兴了。他们的幻想是灵动飘忽，轻盈无迹的，一旦处于兴奋状态，情绪高涨，整个幻想的天地，连同欢乐和痛苦，地狱和天堂，倾国倾城的美女和惊天动地的奇功，高尚的行为和常常是重大的斗争，各种罪行和大小恐怖事件，突然之间成了幻想家的全部生活内容。居室不存在了，空间消失了，时间停止了或者疾飞而去，一点钟过得像一分钟似的。有时候在难以形容的欢乐中一连几个夜晚悄然而逝；常常在几个钟头之内，游遍了爱情的天堂，或者度过了宏伟的、广阔的、空前未有和如同梦境般奇异的壮丽的一生。由于某种神秘的天意，脉搏加快，泪如泉涌，苍白而泪水纵横的两颊像烈火似的燃烧得通红；当朝霞从幻想家的小窗子里猛然射进来玫瑰色的光芒，他脸色发白，病魔缠身，痛苦不堪，又深感幸福。他昏昏沉沉地往床上一躺，睡着时还久久地记着心里那可以触摸到的特别愉快的感觉……清醒以后的时刻是可怕的，他们的不幸是无法忍受的，于是赶紧服毒，剂量比平常增加数倍之多。又是一本书，一支乐曲，一个古老的久远的回忆，现实生活中，总而言之，毫不足道的千百种理由里只要有一种，毒药早已准备妥当。于是幻想又在平静的隐蔽的想象那花纹精细的底布上铺展开来，绚丽多彩。他垂头丧气地在街上走，不大注意四周的动静，有时候根本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存在；如果发现了什么，那么极其平常的生活小事，毫无意义的普通之至的现象，立刻会在他心里被涂上幻想的色彩。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快乐的情绪，到处都可以看到幻想中的东西。白天里关闭着的护窗板，说话颠三倒四的

老大娘，迎面走过来的手舞足蹈地在自言自语的绅士；顺便说一句，街上遇见的这许多人，以及穷人家小木屋窗口里看到的家庭生活景象，几乎全都是生动有趣的。

想象活跃起来了，立刻产生了许多故事，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现实生活时常在幻想家的心中引起一种沉重的相抵触的感受，他就急急忙忙躲进自己那心爱的神圣的角落里，那里实际上经常落满尘土，肮脏不堪，杂乱无章，垃圾遍地。咱们这位淘气的孩子慢慢地开始与大家疏远了，对共同的利益淡漠了，他的反映现实的才能不知不觉中逐渐开始衰退了。他自然而然也开始觉得他那随心所欲的想象所给予他的快感，比真实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加可爱。最后，由于这种迷误，他完全丧失了道德感；一个人没有它就不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美丑作出判断。他惘然不知所措，六神无主，错过了真正幸福的时刻，在冷漠之中他懒洋洋地跷起二郎腿，不愿意去了解人类生活本是在自然界和不能须臾离开的现实环境中不断地认识自己的道理。有一些幻想家甚至为自己的幻觉产生一周年做纪念。他们常常记得哪个月的哪一天是他特别幸福和他的幻想使他特别高兴的日子，而假如那时候他们正在哪一条街上闲逛，或者在读哪一本书，看到哪一个女人，那么他们一定竭力去重温一年之前当日的感受，摹仿、回忆他那个已变得暗淡而模糊的幸福的每一个细节。这种生活决不是悲剧！决不是罪孽或灾难！决不是讽刺！咱们大家也决不是大大小小的幻想家！……充满了对外界的感受的别墅生活，大自然，活动，阳光，绿叶，还有女人，她们在夏天总是非常迷人，非常善良——所有这些，对于患病在身的古怪而忧

郁的彼得堡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在彼得堡，青春转瞬即逝，希望迅速凋谢，健康很快遭到损害，整个人不消几天就被工作拖垮了。太阳在咱们这里是不常见的稀客，绿叶是无价之宝，我们已经习惯于坚守在冬日的住房里，新的习惯，环境和生活的变动，不可能不对我们产生十分良好的影响。城市是这样的繁华又这样的空虚啊！虽然有一些怪人喜欢它的夏天胜过别的季节。何况我们可怜的夏天是这样的短促,你简直不知道树叶子怎么一下子就黄了,少得可怜的最后的几朵花怎么就谢了，天气又潮湿起来，雾气迷漫，多病的秋天又来了，生活又同以前一样开始忙碌了……前景并不叫人愉快——至少眼前是如此。

1847 年

小 小 的 图 景

一

夏季，休假，尘土飞扬，热不可挡；热不可挡，尘土飞扬。待在城里受不了。大家四散而去。连日来想动手把编辑部积压的稿件都看完……不过关于稿件的事暂且放一放，虽然这方面是有话可说的。想透透气，放松放松，自由一下，可是没有空气也没有自由，一个人却毫无目的地在满地是沙子和石灰浆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被谁欺侮了似的——不错，就像是这样的感觉！大家明白，只要找到一个什么人向你赔不是，气就消了一半了；而如果压根儿找不到这样的人，那就更加感到受了委屈了……

这几天我经过涅瓦大街的时候，总躲开太阳地，在树荫底下走。大家知道，在涅瓦大街过马路时总要十分小心，要不然会当场给轧死——你得躲闪着走，要看准了，穿过危险的路段之前要选好适当的时机，要等那一辆接一辆、走成两列或三列的飞驰而来的马车过去，稍为等一下也好。冬季，比方说在圣诞节前两三天，过马路特别有意思：你得

冒很大的危险，尤其是寒冷的雾气在天还没有大亮就笼罩着城市的时候，三步之外就看不清楚行人。在这种时候，你吊儿郎当地从最早向警察桥方面驶去的一列轿式马车和出租马车前边溜过去，还沾沾自喜地以为你并不感到可怕，因为马蹄声、车轮的辘辘声和马车夫嘶哑的吆喝声都已落在你的后面。但是且慢高兴，你只不过走到了危险的人行横道的中间，接着而来的就是危险和完全不可捉摸的前景。你提心吊胆地向四周围很快看了一眼，急忙考虑怎么样从那一列向阿尼契科夫桥驶去的马车前面穿过去。但是你感到没有时间考虑了，何况还有这个要命的大雾，你只听见马蹄声和吆喝声，周围只能看到丈把远的地方。而突然间从浓雾中出其不意地传来急促、密集、渐行渐近的响亮而清晰的声音，这时显得凶恶而可怕，简直好像六七个大汉在木桶里用乱刀剁白菜一样。“躲到哪里去？前进还是后退？来得及吗？”算你走运，留在原地没有动弹，因为突然在离你只有一步之遥的浓雾中，现出一个灰色的马脸。这是一匹快马，脸上喷着热气，以铁路上特别快车的速度向前飞奔，马勒上都是白沫，马轭似要分离而去，缰绳拉得笔直，漂亮的健壮的马脚每一举步就迅速、均匀而坚定地跨过丈把远的距离。马车夫拼命地大喝一声，只见眼前一闪，转瞬之间又没入浓雾之中，马蹄声、乱刀剁白菜声、吆喝声又随之消失，如同一幕幻影。十足的彼得堡的幻影啊！你划了一个十字，几乎小看了一分钟之前使得你十分害怕的这一列马车，你迅速走上了想要达到的街对面的人行道，全身还因为刚才经历的惊险的一幕而发抖，——怪事，——同时不知道为什么从中感到一种快慰，这绝不是因为逃脱

了危险，而是正好因为遇到了危险。这种快慰是反动的，我不想争论，而且在你一生之中是无益的，相反，你应该为此而表示反对，不应当觉得快慰，因为快马充其量并非自由派，它使你想起骠骑兵或者饮酒作乐的小商人，因而会想起不平等、厚颜无耻、专制等等。我知道，我不想争论，但现在我只想就此带住了。就这样，前些天我以冬季所养成的那种小心谨慎的心理穿过涅瓦大街时，忽然从沉思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在人行横道中央站住，非常奇怪。一个人也没有，一辆马车也没有，哪怕有几辆玎玎珰珰响的轻便马车也好呀！两旁大约五十丈之内一片空空如也，简直可以站在那里同一位朋友讨论俄罗斯文学——安全极了！非常可惜。什么时候能有这种机会呢？

尘土飞扬，热不可挡，奇怪的气味，挖得乱七八糟的马路，正在改建的楼房。越来越多的建筑物的门面在改旧翻新，为了讲究，为了表现特色。我对当代这种建筑艺术感到惊奇。而且彼得堡全城的建筑也非常独特和新奇，常常使我吃惊——因为自从建城以来，它的毫无特色毫无个性的建筑已经表露无遗。从好的方面来说，它本身的特色大概就在于这些腐朽的木头房子，甚至在最为繁华的街道上，依旧安然无恙，同高楼大厦并列在一起，会突然使你感到触目惊心，仿佛一座大理石的宫殿旁边堆着几根圆木似的。说到宫殿，那么它们也暴露了毫无特色的思想，显出了整个彼得堡时期自始至终的本质中那否定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城市像它这样。因为从建筑学方面来看，它是世界上各个时期、各种流行样式的各种建

筑学说的反映；一切逐渐采用外来的东西，一切又按照自己的办法把它弄得面目全非。你从这些建筑物中，像读一本书那样，可以掌握各种大大小小的思想，它们或者是合乎常规或者是出乎意外地从欧洲纷纷飞来，逐渐使我们为之心服，为之倾倒。例如上个世纪那些教堂建筑的缺乏特色，又例如本世纪初对于罗马风格的没有出息的模仿，以及文艺复兴时代和好像是建筑师托恩①在上一个朝代所探索的古拜占廷风格的类型。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建筑物——例如本世纪初和最初十年的医院、学校乃至宫殿——是拿破仑一世时代的风格的缘故：大而无当，虚有堂皇其表，沉闷之极，是那时候挖空心思牵强附会地想出来的，与拿破仑皇袍上的蜜蜂一样，以表示当时重新降临的时代和前所未有的万世不衰的王朝之伟大。又例如此后的房屋建筑，以及我国若干贵族世家像宫殿般的府邸，不过那是后来很晚的事了。那是模仿意大利某些宫殿或者革命前的并不那么纯正的法兰西风格。但在那些威尼斯式或者罗马式的宫殿里，百年之间，古代贵族世家已经历了几代的兴衰，或者一代一代子孙仍然在安度他们的岁月。我国只是在上个朝代建造了宫殿，似乎也以传之万世为目的，显示出那时所建立的万物的秩序是极为巩固和令人鼓舞的。而且这些宫殿的出现仿佛也显示了充分的信心：它们也将历万世而不败。可是这些宫殿差不多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兴建的，后来又是农奴解放……假如我有朝一日在这些宫殿门上读到

① 康·托恩（1794—1881）：俄国建筑界拜占廷风格的代表人物，曾建造莫斯科的大克里姆林宫和兵器馆等。——译者注

设有游乐园的小客店或者法兰西大旅馆招徕旅客的招牌，我会觉得非常之悲哀。最后，又例如当代大旅馆的建筑——那已经是求实的美国风格，有几百个客房，大工业企业，因此立刻可以看出我们有了铁路，我们突然之间也就不由自主地成了求实的人了。而现在，现在……你确实不知道怎样来说明我国当前的建筑。一片混乱，如同当前的时代一片混乱一样，是相适应的。盖了许多非常高（首先是高度）的居民楼，据说非同寻常的薄壁结构，造得又很简陋，楼房的立面却打扮得叫人叹为观止：这里是拉斯特列利①，那里又是晚期的洛可可，总督府②的阳台和窗子，必定是小圆窗，而且必定是五层楼，而所有这些都摆在同一个立面上。“伙计，你不一定给我安什么总督府的窗子，因为我比起他们那个穷得没有裤子穿的总督，要差得多了。哎，你无论如何要把我迁到五层楼里去——放人进去住；窗子是窗子，楼房总归是楼房，我不能因为一个小玩意儿把我们的根本都丢掉。”其实，我不是彼得堡的小品文作家，我不是专门来谈这个问题。我开始时说的是编辑部的稿件，却扯到旁的事情上去了。

二

尘土飞扬，热不可挡。据说要开放几个花园和娱乐场所，让留在彼得堡的人进去“呼吸”新鲜空气。我不知道

---

① 瓦·拉斯特列利（1700—1771）：俄国巴罗克风格建筑师，曾建造彼得堡的冬宫。——译者注

② 指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的官邸，初建于814年，两次毁于火，现在的建筑于1424年完工。——译者注

那些地方有没有什么空气呼吸，但我哪儿都没有去。在彼得堡待着要好一些，闷热一些，无聊一些。你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一个人自由自在——这比起彼得堡游乐园里的新鲜空气要好一些。何况城里面一下子开放了许多处花园，那里完全可以随便进去，没有人过问。现在几乎在每条街道上都可以看见一些大门口贴着路标："旅馆花园由此入内"，门口有时还堆着石灰和砖头。院子里在四十多年前盖的旧的厢房前面，隔出了一个小花园，大约十步长，五步宽，这就是目前所谓的"旅馆花园"。请你们说说，为什么彼得堡的星期天要比平日无聊得多？是酒喝多了吗？喝醉了吗？是因为涅瓦大街上明亮的……黄昏时躺着许多醉汉在呼呼大睡，那是我亲眼所见的！我没有想到。工人中出来闲逛的人并不妨碍我，我现在留在彼得堡以后，对他们也完全习惯了，虽然在以前是受不了的，甚至还觉得可恨。他们每逢假日喝得醉醺醺的，有时成群结队，在街上横冲直撞——并非成心闹事，而是因为喝醉以后不可能不碰着人撞着人；他们说的话不堪入耳，尽管有一批一批孩子和妇女不断地从他们面前过去——并非不顾羞耻，而是因为喝醉的人不可能使用别的语言，除了下流的字眼之外。正是这种字眼，完整的语言，我不久之前才弄明白，是最方便又最富特色的语言，对喝醉酒的人甚至稍微有点醉意的人最为合适，所以这种语言不可能不应运而生；假如一句也没有，那就一定会把它创造出来。我这样说绝不是开玩笑。请你们考虑考虑：大家知道，一个人喝醉的时候，首先是舌头在嘴里转动不灵，像被捆住似的，他的思想和感觉都挤到了嘴边；或者他还没有喝得酩酊大醉，而挤在嘴边的思想比平常差

不多增加十倍，因此自然而然要寻找一种适应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状况的语言。这种语言在俄罗斯八百年以前就已经找到并广泛应用了。它只不过是词典上不收的一个名词的称呼，因此这种语言总共只有一个字，发音特别方便。有一个星期天，快到深夜了，我恰好同六个喝醉的工人一起走了十五六步路，我忽然大悟，只要一提这个名词，而且音节是极短的这个名词，就可以表达全部思想、感觉甚至一些深奥的论断。你听其中一个小伙子使劲喊出了这个名词，以表达他对早些时候他们共同谈话时所涉及的问题的意见，即他的最为鄙视的否定的态度。第二个小伙子接着也把这个名词喊了一遍，作为对他的回答，但语调完全不同，因此意思也不同——他所表示的意思是对于第一个小伙子的否定态度是否正确极为怀疑。第三个小伙子突然对第一个小伙子生起气来，非常激动非常急躁地加入他们的谈话，朝他大喊一声，用的是同一个名词，可是它的意思是骂他，是很厉害的骂人的话了。这时第二个小伙子又对第三个小伙子发怒了，认为他在欺侮他，要加以制止，想说的意思是："伙计，你干吗这样骂人？我们平心静气地谈话，你这是从哪里跑出来，跑到这里来骂娘！"就是这么个意思，他说的也只是一个词，一个犯禁的字眼，同一个事物的毫不复杂的单音节的名称，也许他还抬起手来抓住了第三个小伙子的肩膀。这时第四个小伙子，他们这一群中间年纪最轻的，一直没有说话，好像突然之间想出了解决他们最初碰到的难题的办法，他们的争论就是因此而引起的。他高兴极了，忽然举起双手大喊……我有办法啦，怎么样？有了，有了？不，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什么办法；

他也只是重复了这个词典里不收的同一个名词，只是一个词，总共只说了一个词，不过是兴奋地喊出来的，是在狂喜中尖叫出来的，但似乎力量太大了，因为第六个小伙子，年纪最大而又闷闷不乐，对此似乎“无动于衷”的那一个，立刻给这个不懂事的小伙子泼一桶冷水，他对着他也重复了这一个词，声音是闷闷不乐的，但有教训的口气……仍然是这个在妇女面前忌讳的名词，但他说得清楚而准确，就像是这样的意思：“你喊什么，把喉咙喊破了！”就这样，他们没有说一句别的话，只把他们所爱用的这样一个字眼重复了六次，每个人轮着来，一个接一个地说，彼此之间完全理解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实。“行啦！”——我突然毫无原由地向着他们大喝一声（我走在他们六个人中间）——“一共只走了十步路，却重复了六次（那个字眼）！这多可耻！喂，你们不害臊吗？”

六个人一下子都瞧着我，好像在观察一个怪物一样，有一会儿都不说话。我想把他们骂一顿，但没有骂出口，只有一个走出十步远的年轻小伙子，忽然转过头来，一边走一边冲着我喊了一句：“如果你数出我们说了六次，那么你本人不是明白了它七次吗？”

轰的一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六个人走了，再也没有理睬我。

三

不，我不是在说这些闲逛的人，我之每逢星期天感到特别的无聊，也不是他们的缘故。不久前我出乎意外地发现，彼得堡小市民和工人中间，有一些男人滴酒不沾，即

使在星期天也绝对的"戒酒"。使我感到惊奇的不只是这件事，而是他们的人数比我至今所想的似乎要多得多。嘿，这些人在我看来比那些喝醉了酒游逛的人更加无聊，而且没有人去可怜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去可怜他们，因此我的脑子里就常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一到星期天晚上（平日根本见不到他们），这些滴酒不沾的人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忙着工作，这时候就像潮水似的涌到街上来了。他们上街就是逛逛。我发现他们从来不上涅瓦大街来，大多在家门口附近遛一遛，或者带着全家上什么地方串门回来顺便在外边"凉快凉快"。（彼得堡有家眷的工人也非常之多。）他们不急不慢地走着，脸孔板得极其难看，简直不像在逛马路，而且彼此间也很少说话，特别是丈夫和妻子之间几乎一句话也没有，可是却穿得整整齐齐。衣服旧了，料子也不好，女人身上穿的布料是拼起来的，但是都洗刷得干干净净，就为了过这个假日，又好像专门为了这个时刻一样。有的人穿俄罗斯的连衣裙，许多人却是德国人的打扮，还留大胡子。最可叹的是他们似乎一本正经实实在在地认为这样地走来走去会享受到确确实实的星期天的愉快。嘿，在这种空空荡荡、寸草不生、尘土飞扬、而且在日落以后仍然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有什么愉快可言？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仿佛是天堂；每个人都得其所哉。

他们常常带孩子出来；彼得堡的孩子也非常之多，还有人说，这里的孩子死得也非常多，简直吓人。我发觉这些孩子的年龄大多很小，一两岁，刚会走路，或者还不会走路。稍为大一点的孩子这么少，是不是因为他们活不到那个年纪就夭折了呢？这时我在人群里看见一个工人，单

身，却带着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两人都很孤单，他们的样子也显得很孤独。工人大约三十岁，面容清瘦，憔悴。他是一身过节的穿着：德国式的外套，线缝都磨平了，纽扣是松散的，领子上满是油污；裤子是在旧货市场上转手买来的，“于无意中得之”，不过尽量刷得干干净净。细布的衬衣和领带，礼帽的帽筒，都被揉皱；颏下留着大胡子。他大概是哪个铁工场的钳工，或者在哪个印刷所里做工。脸上的表情是阴郁的，忧愁的，严厉的，差不多是凶恶的。他手上牵着孩子，孩子跟着他，趺趺撞撞，走得东倒西歪。这个男孩两岁多一点，身体很弱，脸色十分苍白，穿一件小长衫，脚上的靴子镶着红边，帽子上插一小支孔雀的花翎。他走累了，父亲跟他说了一句话，也许只是想说句话，结果却好像吼了他一声。孩子不作声了。但是走不到五步，父亲弯下身，小心地把他抱在怀里，又向前走去。孩子像往常那样信任地紧贴在他身上，右手搂住他的脖子，以稚气的好奇的目光凝视着我，仿佛在说：“为什么你跟在我们背后，又这样注意我们?”我朝他点点头，微微一笑，他却皱着眉头，把父亲搂得更紧了。看来两人是好朋友。

在马路上闲逛的时候，我喜欢观察那些完全陌生的行人，研究他们的脸色，猜想他们是什么人，生活过得怎么样，做什么工作，这个时候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关于那个带着孩子的工人，那时我认为他的妻子刚去世一个月，不知道为什么我肯定她是死于肺结核。留下的孩子没有人照看（父亲一个星期都在工场里做工)，暂时由一个老婆婆领着。她住在地下一层，他们租了一个小房间，也许只是半

间。今天是星期天，父亲带着儿子出了远门，到维堡区死者留下的唯一的亲人，说得明白些是到她的妹妹家去了，从前是很少来往的。她嫁给一个肩章上镶着横杠的军士，住在公家的宿舍大楼里，也是地下一层，但是独门独户。她为死者伤感了一番，但为时并不太久。他在做客时大概也没有太伤心，但一直闷闷不乐，很少说话，要么也只说些专业方面的实际事务，不过没有几句也就不说了。大概也摆出茶炊，咬一点方糖喝着茶。儿子一直坐在屋角的凳子上，愁眉苦脸地不愿见人，最后竟打起瞌睡来了。姨妈和姨夫很少理睬他，不过最后给了他牛奶和小块面包。一直对他漠不关心的军士，这时才开始油嘴滑舌地说了几句孩子的事，表示亲热，但说得十分粗俗，叫人听了不舒服，他自己（只有他自己）却放声大笑。做父亲的这时不知道为什么板起脸孔向他的孩子大喝一声，吓得孩子马上要拉屎，父亲当即把他从房子里弄了出来，沉着脸，一声不吭……告辞时也像说话时那样沉闷，拘束，合乎所有的礼仪。父亲把孩子抱在手上，从维堡区回到铁厂街去。明天又得上工，孩子要交给老婆婆。就这样你在路上走呀走呀，脑子里尽在想着这些毫无内容的景象来消遣。其中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可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因此每逢星期天，假日，在彼得堡尘土飞扬的忧郁的街道上，就觉得苦闷。怎么，在彼得堡忧郁的街道上，你们什么都没有想吗？我觉得这是一座最叫人忧郁的城市，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不错，平日也有许多人带孩子出来的，但是每到星期天傍晚，他们上街的差不多要比平日多上十倍。他们是多么瘦弱，多么苍白，病恹恹的，没有血色；他们的小脸又

多么忧郁，特别是那些还抱在手上的孩子。能下地走路的，则脚步踉跄，摇摇晃晃，东倒西歪的。不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穿得整整齐齐。但是，我的天哪，孩子是花朵，是春天树上长的绿叶，他们需要阳光，空气，广阔的天地，新鲜的养料；这些东西都没有，却只有发着酸臭或者充斥着白菜气味的地下室，夜间可怕的恶臭，粗劣的食物，蟑螂和跳蚤，阴冷和四壁散出的潮气，院子里则是尘土、砖头和石灰。

可是他们喜欢自己苍白和病弱的孩子。这里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很可爱，穿着新连衣裙，急急忙忙向坐在大门口的妈妈奔去。她们有一大堆人聚在那里聊天，来自大楼里的每一家。做妈妈的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在十步远的地方玩耍着的小女孩。孩子弯着腰捡起一个什么东西，一块小石子，两只脚不小心踩住了裙子的下摆，怎么也站不起来，努力了一两次，跌倒了，哭了起来。妈妈欠起身想扶她，我却先把她搀起来了。她站直了身子，很快地看了我一眼，显出好奇，眼睛里还含着泪水。由于害怕，也有点孩子特有的害羞，她突然扑到妈妈的怀里。我走过去，很客气地问孩子有几岁了，她的妈妈回答时也很客气，但很拘谨。我说我也有一个这样大的小女孩，这时我听不到答话了，做妈妈的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你可能是个好人，只不过你站在这里干吗，赶快走呀。"所有聊天的女人也不作声，好像也都这么想。我用手碰了碰帽檐，走了。

这里是另外一个小女孩，一直被妈妈牵着走，到了热闹的十字路口，却落在妈妈后面。不错，她的妈妈忽然看到十五步以外的地方，一个要来看望她的女朋友正迎面走

来，她想着孩子自己能认得路，就放开她的手，跑上前去迎接客人。孩子突然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上，吓得大叫，哭着去追她的妈妈。

一个过路的不相识的白发老人，小市民，留着大胡子，在路中间一下子把跑着的他不相识的女人拦住，抓住她的手：

"你跑什么！看你的孩子在后面哭；这不行，会把孩子吓着的。"

女人本想狠狠地骂他，可是没有；她明白过来。她没有怨言，也没有不耐烦的表示，握住了跑到身边的小女孩的两只手，然后稳重地向她的女朋友走去。这个小市民一丝不苟地等到最后才走开了。

空洞无物、毫无内容的小小的图景，这种东西竟然也写到日记里。以后尽量去写比较严肃的题材吧。

1873 年约 8 月

带着一只手的男孩

孩子们真奇怪，常常会进入你的梦里，来到你的眼前。在枞树晚会之前和圣诞节前夕开枞树晚会时，我常在街角上遇见一个小男孩，最多只有七岁。在寒风刺骨的天气里，他穿得几乎像夏天一样单薄，只是他的脖子上缠着一块旧布，这说明打发他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人给他装扮过。他身上只“带着一只手”；这是一句行话，意思是求人施舍。这句行话是这些孩子自己发明的。像他这样的男孩很多，他们老在你们家那条街上转来转去，并且悲哀地呼喊着背熟的几句话；不过这个小男孩没有呼唤，却不知道为什么天真地、羞怯地说话，表示信任地直看着我。看样子他是刚开始干这一行。我详细问他的情况，他只回答说，他有一个姐姐，失业在家，又生了病。这也许是真的，只不过我后来了解到，这样的男孩数不胜数；即使是在寒风刺骨的天气里也把他们放出来，只“带着一只手”，如果他们一个钱也要不到，等待他们的无疑是一顿痛打。孩子要到了几枚钱，便带着一双冻得通红的手回到某个地下室，那里有那么一伙懒汉正在酗酒，他们当中有些人“等不及星期天，星期六就从工厂出来，不到星期三晚上是不会再去做工

的”。和他们一起在地下室酗酒的还有他们那些饥饿的挨打的妻子，他们那些抱在怀里没有奶吃的孩子也在这里尖声哭闹着。酗酒，混乱，堕落，而主要是酗酒。他们立刻派小男孩揣着讨来的钱去小酒馆，他又拿来了酒。为了寻点开心，他们有时也给小男孩嘴里倒上半瓶烧酒，当他一口气憋住，几乎失去知觉倒在地上时，他们就哈哈大笑。

……他硬着心肠灌了我
一嘴可恶的烧酒……

当他再稍为长大一点，他们就很快找了个工厂把他打发去做工，但是他挣到的工钱，仍然要拿回来交给这些懒汉，他们又把它统统喝光。然而在进工厂以前，这些孩子也逐渐变成了十足的罪犯。他们在城里四处流浪，知道各处的地下室，知道哪里可以钻进去，人不知鬼不觉地过夜。他们当中有个孩子在一个扫院子的工人的筐子里接连住宿了好几夜，却没有被这个人发现。他们自然而然就逐渐变成了小偷。甚至八岁的孩子也有了强烈的偷窃的欲望，有时候他们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这是犯罪行为。他们忍受一切——饥饿，寒冷，殴打，最终只是为了一件事，即为了自由，因而常常摆脱这些懒汉的控制，外出流浪。这是些没有受教育的人，有时候一无所知，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是哪个民族，不知道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国君；甚至听到他们的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也加以传播，而这一切都是事实。

1876年1月

在耶稣身旁过圣诞节的小男孩

我是写小说的，我却好像编写了一个人的“历史”。为什么我用“好像”这个词，因为我知道自己是编写了，但总觉得这件事从前在某个地方确实发生过；确切地说，是圣诞节前夕，在某座大城市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里发生的。

我仿佛看到地下室里有一个男孩，他还很小，大约六岁，或者更小。这个男孩早上在潮湿寒冷的地下室里醒来。他穿着一件罩衫，在瑟瑟发抖。他坐在屋角一只箱子上，一呼吸就吐出白气，由于无聊，他故意从嘴里吐出这种白气，看着它飞出来取乐。但是他非常想吃东西。一早上他几次走到木板床旁边，他那生病的母亲正躺在那里，身子底下是一块薄得像煎饼一样的垫子，头枕着一个包袱当作枕头。她怎么会来到这里的呢?肯定是带着孩子从别的城市来的，而突然之间生了病。半间屋子的女房东早在两天前被抓到警察局里去了，住户们四散而去，这是叫人高兴的事。可是留下的唯一的懒汉，等不到过节，喝得烂醉如泥，已躺了一天一夜了。房间的另一半有个八十岁的老太婆，因为得了风湿病在哼哼，她从前在哪个地方当过保姆，这时候将要孤独地死去。她叹着气，对着小男孩唠唠叨叨地诉苦，

使得他开始害怕靠近她住的那半间屋子。他在过道里喝了一肚子的水，但是一点面包皮都找不到，第十次走到床前叫他的母亲醒来。最后他在黑暗中感到害怕，因为天早就黑了，屋子里没有点灯。他摸了摸妈妈的脸，觉得奇怪，她躺着一动不动，像墙壁那样冰冷。"这里是非常冷。"他想了想，站了一会儿，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是放在死者的肩上。后来他呵了呵手指取取暖，忽然在铺板上摸着了自己的帽子，用手探着路，轻轻地走出了地下室。他本来可以早一点离开的，但一直害怕地面台阶上那只大狗，它在旁边的门口叫了一整天。狗没有了，他就立即走到马路上。

天哪，多么大的城市呀！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情。他来的那个地方，每到夜里一片漆黑，整条街只有一盏路灯。矮小的木头房子，窗户都用木板挡着；只要天一黑，马路上就什么人也没有，大家都关在各自的家里，一大群狗就开始号叫，几百只几千只狗通宵达旦地号叫狂吠。然而那个地方是多么的温暖，他总有吃的东西，而这里——天啊，要是能吃点东西就好！可是，这里听到的是这样嘈杂的撞击和叫喊的声音，见到的是这样的明亮和这样多的人，这样多的马和马车，这样的寒冷，寒冷啊！马被赶得筋疲力尽，它们口鼻里喷出一股一股热气，又被冻住了；马蹄敲击着松软的积雪底下的石头，发出清脆的声音。人们都这样逛来逛去，天啊，都这样想吃点东西，哪怕是一小块什么东西也好。突然他的脚趾感到那么疼。身边走过一个警察，他有意扭过脸去，不理睬这个小男孩。

这儿又是一条马路，多么宽敞呀！这里确实非常拥挤；他们这些人都叫唤着，奔跑着，坐着车飞驰。多么明亮，多

么明亮啊！这是什么？嘿，多么大的玻璃！玻璃后面是一个房间，房间里竖着一株树，顶着了天花板；这是圣诞树，圣诞树上挂着很多盏灯，很多金纸和苹果，四周摆着布娃娃、小马；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得干干净净，在房间里奔跑着。他们在嬉笑，玩耍，又在吃喝着什么。瞧这个小女孩和一个男孩开始跳舞，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呀！隔着玻璃可以听见房子里的乐曲声。小男孩看着，来了兴趣，也笑开了，可是他感到手指和两只脚在发痛，双手冻得通红，不能弯曲，稍微动一动就痛。小男孩突然想起他的脚趾痛得那么厉害，便哭了起来，继续往前跑去。他又从一扇玻璃中看见一个房间，房子里也有树，但几张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馅饼，有杏仁的，红的，黄的，桌旁坐着四个有钱的太太，见到谁来了，就递给他馅饼，门一刻不停地被推开，许多老爷从门外向她们走去。小男孩偷偷地走上前，突然推门进去。嘿，都朝着他大声呵叱，挥手赶他走！有个太太很快走过来向他手里塞了一个戈比，又打开门让他出去。他吓得心惊胆战！那一个戈比马上掉了出来，沿着台阶丁零丁零地滚下去，因为他那红肿的手指已经不能握住它了。小男孩跑了出来，他急急忙忙地走，可是到哪里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又想哭，又害怕，他跑呀跑呀，风吹着他的两只小手。他发愁了，因为他突然之间感到孤单，可怕；突然之间，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一大堆人站在那里，好奇地瞧着，因为玻璃窗里摆着三个布娃娃，很小，穿着红的和绿的连衣裙，与活人简直一模一样！有那么一个小老头坐着，好像在拉大提琴；另外两个站在那里拉小提琴，随着节拍摇着小脑袋，互相对望着，动着

嘴唇在说话，的确是说话，只不过隔着玻璃听不见。小男孩开始时认定他们是活人，而当他完全猜出这是木偶时，他立刻笑了起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木偶，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他确实想哭，然而又觉得那些木偶是这样可笑、可笑。突然之间他觉得背后有人抓住了他的衣服：一个凶狠的大男孩站在旁边，突然猛击他的头，一把拉下他的帽子，他就从底下扫了那个大孩子一脚，大孩子滑倒在地。这时听到人们在喊叫，他惊呆了，跳起来赶紧就跑，一下子跑得连自己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从一扇大门底下钻进了别人家的院子，在柴堆后边坐了下来，“在这儿他们找不着，也很黑。”

他坐了一会儿，冷得全身抽搐；他害怕，呼吸都乱了。突然之间，完全是突然，他觉得那么舒服：双手和双脚突然不痛了，暖和了，那么暖和，就像在炉子上烤火；这时他全身哆嗦了一下：哎哟，他应该睡觉了的！这时候睡一觉多好。“在这儿坐一会儿再去看看木偶。”当小男孩记起它们的时候，这样想了想，笑了起来，“完全像活人一样！……”忽然他听见妈妈在他头上唱歌，“妈妈，我要睡觉了，哟，在这里睡觉多舒服呀！”

“孩子，到我那儿去参加圣诞晚会吧。”一个细微的声音突然在他头上小声地说。

他想了想，这都是他妈妈在说话，但是不，不是她；到底是谁在叫他，他看不见，只觉有一个人弯下身来，在黑暗中抱住了他，他向这个人伸出双手……突然间，“啊，多么明亮呀！啊，多么美丽的圣诞树呀！”但这不是圣诞树，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树呀！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一切都在

闪光，发亮。四周围都是布娃娃——然而不对，四周围都是男孩和女孩，通体透明，他们在他身边旋转、飞舞，他们都来吻他，抱他，举起他，于是他也飞了起来，他看见他的妈妈正在瞧着他，高兴地对他笑着。

“妈妈！妈妈！啊，这儿多好呀！妈妈！”小男孩朝她叫着，又一次和孩子们相互亲吻，他想把玻璃窗里那些木偶的事尽快地讲给他们听。“男孩子们，你们是什么人？小姑娘们，你们是什么人？”他笑着问，他喜欢他们。

“这是‘耶稣的圣诞晚会’。”他们回答说。“耶稣常常在这一天为没有圣诞树的小孩子们举行圣诞晚会……”他知道这些小男孩和小姑娘全都是他那样的儿童，只是有一部分被悄悄地放在彼得堡大小官员门口的台阶上时就已经冻死在自己的襁褓里，另一部分由于寄养在育婴堂里而在丘洪人[1]手下被折磨而死，还有一部分死在母亲干涸的胸前（萨玛拉饥荒时期），最后一部分则闷死在臭气熏天的三等车厢里。他们这些人现在都在这里，现在都像天使一样，都在耶稣身旁。他也在他们中间，向耶稣伸出两只手，为孩子们和他们有罪的母亲谢恩……这些孩子的母亲也都站在这里，在旁边哭泣；每个母亲都会认出自己的男孩或女孩，他们会飞到母亲跟前亲吻她们，用手擦去她们的眼泪，劝她们别哭，因为他们在这儿很好……

然后，第二天早上，几个打扫院子的人在柴堆背后发现了跑进来的小男孩那冻僵了的尸体；他们到处寻找他的妈妈……她死得比他更早，母子二人在天堂里上帝面前相

---

① 旧俄时期对芬兰人的称呼。——译者注

会了。

我为什么要编出这样一个与平常理性的而且是作家的日记格格不入的故事呢？何况还答应过要用大半的精力描写反映真实事件的短篇小说！但问题在于我始终觉得这一切在实际上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地下室里和柴堆后边发生的事情在实际上是可能发生的。至于耶稣举行的圣诞晚会，怎么对您说呢，我就不知道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好在我是写小说的，可以虚构吧。

1876年1月

百岁老人

“那天上午我迟到了，去得特别晚，”近日有一位少妇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我出门时都快到中午了，好像有意跟我为难似的，很多事都堆到那一天来办。单是尼古拉耶夫大街就要去两个地方，离得倒不远。先得去办公室，我在大门旁边碰见这个老婆婆；我觉得她老得不得了，拄着拐杖，弯着腰，我都想不到她有多大年纪。她走到门口，就在门角落护院的长凳上坐下来歇一歇。不过我只是从她身边走过，她在我眼前只这么地晃了一下。

“大约十分钟之后，我从办公室出来，这里过去两个门面就是一家百货店，上个星期我在那里给索尼娅定做了一双靴子，正好要去取来。我一看，这个老婆婆仍然坐在那所房子门口，还在长凳上坐着，正瞧着我。我朝她一笑，进去拿了靴子。嗳，过了三四分钟，我要到涅瓦大街去，嘿，我一看，这个老婆婆已经到了第三家，也在门口，没有坐在长凳上，门口没有凳子，就坐在台阶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她面前突然停下，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每家门口她都要坐一坐吗？

“‘老太太，’我喊了一声，‘走累了吧？’

“‘累了，好姑娘，我一直觉得累。我想，天气暖和，太阳又这么好，我就到孙女家去吃午饭吧。’

“‘奶奶，您这是去吃午饭吗？’

“‘吃午饭，好姑娘，去吃午饭。’

“‘可你这样走是走不到的。’

“‘不会，走得到。我走几步歇一歇，起来再走。’

“我看着她，感到特别的好奇。老婆婆个子很小，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却很干净。她大概是市民家庭出身，拄着拐杖，脸色苍白，发黄，皮包骨头，嘴唇没有血色，像一具干尸。可是她笑嘻嘻地坐在那里，全身都照耀着阳光。

“‘奶奶，你大概年纪不小了吧，’我自然是说着玩的。

“‘一百零四岁了，好姑娘，我只有（她也说句玩笑话）一百零四岁……你这是上哪儿去？’

“她又看着我，笑嘻嘻地。有个人同她说话，她自然高兴，只不过我觉着奇怪，一百岁的老人，还这样关心我上哪儿去，仿佛是她该问的。

“‘是这样，奶奶，’我笑着说，‘到店铺里给我的女孩儿取双靴子，拿回家去。’

“‘这么小的鞋子，你家是个小姑娘吧？你真好。还有别的孩子吗？’

“她又笑嘻嘻地看着我。眼珠子是混浊的，差不多不能转动了，但射出的目光好像是温暖的。

“‘奶奶，要是你愿意，把这五戈比拿去，买个面包吃吧。’我给了她五戈比。

“‘你干吗给我五戈比？好吧，谢谢，我收下你五戈比了。’

“‘拿吧，奶奶，别嫌少。’她收下了。显然她是不会讨钱的，也没有到这步田地，她从我手上接过钱时非常自然，完全不像是接受施舍，倒好像是出于一种礼貌，或者是因为心地善良才这么做。不过，也许她非常喜欢这种事，因为有人同她这样的老太婆说话，不单是说说话而已，还会生出怜悯之心来关怀她。

“‘好吧，奶奶，’我说，‘再见。路上要走好。’

“‘我走得到的，好姑娘，走得到的。你也到你孙女家去吧。’老婆婆弄糊涂了，她忘了我的是女儿，不是孙女，她大概以为每个人家里都是孙女。我往前走，最后一次回过头时，看见她很费力地慢慢站起来，用拐杖敲着地，沿着街道一步一步地走去。路上也许会再歇上十次，才能赶上去吃她的‘午饭’。可是她到什么地方去吃午饭呢？这个奇怪的老婆婆啊。”

那天上午我听完了她讲的故事，——是啊，不错，这不是故事，而是遇见一个百岁老人（实际上，你什么时候还能遇见一位年高百岁而且心胸如此宽广的老太太呢？）时所得到的印象——就把它完全忘记了。深夜里我读了杂志上登的一篇文章，把杂志丢在一边，忽然间想起了这个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想象出了她走到孙女家以后的情景，出现了一幅也许是非常合乎实际的小小的画面。

她的孙女们，或者是曾孙女们，她笼统地把她们都叫作孙女，她们大概是行会中人，自然也有很重的家庭观念，否则，她就不会去她们家吃饭了。她们住的是地下室，也许还承包了一家理发店，当然，她们是穷苦人，但是还能温饱，克己守法。她好不容易走到孙女家，已经快两点钟

了。她们没有等她，但是很可能非常亲切地把她迎进屋。

“啊哟是她，玛丽娅·马克西莫夫娜，进来，进来，欢迎你老人家光临！”

老婆婆笑着进了门，门口的小铃铛还拉长了尖细的声音在不停地响。她的孙女大概是嫁给这个理发师为妻，他本人还不算老，约摸三十五六的年纪。他的手艺是熟练的，尽管这种手艺不用费脑筋。他穿一件紧身的大褂，因为用多了头发油还是别的什么缘故，我不知道，油光光的像一张煎饼；另一种样子的“理发师”我还从没有见过，连他们那白大褂的领子也都一样，像是在面粉里滚过似的。有三个小孩，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一下子都向曾祖母奔来。一般地说，像这样大年纪的老婆婆，同孩子们总是非常合得来的，因为她们从内心来说与孩子非常相像，有时简直毫无区别。老奶奶坐了下来，这时主人家里有一位不知是客人还是来办事的，年纪也在四十上下，是他的一个熟人，正准备告辞。另外还有一个他的外甥，他姐姐的儿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也在他家坐着，想进印刷所做活。老太太划了十字，坐着，看着两个客人。

“啊哟，好累哪！你们家这是谁呀？”

“我吗？”客人笑着回答。“怎么，玛丽娅·马克西莫夫娜，您认不出我了？前年我还跟您一起在林子里采菌子呢。”

“噢，是你，我知道你，喜欢嘲笑人。我记得你，就是想不起你叫什么了，你这个人我记得。啊哟，我不知道怎么累极了。”

“您怎么，玛丽娅·马克西莫夫娜，一位叫人尊敬的老太太，怎么一点也没有长大，我想问您的就是这个。”客人

同她开玩笑。

“瞧我不打你，”老太太笑了，看来她很满意。

“玛丽娅·马克西莫夫娜，我可是好人。”

“同好人说话总是有趣的。啊哟，我的胸口老是闷得慌，妈呀。谢辽扎的大衣好像做起来了？”

她用手指着外甥。

这个外甥是个健壮的小伙子，长得胖乎乎的，笑得合不拢嘴，向前走了几步。他的身上是一件新做的灰大衣，穿上它就觉得高兴，平静不下来。大概再过一个星期才不会那么兴奋，现在则每分钟都要看看卷上去的袖口，翻过来的领子，还要对着镜子全身上下打量一番，觉得自尊心特别的强。

“嗳，你来，转过身去，”理发师的妻子像放机关枪似的，“老太太，你瞧，做得怎么样；这可是六卢布，就像一戈比，比较便宜。普罗霍雷奇做的，他那里的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花钱做，将来你们要哭出眼泪来的，这一件可经穿了。瞧这料子！你转过身来！瞧这里子布，多结实，多结实，你转过身来嘛！钱就这么花了，老太太，我们每个小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

“唉，妈呀，世上的东西现在都贵，什么都别沾边，你最好别跟我说这些事，也别叫我心烦。”马克西莫夫娜深有感触地说，但她一直没有缓过气来。

“好吧，行啦，”主人说，“该吃点东西了。玛丽娅·马克西莫夫娜，你怎么，好像，我看得出来，你很累吧？”

“啊，你真聪明，我是很累，天气暖和，又出了太阳，我想，去看看他们吧……躺着干吗。噢！路上我碰见一个

太太，年纪轻轻的，给孩子买了靴子，她说：‘老太太，你怎么了，走累了吗？给你五戈比，买面包吃吧……’我，你瞧，就把五戈比拿了……”

“奶奶，你还是先稍为歇一会，今天怎么憋得这么厉害啊？”主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特别警觉起来。

大家都看着她；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极其苍白，嘴唇也全白了。她也左右看了大家一眼，可是目光好像是暗淡的。

“拿去，我想……给孩子们买饼干……就五个戈比……”

她又说不下去，又喘了一口气。大家忽然都不作声，这样过了五秒钟。

“奶奶，你说什么？”主人弯下腰去听。

可是奶奶没有回答；大家又不作声，又过了五秒钟。老婆婆的脸似乎变得更加苍白了，好像一下子瘦了很多。眼珠子不转了，嘴角的微笑僵住了；她直视着前方，但好像一无所见。

“赶快去找神父！……”客人在背后突然慌慌张张地小声说了一句。

“是啊……不……晚吗……”主人含含糊糊地说。

“奶奶，啊，奶奶？”理发师的妻子突然惊慌起来，连声呼唤老婆婆，但是奶奶不能活动了，头歪在一边；搁在桌子上的右手里还捏着五戈比，左手一直放在大的曾孙米莎的肩膀上。孩子只有六岁，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瞪圆了眼睛惊奇地看着曾祖母。

“她走了！”主人直起身来，一字一板地严肃地说，并

轻轻地划了十字。

“原来这样！怪不得，我看见她身子都歪了。”客人难过地说，话不成句。他非常吃惊，不停地打量着周围的人。

“唉，天哪！是这样！现在怎么办，马卡雷奇？是把她送那里去吗？”女主人慌得手忙脚乱，说话又快又急。

“那里是哪里？”主人郑重其事地说，“在这里自己动手。你不是她的亲人吗？你得去报信。”

“一百零四岁，唉！”客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越来越觉得心里难受。他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把脸孔涨得通红。

“是啊，最近几年她对过日子不大注意了。”主人更加严肃更加沉重地说，他在找帽子，又把大衣拿下来。

“她还笑了一分钟，看她那高兴的样子！瞧手里还捏着五戈比呢！说是买饼干，唉，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好吧，彼得·斯捷潘内奇，怎么，咱们走吧。”主人打断了他的话，两人一起出了门。自然，这么大年纪了，没有人会哭她。一百零四岁，“没灾没病地去了”。女主人派人找左邻右舍来帮忙，他们听到消息后差不多都是甘心情愿地跑来了，一个个叹着气，大声叫喊着。当然，首先把茶炊拿出来放好。孩子们一脸的惊奇，躲在屋角里，远远地望着死去的老奶奶。米莎无论以后活到多少岁，都会记得老奶奶是怎么死去的，死的时候还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而当他以后死去，这世上就没有任何人记得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从前有一个这样的老婆婆，活了一百零四岁；为什么活得那么久，怎么会活到这么大的年纪，都不知道了。又有什么必要去记住呢，反正都是一样的。几百万人都是这样离去的：他们无声无息地活着，又无声无息地死去。只

不过这些百岁的老汉和老婆婆在临终时仿佛有一种叫人感动的平静的东西，仿佛有一种甚至是庄严的叫人安心的东西，因为活到一百岁，直至今天对人好像仍然会产生奇怪的作用。但愿上帝保佑善良的老百姓好死好活吧！

其实这只是一幅简单的没有情节的场景。不错，你想把一个月以前听来的故事写成更加有趣的东西，但怎么落笔呢，要末写得正好，或者不行，或者不合适，或者“写得走了样”，结果只弄成了一个没有情节的玩意儿……

1876 年

农民马莱

但以上所说全都是宗教信仰问题①，我想，大家看得太枯燥了，我来说一个有趣的故事；其实也算不上有趣，只不过是一个遥远年代的回忆，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很想在这里、在结束我们关于人民的话题的现在这时候来叙述它。那时候我只有九岁……不不，我最好还是从我二十九岁那一年说起吧。

那是复活节的第二天②。天气暖和，碧空如洗。太阳高高挂着，"暖和"，明亮，可是我心里非常阴冷。我在牢房后面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一边数着它们，一边看着监狱那坚固的圆木围墙里的洼地，我不愿意数它们，尽管已经习以为常了。按照监狱的规定，这一天还是"过节"，犯人不出工，不少人喝得醉醺醺的，到处是骂人、吵架的声音，没有一刻停止。唱下流无耻的小调，躲在铺板底下玩纸牌

① 本文是1876年2月《作家日记》中的一篇；作者在谈论作家与人民的关系时，同意作家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意见，认为俄罗斯人民虽然不识字，没有受到教育，但在精神方面（道德上）是文明的，"有教养的"。然后便写到马莱。

② 这一天是1850年4月24日。

赌博。有几个犯人因为特别倔强，被毒打得半死，一旦死而复生，清醒过来，就用皮袄在铺板上遮着，拿同房的犯人来审问，有几次还拔刀相向——在过节的两天里，这些事让我厌恶透了，难受得要生出病来。而且我从来无法忍受众人的酗酒，讨厌极了，特别是在这里，在这种地方。这两天连当官的也不来监狱巡视，不进行搜查，不来禁酒。他们明白应当让这些被抛弃的人也乐一乐，一年只有一次，否则会更加糟糕。最后我心里起了恶念。我无意中遇见一个波兰人，政治犯，名叫米什么茨基[1]；他板着脸看了我一眼，眼珠子闪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我恨这帮强盗！"他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便走过去了。我立刻回到牢房去，虽然一刻钟之前我像疯了似的从那里跑出来；那时有六个强壮的大汉同时扑上去抓住一个喝醉了的叫做加辛的鞑靼人，按倒在地，然后拳脚相加痛打一顿。他们没头没脑地打他，一只骆驼挨上这顿拳脚也会丧命。但他们明白，这个力大如牛的家伙轻易是打他不死的，所以放心大胆地使劲。这时我一回去，发现牢房墙根一个角落的铺板上，已经失去知觉的加辛，几乎没有了呼吸，躺在那里，身上盖了一件皮袄，围在他身边的人都一声不响，因为大家都坚决相信第二天天一亮他就会醒过来，"但是这样打一个人，说不定会要了他的命的。"我悄悄地回到自己的铺位上，正对着带铁栅的窗子，仰面朝天地躺着，两只手枕着脑袋，闭上眼睛。我喜欢这样躺着，因为一个人在睡觉，他们不会来找麻烦，同时思想又可以无拘无束地活动。但我没有去

---

① 指波兰政治犯亚历山大·米列茨基。

想什么，我的心里并不平静，耳边一直响着米什么茨基的话：“我恨这帮强盗！”其实，用不着描写我的印象；现在我有时每晚还梦见那些日子，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到痛苦的梦了。也许大家会注意到我至今为止几乎从来没有在报刊上谈我在服苦役时的生活。我写了《死屋手记》，那是十五年前，虚构了一个人物，一个罪犯，好像他把自己的妻子弄死了。这里顺便提一句，当作一个小故事吧。从那时候以来，许多人就以为，现在更有人认定，我是因为犯了杀妻罪才被流放的。

我慢慢地真的陷入沉思冥想之中，不知不觉地回忆起往事来了。我在四年苦役期间不断地回想起过去的事，仿佛在回忆中重温了一次我以前的生活。这些回忆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我很少有意去触动它们。开始时只是一个圆点，一根直线，有时还十分模糊，后来慢慢地变成了整整一个场面，一个强烈的完整的印象。我分析这些印象，把早已模糊的线条重新描一遍，而更加重要的是加以修正，不断地修正，这成了我的乐趣所在。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我最早的童年时代一个难以觉察的瞬间，那时我只有九岁——这一瞬间似乎被我完全忘记了，可是我那时非常喜欢回忆我最早的童年时代。我想起八月间在我们村子里[1]，那一天天气干燥，晴朗，不过有点冷，刮着风。夏天眼看要过去，很快又得去莫斯科，又要花一个冬天去学习那枯燥的法文课了，而我又非常舍不得离开农村。我朝

① 指1831年8月，作者九岁，正在图拉省卡什尔斯克县达罗沃村父母的庄园里。作者在服苦役中回忆这件事是1850年4月24日，而把它写成文字则在1876年2月。

粮仓后面走去，下了一条沟，又从沟的那一边走上一片浓密的灌木丛，我们把它叫作洛斯克，然后便是小树林。于是我躲进灌木丛里，听到大约三十步以外的不远处一块空地上，一个农民正独自在耕地。我知道他耕的是一块很陡的坡地，走马很困难，不时传来他的大声呵叱："嘎嘎！"我差不多认识每一个农民，却不知道这时在耕地的是谁，反正同我没有关系，我正一门心思想自己的事；而且我也忙着呢，因为我正在折一根硬树枝，想拿它来打青蛙。榛树的枝条都很好看，又都不禁用，远远比不上白桦树的树枝。我还在捉小甲虫和小虫子，把它们装起来，有非常漂亮的；我也喜欢身上红一道黄一道有黑斑的小蜥蜴，十分机灵，可是我怕蛇。其实蛇不像蜥蜴那样多可以见到。这个地方蘑菇也不多，要采蘑菇得到白桦林里去，我也准备去。我的生活中除了树林子和林子里长的蘑菇、野果、昆虫、小鸟、小刺猬、小松鼠，还有林子里我非常想闻一闻的腐烂的树叶子那种潮湿的气味，此外别无所爱。现在当我写到这里时，我甚至还闻到了我们村子里那白桦林的芳香，这种印象是一生都不会消失的。忽然间在一片寂静之中，我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听到有人喊："狼来了！"我大叫一声，吓得魂不附体。我一边大声叫喊，一边直向空地上正在耕地的农民身边跑去。

他是我们家的农民马莱。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名字，但大家都这样叫他——他大约五十岁光景，身强力壮，相当魁梧，深褐色的大胡子有相当多已变白了。我知道他，但在此之前几乎从来没有同他说过话。听到我的喊声，他甚至让马站住了；而当我冲出来，一只手抓住他的木犁，另

一只手拉着他的袖子时，他才看出我害怕极了。

“狼来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了一句。

他一时间几乎信了我的话，抬起头来，不由自主地四下看了一眼。

“狼在哪里？”

“喊过……刚才有人喊过：‘狼来了！’……”我含含糊糊地说。

“你呀，你呀，有什么狼，耳朵听花了；这里哪有什么狼！”他急忙小声地安慰我。可是我全身发抖，仍然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前襟，大概脸色也白得像纸一样了。他看着我，不自然地笑着，显然是为我担惊受怕。

“啊哟哟，你瞧，能怕成这样！”他摇摇头，“得了，好孩子。啊哟，瞧你是个大人了！”

他伸出手来，突然在我脸上摸了摸。

“好，行啦。唉，基督保佑你，划个十字吧。”但我没有划十字，我的嘴角在抖动，这似乎特别让他吃惊。他轻轻地伸出一根胖乎乎的手指，指甲在泥里弄得都是黑的，稍为碰了碰我往上翘的嘴唇。

“你瞧，啊哟，”他向着我微笑，像母亲爱怜孩子似的，笑容很久都停留在他脸上。“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你瞧，啊哟哟！”

我终于明白过来，没有狼，有人朝我喊“狼来了”是我的幻觉。不过，一个字一个字喊得这样清楚，而且这样的喊声（不单是喊狼来了），我以前还听见过一两次，我知道有这种事。（后来，随着童年的消逝，这种幻觉也不复存在了。）

"那我回去了。"我说，胆怯地看着他，问他的意见。

"好，你走吧，我在后面看着。我不会让狼来咬你！"他加了一句，仍然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向着我微笑。"好，上帝保佑你，走吧。"他为我划了个十字，自己也划了个十字。我走了，几乎每走十步都回头看看。马莱和他的马一直站在地里，他一直看着我，每次当我回头望的时候都朝我点点头。坦白地说，我吓成这个样子，在他面前我觉得害臊。但我一路上仍然很怕狼，一直到走上这条沟的沟顶，来到最前面的一座粮仓前才放下心来；到了这里一点也不害怕了，而突然之间我们家守院的狗伏尔乔克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扑到我身上。有这条狗在身边，我的胆就壮了，我最后一次回头看马莱，他的面孔已分辨不清，但感到他仍然在温和地向我微笑，点着头。我向他挥挥手，他也朝我挥手，然后赶起马来。

"嘎嘎！"我又听到远远传来的他的呵叱声，马又拉动木犁走了起来。

这些情景我是一下子回想起来的，我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但是所有细节丝毫不差，令人奇怪。我忽然醒觉，在铺板上坐了起来，记得当时我的脸上还挂着回忆时淡淡的笑意。我接着大约又想了一分钟。

那一天我离开马莱回到家里，没有同任何人说起我的"历险"。这算是什么历险呢？不过那时我很快便把马莱忘了。后来同他也很少见面，甚至也从没有同他说过话，不但是狼，别的什么话都没有说过。而突然之间，二十年后的今天，在西伯利亚，我想起了遇见他的事，一清二楚，毫不模糊。这就是说，这件事不知不觉中已在我心底里生了

根，自然而然，不是我有意这样做的。而在必要时，它一下子就让我记起它来。这个可怜的农奴那温和的像母亲对孩子似的微笑，他为我划十字，他向我摇头时说的那句话："瞧你吓成这样子，是个大人了！"一下子都让我记了起来；特别是他那根胖乎乎的在泥土里弄得又黑又脏的手指，它轻轻地有点胆怯地碰了碰我的颤抖的嘴唇。当然，这些动作对孩子都是一种鼓舞，但在这种场合，在只有两个人面对面时，似乎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假如我是他亲生的儿子，他必定不会用一种透露着更多光辉的爱的眼光来看我。是谁在强迫他吗？他是我们家的农奴，我尽管是他的小少爷；谁也不会知道他安慰过我，却没有因此得到奖赏。是不是他非常喜欢小孩子？是有这样的人。可是我和他是单独见面的，在空地上，也许只有上帝才从天上看见俄罗斯有一些农奴的心里，这样粗鲁的、野蛮无知的人的心里，也能饱含着如此深厚的文明人的感情，如此体贴入微的近乎女性的柔情，那时他却并不期待也不猜测能否获得自由。当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谈到我国人民接受高等教育问题时，请你们说一说，他所理解的是这个吗？

因而，当我从铺上下了地，向周围打量的时候，我记得突然感到我能够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不幸的人了，我心里装的一点点敌意和恶念也消失得干干净净。我一边走，一边注视着迎面过来的每一张脸孔。这是个农民，因受到惩罚被剃光了头，脸上有几个烙印，喝醉了酒，拉着嘶哑的嗓子高唱他的醉汉的小调。他也许又是一个马莱，因为我也无法看透他的心。那天晚上我又一次遇见米什么茨基。不幸的人啊！他不可能有什么马莱可以回忆，除了

说一句“我恨这帮强盗！”之外，他也不可能用别的什么眼光来看他们。不，那时候这些波兰人比我受的痛苦要更多！

1876年2月

信　使

我遇到这件事是在很早以前，在我的所谓史前时期；具体地说是在1837年，我大约只有十五六岁，从莫斯科前往彼得堡途中。我和哥哥两人随同先父去彼得堡，到那里的总工程学校谋求听讲的席位。那是五月间，天气炎热。我们用的马始终没有更换，几乎像步行一样，而且在驿站上一停就是两三个小时。我记得我们都厌烦透了，行程拖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到最后终于结束。那时我们兄弟二人一心向往着新生活，渴望着新事物，渴望着“美和崇高”的所有东西——那时候这两个字眼还刚刚出现，说起来一点也没有嘲弄的意味。那个时候有多少这样美好的字眼在流行啊！我们满腔热情地相信它，虽然我们两人都非常清楚地了解数学考试所要求的一切，但我们只沉湎在诗和诗人的幻想中。哥哥在写诗，每天三首，甚至在路上也写诗；我不断地在构思长篇小说，描写平静的爱情和友谊生活。那是普希金去世后的两个月①，我和哥哥在路上就商定一到了彼得堡就立刻去看普希金决斗的地方，溜进他以前住的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二人有一段时间为普希金去世佩带黑纱致哀。

房子里去，看看他临终时的房间。于是有一天傍晚时分，在驿站的一家旅店里，在哪个村子已不记得了，好像是在特维尔省，这个村子人烟稠密，相当富裕。再过半个小时就要上路了，我从窗口看到了这样一件事。

旅店的街对面就是驿站的房子。突然有一辆三匹马驾驶的特快邮车飞也似的驶到门口，车上跳下一个穿着全套制服的信使，后襟是当时流行的狭小的样式，大三角帽上插着白色、黄色、还有好像是绿色的羽毛（记不详细了，可以查问一下，但我记得有绿色的羽毛在眼前晃了过去）。信使是个身材魁梧、结实强壮的年轻人，脸孔通红。他跑进驿站的房子，大概要在那里“喝它一杯”烧酒。记得当年有个马车夫曾经跟我说过，这些信使每到一站总是要喝它一杯的，否则就支持不了“这种折磨”。这时，驿站门口又驶来了一辆三匹马驾驶的新的马车来替换，马匹矫健而剽悍。马车夫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手里拿着粗呢外套，身上穿着红衬衫，跳上座位坐着。同时信使也从房子里跑了出来，奔下台阶，就坐进了车子。马车夫赶马上路，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挥动鞭子，信使从车子里抬起身来，一句话也不说，举起右手那力大无穷的拳头，朝马车夫的后脑勺狠狠地打了下去。马车夫全身向前一倾，扬起鞭子，用尽力气给了辕马就是一鞭，三匹马就冲了出去。但这样还完全没有让信使息怒。不过这是一种方法，不是感情激动；是一种偏见和根据多年的经验得出的东西。于是可怕的拳头又高高举起，一次一次地打在后脑勺上，然后一次又一次地继续下去，直至三驾马车走得无影无踪。自然，马车夫勉强经受住了这种打击，时刻不停地用鞭子抽他的三匹

马，仿佛脑子被打得麻木了。最后他把三匹马也抽得不停地飞奔，好像发疯了似的。我们的马车夫告诉我，几乎所有的信使都是这样行路的。这一个特别，大家都知道他；他一喝了烧酒，上了马车总先动手打马车夫，而且“总是用这种方式”痛打，毫无愧色，落手平稳。拳头举起又落下，“把马车夫打出一里多路才住手。如果觉得闷得慌，说不定中途又动手打，也许老天爷会保佑马车夫。因此一当马车快驶到驿站时，他又来了劲，大约从一里开外就动手了，一边走一边把拳头举起又落下，这种方式一直继续到马车驶进驿站为止，让村子里的人都为他感到吃惊。过后脖子痛了一个月”。小伙子回到家来，大家都嘲笑他：“喂，信使把你的脖子打断了吧。”这一天小伙子也许会把自己年轻的妻子揍一顿：“恨不得把你撕碎了。”也许因此她一整天都在“瞧着，提防着”……

1876 年

被捕之夜*

4 月 22 日（1849 年），或者说得准确些是 23 日，凌晨三点多钟我从格里戈里耶夫②那里回到家来，躺下后立刻就睡着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在睡梦中觉得房间里进来几个可疑的特殊人物。马刀不小心碰着了什么，发出一声响。怎么回事？我使劲睁开眼睛，听到一个人用温和的亲切的口气喊我："起来！"

我看见面前站着街区的派出所所长或者是警察分局的局长，有一部很漂亮的大胡子。但是说话的不是他，说话的是另外一个人，穿着蓝制服，佩带的是中校的肩章。

"出了什么事？"我问，从床上抬起身来。

"奉上司的命令……"

我看见的景象的确是"奉上司的命令"：门口站着一个当兵的，穿的也是蓝军装，他身上的马刀又发出一声响……

---

* 本文是作者 1860 年 5 月写在米柳科夫女儿的笔记本上的片断回忆，题目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② 尼·格里戈里耶夫（1822—1886）：陆军中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曾写传单号召审判沙皇。同日被捕，判处劳改十五年。——译者注

“嘿，这是干什么来了！”我想，“让我……”我刚说出这两个字就被打断了。

“没事没事！您穿衣服吧。我们等您。”中校用更加客气的口气补了一句。

当我穿衣服的时候，他们看到书就收，到处翻寻；所获不多，但什么地方都翻遍了。纸张和信件已经用绳子捆得整整齐齐。这时派出所所长表现出了过人的警惕性，他爬上我的火炉，用我的长烟袋在积了多日的炉灰里掏了一阵。一个宪兵的军士按照他的吩咐，先站在椅子上，再往火炉上爬，可是炉面上不能立足，跌在椅子上，发出很大的响声，然后连人带椅子翻倒在地。于是这些警惕性很高的先生认定炉子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桌子上放着一枚早年的十五戈比铜币，已经变了形。所长仔细察看了一番，最后朝中校点了点头。

“怎么，是假的吗？”我问。

“嗯……不过，要研究研究……”所长含含糊糊地说，结果把它也当作了案子的物证。

我们出了房门。房东太太给吓坏了，她的听差伊凡虽然也十分害怕，但隐隐有一种庄重的神色，与某种重大事件相适应的庄重的神色，但并非那种喜庆的事件。她们两人看着我们出去。台阶前面停着一辆轿式马车，当兵的、我、所长和中校都坐了进去。我们朝方坦卡，朝夏园①前面的链桥方向驶去……

1860年

① 方坦卡、夏园均为彼得堡地名。——译者注

当代的一种伪善

我们有几位批评家指出，我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群魔》是利用了众所周知的涅恰耶夫①一案的情节，但他们又立刻声明，我并没有照搬或者逐字逐句复述涅恰耶夫案件中的人物和事实，我只是描写这一现象，只想说明这一事件在我国社会中发生的可能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件荒唐的事，当作莫斯科的一起个别的事件来写。从我来说，这些意见讲得都是完全正确的。我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大家都知道的涅恰耶夫和被他杀害的伊凡诺夫。我的涅恰耶夫的面貌当然是与真实的涅恰耶夫的面貌不同。我想以小说的形式尽可能明确地提出问题，并作出回答：在我们当前这个奇怪的正在转变的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涅恰耶夫——不是一个涅恰耶夫，而是一批涅恰耶夫；而且为什么这些涅恰耶夫终于能够纠集

---

① 谢·涅恰耶夫（1847—1882）：莫斯科大学生中一个秘密革命团体"人民除暴团"的头目，1869年一个叫做伊凡诺夫的团员拟欲退团，他下令予以杀害。1871年开始审理此案，被判徒刑二十年。当时《俄国世界》报载文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只会欺骗幼稚无知的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此文加以驳斥。译文有删节。——译者注

起一群追随他们的人来?

…………

请原谅，先生们（我是面向大家说话，不是针对《俄国世界》报的一位作者），“否认了事实”，然后断言“涅恰耶夫们”肯定是白痴，是“没有头脑的狂热分子”，是这样吧？这样说对吗？这里我撇开涅恰耶夫不谈，我来谈“涅恰耶夫们”，一批涅恰耶夫。是的，这许多涅恰耶夫是会变成异常阴险、极端冷酷的生物的，人性扭曲，有动机极为复杂的玩弄阴谋的嗜好，狂热地病态地要求表现个人，但是——为什么他们是白痴呢？相反，即使是他们中间的无恶不作的魔鬼，也可能是经验丰富、精明老练乃至学识渊博的人。或者你们以为知识、“科学”、学校教育（就算是大学教育）可以把青少年的心灵塑造成型，只要他拿到了毕业文凭，就等于有了一张万无一失的护身符，一劳永逸地掌握了真理，不为任何诱惑、任何邪念所动，因此，按照你们的意见，这些修完学校课程的青少年，一个个立刻都会变成好像是六根清净的小和尚。是吗？

……莫非你们真的认为那些会被我们的某一位涅恰耶夫招去入伙的小青年，必定只是一些游手好闲的家伙？我并不认为全都是这样的人。我本人就是一个老资格的“涅恰耶夫分子”。我也上过刑场。准备被拉出去枪毙；而且我告诉你们，同我一起站在刑场上的都是受过教育的。几乎每个人都读完了高等学校的课程，有几位到后来，即事情过去以后，显露了渊博的专业学识，并有几本著作。不，先生们，涅恰耶夫们并非都是不学无术的懒汉。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反驳我的意见，认为我压根儿不

是涅恰耶夫分子，我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①]。就算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吧。（虽然我认为这个称呼是不正确的，因为除了我们几个上过刑场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之外，其余绝大多数成员根本没有受到触动，没有惹上麻烦。的确，他们一向不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而在这起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事件中，问题也根本不在彼得拉舍夫斯基身上。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但是就算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吧。你们怎么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不会变成涅恰耶夫分子，即走上“涅恰耶夫的道路”呢，假如事情发生这种转变的话？当然，那时候是不可能设想的：事情怎么会有这种变化？时代完全不同。但是请让我谈谈我自己的情况。我大概永远不会变成涅恰耶夫，不过在我年轻时……我不敢说我不会成为涅恰耶夫分子。

现在我谈自己的情况，是为了取得资格来谈别人。但我接下来还是只谈自己，如果要提到别人，那么我也不会指名道姓，只是抽象地说一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案件早已成为过去，已经是一段古老的历史了，因此我重提这件旧事，恐怕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危害，何况我谈得又很笼统，很抽象。

在我们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中间（无论是上过刑

---

①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是1844年末开始在彼得堡活动的青年团体，每周在法学候补博士米·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家讨论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其中有人曾计议成立秘密革命组织，准备农民起义及建立地下印刷厂印发传单，1849年4月间被破获。123人受到传讯，彼得拉舍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21人被判死刑，后改为刑期不等的苦役。1856年获赦。——译者注

场或者未受触动的，都一样），一个“魔鬼”和“骗子”都没有。我不认为有什么人会来否定我这个看法。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大概也不会有人反对。然而我们中间还没有几个人能出来反对那时在青少年心中已埋得根深蒂固的一些思想和概念，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那时已经受到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那时还没有在欧洲成为事实，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首领们甚至还排斥它。

…………

但那时候还把问题想得非常美妙，非常高尚。不错，那时候即使是在某些领袖人物的心目中，初生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与基督教差不多[①]，并且被当作基督教为适应时代和文明社会的需要而作的修正和补充。那时候我们在彼得堡狂热地信奉这些新思潮，把它们看成最神圣、最高尚、特别是最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的东西，是全人类概莫能外的未来的法则。还在 1848 年巴黎发生革命之前很久，我们就深深受到这些思潮的吸引和影响。别林斯基在 1846 年就已经把未来“新生的世界”的真实面貌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圣洁所在告诉我了。关于现代社会的（基督教的）基础之不道德，关于宗教、家庭之不道德，关于所有权之不道德，所有这些观点，以及消灭民族以建立人类的博爱世界，心中无祖国，把祖国当作全人类普遍发展的障碍，以及其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抗拒的影响，反而由于它

---

① 法国社会主义者艾·卡贝曾著有《基督教真谛》一书，认为共产主义是地上的天国。

们的一种博大的胸怀而吸引了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无论如何，题旨显得都很严肃庄重，远远高出那时流行的观念的水平之上——而这是有诱惑力的。我们中间——不单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中间，还有当时虽受熏陶但后来彻底否定了这一梦想、否定了为人类所准备的以重建和复兴的面貌出现的黑暗和恐怖的那些人——我们中间有一些人那时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根，因而还不能克服自己的毛病。那么，为什么你们认为涅恰耶夫制造的凶杀会阻止我们前进，即使不是全体，当然，至少也会阻止我们之中的有些人前进呢？在那样沸腾的时代，置身在各种深得人心的学说之中，为欧洲各种事件所震惊；我们那时完全忘记了本国，激动而紧张地注视着它们。

莫斯科发生的这起杀害伊凡诺夫的卑劣无耻、骇人听闻的事件，毫无疑问是凶犯涅恰耶夫强加在他的受害者"涅恰耶夫分子"身上的。这是政治案件，对于今后"伟大的共同事业"是有好处的。否则，就不能理解有一些少年（无论他们是什么人）怎么会赞同这种丑恶的犯罪行为。我在长篇小说《群魔》中仍然想写出形形色色的犯罪的动机，有些心地极为纯洁并且秉性极为厚道的人，也会出于这些动机而犯下可耻的罪行的。在我们国家里，有时不是什么坏人，却可以干出最卑鄙最无耻的勾当，这是很可怕的！这也不是我们国家所独有，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一般都在世纪的开始，在转变时期，在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动荡，对于基本的社会信仰发生疑惑和否定、怀疑和动摇的时刻出现的。这是我们的特点，在当前是最令人痛心最叫人担忧的。在干着明显的无可怀疑的坏事的时候，却可能认为自己并

非坏蛋，甚至有时确实不是坏蛋，这是我们当前的可悲之处！

为青年辩护的先生们，与别的年龄的人比较起来，你们这样情有独钟地为青年人辩护，不如当他们刚刚开始努力学习的时候，不失时机地要求他们具有为他们的父辈所缺乏而现在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少见的那种坚定而成熟的信仰。我们知识阶层的青少年在我们这种家庭中长大成人，而我们的家庭中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不满意、不耐烦、粗暴无礼的行为（尽管是知识分子家庭），并且随处表现出缺乏真正的教育，充斥着人云亦云的可耻的否定；物质的欲望压倒了高尚的思想；对子女的教育缺乏根基，不自然，不真实，不爱或者不关心祖国，嘲笑并轻视人民，这在近年来特别普遍，我们的青少年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从这个源泉中汲取营养，正确无误地跨出他们人生的第一步吗？罪恶的根源就在于全盘接受、不敢超越思想的规范，几百年来按照民间传统压制本身的任何一点独立思想，把欧洲人的高贵的社会地位理解为轻视自己即轻视俄国人的必备条件！

…………

我们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站在刑场上听取判决时毫不后悔。当然，我不能证明全体都是如此，但我觉得当时，在那个时刻，如果我们中间不是每一个人，那么至少也是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放弃自己的信念是可耻的。这件事早已过去了，也许由此会提出一个问题：难道这种顽强不屈和绝不后悔的事只有笨蛋才能干，只有头脑不发达的好闹事的人才能干吗？不，我们不是好闹事的人，恐怕也

不能算是很笨的年轻人。事先向我们宣布了死刑，要死在枪弹之下，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几乎每个被判处死刑的人都相信死刑是要执行的，在等待被处死的时候，至少要忍受那极其恐怖极其可怕的十分钟。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们中间有几位（我知道得很清楚）本能地陷入了沉思，极其短暂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尽管生命是这样的年轻——也许会对自己做过的某些痛苦的事感到后悔（这些事每个人一辈子都会记在心里，良心上会不安的）。但是我们受到审判的这件案子，我们全心全意信奉的这些思想和观念，不仅没有使我们觉得需要后悔，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净化剂，一种殉道精神；由于这一殉道精神，人们在很多方面原谅了我们！这种情形持续了很久。无论是流放的岁月，无论是苦难的日子，都没有把我们摧毁。相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摧毁我们，我们的信念只会增强我们自觉地履行义务的勇气。不，另外有一样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改变了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心（当然，我只能说我们中间那些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信念并且他们本身也以某种方式表明了这一改变的人）。这个另外的东西就是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不幸之中与他们形成的兄弟般的团结，理解到本身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与他们打成一片，甚至与他们最低层的人已没有两样。

我再说一遍，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快发生的，而是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后才逐渐造成的。自尊心也好，自傲心也好，都没有妨碍自己认清自己。同时，有一些人是最容易回归人民的根基、重新认识俄罗斯的灵魂、重新承认人民的精神的，我也许就是他们中的一人。我出身于俄罗

斯一个信教的家庭，从我开始记事那时候起，我就记住了父母对我的爱护。我们很小就在家中见到了福音书。我不到十岁，已从卡拉姆津的著作中了解到俄国历史中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因为每天晚上父亲都要给我们朗读。每次去参观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的大教堂，我都觉得是件神圣的事。别人也许没有受到过我这样的教育。近来我常常在考虑，并且我现在想问一问自己：我们当代的青年们从童年生活中得到的印象，大多是什么？如果连我——我这种人自然是不可能冷淡地坐视不幸的命运让我置身其中的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的环境从身边白白地流失的，不可能冷淡地随随便便地对待我们面前出现的人民的精神的——如果连我，我说呀，都简直难以相信我们在自己家里认为光明和真理的东西几乎全部是谬论和谎言，那么别的那些更加严重地脱离人民的人该怎么想？从父辈和祖父辈开始就已脱离人民了，一直遗传到他们这一代。

我很难叙述自己的信念变化的过程，何况这种事说起来恐怕也没有多大趣味可言，而且好像也不是写小品文的材料……

1873 年

再谈妇女

报纸上的舆论几乎都转而支持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起义以解放他们的同胞，社会上以至民间都在热情地注视着他们在军事上的进展。但是斯拉夫人需要支援。有消息、而且是十分准确的消息说，奥地利和英国虽然不公开出面，却非常起劲地在帮助土耳其人。不过差不多也公开化了。向他们输送金钱，武器，弹药，甚至人力。土耳其军队里有许多外国军官。英国一支强大的舰队停在君士坦丁堡①近海……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说得确切些，是为了应付突然事变。奥地利也调动了大军，也为了应变。奥地利的报纸对起义的塞尔维亚人以及俄罗斯大动肝火。应当说明，如果欧洲现在声色不动地看着斯拉夫人，那当然是因为俄罗斯人也是斯拉夫人。否则奥地利的报纸就不会这样害怕塞尔维亚人，他们的军事力量在强大的奥地利面前简直不在话下，与皮埃蒙特②也无法相比……

---

① 现称伊斯坦布尔。——译者注

② 意大利西北部一个地区。——译者注

也因此之故，俄国社会又得帮助斯拉夫人——自然，即使只是金钱和一些物资也好。切尔尼亚耶夫将军[1]已通知彼得堡，塞尔维亚军队的医疗救护力量极为薄弱：医生、药品都没有，伤兵几乎得不到救护。莫斯科的斯拉夫委员会急切地呼吁俄罗斯向起义的同胞兄弟伸出援助之手，并且每当大批群众涌到塞尔维亚人修道院的教堂里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时，委员会的成员全体参加，祈祷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军队取得胜利。彼得堡的报纸开始登载公众送来捐款的消息，显然，这一举动逐日在发展，虽然正逢上所谓“休夏的淡季”。要知道这只是彼得堡的淡季。

我已经想把我的《作家日记》告个段落，正在看校样，突然有一个姑娘敲门来找我。她同我还是冬天里认识的，那时我已经开始印行《作家日记》。她想参加一次相当难的考试，正在努力准备；当然，通过考试是没有问题的。她的家境富裕，不缺钱用，但十分重视自己的学业，多次来征求我的意见：她应当读什么书，特别要注意哪一方面。她大约每个月来找我一次，每次最多不超过十分钟。只谈她的事，话语不多，举止朴实，显得有点害羞，对我十分信任。但看不出她的性格极为果断，我果然没有说错，这一回她进门后直截了当地说：

“塞尔维亚需要有人去照顾病人，我决定暂时推迟考试，想去看护伤兵。您有什么意见吗？”

她有点胆怯地看着我。这时我已从她的目光中清楚地

① 米·切尔尼亚耶夫（1828—1898）：俄国将军。1876年塞尔维亚人起义反抗土耳其时，他率领五千俄国志愿兵前往支援。——译者注

看出她已经作出了决定，她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但她需要我说几句勉励的话。我不可能把我们的谈话逐字逐句照抄在这里，免得有蛛丝马迹可寻，哪怕只是一点点，暴露了她的姓名。我只写几句最普通的话。

我突然间为她感到非常可惜——她是这样的年轻。拿各种困难、战争、战地抢救所的伤寒病来吓住她，完全是多此一举，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她只渴望着作出牺牲，建立功勋，有利于人；而主要的，也是最宝贵的，是毫无哗众取宠、毫无炫耀自己之心，她唯有一个愿望——“去看护伤兵”，造福于人。

“但是您能去看护伤兵吗？”

“能，我干得了。我到委员会去过，凡是参加的人，都给两个星期的时间，我自然会做好准备的。”

她自然会做好准备的。她说到就会做到。

“听我说，”我跟她说，“我不想吓唬您，也不想留住您，不过您要考虑我说的话，在心里好好地斟酌斟酌。您不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您看到的都是上等社会的士女，从来没有见过另外一种人，不像他们那样平平安安地住着，说话也没有他们那样客客气气。这些人是在打仗，住的地方很狭窄，精神上的压力很大，工作很劳累，有时变得完全像是两个人。您突然之间要通宵看护病人，侍候他们，累得不得了，站都站不住；而且医生，也许本来是个很好的人，因为太劳累了，精疲力尽，刚刚切掉了几只手几只脚，一下子大发脾气，冲着您说：‘您什么也干不了，光在这里碍事！既然来了，就得干活。’还说了些别的话。您不会觉得受不了吗？这种情况一定得考虑，我只是给您举很小的

例子。实际情况有时是完全意料不到的。最后，您能不能胜任这个看护工作呢？虽然您做出了这样重大的决定，但有没有信心做好这个看护工作呢？当您看到有人死去，受伤，动手术，您会不会昏倒在地？这种事是由不得您作主，是无意识的……”

“如果说我只会碍事，不是在干活，那么我完全明白这位医生是累了，是心情烦躁。我心里知道自己没有错就满意了，照样去干我的活。”

“但是您的年纪还非常小，您怎么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为什么您认为我的年纪小呢？我已经十八岁，完全不小了……”

总而言之，劝她是没有用的：她反正明天就出发了，只不过我没有鼓励她一番，她觉得有点伤心。

“好吧，上帝保佑您。”我说，“去吧。但是事情一结束，赶快回来。”

“啊，那当然，我还要参加考试呢。但是您不会相信我听了您的话是多么的高兴。”

她容光焕发地走了，自然，一个星期后她就到了那里。

这个月的《日记》的开头，是一篇关于乔治·桑的文章，她早期的小说里有几个少女的性格使我特别喜欢，我写了几句话。这个姑娘正像那些少女，也是那样的坦率、正直、但缺乏经验的年轻少女的性格，也有出于纯洁无瑕的自豪感，不惧怕与道德败坏的人接触，也不可能因有这种接触而受到污染。她要求作出牺牲，要求工作，仿佛这些

东西正在等待着她。她有一个信念，认为期待别人、要求别人去做的一切好事，需要也应当首先由自己做起，没有任何条件可讲。这种信念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正确的高尚的信念，可是，唉，常常只属于纯洁无瑕的少年所独有。而主要的在于，我再说一遍，是一心一意为了工作，丝毫没有出风头的想法，丝毫没有以为自己有功而自命不凡和炫耀自己的心理，这些东西我们反而常常在现代的青年人、甚至乳臭未干的少年身上见到。

她走后我不由得又想到了我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性，正是在现在，从现代妇女对于事业的认真的要求、对于教育的要求、对于参与公共事业的要求来看，这种必要性显得极为迫切。我想，这些女孩子的父母，如果他们爱自己的子女，为本身着想，也应当力争其实现。实际上只有高深的科学知识才能以十分严肃的态度，以强大的魅力和力量来平息在妇女中开始出现的不安和激动；只有科学知识才能解答她们的问题，增强她们的理智，把她们涣散的思想，这么说吧，管束住。至于这个姑娘，虽然我为她的年轻感到担忧，但我之所以不阻止她，除了我无能为力之外，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这次长途跋涉从某个方面来说也许对她有好处。因为这毕竟不是书本里的世界，不是抽象的信念，而是摆在面前的一场艰苦的考验，也许是上天赐予她的不可估量的慈爱。上帝要挽救她，是会为她考虑的。这时候已为她准备着一门现实生活的功课，这时候她的思想和眼光将面对着开阔的天地，她以后一辈子都会回忆起她所参与的宝贵的美好的事业，因而会使她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因为生活得太累而不想活了，像那个不幸

的皮萨列娃一样，我在五月份的《日记》里提到了她，她因为觉得生活太累而寻了短见。

1876 年 6 月

车厢里的俄国人

从彼得堡到柏林是长途旅行，差不多要两昼夜，因此我随身带了两本小册子和几张报纸，必要时可以翻翻。完全有这个必要，因为我总是害怕同咱们俄国这个知识阶层不相识的人待在一起，而这些人到处都是，车厢里也好，轮船上也好，或者无论开个什么会也好。我承认这是我的弱点，并且首先把它看成是我的多疑所造成。在国外，置身在外国人中间，我总觉得轻松一些。那里每个人如果想到什么地方去，头也不回地笔直走了。可是我们走起来就会四处张望一下："啊哟，他们会不会议论我呀。"但是表面上装得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内心里却慌乱异常，对自己毫无信心。如果有个陌生的俄国人想同你说话，总是显得非常神秘，而且非常友好，但是他一开口你就明白他对你怀着戒惧的心理，甚至隐含着可疑的敌意，差不多是这样。这种敌意转眼间就会从他身上显露出来，或者挖苦你几句，或者干脆把你骂一顿，尽管他"富有教养"。而主要的是这种发作是毫无来由的。每个人为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似乎都想拿别人来发泄一下怒气，而实际上这个人也许根本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甚至恰好相反。这种事常常可

以碰到。没有人像俄国人那样总喜欢重复这样的话："人家在议论我，我才不管呢。"或者说："我根本不理睬公众的舆论。"也没有人像俄国人（又是富有教养的文明人）那样害怕、担心公众的舆论以及公众对他的议论或想法。这种担心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他内心深处隐藏着自卑的缘故，同时，当然，他的自负和虚荣心也是无限膨胀的。几乎每个俄国知识分子身上都存在着这两种对立的东西，而对他们来说是最不能忍受的。因此每个人有了这种东西就好像"心里有了鬼"似的。特别难堪的是在国外遇见陌生的俄国人，在某个地方面对面地坐着，没有办法逃走，比如说，碰上这种倒霉的场合，把你们两人锁在一节车厢里。但同时又好像"在异国他乡遇见自己的同胞是多么的高兴啊"。两个人的谈话开头一句总是相同的。得知你是俄国人以后，这位同胞一定会说："您是俄国人吗？在异国他乡遇见自己的同胞是多么的高兴啊，因为我在这里也……"于是马上就向你倾心吐腹，就是说，用非常友好的，这样说吧，像遇见亲兄弟那样的语气，这种语气是与两个在异国土地上互相拥抱的同胞相称的。但是千万别相信语气，因为这位同胞虽然满脸堆着笑容，却用怀疑的眼光看你；你会从他的眼神里，从他的故作小孩子的腔调和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说话中发觉这一点。他在估量你，他一定是在提防你，他已经在编一套假话来应付你；不过他不可能不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你，不可能不编造假话。正因为你也是俄国人，他不由自主地也连带着估量自己，也许因为你确实值得估量。妙的是一个在国外（经常在国外，几乎一直在国外）的陌生人，刚说了两三句话，总是，或者至少是常常急于插进

一句话，说他刚刚碰见一个什么人，或者刚刚听说这个人的一件什么事；也就是说，这个什么人是咱们俄国的一位名人或者显贵，但他在这个时候用非常亲热的口气提出这个人，就像是老朋友一样，不但是他的朋友，也好像是你的朋友。——“您自然知道，有个可怜的老兄访遍了这里的名医，他们把他打发到温泉治疗去了，灰心得要命。您认识吗?”如果你回答说根本不认识，那么这位陌生人立刻会因此觉得你让他难堪，他会说：“你是不是以为我想拿结交名流在你面前自吹自擂?”你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这个疑问，而事实也许正是如此。如果你回答说你认识这个名人，那么他会更加觉得难堪，这中间的缘故，的确，我也弄不明白了。总而言之，虚情和敌意从两个方面生成，于是谈话突然中断，相对无言。这位同胞立刻转过身去，准备同坐在对面的一个德国面包商作彻夜长谈，只是不屑跟你说话，并且希望你看出这一点。开始时他把你当作朋友，然后又断绝了同你的来往和关系，根本不理睬你。到了夜里，如果有位置，他会躺在座位上，把两只脚一直伸到你身边，也许故意把脚伸到你身上。旅程结束，他走出车厢，甚至跟你连个头也不点。“为什么他这么恼恨在心?”你想，大惑不解，甚至有点伤心。最好碰到一个俄国的将军。俄国的将军在国外最操心的就是如何避免那些遇见他的俄国人里头有个什么家伙大着胆子忘掉自己的官阶去同他攀谈，利用的借口就是：“咱们都在国外，大家都是平等的。”因此，比方说，从旅途上最初相聚的那一刻开始，大家都像岩石一样保持着严格的沉默；这样倒好，谁也不来打扰谁。顺便说一句，奉派出国的俄国将军，有时候极其喜欢穿便

服，他的衣服是从彼得堡第一流的裁缝手上定做的；来到温泉以后，也极其喜欢穿着打扮，因为从欧洲各地纷至沓来的迷人的太太小姐们长年云集在这里。季节一过，他特别高兴地拍了一张照片，穿的自然是便服，准备分赠给彼得堡的熟人，或者当作礼品让忠心耿耿的部下来个受宠若惊。但是，无论如何，身边带一本书或几张报纸，总是特别有用的，可以在旅途中挡住俄国人："我正在看书呢，请别打扰我。"

1876年7月

不可思议的怪事

从我第一次即三年前来到埃姆斯[1]以来，从来到的第一天开始，有一件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以后每次来到这里，我的兴趣一直没有减退。埃姆斯有好几处矿泉，但其中的两眼矿泉是饮用的人最多的，一处叫做克列恩森，另一处叫做凯塞尔布鲁宁。泉源上盖起了房子，泉眼前面围了一道栅栏把它与公众隔开，栅栏后面站几个女孩子，每眼矿泉前站三个，年纪轻轻的，穿得都很整洁，笑容可掬。你把杯子交给她们，她们立刻给你灌一杯泉水。在规定为上午饮水的固定的两小时之内，来到栅栏面前的病人有几千名，每个病人都要在这两小时之内喝几杯水；按照处方上的规定，有的两杯，有的三杯，有的四杯。下午的饮水时间内也一样。因此，这三个姑娘每个人在这两小时之内灌水给水的次数就非常之多。不仅如此，她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却有条不紊，不慌不忙，不急不躁，秩序井然，绝不让你久等。最叫人惊奇的是这些姑娘人人似乎都掌握了某

① 埃姆斯是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境内的矿泉疗养地，位于科布伦茨市东南，又称巴特埃姆斯，作者于 1874 至 1876 年以及 1879 年曾四次来这里疗养。——译者注

种好像是超自然的理解力。你第一次来到这里，只跟她说一次“这是我的杯子，我要多少盎斯的泉水和多少盎斯的牛奶”，在一个月的治疗全过程中从没有弄错过。除此之外，她已经把你记住，在人群里可以把你认出来。人挤得水泄不通，站了好几行，大家都把杯子伸出去，她一次接过六七只杯子，一下子就都灌上了。不到半分钟，水不洒，杯子不打破，交还给每个人，丝毫不错。她把杯子给你递过来时，在几千只杯子里知道这是你的杯子，那是别人的杯子；你要多少盎斯水，多少盎斯牛奶，处方上写好要喝几杯，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从没有发生过差错，小差错也没有。这一点我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且有意去问过。主要的是这里有几千病人。很可能这种事在这里是平常得很，不足为奇，但对我来说，已经看了三年了，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仍然把它当作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虽然看到什么事都觉得奇怪是可笑的，但这道难题我的确无法解开。大概应当认为这是德国妇女的一种不寻常的记忆力和迅速理解的能力；同时，也许这里只不过是一种工作习惯，从儿童时代就开始掌握了工作的能力，并且，这样说吧，已经**征服了劳动**。说到劳动，那么对于在仔细进行观察的俄国人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我在旅馆里住了一个月（并非真正的旅馆；这里每座房子都是旅馆，而除了几家大旅馆之外，大多数这种旅馆只是几间客房，根据协议有个女仆可供使唤，并供应伙食），这个在旅馆里当女仆的实在叫我吃惊。我住的这个旅馆有十二套客房，全部客满，有的客房甚至住了一大家子。什么人都打铃叫她，什么人都支使她办事，什么人她都得侍候，都得为他们跑腿，一天到晚在

楼梯上跑上跑下，数不清有多少次——所有这些事，整个旅馆里只由一个女仆来做，她只是个十九岁的姑娘。除此以外，她还要听候女主人的差遣：给这个人拿酒去喝，给那个人去抓药，给第三个人送衣服去洗，给女主人本人去铺子里买东西。这位女主人是寡妇，有三个孩子，她还得看孩子，侍候他们，每天早上给孩子们穿好衣服去上学。每个星期六必须擦洗整座楼房的地板；每天必须打扫所有的房间，换下床单枕套，餐巾桌布。每个客人退房以后，必须马上把他住的屋子整个儿擦洗干净，不能等到星期六再来干。这个姑娘躺下来睡觉都在夜里十一点半钟，第二天早上五点整，女主人就用闹钟把她叫了起来。所有这些事都像我说的那样句句是实，毫不夸大。再补充一点，她这么拼命干，报酬却极为微薄，在咱们彼得堡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却要求她必须穿得整齐干净。你们看，她可是一点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样子也没有，她总是很快乐，很活泼，精神饱满，显得非常满意，处之泰然。不，在咱们那里是没有人这样干活的；咱们那里没有一个女仆愿意干这种苦差使，即使给她很高的工资；而且绝对干不了这种事：转眼就忘，一百次也记不住，杯子里灌了水也不递给你，或者把杯子打破了，弄错了，就发脾气，“张口骂人”。而我在这里整整一个月，简直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觉得这真是怪事——我身为俄国人，不知道应该赞扬它呢，还是应该咒骂它？但是冒它一回险，我赞扬它，虽然不免有些顾虑。在这里每个人都如实地接受自己所处的地位，安之若素，不羡慕别人，也不怀疑别人。看起来是这样，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样。但是劳动始终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劳

动是几百年来形成的，有明确的方法和方式，每个人几乎从出生之日起就经受到的，因此每个人都会善待自己的工作，完全掌握它。这里每个人都熟识自己的工作，虽然他们只熟悉自己的工作。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里大家都这样工作，不单单女仆是如此，她们的主人们也如此。

现在来看一看德国的公务人员吧——好，就拿邮局的职员来说。大家都知道俄国的公务人员是什么样子，特别是每天同公众打交道的那些人：这种人都是老大的不高兴，脾气暴躁，如果有时候不明显地发作，那就是埋在心里，从脸色上可以看得出来。这种人目中无人，十分傲慢，俨然是神王尤皮特①。这从小虫子身上看得特别明显，这些小虫子坐在那里回答你的询问，收下你的钱，给你票据等等。请你看看，他在忙着呢，“在办公呢”：顾客聚在他面前，排着长队，每个人都急着问他事情，听他回答，急着拿到收据，拿到票。而他呢，对你们理都不理。终于轮到你了，你站在他面前，你跟他说话，他不听你，也不看你，他扭过头去同坐在背后的同事聊天。他拿了一张纸头在查什么，虽然你完全认为事情只能是这样，他根本用不到去查，但你还是愿意等着。可是，他站起来走了。突然间时钟响了起来，下班了——“走吧走吧，大家走吧！”同德国相比，咱们的公务人员一天里坐着办事的时间差得太远了。粗暴无礼，不理睬、不尊重顾客，把顾客视同仇敌，只因为他们是顾客。而主要的是摆一点小小的威风。他一定要在你面前显出你是非依赖他不可的：“哼！我是什么人，你们在这

① 古罗马神话中的神王。——译者注

里能把我怎么样，我坐在栏杆后面可以随意摆布你。你们要是生气呀——马上叫警察把你们带走。”他觉得满肚子委屈，要找人出出气；就因为他位卑人轻，他要拿你来出气。在埃姆斯这里，邮局里一般坐着两个、最多三个职员。逢到旺季的一两个月（例如六月、七月），成千上万的人涌到这里来，可以想见要收发多少信件，邮局的业务有多么繁重。但是除了有两个小时吃饭和方便之外，他们整整一天忙碌不停。他们要收取邮件，寄发邮件；成千的人来问有没有存局自领的信件或者别的事。他要为每一个来问的人从头到底把几大堆信件翻阅一遍，要听完每个人说的话，要回答每个人的问题，详细地解释，而且态度亲切，耐心，有礼貌，同时又保持着本身的尊严。他从小虫子变成了人，而不是从人变作了小虫子……来到埃姆斯以后，我很久都没有收到信，等得十分焦急，每天都去邮局查问。有一天上午我饮水回来，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我的信。信刚刚寄到，邮局里的一个职员记得我的名字，但不知道我住在哪里，特地翻开打印的一本外地来人的名册查看，名册上登记着所有外来人口的姓名和住址，于是便专门派人给我送来，虽然这封信写明是“存局候领”的。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前一天我去查问的时候他看出我特别焦急不安的缘故。你想想，我们的公务人员里头有哪一个能这样做呢？

关于德国人脑筋的灵活和反应的迅速——我是从德国人的劳动和以上所说的那些事想起来的——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法国人从来不喜欢而且首先不喜欢德国人，始终认为德国人有点呆头呆脑；自然，并不傻。他们认定德国人的头脑里有一种好像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肯直来

直去的倾向，总想绕一个圈子，简单的一句话好像要分成两句说，一步路要分成两步走。咱们俄国人对德国人的呆头呆脑和傻里傻气，总有许多笑话可讲，虽然对他们的一肚子学问是从心底里佩服的。但是我觉得德国人的特点太突出，民族性表现得太顽强，甚至到了十分傲慢的程度，常常引起别人的反感，因此有时候给他们下的结论并不正确。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对于第一次踏上德国土地的外国人来说，德国人最初给人的印象有时的确是古怪的。

从柏林到埃姆斯途中，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四分钟。那是在夜间，我在车厢里坐累了，想稍为走动一下，到外面去抽根烟。所有车厢里的人都睡了，整列长长的火车除了我之外，再没有人出来。响起了铃声，我忽然发觉我把车厢的号码忘了，因为平常总是马马虎虎惯了，我下车时是自己把车门关上的。大约站了几秒钟，我正想去找车长，他在火车的那一头，突然听见有人从一节车厢的窗子里喊我：喂！喂！——嗳，我想，那是我的车厢吧！不错，德国人在车上他们那个限乘八人的房间里，在漫长的旅途中彼此把脸孔都看熟了，如果到了一个大站停车吃中饭或者吃晚饭，一个德国人下车时一定会把身边还在睡觉的旅伴叫醒，免得他过后为漏掉一顿饭或者错过别的什么事而烦恼。于是我想，这个人是我同房间睡醒过来的德国人，他发现我找不到车厢就来喊我。我走到伸出窗子来的那张极表关切的德国人的脸孔前：

“Was suchen Sie？（您在找什么？）”

“找我的车厢。我是不是跟您坐在一起？这是我们的车厢吗？”

“不，这不是您的车厢，您不坐在这里。您的车厢在哪里？”

“是啊，我正好忘记了！”

“我可不知道您的车厢在哪里。”

可以说直到最后一秒钟，走到我近旁的车长才指点我找到了我的车厢。请问：这个德国人干吗要把我叫过去问呢？但在德国住过一段时期，你很快会明白无论哪个德国人的确都是这样，都会这样做。

大约十年前，我来到德累斯顿，第二天我从旅馆出来，直接去找画廊。事先我没有问明路线，我想，德累斯顿画廊举世闻名，我在路上随便碰到一个当地的知识阶级的人，都会告诉我怎么走的。瞧，走过了一条街，我拦住一个德国人，外表看来是非常严肃而有教养的。

“请问，这里的画廊在什么地方？”

“画廊？”这个德国人站住了，在思索。

“是的。”

“皇家的——画廊？”（他特别把“皇家的”三个字说得很清楚。）

“是的。”

“我不知道这个画廊在哪里。”

“那么……难道这里还有第二个画廊吗？”

“啊，不，没有第二个。”

1876 年

征订1861年《当代》月刊启事

《当代》文学政治月刊将于1861年1月出版，大开本，每期25至30页。

首先我们要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文学领域中创办一种新的公共舆论工具，并就我们对于当代和当前社会生活的理解说几句话，这将有助于了解本刊的宗旨和倾向。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为美妙而又极为严峻的时代。我们不想特别指明近年来思想界所一致宣布的俄国社会那些新思想和新要求。我们也不想指明当代开始出现的重大的农民问题……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大转变的现象和征兆，这个大转变需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地和平地进行，虽然就其意义来说，它不亚于我国历史上各个重大事件，甚至可与彼得的改革相提并论。这一转变是知识界及其代表人物与人民的因素的结合，是全体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对我们当前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参与——我们的人民在170年之前是被排除在彼得的改革之外的，并且从那时以来同闭关自守自立天地的知识阶层中断了联系。

我们提到了现象和征兆。其中毫无疑问最为重要的是农民生活的改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而是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即将进入俄国的生活，注入永不枯竭的新鲜的活力，要说一番从未听过的话。但我们生活中未来因素发展的基础，不应当是两个阶层即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的敌对状态，如同欧洲随处可见的情况那样。我们不是欧洲，我们不会有也不应当有战胜者和战败者。

彼得大帝的改革本来就使我们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它把我们与人民隔离开来。人民从一开始就反对改革。改革留给人民的生活方式，既与他们的精神不合，也与他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对他们来说既不切合实际，也不合时宜。他们把这些人，把彼得大帝的追随者叫做德国人，外国人。人民与最高阶层、与他们的首领和领袖单是在道义上的分裂，表明那时候我们为创造新生活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但是人民虽然与改革分道扬镳，却并不气馁。他们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精神，以非同寻常又极为紧张的努力来表明这种精神，因为他们是孤军作战，因而是艰难的。他们在黑暗中行进，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特殊的路。他们对自身和所处的环境作了深入的考虑，试图得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哲学；他们分散成为多个秘密的非正统的派别，为自身的生存谋求新的出路，新的方式。但他们不可能离开以前的海岸更远，不可能冒冒失失地把自己乘坐的船只烧毁，像我们的人民从前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新的道路后所做的那样。因而他们被称为彼得改革之前旧方式的抱残守缺者，麻木不仁的旧教派。

当然，人民失去了领路的人，单是依靠自身的力量，他

们的思想有时是极为可怕的；为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尝试也是非常丑恶的。但是其中有共同的因素，单一的精神，毫不动摇的自信心，永不枯竭的力量。在改革之后，他们与我们知识阶层之间，只有过一次联合的机会——那是 1812 年[1]，于是我们领教了人民是怎样大显身手的。那时我们才明白他们是什么模样。可惜他们一直不认识我们，也不了解我们。

不过现在这种隔阂正在消除。彼得的改革延续到了今日，终于有了尽头。它不能再往前走，也已无处可去，因为面前没有路；路都走完了。彼得的后继者们对欧洲全不陌生，他们醉心于欧洲的生活，快要变成欧洲人了。我们有个时候也曾经责备自己没有能耐成为西欧派，现在我们的想法却不同。现在我们明白，我们是不可能变成欧洲人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迫使自己适应一种欧洲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历经磨难而幸存下来，并由欧洲按照当地民族的因素培养而成，与我们格格不入，是互相对立的，——就好像我们不可能把不是按照我们的尺寸做的别人的衣服拿来穿一样。最后，我们认为，我们也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是一个具有高度独特性的民族，因而我们的任务是为自己创造新的方式，我们自己的、本土的，植根于我们的土壤的，来自人民的精神、融合了民族的各种因素的方式。但我们并不是作为战败者而回归本土的，我们也不否定过去，因为我们必定会认识到过去的合理性。我们会认识到改革已经扩大了我们的眼界；由于改革，我们理

① 指 1812 年抗击拿破仑入侵。——译者注

解到了我们未来的所作所为在各民族大家庭中的意义。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没有用中国的长城把自己隔离在人类之外。我们可以预料，而且以一种虔诚之心预料，我们未来的事业必将具有最深刻的全人类的性质，俄国的思想可能成为欧洲各民族正在势不可挡地蓬勃发展的各种思想之集大成者，而其中敌对的思想也一定会被俄罗斯民族容纳并继续发展。我们之能够说各种语言，理解各种文明，支持欧洲各个民族的利益，明白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各种现象的内涵及其意义，并非没有原因的。我们在自我批判方面表现出了这么大的力量，使得所有外国人为之惊异不已，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为此而责备我们，把我们叫做没有个性、没有祖国的人，却不知道暂时脱离根基，更加清醒更加客观地打量自己，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最大的特色的表现；以一种容忍的眼光看待外来的事物，这种能力也是大自然最高和最宝贵的赐予，只有极少数民族才能获得。外国人还没有认识到我们那永不枯竭的力量……不过现在好像有了不同，我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就在开始新的生活之前，拥护彼得进行改革的人如能容忍人民的因素，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这里说的既不是斯拉夫派，也不是西欧派。我们的时代对于他们之间的妇姑勃豁丝毫不感兴趣。我们说的是文明与人民的因素之间的调和问题。我们觉得双方到最后都应当互相理解，应当消除彼此间长期积累的多得不可胜数的误会，然后共同努力以和谐的一致的步调走上新的广阔而光荣的道路。无论如何要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先进思想，这就是我们的口号。虽然这样做要作出一些牺牲，那是十分可能的。

但是什么地方才是与人民的接触点？要与人民接近，第一步怎么走？这是问题，这是每个珍惜俄罗斯名誉的人，热爱人民并且重视他们的幸福的人，都应当关心的。而他们的幸福，也就是我们的幸福。自然，识字和教育，是为实现任何一种和解而走出的第一步。如果人民事先不作这种准备，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别的路是没有的，而且我们也知道，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没有别的新东西可说。但是目前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还没有迈出第一步，他们应当利用自己的地位，坚定不移地去利用。加紧普及教育，加快普及教育，无论如何要这样做——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主要任务，着手任何事业的第一步。

我们只说了本刊主要的指导思想，间接地指出了本刊的性质和今后活动的原则。但我们还有另外的原因——它提醒我们要创办的是新的独立的文学杂志。我们早就注意到，近年来我们的出版界兴起一种自愿地依附和归属于文学界权威的特殊现象。当然，我们并不责怪我们的出版界唯利是图，卖身投靠。杂志和报纸可以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信念，仅仅因为买主多出几个钱而改换门庭，干起别的下流的勾当，这种情形在欧洲文化界随处可见，我们这里没有。但我们也会发现不是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信念的情况，比方说，由于天生的奴颜婢膝，或者因为害怕与文学界权威不和而被骂为笨蛋，都可以把自己卖掉。善于折中的庸人们有时甚至完全不是出于私心而为文学界的砥柱们所提的意见惶恐不安，特别是如果这些意见说得非常大胆，粗暴，毫不客气。有时单是这种粗暴无礼的态度，就会给并不愚蠢而善于利用时机的作家带来中流砥柱和权威

的美誉，同时也会使砥柱们在群众中产生非同小可的虽然只是暂时的影响。庸人们从他们自身方面来看，几乎永远是非常胆小，并且极其愿意受人领导的，尽管他们表面上看来显得特别傲慢。胆小就产生出文学的奴性，但文学中是不应当有奴性存在的。由于渴望得到文学上的权势，文学上的优越地位，文学上的官职，有的甚至是受人尊敬的老作家，有时竟然能够下定决心去干一种意料不到的、一种古怪的举动，却不由自主地使得同时代人受到诱惑，感到惊奇，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流传到后世，成为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件丑闻。而这种丑事却屡见不鲜，这种人的影响长存，出版界却保持沉默，至今不敢触动他们。我们文学界至今仍然有一些既定的思想和意见，毫无一点独立精神，却成了不容怀疑的真理，唯一的原因是文学界的领袖们从前就是这样定下来的。批评流于庸俗化，一晃而过。有些出版物对某些作家只字不提，唯恐不小心说错了话。争论是为了在争论中分输赢，不是为了明辨是非。一钱不值却能蛊惑人心的质疑，成功地掩盖了自身的低能，并且用来招揽订户。富于真知灼见的严谨的言论越来越少。最后，文学界盛行的投机取巧之风，使得某些定期出版物主要以赚钱为目的，什么文学，什么文学的利益，全都不在话下，有时压根儿把它忘了。

我们决定创办一种完全不受文学界权威指使的刊物——尽管我们对他们是尊敬的——并将以最大的勇气充分揭露当代文学界各种怪现象。我们本着对俄罗斯文学最深厚的敬重之心来进行这种揭露。我们的刊物绝不会有文学以外的好恶与偏私。我们甚至准备承认本身的错误与过

失，在刊物上公开承认；如果有人称赞这样的做法（虽然现在言之过早），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可笑。我们不回避争论。我们有时也并不害怕稍为“刺激”一下文学界的一群鹅。鹅的叫声有时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预报天气，尽管不一定每一次都救得了卡皮托利尼山上的罗马①。我们将特别注意批评这一栏。不单是好书，即使是在别的杂志上发表的好文章，不论是什么人所写，我们的杂志一定加以评论。单单因为一本书不像以前那样印成单行本，而只是在杂志上发表，就拒绝予以评论，是不应该的。《当代》不针对任何个人，对于平庸而无害的东西不予置评，但将密切注视文学中的各种重要现象；重视特别突出的事件，无论它属于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毫不容情地揭露粗制滥造、用心不良的作品，错误的趣味，狂妄自大的作风以及文学界的贵族派头，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流行的观点，既定的原则，由于普遍的、无论是否合适都被滥用而变成庸俗、古怪、令人哭笑不得的陈规俗套，都属于应予批评之列，如同重出的书和重发的文章之应受批评一样。本刊信守不渝的准则是对于任何真诚的文学作品直言无隐地坦陈我们的看法。作品上署着响亮的名字，也必须接受评判，而且对它要更加严格，本刊绝不自甘堕落，去采用目前通行的滑头的手法——向一位著名的作家先说上十句过甚其辞的奉承的话，以换得一个权利向他说一句并不十分中听的意见。赞扬人总是非常高尚的；单纯的吹

① 此处典出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鹅》：一群鹅被赶往市场出售时嫌主人粗暴无礼，自以为祖上曾救过罗马，即使本身对人没有贡献也应受到尊重。卡皮托利尼是罗马的一座山。——译者注

捧却散发着奴才的气味。这篇简单的启事无法详述我们这本杂志的各项细节，这里只说一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政府批准，其内容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全文如下：

计　划

1. 文学部分。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回忆录，诗歌等等。

2. 批评与国内外图书评论。包括新上演的剧本的评论。

3. 学术论文。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财政、哲学等方面的问题。行文应通俗易懂，并非作专题研究。

4. 国内新闻。政府法令，国内大事，各省来信等等。

5. 政治述评。每月各国政情综述。最新消息，政治传闻，国外通讯员来信。

6. 综合栏。①小小说，国外和各省来信等。②小品文。③幽默讽刺小品。

从以上所述各点可以看出，我们的计划中包括了当代读者感兴趣的各种内容。我们每一期都将在杂志最后几页发表几篇幽默讽刺小品，开辟一个专栏。

我们不想列举为本刊撰稿的作家姓名。使用这种办法吸引读者的注意近来已经行不通了。我们见过不止一家杂志开列了几个响亮的名字，只是做做广告而已。虽然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刊物上开出著名文学家的姓名，而且不只是一位，我们却有意不这样做，因为虽然我们对他们极为

尊敬，但我们认识到他们并不是杂志的力量之所在。

《当代》每月一期，月初出版，大开本，每期 25 至 30 页，是我国大型月刊之一。

1860 年 9 月

写作计划*

1877年12月24日。牢记。终身莫忘。

1）写作一部俄国的老实人①

2）写作一部耶稣基督传

3）写作一部回忆录

4）写作一部人死后四十天的小说

注意：除了最近一部小说和预定印行的《作家日记》之外，这四项工作至少要用十年时间，而我年已五十六岁了。

---

* 本文是一则记事，题目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① 老实人是法国作家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中的主人公。作者后来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人物伊凡·卡拉马佐夫身上体现了他的一部分构思。——译者注

爱伦·坡的小说*

爱伦·坡有两三篇小说已在我国的刊物上译成俄文发表，现在我们再向读者介绍三篇。这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作家——确实奇特，虽然有非凡的才华。他的作品不能直接归入幻想小说一类；如果说他是幻想，那么，这么说吧，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比如他写埃及金字塔里沉睡了五千年的木乃伊，可以通过电疗的办法起死回生；他写死去的人也可以使用电疗法向世人叙述他的心情①，如此等等。但这些还不直接属于幻想小说一类。爱伦·坡只是让一件不正常的事从表面上看有可能发生（不过有时会非常巧妙地证明它发生的可能性），而在假定事件发生以后，其余方面的描写则完全忠实于现实生活。但是，比方说，霍夫曼②笔下的幻想就不是这样。他是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女巫、精

---

* 本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当代》月刊1861年1月号发表美国作家爱伦·坡（1809—1849）的《黑猫》、《亲爱的告密者》、《市政局里的鬼魂》三篇小说的俄译而写的编者按语，题目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① 前者指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与木乃伊谈话》，后者指他的《超前的葬礼》。

② 恩·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译者注

灵都成了他故事中的人物，他有时甚至在尘世之外，在某种奇异的世界中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人物，把那种世界当作最幸福的乐土，仿佛他本人相信确实存在着这个神秘的梦幻的世界……别把爱伦·坡叫作幻想作家，最好称他为别出心裁的作家。他的构思的富于变化是多么的奇特，实现这些变化又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他差不多永远可以抓住一种极其特殊的现实环境，把人物放到外部这一极其特殊的环境或者心理状态之中，然后叙述这个人物的内心活动，而他在叙述时所显示的观察力是多么的敏锐，细节的准确无误又是多么的惊人啊！除此之外，爱伦·坡身上还有一个特点，把他与别的作家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且构成了他的鲜明的特色，这就是想象力。并不是他在想象方面胜过别的作家，而是他的想象力之中有这么一个特点是别的任何作家所不具备的，这就是细节的力量。比方说，请你们来试一试，想象一件稍为有点特别、甚至现实生活中不常见到但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事。那么你们眼前浮现的形象，或多或少总会带着全幅图景的一些共同的特点，或者只选取其中的一个特点、一个细节来构成形象。然而在爱伦·坡的小说中，你们会非常清楚地看到他向你们所描写的形象或所叙述的事件的全部细节，使得你们到最后似乎相信了这件事可能发生或实际上已经发生，虽然这种事几乎完全不可能发生或者天底下从没有发生过。例如他有一篇小说是描写去月球旅行的①，描写得详细极了，差不多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跟在身后作报道，使得你差一点完全相信

① 指《某位汉斯·普法利先生历险记》。

真有其事。他在一家美国报纸上也同样准确地描写了气球从欧洲横越大洋前往美洲的飞行①，也写得详细之极，准确之至，充满许多意想不到的偶发事件，表面上看来十分真实，使得大家都相信真有这次旅行。自然只是几个钟头内的事，当时经过查询，原来根本没有什么越洋旅行，爱伦·坡的叙述是报纸上捏造的消息。这样的想象力，或者说得更准确些，这样的思考能力，在被窃的信件、在猩猩制造的巴黎谋杀案的故事，以及发掘宝藏等等故事中，都表现了出来。

有人把他与霍夫曼相提并论。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不确切的。而且霍夫曼与作为诗人的爱伦·坡相比，肯定要高出一头。霍夫曼有理想人物，有时确实写得不很准确，但在这个理想人物身上藏着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现实的真正的纯洁和美，在他的非幻想的小说如《马丁师傅》或写得非常典雅优美的中篇小说《救苦救难的罗莎》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更不必谈他的最优秀的作品《公猫摩尔》了。多么真诚圆熟的幽默，多么强大的现实的力量，多么老练，多么真实的典型和肖像，同时多么渴望着美，又是多么光辉的理想人物啊！在爱伦·坡笔下，如果有什么幻想，那么他的幻想是物质的——假如只能这样形容它的话。可见他是地道的美国人，即使在他那些最富于幻想的作品中也是如此。为了向读者介绍这位别出心裁的天才，现在我们发表他的三个短篇。

1861 年

① 指《气球的故事》。

关于西欧作家*

总而言之，说一句不中听的话，西欧的许多诗人和小说家，都站立在我们的批评家法庭上受到审判。不必说席勒了，我们回想一下吧，例如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弗雷德里克·苏利、欧仁·苏以及别的许多人，我们的批评家们从四十年代以来，谈到他们时总显得非常傲慢。别林斯基对他们要负一部分责任。他们不符合我们那时候过于现实的批评家们的尺寸。如果说拜伦躲过了严厉的判决，那么第一，他得感谢普希金；第二，由于从他的每行诗里都挖出了抗议的声音。否则，我们也会弄得他名誉扫地的。他绝对地不符合尺寸。

所有这些都非常有趣，也合乎时代。我们希望很快发表一篇长文，题目就叫做《我们批评家法庭上的西欧诗人和小说家》。

1861 年

* 本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1861年2月《当代》月刊一篇谈论席勒的文章写的编者按语，题目是译者所加。——译者注

关于《巴黎圣母院》*

“丑也是美。”这是一个警句，大约三十年以前，一些自以为是的抱残守缺者错误地理解了维克多·雨果为他的这一思想所作的解释，错误地向读者作了宣传，然后把这个警句看成是雨果的关于才能发展趋向的思想。但是应当承认，他本人在嘲笑他的论敌时也有错误，因为他的论辩非常含混，态度十分傲慢，而且为自己所作的解释也相当杂乱。然而，对他的攻击和嘲笑早已无影无踪，而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却并未消失；而且不久之前，即在他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问世三十多年以后，又出版了《悲惨世界》。伟大的诗人和公民在这部小说中显示了非凡的才华，以如此丰满的艺术力表现了他这部史诗的基本思想，使得它在全世界不胫而走，人人以一读为快。作品给予读者的印象是如入胜境，迷而忘返，无一例外。早就有人揣摩到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足以说明雨果的思想的这一警句，并非荒谬可笑的定理。他的思想是十九世纪整个艺术界的基

* 本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当代》月刊1862年9月号发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俄译本所写的编者按语，题目是译者所加。——译者注

本思想，作为艺术家的维克多·雨果也许算不上是提出这个思想的第一人。这是基督教的思想，道德高尚的思想。它所体现的定理是促使在环境暴虐的压迫下死去的人们死而复生，推动停滞的时代进步，消除社会的偏见。这个思想是为社会中的被侮辱者及一切被排斥的贱民仗义执言。当然，在如同《巴黎圣母院》这样的艺术作品之中，是不可能设下什么影射的。但谁不认为卡西莫多是中世纪被压迫受歧视的法国人民的化身呢。他又聋又哑，外形丑陋，只有一副天生的力大无穷的躯体，然而体内终于有了对于爱情的觉醒，对于正义的渴望，同时也觉察到了自身的真实情况以及还没有一试身手的取之不竭的力量。

维克多·雨果差不多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之中这一“起死回生”思想的主要的预言家。至少他是最先在艺术作品中以这样的艺术力提出这个思想的。当然，这个思想并非雨果的独家发明，相反，根据我们的看法，它是十九世纪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属性，也许又是十九世纪的一种历史必然性，虽然动辄指责我们这个世纪除了几位堪为典范的大家之外，在文学艺术中没有作出任何新的成就。这种指责是非常不公正的。请你们认真观察一下当代欧洲各国的文学，你们就会发现这一思想的所有痕迹；而且说不定到本世纪末，最终会有一部表现时代的愿望、体现时代的风貌如同《神曲》表现它那个中世纪的天主教信仰和理想的时代那样全面、永久的艺术作品，来鲜明而强有力地、充分而完整地表达这一思想的。

维克多·雨果无疑是法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他的思想已在传播；甚至当前法国长篇小说的形式，差不多

也是他一人的创造。连他的一些严重的缺点，凡是追随他的法国小说家，几乎也都照搬不误。现在《悲惨世界》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获得好评，我们不免想起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由于某种原因还没有翻译成俄文，而欧洲有许多作品已经有了俄译本。当然，以前我们都读过它的法文原本，但是，第一，我们认为，那只是懂法文的人读过它；第二，懂法文的人也不一定全都读过；第三，读过以后已经隔了很长时间了；第四，从前，也就是三十多年前读它的法文原著的时候，读者的人数非常少，不懂法文却愿意读它的人又非常之多。而现在，读者的人数与三十年前相比可能增加了十倍。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以上所说各点都是很早之前的情况了。现在的一代人不一定再把旧的小说拿出来读。我们甚至认为现在的一代读者中已没有几个人知道雨果的小说了。这就是本刊决定翻译优秀的感人的作品的缘故，目的在于向我们的读者推荐当代法国文学的名著。我们甚至认为在相隔三十年这样长的时间之后，当年读过这部小说的人再来读它一遍也许不是什么太麻烦的事。

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会埋怨我们向他们推荐这样一本书……从书名来看是无人不晓的。

1862 年

略谈乔治·桑

乔治·桑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之时，正好是我的少年时代，这个事实早已存在，现在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隔了三十多年之后，现在我差不多可以完全把它公开说出来了。应当说明，从前只有一件事是可以准许的，那就是读小说，别的无论什么事，无论什么思想，特别是法国传过来的，是严而又严地绝对禁止的。啊，当然，他们常常是看不住的，也没有地方可以学到这个本领，连梅特涅本人①都看不住，何况他在咱们这里的徒子徒孙。所以"危险分子"常常从眼皮底下滑了过去（例如滑过去别林斯基一个大活人）。但是，好像改变了一下手法，到最后，特别是为了避免失误，几乎一切都在禁止之列，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不准乱说乱动。不过小说照样可以读，无论在开始时，在中途，乃至最后，而就在这一点上，正是在乔治·桑身上，那时的当权者犯了一个大错误。你们一定记得这几句诗：

梯也尔和拉博的著作，

---

① 梅特涅（1773—1859）：曾任奥地利首相，著名的反动分子。——译者注

他倒背如流——
同激烈的米拉波一样，
他赞美自由。[①]

这几句诗写得精彩极了，世间少有，将成为不朽之作，因为它具有历史意义，所以更加珍贵；因为诗的作者是丹尼斯·达维多夫，诗人，文学家，忠贞不渝的俄罗斯人。然而，如果丹尼斯·达维多夫那时候认为什么人——例如梯也尔是危险分子（自然是由于他的《革命史》一书），把他同叫做拉博的某个人（可见也是同样危险的人物，不过我就不知道了）一起写到诗里去，那么，显然，几乎是不可能得到那时候官方的允许的。结果竟然是这样：那时候却以小说的形式使我们接触到这种思想，不但圆满妥帖地办成了事，而且恰好相反，所使用的形式在那时看来也许还是最为“危险”的。因为那时候喜欢拉博的人说不定一个也找不到，而喜欢乔治·桑的人却有成千上万。在这里应当指出，咱们国家里虽然有马格尼茨基和利普朗迪[②]之流，但从上个世纪以来，欧洲的知识界一有什么举动，我们总是立刻就会知道，并且我们的上层知识分子立刻就会把它传播到略感兴趣而稍有头脑的广大群众中去。关于三十年代欧洲的运动，情况也完全一样。欧洲文学中这一重大的运动，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很快就为我们接受，许多新起

---

① 诗中的梯也尔（1797—1877）曾任法国总统，多次镇压起义，特别是巴黎公社起义。著有《法国革命史》十卷。拉博（1743—1793）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米拉波（1749—1791）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曾激烈反对专制主义。——译者注

② 米·马格尼茨基（1778—1844）是反动官僚。伊·利普朗迪（1790—1880）是告密者。

的演说家、历史学家、政论家、教授，他们的名字我们都熟悉。这个运动欲向何处去，我们也知道，即使知道得并不全面，也不详细。而这个运动在艺术界，在小说方面，尤其在乔治·桑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强烈。是的，洗科夫斯基和布尔加林二人[①]在她的小说翻译成俄文之前已经向读者发出警告。他们特别让俄国的太太小姐们感到害怕的是说她身穿长裤，想把她形容成个受人耻笑的堕落的女人来吓住她们。洗科夫斯基本人准备翻译乔治·桑的小说在他的《读者文库》杂志上发表，在报刊上把她叫做“叶戈尔·桑女士”，一本正经地为自己这种俏皮而洋洋得意。后来，1848 年，布尔加林在《北方蜜蜂》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她每天在城门口岗哨旁边同皮埃尔·勒鲁[②]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又参加内务部举行的放荡的晚宴，主持者赖德律—洛兰[③]既是内务部长，又是强盗。我亲眼见到这篇文章，至今记得十分清楚。但在 1848 年那时候，我国读者几乎无人不知乔治·桑，谁也不相信布尔加林的话。她的作品最早翻译成俄文大约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可惜我不记得也不知道最早翻译过来的是她的哪一部作品，在什么时候；但也许因此而给我更加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那时的一代少年都同我一样，被她的高尚纯洁的典型和理想的人物，以及严

① 奥·洗科夫斯基（1800—1858）：彼得堡大学教授，《读者文库》主编。法·布尔加林（1789—1859）：彼得堡《北方蜜蜂》报主编。——译者注

② 皮·勒鲁（1797—1871）：法国经济学家。1841 年与乔治·桑合办《独立评论》杂志。1848 年当选为革命后的布萨克市长。乔治·桑从他那里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译者注

③ 赖德律—洛兰（1807—1874）：法国律师。曾任内政部长，参与镇压 1848 年六月起义。

谨、朴实而动人的叙事笔调所陶醉了——而这样一位妇女居然身穿长裤，腐化堕落！是的，我第一次读她的中篇小说《跳跃》时我才十六岁。这是她早期的一部极为精彩的作品。我记得读完以后整个晚上都十分兴奋。那时候欧洲有一大批新起的作家，一夜之间名闻天下，如雷贯耳。根据我的记忆来判断，在这群新星之中，乔治·桑在我们的心目中差不多可以登上首席的位置，起码是这样。如果我这样说，我想我是不会错的。即使是狄更斯，他在我国几乎是与她同时出现的，在我们读者看来，也要让她三分。我不说巴尔扎克，因为他出场比她要早，三十年代已经写出了《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这样的作品（但别林斯基对后者的态度是错误的，完全忽略了它在法国文学中的重要性）。不过，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从某种批评的观点出发，我只是重提那时候俄国广大读者的趣味以及他们所接受的直接的印象罢了。主要问题在于读者能不能从小说中得到当年防止他们得到的东西。至少在四十年代中期，我们有许多读者只是零零碎碎地听说乔治·桑是那时西欧新人物群体之中的一个卓越的、严谨的和正确的代表；这批新人物出现后，便开始直接否定上个世纪末法国的（更确切地说是欧洲的）流血革命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在这场革命之后（拿破仑一世之后），为表达新的愿望和新的理想而进行了新的尝试。先进的思想家们非常了解：专制政体刚刚变革；“滚开，你的位置由我来坐”这句话刚刚说过；征服了世界的新的胜利者（资产者）好像比从前的专制者（贵族）还要坏；“自由，平等，博爱”只不过是豪言壮语，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而且冒出了这样的理论，认为在所

有的豪言壮语之中，这三个词是办不到的。胜利者说出或者提起这三个神圣的字眼已经显得可笑了，甚至科学（经济学家们）通过它的当时嘴上似乎也有新名词的优秀的代表人物来证明这三个字眼是可笑的，并指责它们包含着乌托邦的意义，而为了这三个词却流了这么多的鲜血。因此，与得意洋洋的胜利者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的人，使得胜利者为之惊恐不已。于是在这样的时代一下子又产生了真正崭新的字眼，散播着新的希望：有一批人直截了当地宣称一番事业已付之东流，铸成了大错；胜利者在政治上的换班毫无结果，事业必须继续下去，人类的复兴应当从根本上下手，发动社会的力量来完成。啊，当然，除了这些呼声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十分有害又极其古怪的结论，不过重要的是又有了一线希望，又开始有了信心。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的历史，它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似乎根本不想就此停步。我无意在这里对它表示赞成或反对，我只想说明乔治·桑在这一运动中真正的位置。她的位置应当从运动的首创中寻找。那时候在欧洲遇见她的人都说她在鼓吹妇女应有新的地位，并预言将赋予"不受管束的妻子以权利"(这是冼科夫斯基谈到她时的用语)；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完全确切的，因为她所宣传的不仅仅是妇女问题，也没有发明什么"不受管束的妻子"这种字眼。乔治·桑献身于整个运动，并非只限于妇女权利问题的宣传。当然，作为妇女，她自然喜欢更多地谈论巾帼英雄，而少谈须眉男子，因而全世界的妇女现在理应为她服丧致哀，因为她们最伟大最杰出的代表之中有一位去世了；同时，就智慧和才华而论，她可以说是一位前所未有的女性，她的

名字将载入史册，她的名字在欧洲社会中不可能被遗忘，不可能湮没无闻。

至于她笔下的妇女，我再说一遍，早在我第一次即十五六岁时开始读她的作品时，就已经感到惊奇，因为有人对她的议论与我在实际中亲身的体会之间存在着奇怪的矛盾。在实际上，她的许多（至少是有一些）女主人公是道德上纯洁无瑕的典型，而如果作者本身在道德方面没有强烈的要求，不愿意充分履行她的义务，不理解或者不认为仁爱、容忍、正义之中包含着最高的美，那么塑造这些典型是不可设想的。不错，在仁爱、容忍和承认必须履行义务之中也存在着提出要求和表示异议的高度的自尊心，有这种自尊心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它从最严格的真实出发，人类如果否定这种最严格的真实，就没有立足之地，就没有道德水平可言。这种自尊心毕竟不是什么敌意，不是出于一种我比你强、你不如我的心理。它只是一种洁身自爱，不能容忍虚伪和恶德的纯洁的感情，虽然，我再说一遍，这种感情并不排斥宽容和仁爱，而且与自尊心是相适应的，是自愿去担负重大的义务的。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渴望着作出牺牲，完成壮举。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她早期作品中几个少女的典型，例如她那时所谓的“威尼斯式小说”①（《跳跃》和《阿尔迪尼》都属于这一类）里描写的，直到后来的长篇小说《让娜》中才宣告完成。《让娜》写得十分出色，它明确地、也许可以说无可争议地解决了关于圣女贞德②

---

① 指故事生动的爱情小说。——译者注

② 贞德（1412—1431）：法国一农家少女，百年战争中多次率兵击退入侵的英国军队。——译者注

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她通过同时代的一个农家少女在我们眼前一下子复活了历史上的贞德的形象，并且生动地证明了这一伟大而奇妙的历史现象之产生的实际可能性。完成这一使命非乔治·桑莫属，因为除她之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诗人也许都不会在心中怀有一个无辜的少女如此纯洁的理想——纯洁无瑕，而且由于她的清白无辜而显得如此强大有力。我在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少女的典型，在多部作品中一再出现，连续地完成同一个使命，同一个主题（但不是相同的几个少女，因为同一个主题后来在她的色彩华丽的中篇小说《侯爵夫人》中，也是她早期的作品，又表现了一次）。她笔下的年轻女性的性格都是坦率的，正直的，但缺乏经验。她们以纯洁无瑕而自豪，并不害怕与道德败坏的人接触，也不可能因此而受到污染，即使她们无意中突然落入罪恶的渊薮之中。要求作出无私的牺牲（好像已在预期之中），震动着少女的心，她毫不犹豫，毫不吝惜自己，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无私无畏地一下子迈出了危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她所见到和遇到的一切并没有使她退缩，反而立刻在她那年轻的心中增强了勇气。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来自贞洁、正直、纯朴的力量，使她全身的毅力增加了一倍，并且向一直不了解自己但精神饱满、朝气蓬勃、还没有被生活中的挫折污染的头脑指明了新的道路和新的天地。同时，作品的形式又极为优美，无可挑剔，乔治·桑那时候特别喜欢给她的故事安上幸福的结局，以贞洁、真诚、年轻无畏而纯朴的心获得胜利而告终。这样一些形象怎么会扰乱社会，煽动怀疑和恐怖呢？相反，严厉的家长已经允许子女

在家中阅读乔治·桑的小说，他们只会感到奇怪："对她的种种议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过这时送过来警告的声音："写女人要有自尊心，美德要与恶行进行势不两立的斗争，对任何罪恶行为要寸步不让，贞洁的少女要无畏地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坦然面对各种诬蔑，就在这些描写之中包含着毒素，包含着女人今后起来抗争的毒素，妇女解放的毒素。"天哪！也许——说毒素是有道理的，的确产生了毒素，但这个毒素要去毁灭的是什么，什么东西中了它的毒会死去，什么东西又会因它而得到解救——问题立刻提了出来，长期没有解决。

现在这些问题早已得到了解决（好像是这样）。这里必须交待一句，到了四十年代中期，乔治·桑的声望如日中天；对于她的才能所具有的魅力的信任也普遍高涨，因而我们作为她的同时代人都期待着她将来说出更多的前所未闻的话，甚至是能解决问题的带总结性的话。我们的这些期望没有实现，原来在那个时候，即四十年代末期，她已经把要说的和应当由她来说的话全都说完了，现在在她的新坟前完全可以说一说关于她的最后的话了。

乔治·桑不是思想家，但她是对于更加幸福的未来的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者（如果只允许使用这种过于雕琢的句子来表达的话）。更加幸福的未来在等待着人类，而她一生对人类实现理想始终充满信心，生气勃勃，豁达乐观，因为她本人能在心里树立起理想。这一信念保持到最后，常常被所有崇高的心灵、所有仁人志士当作自己

的归宿。乔治·桑去世时是一位自然神论①的信徒，她终其不朽的一生都坚信神的力量。然而关于她只说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她已经超出了这一点；而且在同龄的法国作家之中她也许是最虔诚的基督徒，虽然表面上看来（像天主教徒一样）并不信奉基督。当然，身为法国的女人，乔治·桑必须取得同胞们的理解，不能有意识地说出这样的想法："普天之下唯有诵念他的名字才能得救，此外再无第二人。"这是东正教的主要思想。虽然从表面上从形式上看来是一种矛盾，但我再说一遍，乔治·桑却是最虔诚的基督教的信徒，这一点也许连她本人都没有发觉。她把她的社会主义，她的信念、希望和理想，都建立在人的道德感，人类的精神的需求，人类对于完善、纯洁的憧憬上，而不是建立在蚂蚁的欲望上②。她无条件地相信人的个体（甚至认为它是永存的），她一生都在提高并扩大个人的概念，在每一部作品里都这样，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与基督教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承认个人及个人的自由（因此也承认个人的责任）。由此并承认义务以及对于履行义务所需要的严格的道德上的要求，同时也完全承认个人的责任。她那时的法国也许还没有一个思想家和作家如此深刻地理解"人不是单为了面包而活着"这句话。至于她的提出要求和

---

① 自然神论是欧洲十八世纪前后的一种宗教学说，在神学中提倡理性原则，认为上帝是世界理性，世界应按自然规律存在和发展。反对迷信和愚昧，反对正统的神学教条。——译者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3 年已把人类社会形容为蚂蚁窝。他认为那些改造社会的理论都从人的物质的经济的利益出发，并没有考虑人的精神上的需求，首先是对自由的要求。因此社会生活就是强制的一体化，维系社会的是人的本能的欲望，而不是精神倾向。

表示异议的自尊，那么，我又要重复一句，这种自尊绝对不排斥仁爱之心，不排斥对于各种指责的宽容，甚至不排斥极度的忍耐力。它的基础是对于指责者本人的同情。相反，乔治·桑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歌颂这些原则的美，也不止一次地描写了真诚地宽恕人和以仁爱之心待人的典型。有人在文章中写到她时说她像一个慈祥的母亲那样地死去，她直到临终时还在操劳；她是城郊农民的朋友，受到她的朋友们的热爱。她似乎有一点珍惜自己的贵族出身（从她的母系来看，她出自萨克森王族①），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她在人们面前重视自己的贵族出身，那么这种重视的根源只能是人类的美好的心灵，因为她不可能不爱伟大的人物，不迁就下层人民，不放弃自己的一些想法——在这方面也许她是过于骄傲。不错，她也不喜欢在小说里描写逆来顺受的、为人正派但逢人退让三分的、疯疯癫癫的、吓破了胆不敢反抗的人物，在伟大的基督徒狄更斯的任何一部小说里，几乎都有这一类角色。相反，她塑造的妇女形象都是高傲的，简直像女皇一样。这是她的喜好，应当指出这个特点。她是相当有特色的。

1876年

① 乔治·桑的贵族出身由父系而来，她的父亲是萨克森伯爵莫里茨的后代。

旧时相识

别林斯基这件轶事①，现在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踏上文学道路时的情形，天知道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忧愁的、决定命运的时刻②。我始终没有忘记那时我所见到的别林斯基以及他当时接待我的情形。我现在之所以常常想起旧时的朋友，当然是因为我结识了新的朋友。他是我生平所遇见的最热情的一个人。赫尔岑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是我们贵族阶级的产儿，他首先是俄国贵族和世界公民，——只在俄国出现，除了俄国之外，别的地方不可能出现的典型。赫尔岑不是移居去外国，他不是俄国侨民的开路者；——不是，他生来就是侨民。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在我们这里一生下来也就是侨民，尽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离开过俄国。一百五十年来俄国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称赞赫尔岑在书中把论敌写得很聪明，赫尔岑就告诉他别林斯基的一件事：别林斯基写了一篇题为《甲先生和乙先生的谈话》的文章，甲代表他本人，乙指他的论敌，十分差劲。他问赫尔岑读后的意见，赫尔岑说："看得出你很聪明，可是却愿意在这么个傻瓜身上浪费时间。"别林斯基听后掩面大叫道："真该死！真该死！"——译者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和别林斯基见面是在1845年5月。

贵族的生活中，除极少数之外，最后的根都完全腐烂了，与俄国土壤和俄国现实的最后联系都动摇了。仿佛历史早已注定赫尔岑作为一个最鲜明的典型，以表现他与我们知识阶层的大多数人这种脱离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历史的典型。他们脱离人民，自然也就失去了上帝。他们当中不安于现状的人成了无神论者；萎靡不振和安份守已的人则成了漠不关心者。对于俄国人民，他们只怀着蔑视，同时却自认并且自信是热爱人民，并希望人民一切顺利的。但是，他们对人民的这种爱是从否定的立场出发的，他们想要以某种理想的人民来加以取代——按照他们的理解，俄国人民应该是那种样子的。那时候在某些先进的代表人物心目中，大多不由自主地把1793年巴黎的平民当作这种理想的人民。在那个时候，这是人民最富有魅力的榜样。当然，赫尔岑正因为是个俄国的大少爷，也就是无饥寒之虞，不为谋生而奔走，单单由于一种“思想的逻辑趋向”和在国内所感到的内心的空虚，他应该去当个社会主义者。他脱离旧有的社会基础，否定家庭，但他似乎还是个好父亲和好丈夫。他否定财产，却期望能成功地安排自己的事业，并为在国外维持富裕的生活感到满意①。他策动革命，鼓励别人参加革命，同时又贪图舒适和家庭的安宁。这是个艺术家，思想家，杰出的作家，学识渊博，思想敏锐，非常健谈（他的谈吐胜过他的文笔），善于思考。深思

① 1850年，按照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法院缺席判决剥夺赫尔岑的一切公民权利，并认定他是“永远被逐出俄国国境的流放犯”。赫尔岑的田产被没收。但他从父亲处所继承的资金（几十万卢布）事先已转移到了国外，因而有可能开展革命活动，创办“自由俄国印刷所”。

熟虑，内心深处的感情化为客体，供奉在自己面前顶礼膜拜，大概又立即加以嘲笑，这种才能在他身上发展到了极限。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然而，无论他是什么人——写过回忆录[①] 也好，与蒲鲁东[②] 一起出版过报纸也好，或者出现在巴黎的街垒上[③] 也好（他在回忆录中非常可笑地描写过）；他痛苦也好，高兴也好、怀疑也好；1863年为了讨好波兰人，他写信回国，给俄国的革命者寄呼吁书[④]，同时他又不相信波兰人，明知他们欺骗了他，明知他的呼吁书会断送这数百名不幸的青年；对这一点他最近在一篇文章里以空前的天真直认不讳，甚至毫不顾忌这样的自白会把自己置于何地。——尽管有以上这些表现，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合以至终其一生，他首先是俄国的贵族和世界公民，纯粹是已成为过去的农奴制的产物。他憎恨农奴制，又来源于农奴制，这不单是由于父亲，而且还因为脱离故国的土地和理念所造成。别林斯基正好相反，别林斯基压根儿不是贵族，——啊，不。（天知道他是什么出身。他的父亲似乎是军医。）

总的来看，别林斯基不是一个内省的人，他这一辈子总是无所顾忌而充满激情。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深

---

① 指《往事与随想》（1852—1868）。

② 皮·约·蒲鲁东（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他主办的报纸《人民报》于 1849 年 6 月停刊后，决定出版《人民之声》报，赫尔岑曾提供保证金。

③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叙述了他与国民卫队及巴黎警察的冲突。

④ 早在 1863 年波兰起义之前，为捍卫波兰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权利，赫尔岑发表了不少文章。起义开始后，赫尔岑不止一次地号召俄国官兵“不要拿起武器对着波兰人”，不要“用武装力量支持给波兰人和我们带来不幸的政府”。

得他的赞赏（后来，大约过了一年，我们分手了[1]，原因很多，其实从各方面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时，在相识的最初日子里，他心里老牵挂着我，非常单纯而又迫不及待地想让我接受他的信念。我丝毫没有夸大他对我的偏爱，情形十分热烈，至少在相识的最初几个月里是如此。我遇见他时他正是一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他开门见山就同我谈无神论。这方面有我感到重要的许多东西——确切地说，是他的惊人的敏感和极为深刻地理解各种思想的非凡才能。两年前，"国际"[2]的一份呼吁书开头第一句就郑重地声称："我们首先是无神论的团体[3]。"一开始就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别林斯基也从这里开始。他非常重视理性、科学和现实主义，同时他比谁都更深刻地懂得，单是理性、科学和现实主义，只能建造蚂蚁窝，而不是人们可以共存的社会的"和谐"。他知道，一切的基础是道德准则。他狂热地毫不怀疑地相信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基础（然而，社会主义至今尚未指出任何基础，除了揭露人性和健全的理性被丑恶地扭曲以外）；这只是一种狂热。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首先应该消灭基督教的势力；他知道，革命必然要从宣传无神论开始。他应该推翻那在他所否定的社会的道德基础上产生的宗教。家庭、财产、个人在道义上的责任，他是从根本上否定的。（我发觉，他和赫尔岑一样

---

① 1846 年下半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在思想和文学、美学观点上产生了分歧。

② 指第一国际。——译者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处引文来自巴枯宁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

也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毫无疑问，他懂得，在否定个人的道义上的责任时也要否定个人的自由；然而他完全相信（他比赫尔岑要盲目得多，赫尔岑到后来似乎产生了怀疑），社会主义不但不破坏个人的自由，反而会把它恢复到前所未闻的广阔的程度，而且会有新的坚固的基础。

但这时仍然存在着耶稣的光芒四射的人格，要否定它是最为困难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必然要攻击基督教的教义，称它为虚伪的和无知的仁爱，受到现代科学和经济法则的谴责；但仍然存在着耶稣光芒四射的形象，存在着他在道德上无人可及的境界，他的神奇的能创造奇迹的美。但是别林斯基在他永不休止、历久不衰的狂热中，甚至遇到这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时也不像勒南① 那样停步；勒南在他那本排斥宗教信仰的《耶稣传》一书中宣称，耶稣毕竟是人类美的典范，是不可企及的典型，这种典型甚至在将来也不可能再出现。

“是的，您知道吗，”有一天晚上他尖声叫喊道（当他非常激动时，有时不知道为什么要尖叫），“您知道吗，当社会道德沦丧，一个人不可能不犯罪时，当他在经济上堕入罪恶的深渊时，是不可能把罪行算到他的身上的，也无法让他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的；并且即使他愿意，也无法横蛮而粗暴地要求一个人去完成按照自然法则所不能完成的事……”

这天晚上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在座的还有别林斯基的

① 恩纳斯特--约瑟夫·勒南（1823—1892）：法国宗教史家。《耶稣传》（1862）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

一个朋友[1]，他十分尊重别林斯基，并且在许多事情上听从他的意见；也是一个刚刚开始创作的青年，后来在文学界负有盛名。

“我看着他时甚至觉得非常感动。”别林斯基突然停止了激烈的叫喊，用手指着我，对他的朋友说。“每一次，当我这样想起耶稣时，他整张脸都变得好像要哭的样子……请您相信，您是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他又突然同我说起话来，“请您相信，如果您的耶稣出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就会是一个最不显眼的、最平凡的人；于是就会在当今的科学和当今人类的推动力面前显得无地自容。”

“嗯，不！”别林斯基的朋友接着说。（我记得我们两人坐着，而他总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嗯，不。如果现在出来一个耶稣，他会参加运动，并且成为它的领袖……”

“对呀，对呀，”别林斯基突然急急忙忙地表示同意。“他会加入社会主义者的队伍，跟他们走。”

耶稣命中注定要加入的人类的推动力，当时全是法国人：首先是乔治·桑，现在已完全被遗忘了的卡贝，皮埃尔·勒鲁[2]以及那时刚刚开始活动的蒲鲁东。就我所能记得的，这四个人是别林斯基当时最崇拜的。他对傅立叶已远不是这样尊重。在他家里整夜整夜地谈论这些人。他当时非常崇拜的还有一个德国人，叫做费尔巴哈（别林斯基一辈子没有学会一种外语，他把这个姓氏读成“菲耶尔巴

---

① 可能是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波特金（1812—1869），俄国作家。
② 皮埃尔·勒鲁（1797—1871）：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赫”)。谈到施特劳斯[①]时也是满怀着敬仰之情。如此热诚地信奉自己的思想，这样的人当然是幸福的。啊，后来有些人写道，如果别林斯基多活几年，他会参加斯拉夫派[②]。这是浪费笔墨而已。他永远不会以斯拉夫派而终其一生。如果别林斯基能多活几年，如果他有机会移居国外，他可能会客死他乡；他现在可能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小老头，怀着从没有丝毫怀疑过的旧日热诚的信念，奔波于德国和瑞士的哪个地方的会议上，或者以副官的身份跟随德国的某一位赫格[③]夫人，为某个妇女问题而忙碌。

不过，这个生活十分美满、心地极为平静的人，有时候也很苦闷；但这种苦闷很特别，——不是由于怀疑，也不是由于失望，啊，不是的，——为什么不是今天，为什么也不是明天呢？这一位在全俄国来说是最性急的人。有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在兹纳明斯克教堂旁边遇见他[④]。

---

① 大卫·弗里德利希·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所著《耶稣传》(1835—1836）一书对发展反宗教的思想产生过很大影响，他把耶稣看成一个历史人物，认为《新约》只是当时的文学名著。

② 这是俄国批评家阿·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在《我国批评家笔下的著名欧洲作家》一文中写的一句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征订1861年《当代》杂志的启事和《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中重申了别林斯基有可能转变为斯拉夫派的想法。他在援引格里戈里耶夫的话以后指出："这句话里有思想。”因为别林斯基曾经反对赞扬“西欧的东西”，他相信俄国肩负着伟大的使命，他高度评价普希金认识异族内部利益的能力，认为是俄国人的特点，这些被当成了得出上述判断的依据。然而别林斯基对斯拉夫派全盘加以否定的态度，迫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的“根基”派对别林斯基思想的发展趋向从根本上作出修改。同一个格里戈里耶夫1861年在《别林斯基和文学界的反对观点》一文中写道："他在当代不可能不是一个反对者和操纵者，虽然对于他会成为斯拉夫派这一点应当表示怀疑。”

③ 赫格是德国的政治活动家，日内瓦和平大会的领导成员。

④ 别林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会面可能是在1847年末。

他对我说出来散步，正要回家。“我经常到这里来看工程的进展情况（指当时正在建设的尼古拉耶夫火车站）。我站一会儿，看一看施工情况，借此散散心：我们终于要有一条铁路了。您不会相信，这个想法有时真能使我感到宽慰。”

这番话说得很热情，说得很好；别林斯基是从来不自我吹嘘的。我们一起走着，我记得他在路上对我说：

“您看，一当人们动手要把什么人埋进坟墓里去（他知道自己患有肺结核病），那时候才忽然想起，才知道是谁没有了。”

在他去世的最后一年，我已经不到他那里去了。他不喜欢我；但我那时已经狂热地接受了他的全部理论。再过一年，在托博尔斯克[1]，当我们坐在城堡中转送犯人的院子里，等待未来命运的时候，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恳求城堡的看守在他的屋子里安排一次和我们的秘密会见[2]。我们见到了这些伟大的受难者，她们自愿跟随自己的丈夫来到西伯利亚。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的地位、财产和亲戚朋友；为了无比崇高的道义上的责任，为了充分履行未被剥夺的义务，哪怕只有一点可能，她们牺牲了一切。她们在漫长的二十五年中无辜地忍受了她们被判刑的丈夫所忍受的一切。会见历时一个钟头。她们为我们走向陌生的道路祝福，给我们画十字，赠给每人一本《新约》——监狱里允许阅读的唯一的一本书，这本书在我服苦役期间压在枕

---

① 西伯利亚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一个小城，沙皇时代流放政治犯之地。——译者注

② 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与被流放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会见是在1850年1月。

头底下四年。有时候我读它，有时候别人读它。我还用它教会一个苦役犯读书。我身边正是这样一些人，按照别林斯基的信念，他们是“**不可能**”不犯罪的，因而没有错误，只是比别人不幸而已。我知道，全体俄国人也把我们称为“不幸的人”，我多次听到这个称呼，也从很多人的口中听到这个称呼。但在这里是另外一回事，完全不是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在这里会听到的，比方说，是目前我们陪审员的某些判决书中的称呼。在“不幸的人”的这个字眼里，在人民的这个判决中，包含着另一种意思。四年的苦役是一个漫长的经历；我有时间相信……现在想谈的正是这一点。

1873 年

一件私人的事

有人多次要我写文学回忆录。我不知道能否写成，因为记忆力不好，而且回忆起来使人伤心；一般来说我不爱回忆往事。可是尽管记忆力不好，我的文学生涯中的某些事情，却时常不由自主地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譬如，有这么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有一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去看望现已作古的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柯瓦列夫斯基①。他非常喜欢我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当时刊登在《俄国导报》上。他热情地称赞它，并向我转达了有个人提的一条对我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能说出来。这个时候房间里一前一后进来了两份杂志的两个出版人。其中一份杂志后来订户的数量大增，是我们任何一家月刊前所未见的，但当时只是刚刚起步。而另一份杂志却相反，它的美好的时光以及对文学界和读者的影响正在逐渐消失，但那个时候，在那天早上，它的出版人还不知道它的出版已接近尾声。我正是和

① 俄国作家、地理学家，文学基金会首任主席，生于1809年，死于1868年。——译者注

这个出版人一起来到了另一个房间，两个人待了一会儿。

我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只想说我和他的第一次会面是一生中最热烈的，不平凡的，是我永远难忘的。也许，他也不会忘记。当时他还不是一个出版人。后来发生了许多误会。我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1]，同他很少见面，但是有一次他匆匆地和我说了一句十分热情的话，并由于某种缘故告诉我他写的一些诗——他从前写的好诗。我这里补充一句，从外表和举止上看，任何人都比他更像一个诗人，即使是在“悲天悯人”的人中间，但他是我们诗人当中最热情、最忧郁和最“悲天悯人”的一个。

“嗨，我们把您痛骂了一顿。”他对我说（即在他的杂志上批评《罪与罚》）。

“知道。”我说。

“您知道为什么吗？”

“大概是照章办事吧。”

“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

我惊呆了。

“某某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这位出版人接着说，“他这么对我说：‘他这部小说是写得好的，但因为两年前他的一部中篇小说不知羞耻地污辱了一个不幸的被流放的人，并把他丑化了一番，所以我要批评他的这部长篇小说。’”

“这岂不是又对《鳄鱼》进行愚蠢的诽谤吗？”我想了想，叫了起来。“难道您会相信吗？您看过我的这部中篇小

---

[1] 1858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西伯利亚流放地塞米帕拉金斯克，抵达特维尔，1859年12月由特维尔来到彼得堡。——译者注

说《鳄鱼》没有？”

“没有，我没看。”

“可是这纯粹是诽谤，是天底下最卑鄙的诽谤。只有布尔加林[1]这种人的头脑和对于诗的嗅觉，才能够在这篇小玩意儿，这篇给人取乐的中篇小说的字里行间找出这种‘人身的’影射，而且还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攻击！您该知道，这种牵强附会是多么的愚蠢！不过，两年前我没有驳斥这个卑鄙的诽谤，我绝不原谅自己，当时就是把它放过去了！”

我和现在早已逝世的这位杂志出版人的谈话，是在七年之前，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没有驳斥这个“诽谤”，有时是忽略了，有时是“没有时间”。然而对我凭空捏造的这种卑劣的谎言，在某些人的记忆中把它当成了确凿的事实，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并散布到读者中去，因而不止一次地给我带来不快。对这一切已忍无可忍，至少应该说一句话了，而现在正是时候；虽然毫无根据，但是这种诬蔑之毫无根据地信口雌黄，已无以复加，必须加以驳斥。由于我长期保持沉默以及至今仍然不重视这件事，仿佛我默认了似的。

我第一次和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见面是在1859年，我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的第一年，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和怎么见面的。后来有时也见到过，但不经常，谈过话，也不多。总是握握手就算了。赫尔岑曾同我说过，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印象不好，他是指外表和

---

① 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1825年在彼得堡创办《北方蜜蜂》报。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立场趋于反动，后成为情报机关“第三厅”的文化特务。——译者注

举止而言，我却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外表和举止。

有一天早上，我在住宅门锁的锁把上发现一张传单。这种传单当时散发得相当多，这一张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它的标题叫做《致年青一代》①。再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比它更荒谬和更愚蠢的了。内容带煽动性，形式非常可笑，只有他们的凶手才能给他们想出这样的形式，好让他们送命。我感到非常苦恼，整天都闷闷不乐。这一切当时还不习惯，但又出现在我眼前，因此当时要完全看清楚这些人还很困难。困难正在于似乎不相信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还隐藏着这样的小事。我并不是说当时整个的运动，而只谈人。至于运动，这是一个严重的、不健全的、但以它的历史进程表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象，它在我们历史上的彼得堡时期将写上庄重的一页，而这一页似乎还远远没有写完。

从我内心来说，我早就不同意这些人，也不赞成他们所进行的运动的目的，——那时我突然感到懊丧，几乎要为他们的无能而羞愧："为什么他们会办这种愚蠢而拙劣的事呢？"不过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我并不是为他们的失败感到懊丧。散发传单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懊丧的是我见到的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不是那些毫不相干的人干的愚蠢的把戏。这里掩盖了一个事实：文化水平，觉悟水平，以及对实际情况理解的水平，被

---

① 此处可能指"青年俄罗斯"于1862年5月18日发的传单，号召民众起来推翻俄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消灭皇族和统治阶级。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来看望他的原因是1862年5月彼得堡发生大火，火灾带有明显的挑衅性质，沙皇内务部指示趁机逮捕著名的革命家，认为火灾与煽动性传单有关。

严重地忽视了。尽管我在彼得堡已经住了三年，对某些现象已经见怪不怪，那天早上的这张传单仍使我大为震惊，对我来说完全像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新发现：在那天以前我绝对没有料到会碰上这种毫无价值的举动！正是这种毫无价值使我感到害怕。黄昏时我突然想到要去拜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到他家去过，也从没有想过要去，正像他从没有来找过我一样。

我记得是下午五点钟左右，正好碰上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独自在家，甚至连应门的仆人也不在，他亲自给我开门。他非常亲热地接待我，引我进入他的书房。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这是怎么回事？”我掏出传单。

他接过传单，好像根本不认识是什么东西一样，看了一遍。总共也就十行。

“噢，怎么啦？”他问我，脸上有淡淡的笑容。

“难道他们就这么愚蠢可笑吗？难道不能制止他们，停止这种胡闹吗？”

他非常庄重而令人感动地回答说：

“难道您以为我赞成他们这样做，并认定我会参与编写这么一种东西吗？”

“我正好不这样想，”我回答说，“我甚至认为您相信这样做是不必要的。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制止他们。您的话对他们是有分量的，当然，他们害怕您的意见。”

“他们当中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这我相信。但完全不需要认识他们，也不必亲自和他们谈。您只要在哪个地方说明您不赞成，就会传到他们耳

中的。”

“也许不会产生作用。而且这些现象叫做横生枝节，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是不利的。”

这时有另外一个客人敲门，不记得是谁，我就走了。我认为有责任指出，我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谈话是真诚的，并且像现在一样完全相信他不“赞成”这些散发传单的人①。我觉得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对我的造访并不是不欢迎；几天以后他亲临我家就证实了这一点。他在我家里大约坐了一小时，说实在的，我还没有遇见过像他那样温和和热情的人，所以那时有些人议论他的性格，把他说成好像是一个严厉而孤僻的人，使我感到惊讶。我开始明白，他希望和我相识，我记得我也是乐意的。后来我又到他家去过一次，他也来过。不久由于我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我迁居到莫斯科，并在那里住了九个月，刚刚开始的交往就这样中断了。然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并流放②。从此他的事我一无所知，至今也不知道。

大约一年半以后，我突然想写一篇幻想故事③，属于模仿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鼻子》一类。我还从没有试过用幻想体裁写作。这纯粹是文字游戏，只不过为了取乐。确实

---

① 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他的立场与民主运动中某些人的极端主张相去甚远。在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话中，他还证实了后者的情绪确实处于激动的状态。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7日被捕，在彼得保罗堡大约关押了两年，然后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他的中篇小说《鳄鱼》，发表于《时代》杂志1865年第2期。

设想了几个喜剧情节，我想展开一下。即使不值得写，我也要把情节说明白，留到以后再来写它。那时彼得堡的商品街有一个德国人，让人家花钱看一条鳄鱼。彼得堡的一个官员，在启程出国前带着年轻的妻子和一位形影不离的朋友去逛商品街，都想顺便去看看鳄鱼。这个官员属于中间等级，但有一定的独立地位；他还年轻，但目空一切，骄傲得不得了。首先他是一个傻瓜，就像那个令人难忘的丢了鼻子的科瓦辽夫少校[1]一样。他对自己无与伦比的优点的信心，到了可笑的程度；他缺乏教养，但差点没把自己当作天才，在他那个司里，他被看成一个胸无点墨的酒囊饭袋，经常因为普遍对他的轻视而苦恼。好像为了替自己出一口气，他就把他的一个懦弱的朋友指使得团团转，拼命地折磨他，在他身上显示自己的聪明。这个朋友憎恨他，但一切逆来顺受，因为他暗地里喜欢上他的妻子。当这位娇小的太太——年轻、可爱，完全是彼得堡的派头，是中等社会里并不聪明的卖弄风情的女子，当她在商品街上出神地观赏展览出来的鳄鱼和猴子时，她的天才的丈夫不知道怎么激怒了一直像一块木头那样躺着沉睡的鳄鱼，鳄鱼突然张开大嘴，把他整个儿吞了下去，一点儿也不剩。很快就发现这个伟大的人物没有受到鳄鱼的丝毫伤害；相反，他以特有的顽强从鳄鱼的肚子里宣布说，他待在里面非常舒服。他的朋友和妻子急忙去找领导部门来解救他。可以想象，为此完全应该打死这条鳄鱼，剖开肚子，把伟大的人物放出来；而同时，当然还应该给鳄鱼的主人、德国人

① 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鼻子》中的人物。——译者注

和他的相依为命的老伴以赔偿。开始时德国人由于害怕他的鳄鱼吞吃了“官员先生”会被打死而愤怒，感到绝望，但很快就明白，被吞下去的彼得堡的一名行政官员依然在鱼肚子里活着，将来可以在整个欧洲给他带来巨额的收入。他要求赔偿一大笔钱，外带一个俄国的上校军衔。另一方面，领导上感到很为难，这种事在部里是太新奇了，是没有先例的。“假如我们从前哪怕有过一个小小的例子也好，那就可以依例办理，现在真是麻烦。”他们也怀疑，这个官员是因为某种被取缔的自由主义倾向而爬进鳄鱼肚子里的。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开始觉得她的“如同寡妇”般的处境并非没有趣味可言。她的被吞进鱼肚子里的丈夫这时又明确地告诉他的朋友，他呆在鳄鱼肚子里要比他在机关里好得多，简直无法相比，因为现在他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在过去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坚持要他的妻子举办晚会，把他和鳄鱼一起装在笼子里带到晚会上去。他相信彼得堡全城居民和全体政府要员都会蜂拥而至，来看个新奇。这时他还打算捞上一笔：“我将宣示真理，并进行一番教育；我要向为国效劳的健儿提供忠告，我要在部长面前显露才能。”他说，他已经认为自己好像不是来自这个世界，有权提出忠告，并宣布判决。他的朋友提出一个谨慎而恶毒的问题：“假如他由于某种出其不意的过程，但这是应当预料到的，被消化成了不愿成为事实的某种东西，那怎么办？”这位伟人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考虑过了；但是他将满腔愤怒地抗拒这种按照自然规律完全可能发生的现象。但是太太也不赞成抱着这样的目的举办晚会，虽然她觉得他那个主意倒不错：“怎么可以把我的丈夫关在笼子里带给我呢？”她

说。而且她越来越对如同寡妇般的地位感兴趣，她觉得很好玩，大家都同情她。她丈夫的领导常来看她，和她一起玩自己的牌……以上就是这个滑稽故事的第一部分——它没有写完。有了时间我一定写完它，虽然我已经把它忘了，现在应当重新读一读，要把它记住。

然而，这么一件小事，有人却大做文章。这篇故事刚刚在《时代》杂志上（1865 年）发表，《呼声报》立刻在小品栏内登载了一篇奇怪的文章。每个词每个句子我记不起来了，也没有这种本领，但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鳄鱼》的作者走上这么一条道路是枉费心机；这样做既出不了名，也捞不到想要捞的利。"云云。然后是几句极为隐晦而又极不友好的讽刺挖苦。我匆匆地看了一遍，什么也不懂，只看见了许多尖酸刻薄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篇隐晦的小品文式的批评，当然不会伤害我；读者中间反正也没有人能看懂，像我一样。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尼·尼·斯特拉霍夫[1]突然告诉我："您知道他们都在那儿想什么？他们认为您的《鳄鱼》是一种影射，写车尔尼雪夫斯基流放的过程，说您想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拿出来示众，取笑一番。"我虽然感到惊奇，但并不惶惶不可终日；什么样的猜测不会有呀？我觉得这个意见完全是独出心裁，过于牵强附会，目的在于让它四处散布。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提出抗议。但我绝不原谅自己这样做，因为这个意见已被人信以为真，四处散布。诽谤吧，事实真相总不能完全掩

---

①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1828—1896），俄国文艺批评家。——译者注

盖的。

不过，我现在也还认为，这里根本谈不上诽谤，——那么又为了什么，目的何在？在文学方面我几乎从没有和人发生争吵，至少没有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现在，此刻，在我二十七年的文学活动中，我只是第二次谈到自己。这种东西只不过是愚蠢而已，是并不体面的由疑神疑鬼而来的愚蠢，它之钻进某些人的脑袋里，是“倾向性”在作怪的缘故。我觉得这个胡思乱想的脑袋瓜至今还坚信他没有错，好像是我不应该嘲笑不幸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甚至认为即使到了今天，我的任何解释和所陈述的理由已经不能改变他们对我的错误看法。他们长的毕竟是胡思乱想的脑袋。（当然，我不是在说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1]；作为这张报纸的主编和出版人，他与这件事始终是不相干的。）

影射究竟表现在哪里？好吧，当然——鳄鱼是代表西伯利亚；骄傲和轻率的官员是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被鳄鱼吞到肚子里，还一直想着要教训全世界；被他指使得团团转的那个逆来顺受的朋友，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当地的朋友们。至于那位可爱的，但有点傻乎乎的官太太，为“如同寡妇”的处境而沾沾自喜，那又是……但说得太肮脏了，我不想弄脏自己的笔，继续解说影射的对象。（那时影射的说法已经成立，而后一个暗示也许也被人认为确有所指；我有不容置疑的证据。）

这就是说，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我本人曾被流放并服过苦役，为另一个“不幸的人”流放而幸灾乐祸；而

---

① 即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译者注

且还拿这件事写成小说，兴高采烈地中伤别人。但是有什么证据呢？影射就是证据吗？随便拿一篇什么东西来吧……《狂人日记》，《上帝》颂歌，《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费特的诗①，随便什么都行，你指定前十行，我马上可以找出影射普法战争或者诬蔑演员戈尔布诺夫的词句。总而言之，随便对什么人，你说什么人都行。你们回想一下，古时候，比方说，在四十年代末期，书报检查官把手稿和衬格纸都检查得仔仔细细，看看有没有一行字、一个句点包含着可疑的东西，影射的东西。为了证明我像个恶毒的没有心肝的中伤者，期待于我的只能是这种影射，最好让他们从我一生的经历中拿材料出来吧。

恰好相反，这样一些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得出的毫无根据的结论，正好表明这些指责我的人本身有某种卑劣的心地，表明他们的观点是愚蠢的，不人道的。在这里甚至最天真的揣测也是不可原谅的；不是吗？天真的卑鄙者也可能有的，就是这样。

那么，是不是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怀恨在心呢？为了防止这个指责，我特意在上面讲述了我们短暂而愉快的相识过程。有人会说，这不算什么，我是在心底里隐藏着对他的仇恨。然而，请他们说出这种仇恨的理由吧，如果有什么理由可说的话。这种理由是没有的。另一方面，我相信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会证实我所叙述的我们会面的过程是确切无误的，如果他有机会读到我的叙述。愿上帝保

---

① 《狂人日记》是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上帝》是杰尔查文的诗。《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是扎戈斯金的长篇历史小说。费特（1820—1892）是俄国抒情诗人。

佑他有机会这样做。我是这样亲切热情地期待着，如同我无论过去和现在对他的不幸都衷心地感到惋惜一样。

但是仇恨是由于信念而引起的，可能吗？

这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没有以他的信念来非难我。即使跟一个人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仍然可以非常尊重他。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说我并非信口开河，我甚至有一个小小的证据。在《时代》杂志停刊前最后几期的某一期(差不多是最后一期)，刊登了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的长篇文章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出于名家的笔下。不是吗？文章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聪明才智作了应有的评价。对他的小说本身说的话也非常热情。对他杰出的才智从没有人怀疑过。我们那篇文章只谈到了他的才智的特点和倾向，而文章本身的严肃性表明我们的批评家对他所评论的作者的优点是完全尊重的。现在你们会同意：假如因为信念之故我对他怀恨在心，那么我当然不会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来谈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并给以应有的尊重；因为《时代》的编辑实际上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或许，我发表一部恶毒的影射的小说，希望以此在某个上层得到好处？但是什么时候什么人能够说我在这个意义上在某个上层面前玩过把戏或者玩来了好处，也就是出卖了我的这枝笔呢？我甚至想，作这种猜测的人本身也没有这种想法，尽管他有一片天真。那么这种猜测也绝不会

---

① 很可能这里指尼·尼·斯特拉霍夫的文章《幸福的人们》，他高度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这篇评论是为《时代》杂志而写，但没有在《时代》上发表。

在文学界有立足之地，如果只是指责这一点的话。

至于有人可能指责我对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的一些家庭情况进行诽谤和影射，那么我再一次重申，我不想就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我的笔甚至连碰也不愿意碰一下，以免弄脏自己……

我觉得很遗憾，这次我说了一大堆自己的事。瞧，这就是写文学回忆录的结果；以后绝对不再写它。十分抱歉，肯定使读者感到厌烦了，不过我写的是日记，日记有一部分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正好不久前我获得了一个"文学的"感受，间接地使我突然想起我那部已被遗忘的《鳄鱼》的这件已被遗忘的有趣的事。

前几天，我极为尊敬的人士之中有一位（他的意见我是非常重视的）对我说："我刚刚读过您谈论《环境》和对我们陪审官的意见的文章（《公民》杂志第2期》）。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是您的文章可能引起不愉快的误解。人们会认为您赞成法庭取消陪审官，赞成行政监督机关重新进行干预……"

我大吃一惊，感到伤心。这是最没有偏见、与任何文学派别及"影射"都毫不相干的一个人的声音。

"竟然可以这样理解我的文章啊！以后只能一言不发了。在摆脱农奴制的枷锁之后，人民的经济状况和精神状态是非常可怕的。确凿无疑和惊心动魄的事实，时刻在表明这一点。道德沦丧，低级趣味泛滥，遍地是犹太人开的小酒馆，盗贼横行，以致白昼抢劫——这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发展。嘿，怎么？如果有人出自内心的忧虑，拿起笔把它写下来——怎么，难道人

们会大声叫喊，说他是农奴主，赞成倒退回去奴役农民吗？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希望人民有充分的自由自行摆脱悲惨的处境，不要任何监护，不要倒退。”

“必须这样，这正是我的想法！而即使由于人民力量的衰落（他们现在有时回过头来打量自己，逢人便说：‘力量小了，力量小了！’），”我说，“即使人民遇到了实实在在的无可怀疑的某种不幸，遭到巨大的失败，巨大的灾难，那时人民会自己挽救自己，挽救自己也挽救我们，这种事他们过去遇到过不止一次，他们的全部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的想法。也就是——别再干涉了！……”但是，这些话又怎样来理解和解释，也许又会碰到影射吧！

1873年1月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

附带说一下，四十年代的“星团”，总的来看，我认为他们的才华和能力远远不如他们之前的两位天才普希金和果戈理。但是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是世界文学中的不朽之作。为什么？因为它最先以非凡的成就和精湛的功力，把我们的诗人们和所有为今后的命运担忧的俄国人对于未来的梦想化为现实。他们的梦想就是脱离了人民的俄国社会与人民的心灵和力量又汇合在一起。虽然只是在文学方面，毕竟已成了现实。屠格涅夫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这个计划，几乎都失败了，只有《贵族之家》达到了目的。这部作品诗一般的构思体现在一个心地忠厚、意志坚强、性情温和、态度安详、诚实正直、纯洁无瑕的人物的形象之中，他与道德败坏、奸诈狡猾、虚仁假义以及脱离人民的实际的人是直接对立的。因此而产生无穷的痛苦，但绝不报复。性情温和的人是不报复的，他从旁边走过去就是了，但在他心里，对于邪恶决不能容忍，在道义上也不能作丝毫的退让。他的痛苦并没有描写出来，但是你的整个心灵会觉

---

* 本文是作者的一则札记。——译者注

察到它们。这个不幸的男人同另一个不幸的女子在遥远的修道院里相遇的场面，是永远震撼人心的，而这样的感情对你提供的教益也是不可限量的。因为这个人物和他的美德就是人民，人民的典型，你会感到这一点……以你的全身心感到这一点。因而你不由自主地、甚至不知不觉之中对人民的真实面貌产生了崇敬之心。这就是艺术的最高利益。而主要的是这只不过是一个预言，写的是与人民结合的可能性。恐怕没有人会怀疑我是在奉承伊凡·屠格涅夫先生吧。我之所以提出他的这部作品，是因为我认为它在俄国所有文学作品之中是最能说明人民的真实面貌和人民的美德的。我之所以提出屠格涅夫先生的作品，还因为伊凡·屠格涅夫先生，大家知道，就他的信念来说，是最偏执最激烈的西欧派人士中的一位，他后来为我们写了一个糟糕透顶的小丑一样的典型波图金①，十分热衷地把他写了出来，作为憎恨四十年代的俄罗斯的一个代表，自然，是带有四十年代的所有局限性的俄罗斯。

1876 年

① 长篇小说《烟》中的人物。——译者注

《安娜·卡列尼娜》。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

那一天，即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一位我所喜爱的作家。我们平常很少见面，几个月才有一次，而且总是不期而遇，又总是在街上。我们有五六位作家不知道为什么被合称为“星团”,他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至少批评家们追随在读者之后也对他们另眼相看，把他们与别的作家区别开来，这种做法已经沿袭相当久了。——这个“星团”一直是五颗星，队伍从不见扩大。我喜欢同这位亲切可爱的小说家见面，同时也喜欢向他表明我的看法，不相信也绝对不愿意相信他已成为老朽，像他自己所说的，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平常同他简短地交谈几句之后，我总会记得他的机智而富于远见的话的。这一次谈到什么事，慢慢地就激动起来了。他开门见山地提出《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刚刚读完《俄国导报》上发表的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七部分。他在外表上看不出是个好激动的人，可是这一次他以断然的热烈的口气谈论《安娜·卡列尼娜》，却使我感到惊讶。

“这部作品是空前的，是破天荒的。我们有哪个作家能够同他相比？在欧洲作家当中，又有谁能拿出这样的东西？

他们最近几年来，甚至最近十几年来，各个文学门类，有哪一部作品可以同它相提并论的？”

使我感到惊讶的，主要是他在这个我完全赞同的论断之中指出了欧洲，这正好与那时候自行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困惑不解的现象是相适应的。这部作品在我的眼里看来，真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事实，可以为我们向欧洲作出回答；这也是我们所寻求的事实，可以向欧洲显示的。当然，有人会哈哈大笑说，这只不过是文学，一部小说而已，吹得这么厉害，拿着小说去欧洲，简直叫人笑话。我知道有人会大喊大叫，会哈哈大笑，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不是在吹牛，我冷静地在观察。因为我知道它在目前只不过是一部小说，只不过是焦渴时所需要的一滴水，但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已经有了一滴水，这滴水已经到手，已经是实际的确凿无疑的存在了。因而如果它已经存在，如果俄罗斯的天才能够制造这一事实，那么，可以想见他并不是命中注定是无能的，而是可以创造、可以制作自己的语言，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并一直说到最后的时刻和期限的来临的。同时，这一滴水绝对不只是一滴水。啊，我在这里也不是故作夸张，我知道得很清楚，不但是这个“星团”里的某一颗星身上，严格地说，即使在整个“星团”之中，你们也找不出可以称作天才的创造的力量。在我们文学领域内，以无可争议的“新的语言”而无可争议地被称作天才的只有三位：罗蒙诺索夫[1]、普希金以及半个果戈

---

①　作者把罗蒙诺索夫列入三大天才之内，是认为在他那个时候才开始在俄国的土地上寻求自己的理想。

理。这个“星团”（包括《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在内）是直接来自普希金，他是俄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至今仍然没有被理解，被说明。普希金身上有两个主要的思想，——两个思想都包含着俄罗斯未来的使命和未来的目标的雏形，因而也包含着我们未来的命运。第一个思想是俄罗斯的世界性，她对于世界的感应，她的民族特色与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特色的实际存在、无可争论而且是深刻的血缘关系。这个思想在普希金笔下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指示、学说或者理论，不是表现为想象或者预言，而是表现为他的亲身实践，永久地写在他的天才的作品里，并为他的作品所证明。他是古代世界的人，他又是日耳曼人，他也是英吉利人，他深刻理解本身的特点，本身在追求中所产生的苦闷（《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他又是东方的诗人。他向这些民族说话，告诉他们俄罗斯的天才知道他们，曾经理解他们，同他们有过像亲人那样的交往；告诉他们他可以充分体现他们的形象，只有俄罗斯精神才赋有世界性，它未来的使命是理解并联合各个不同的民族，消除彼此间所有的矛盾。普希金的另一个思想是转向人民，把人民的力量看成是唯一的希望所在；他教导我们，只有在人民身上，唯独在人民身上，才能找到我们完整的俄罗斯特点，才能认识它的使命。而且普希金不仅指出了这一点，实际上他率先付诸实行。由他开始，我们才真正自觉地转向人民；这种事在他之前，一直上溯到彼得一世的改革时期，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现在的“星团”只是按照他指出的方向进行活动，在他之后没有说过任何新东西。一切从他开始，一切由他指明了方向。而且“星团”所发掘的只是

他所指明的极小的一部分。但他们所完成的，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发掘的成果，是这样的深入，这样的清晰，普希金自然是会认可的。当然，《安娜·卡列尼娜》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以前不是没有所闻。没有这部作品，我们当然也可以向欧洲直接指明它的渊源，即普希金，他是最明显、最确凿而又无可争议的证据，证明俄罗斯有独立的民族特点，证明它有权利发挥未来全世界全人类大联合的巨大作用。（哎哟，无论我们指出多少次，欧洲长期以来一直不想读一读我们的东西；即使他们读了，长期以来仍然不了解我们，不能正确认识我们，而且他们根本没有力量认识我们。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是无能之辈，而是因为我们在他们的心目中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仿佛是从月球上来的，因此他们很难设想我们的存在。这些我都知道，我所说的"向欧洲指明"什么只是在我们本身所认定的有权对欧洲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的意义上而言。）但是，《安娜·卡列尼娜》是完美的艺术作品，它来得正是时候，当前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它匹敌。其次，从思想内容来说，它是我们的东西，是我们亲生的骨肉，正是它构成了我们与欧洲世界相区别的特点，成为我们民族的"新的语言"，或者起码是"新的语言"的开端。——这种语言是欧洲从未听过但对他们来说又是十分必要的，尽管他们傲气十足。我不可能在这里长篇大论地进行文学批评，我只想说几句话。《安娜·卡列尼娜》贯穿着一个关于人类的认罪和犯罪的观点。人物被放在不正常的条件下。恶已先于人物而存在。谎言不断被揭破，人物犯下罪行，他们的毁灭是不可抗拒的：如同我们所见到的，这是欧洲文学

作品中一个最受喜爱而又最古老的主题思想。不过欧洲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时普遍采用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制定法律，形诸文字，分成条款，千百年来不断完善充实。善与恶有严格的区分，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其范围和程度是由人类中的智者以他们对人类的心灵所进行的不倦的研究，以及对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协调的力量的对比所作的极其精密的科学测算，根据历史经验而确定的。这样一部殚精竭虑制定的法典，要求盲目地服从；谁不遵守，谁敢违犯，——他就要丧失自由、财产、生命作为代价，付出这种代价是毫不含糊的，冷酷无情的。欧洲的文明说道："我知道这是盲目的，是冷酷无情的，不堪忍受的，因为人类在行程的中途不可能制订出行程终结后的规则，可是又没有别的出路，那么只能执行已经成文的条款，不能含糊，不能手软；否则，后果会更加糟糕。同时，我们称之为伟大的欧洲文明的社会制度，尽管是不正常的，荒谬的，但是让人类精神的力量保持着健康，免受毒害吧；让社会坚定地相信它正在走向完善的境界吧；让它不要以为美和崇高的理想已经暗淡，善恶的概念正在混淆，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正常不断地被不正常所取代，单纯和天真必将破灭，会不断地被汇成大海的谎言所吞没。别这样想吧！"另外一种解决的办法则相反："因为社会的结构是不正常的，那就不可能要求个人对造成的后果负责。因此，罪犯是没有责任的，而且现在也谈不上什么犯罪。为了消灭犯罪和人们的犯法行为，应当结束社会和社会结构中的不正常状态。因为医治现存社会秩序需要很长的时间，又没有希望，也无药可救，所以应当破坏整个社会，像拿

着扫帚一样把旧的秩序清除干净，然后开始在另一种基础上建立全新的社会。这种基础是什么目前虽然还不得而知，但新建立的社会总归不可能比现存的秩序更坏；相反，它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机遇。主要寄希望于科学。”总而言之，第二种解决的办法就是：等待着未来的蚂蚁窝[1]，目前把世界淹没在血泊之中。解决人类的犯法和犯罪问题，欧洲西部世界还拿不出别的办法。

在俄国这位作者关于人们犯法和犯罪的观点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是什么样的蚂蚁窝，无论“第四等级”取得什么样的胜利，无论怎样消除贫困，无论是哪一种劳动组织，都不能使人类摆脱不正常的状态，因而免于犯法和犯罪。这一点表现在对人的心理的大量分析之中，其深入的程度和揭露的力量使人感到可怕；他所使用的艺术描写的现实主义手法，是我们迄今为止所未见的。显然，毫无疑问，人类的灵魂深处就隐藏着恶，比以医治社会为己任的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还要深沉；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之下，恶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灵魂仍然是不正常状态和罪过的发源地；人类的精神法则仍然不可知，为科学所无法探测，而且如此不确定，如此隐秘，没有也不可能有救命的神医，甚至也没有最终的法官，而只有一位“他”。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2]只有他一人知道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和人类最终的命运。人类自以为永远正确而傲

① 伏尔泰把人类社会比作蚂蚁窝。——译者注

② 此处引自《圣经·新约·罗马书》，全句为：“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指上帝。——译者注

慢无比，在时辰和期限没有到来之时是不可能动手解决任何问题的。人间的法官应当有自知之明，他并不是最终的法官，他本身也是罪人，他手上拿着的天平和尺子会变得十分荒谬，如果他只是把天平和尺子拿在手里，不向那仍然无法揭破的秘密的法则低头，也不奔向唯一的出路，去求助于“仁慈”和“爱情”的话。由于不了解自己的道路和命运，由于认为恶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而这种不可避免又是无法得知的，人们会陷于绝望之中。为了不使人们在绝望中毁灭，正好给他们指明了一条出路。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压轴部分那精彩的场面中，在小说女主人公病情危急的场面中，诗人都绝妙地指明了这条出路；那时罪犯和仇人们突然摇身一变，都成了高等的生物，成了言归于好的兄弟，成了由于前嫌尽释而脱下伪装、洗净罪恶的生物，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有权这样做因而立刻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是后来，到了小说的结尾，在一步接着一步分析人类精神堕落那阴暗而可怕的画面中，在描写那不可抗拒的状态出现，当恶控制了人的机体，束缚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剥夺他反抗的能力，取消他同降落在灵魂中的黑暗进行斗争的任何一点想法和意愿，并且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怀着复仇的激情在内心中把黑暗当作光明——在这幅画面中，对人间的法官，对手里拿着天平和尺子的法官，居然作了那么多的劝导，自然会使得他在恐怖和困惑之中失声大叫道：“不，我不会有冤必伸，也不会有罪必给以报应。”——他也不会冷酷无情地去斥责那堕入黑暗深渊的罪犯藐视千百年来所指明的出路的一线光明，并且故意抛弃它。至少他没有引用过一个字……

如果我们有了思想力量和行动力量如此强大的文学作品，那么为什么我们将来不能有自己的科学，有自己的经济的、社会的解决办法，为什么欧洲会否认我们的独立精神，否认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提出来的。认为大自然仅仅赋予我们一种文学才能，不应当把这种想法当作笑话。其余的是历史问题，环境问题，时代的限制问题。那么，起码咱们的欧洲人会出来议论的，他们在等着，欧洲的欧洲人就要开始议论了……

1877 年 7 月

俄国的讽刺作品。《处女地》。《最后的歌》。旧时的回忆

这个月我又在研究文学，即叙事文学，“美文学”，很有兴致地读了点东西。正好，不久前我读到一个外国人对于俄国讽刺作品，即对于当代的、我们现时的讽刺作品的意见。这个意见发表在法国。那里面有一个很妙的论断——原文我忘了，意思是这样的：俄国的讽刺作品似乎害怕俄国社会中出现高尚的行为。一旦碰到这种行为，讽刺作品就感到坐立不安，一直到在某个地方，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找到卑劣的东西才放下心来。这时候它立刻会手舞足蹈地叫喊：“这根本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您自己看吧，这里面也是很卑鄙的！”

这个意见公正吗？我不相信它是公正的。我只知道，我们的讽刺作品拥有光辉的代表作，并且大受欢迎。公众很喜欢讽刺作品，然而，至少我深信，同样是这一批公众，却不可比拟地更喜欢正面的美，渴望、仰慕这种美。毫无疑问，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是俄国各种色彩不同的大众最喜爱的作家。

无论我们的讽刺作品多么出色，它确实有某些所指不

明的缺点——这也许就是可以议论之处。有时候不可能从整体上、从总的方面肯定地指出，我们的讽刺作品究竟想说明什么呢？好像它本身没有任何立足点，但这可能吗？它的信念是什么，揭露的目的何在？——这一切似乎都淹没在莫名其妙的黑暗中，根本无从了解它自己认为好的榜样是什么。

于是你对这个问题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我读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并等着读它的第二部。这里我想说一说，我从事写作已有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我经常不止一次地思考我所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所有的批评家（我关注文学近四十年），包括去世的和现今在世的，总而言之，只要我记得的，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只要他们一开始总结当前的俄国文学，稍微郑重一点的（譬如，以前在杂志上每年一月份对过去一年的总结），经常地，程度不同地，但都有极大的爱好，使用同样的一句话："在文学如此衰落的目前这个时代"，"在当前俄国文学如此不景气的时刻"，"在我们的文学萧条时期"，"跋涉在俄国文学的荒漠中"，诸如此类，千百种调子重复同一种思想。而事实上，这四十年发表了普希金最后的作品，果戈理出场又退场了，出现了莱蒙托夫，出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以及至少是十来个最有才华的小说家。这单单是在叙事文学方面！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文学，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没有间断地接连出现这么多天才的作家。然而，我近来，大约是上个月，又读到谈论俄国文学的萧条及"俄国文学的荒漠"这些话。不过，这只是我所观察

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件事完全没有恶意，不必大惊小怪，因而不妨一笑置之。

关于《处女地》，自然，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大家都在等着看第二部。这不用我说。屠格涅夫作品的艺术成就是无可怀疑的。我只指出一点：在小说的第 92 页（见《欧洲导报》），从上往下数有 15 或 20 行，我认为这几行似乎浓缩了作品的全部思想，似乎表达了作者对他所描写的对象的全部观点。遗憾的是，这个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我深感不能同意。这是作者就小说中一个人物索洛明说的几句话①。

我在《祖国纪事》一月号上读到了涅克拉索夫的《最后的歌》。热情洋溢的歌和意犹未尽的词，像涅克拉索夫笔下通常出现的一样，但这是一个病人多么痛苦的呻吟呀！我们的诗人病得很重，他曾亲自对我说，他对自己的情况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我无法相信……这是一个结实而又易受感染的机体。他非常痛苦（他的肠子有一种溃疡，他的病很难确诊），但我不相信他不能坚持到春天。开春后他可以出国，到有矿泉的地方疗养，换一换气候，他就可以更快地恢复健康，我坚信这一点。人常常是很奇怪的；在生活中我同他难得见面，我们之间还产生过误会。可是在我们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处指《处女地》中这样一段描写："原来索洛明并不相信俄国革命即将到来，但又不愿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并不阻止他们去试一下；他不是从远处而是从旁边望着他们。他非常了解彼得堡那些革命者，对他们表示了几分同情，因为他本人也是从人民中来，没有人民你将'一事无成'。但人民是需要长期准备的，也不是用他们那样的方法和手段。"（参见巴金的译本第 12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译者）

的一生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这是我们生平的第一次会见。不久前我顺便去探望涅克拉索夫，他生着病，痛苦异常。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提起过去那些时日。那时候（是三十年前了！）有一种非常年轻、新鲜、美好的东西，是从亲身经历者内心永久的珍藏中流露出来的。那时候我们的年纪都刚过二十。我住在彼得堡，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目的，糊里糊涂地辞去工程师的职务，已经有一年了。那是 1845 年的 5 月。早在入冬之初，我忽然动手写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写过东西。小说写完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把它交给谁。文学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除了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之外，可是他自己只有一篇短文《彼得堡流浪的拉手风琴艺人》被收在一本集子里，当时也是什么都没有写过。他那时好像准备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去度夏，暂时在涅克拉索夫家里住几天。他来找我，对我说，“您把稿子拿来吧”（他还没有读过），因为“涅克拉索夫想在明年出版一本文集，我把稿子给他看看”。我把稿子送去，见到了涅克拉索夫，互相握了握手，前后只有一分钟。想到带着稿子来见他，觉得难为情，跟他几乎没有说上一句话，很快就告辞走了。我很少想到成名，对于“《祖国纪事》这一批人”，——当时人们这样称呼他们，——我是害怕的。几年来我都在读别林斯基的作品，心向往之，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严厉而可怕的人，我有时想：“他会嘲笑我的《穷

① 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戈罗维奇(1822—1900)：俄国作家，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在彼得堡工程学校求学。——译者注

人》的！”但有时也想：我怀着满腔热情，几乎是流着眼泪把它写成的，“难道这一切，难道我手握着笔构思这部小说的那些时刻，都是谎言，虚幻，我的感觉都是不真实的吗？”不过，我这样想，自然只是几分钟的事，很快又心神不定起来。把手稿交去的当天晚上，我到从前的一个朋友家里去了，他住得很远；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谈《死魂灵》，不记得把它读了多少遍了。这在那时的青年人中间是很普遍的现象，两三个人一见面，就说：“诸位，让我们来读果戈理吧！”大家坐下来读，差不多就是整整一夜。那时的青年人中间有很多很多人好像很充实，好像在期待着什么。在明亮得如同白昼的彼得堡的白夜里，我回到家里已经是四点钟了。天气十分温暖，我进到屋里，没有躺下睡觉，却打开窗户在窗下坐着。忽然传来门铃声，使我大为惊奇，只见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直奔过来拥抱我，两人欢喜得几乎要大哭一场。他们昨晚很早就回家，拿着我的手稿，读着试试，“有个十来页就看出来了”。但是，十页读完以后，决定再读十页，后来就一直不歇气地读了下去，坐了一个通宵。两人轮流朗诵，一个人感到累了，另一个人接着念。后来格里戈罗维奇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告诉我说，他“朗诵大学生死的那一段，读到父亲跟在棺材后面跑的时候，我忽然发觉涅克拉索夫的声音停了一次又一次，突然忍不住用手掌拍着手稿说：‘啊，这家伙了不起！’这说的是您。我们就这样读了一夜。”他们读完以后（七个印张啊！），一致决定立刻来找我：“他睡了也不要紧，咱们把他叫醒，这比睡觉更重要！”后来，见惯了涅克拉索夫的性格，我常常奇怪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因为他的性格是孤僻

的，差不多是多疑的，谨慎的，不大愿意与人交流。他给我的印象至少是这样，因此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时刻实在是感情最深厚的表现。那天他们在我家里大约坐了半小时，这半个小时里天知道我们谈了多少话；话说半句，彼此就听明白了；说话中还高声叫喊，急得不行；我们谈诗歌，谈真实，谈“当时的局势”，自然也谈果戈理，引用《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里的词句，但主要是谈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两只手摇着我的肩膀，兴奋地说：“我今天就把您的小说拿去给他看，您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认识以后，您就会知道他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好啦，现在您睡吧，睡吧，我们走了，明天您来找我们！”他们走了之后我真能睡得着觉吗？多么高兴，多么顺利，主要的是，这种感情多么可贵。我至今一直清楚地记得：“有的人成功之后，大家夸奖他，欢迎他，祝贺他，可是这两个人却含着眼泪在早上四点钟跑来叫醒我，因为这比睡觉更重要……啊，真好！”这便是我所想的，还睡什么觉呢！

涅克拉索夫当天就把我的手稿带去给别林斯基。他崇拜别林斯基，似乎一生中最敬爱的人就是他。那时候涅克拉索夫还没有写过像他一年以后写的那种篇幅的作品。据我所知，涅克拉索夫大约十六岁时一个人来到彼得堡。他差不多是从十六岁起开始写作的。他怎样认识别林斯基的，我知道得不多，但别林斯基从一开始就料定他会成功，也许，还对他的诗歌创作的情绪产生过有力的影响。尽管那时涅克拉索夫年纪很轻，他们的年龄相差很悬殊，他们之间那时候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说过这样的话，产生了永久的影响，一直维系到现在。“出了一个新的果戈理了！”

涅克拉索夫带着《穷人》走进他家里时大喊道。“你们的果戈理长得像蘑菇一样地多吧。”别林斯基严厉地对他说，但把手稿收下了。当涅克拉索夫晚上再去时，别林斯基“简直激动得不得了”，对他说：“把他带来，快点把他带来！”

就这样（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他们把我带去见他。我记得，第一眼看上去，他的外表，他的鼻子，他的额头，使我非常惊奇，与我以前所想象的他——“这是个严厉而可怕的批评家”——不知道为什么完全两样。他非常傲慢而拘谨地接待我。“没有什么，应该这样。”我想，可是似乎还不到一分钟，情形完全改观：傲慢的不是那张脸，不是接见二十二岁初起的作家的那位伟大的批评家，这种傲慢不妨说是由于他尊重那些他想尽快地向我吐露的感情，重视他非常着急地想要告诉我的那些重要的话而来。他的眼中燃烧着热情，非常热烈地开始说：“您本人是不是了解？”这句话他对我重复了几遍，并像他往常那样大声地叫喊道：“您写的是什么作品吗？”当他说话时感情激动起来后，总要大声地叫喊，“您像画家那样单凭直觉可以把它写出来，但您本身是不是理解您给我们指出的所有这些可怕的事实的意义？以您二十岁的年纪，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的。要知道您笔下这个不幸的小吏，他多年辛苦，多年严格律己，因为惯于逆来顺受，甚至都不敢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稍有一点不满都当作是自由思想，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有权利做一个不幸的人。而当他的好心的将军赏给他这一百卢布时，他魂飞魄散，惊奇得手足无措，像他这样一个人，居然得到‘大人他老人家’的怜惜；不是‘大人他’，而是像

你们所称呼的‘大人他老人家’。至于这个掉落的纽扣，至于吻将军的手的这一霎那，这已经不是对这个不幸的人的怜悯，而是可悲，是可悲！这种感激令人觉得可悲！这是悲剧！您接触到了事物的本质，一下子指明了关键所在。我们作为政论家和批评家，只是进行推论，力图用语言说明这件事；而您作为画家，单用线条，一下子就把本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可以用手触摸，即使最不善于判断的读者，也可以豁然贯通！这便是艺术性的奥妙，艺术中的真实！这便是画家为真实而服务！事实摆在您面前，您作为画家揭示了事实，您获得它如同天赋。请珍惜您的天赋，对它忠诚不渝，您会成为伟大的作家的！”

这些话全是他当时对我说的。以后他对别的作家谈到我时也说过，他们如今还活着，可以作证。我满心欢喜地从他家里出来。我站在他家的墙角处，望着天空、明亮的白昼、来往的行人，全身都感觉到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庄重的时刻，发生了永久的转折，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但那时即使我能够想入非非，也是料想不到的（我那时是狂热的空想家）。“难道我真的这么伟大？”我不敢太高兴，想到自己有些惭愧。啊，请别见笑，以后我再也没有想过我是伟大的人物，但当时——这难道能受得了吗！“啊，我一定不要辜负这些称赞之词，这都是些什么人，什么人啊！这些人能上哪里去找呢！我要不负所望，努力成为他们那样优秀的人，永远‘忠诚不渝’！啊，我显得多么轻佻，假如别林斯基知道我身上存在着多么丑恶和可耻的东西倒好了！人们总在说这些文学家骄傲，自高自大，然而，只有俄国才有这些人，他们是孤单的，但真理在他们手上，而

真理、善良和真实总是战胜并征服卑劣和邪恶的，我们一定会胜利；啊，到他们那里去，同他们站在一起吧！”

我考虑了这一切，现在我十分清楚地记住这一时刻。后来我从没有忘记这一时刻。这是我一生中极为令人神往的时刻。在服苦役期间，每当我回想起这一时刻，精神就振奋起来。现在每一次想起来还觉得很兴奋。就这样，三十年过去了。不久以前，坐在涅克拉索夫的病榻旁边，我又记起了这个时刻，好像又重新体验到了它给我的兴奋之感。我没有详细地说给他听，只提起那个时候我们有过那么一个时刻，我发现他也记起来了。我知道他会记起什么。当我服满苦役回来的时候，他曾经指给我看他的诗集里的一首诗[①]：“这首诗是我当年写您的。”他对我说。可是我们整整一生是各行其是的。现在他躺在痛苦的病榻上回想起过去的朋友们：

> 他们那富有预见的歌没有唱完，
> 倒下了，成为邪恶和背叛的牺牲品，
> 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他们的肖像
> 从墙上用**责备的**眼光望着我[②]。

“责备的”这个字眼在这里的分量是很重的。我们“忠诚不渝”了没有，是一直忠诚不渝吗？让每个人扪心自问，自己作出判断吧。但是请你们自己来读一读这些痛苦

---

① 指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不幸的人们》(1858)。其中主要人物克罗特概括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以至十二月党人的形象，不是只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人。

② 此处四行诗是涅克拉索夫所作《我即将成为腐朽之物》一诗的最后一节。

的歌，让我们亲爱的热情的诗人复活吧！这位热情地去受苦的诗人啊！

1877 年

涅克拉索夫逝世。关于在他墓前的演说

涅克拉索夫病逝。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我和他见了最后一面。那时他差不多成了一具僵尸了，因此看到僵尸翕动着嘴唇，开口说话，是叫人奇怪的。但他不单是开口说话，而且神智完全清醒，看来他始终不认为他可能很快死去。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他的右边身体瘫痪，直到28日上午，我才得悉涅克拉索夫于昨天，即27日晚上八点钟去世。同一天我去他家吊唁，他的脸被痛苦扭曲得极度变形，特别触目惊心。出门时我听到念圣诗的人一字一句拖长了声音对着他念道："斯人已逝，斯人无罪。"回到家中，我无法坐下来工作，我拿起涅克拉索夫的三卷诗，翻开第一页，开始往下读。我坐了个通宵，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仿佛我重新度过这三十年的生活。他的第一卷诗集中最初的四首诗，曾在《彼得堡作品集》中发表，其中也登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①。因此我越往下读（我一直没有停顿），

① 《彼得堡作品集》是涅克拉索夫于1846年印行的，其中收入他本人的四首诗，即《在旅途中》、《醉汉》、《喜见》、《摇篮之歌》；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

我的一生仿佛都在我的眼前闪过。当我在西伯利亚结束了四年被监禁服苦役的生活，最后终于获得了读书的权利时，我最初读的他的几首诗，现在我又认出了它们，我还记得它们。我还记得那时读它们时的印象。简单地说，那个晚上我差不多读了涅克拉索夫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二，而且的的确确第一次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作为诗人的涅克拉索夫，在这三十年中间，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啊！当然，就他作为诗人而言。从私人关系方面来说，我和他来往很少，难得见面，只有一次，那完全是忘我的热情，在我们相识之初，1845 年，写作《穷人》那个时期。不过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①]。那时在我们两人之间有这样几次，这个谜一样的人在我面前显露了他的心灵中十分重要而又十分隐蔽的一面。这就是我那时候突然感觉到的，他入世之初受到重创的心，而他这个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就是他此后一生中所写的全部热情的痛苦的诗篇的基础和源泉。那时他曾含着眼泪向我叙述他的童年，他在父母家中所过的使他为之痛心的困顿的生活；他也谈到他的母亲——而所谈的他的母亲的事，他回忆母亲时所流露的平静的力量，那时就给人一种预感，如果在他的生活中会出现什么神圣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一定会在他命运中黑暗和不幸的时刻指引他走出迷途，成为他的一座灯塔，一颗北极星。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孩子的眼泪连同孩子的痛哭在最初的幼稚的印象，它们在某个场合突然结合在一起，于是再也不愿（如同他向我说的那样）见到苦命的妈妈，那个如此

① 见本书所译的《俄国的讽刺作品……》一文。——译者注

深深地爱着他的人。我想，此后他在生活中无论依恋着什么人，那个人都不可能像她这样对他的意志，对他内心中别的一些不可遏制的阴暗的欲望发生影响，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内心中这种阴暗的欲望在他一生中始终驱之不去，就在那个时候也曾经发作过。我记得后来我们不知道怎么的疏远了，为时相当的快，我们之间亲近的关系只维持了几个月。误解，外在的原因，还有一些好心人，都起了作用。因此，几年以后，当我从西伯利亚回来，我们虽然并不经常相聚，尽管那时彼此的信念已经有了分歧，但见面后有时还能够同他谈一些令人奇怪的事，就好像我们生活中从青年时代、从 1845 年开始的联系，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又好像不想中断也不可能中断，尽管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就这样，有一天，大概是 1863 年，他给了我一本诗集，并指给我看其中一首诗，《不幸的人》，动情地说："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想着的是您。"（即想着我在西伯利亚的生活）"这首诗是写您的。"最后，也是在最后的岁月里，我们又开始不时地见面了，那时我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少年》① ……

在涅克拉索夫的葬礼上，有数千仰慕他的人参加，其中有许多青年学生。上午九时出殡，队伍在墓地解散的时候天已黄昏。许多人在他墓前发表演说，文学界人士致词的很少。这里顺便提一句，有人朗诵了几首好诗。我怀着满心的激动，从人群中挤到他的没有封土的墓穴前，投下鲜花和花圈，在别人说完之后，用微弱的声音说了几句话。

① 1877 年 1 月开始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连载。

我首先说这是一颗受伤的心，一次受伤一辈子都没有愈合。他的没有愈合的伤口是他全部诗歌创作的源泉，是他这个人对于一切处于暴力之下、处于为所欲为的意志的淫威之下受尽折磨的人极度热爱的源泉，这种为所欲为的意志在压迫着我们的俄罗斯妇女和我们俄国家庭中的儿童，在压迫着经常处在悲惨的命运之中的我们的平民。我也表明了我的观点，我认为在我们诗歌领域中，涅克拉索夫是置身在许多具有“新的语言”的诗人行列之中。实际上（除开他的诗歌的艺术力量和他的诗格等问题之外）涅克拉索夫确实极富特色，确实具有“新的语言”。比方说，诗人丘特切夫在某个时候比他更丰满一些，艺术力更强一些，但是丘特切夫在我们文学中绝不会取得如此显赫而不可磨灭的位置，那无可争辩是属于涅克拉索夫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在诗人（即具有“新的语言”的诗人）队伍中应当紧挨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身后站着。当我说出了这个意见，就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人群中有个人尖声叫喊说，涅克拉索夫应当站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前面，因为这两位只不过是“拜伦的追随者”而已。有几个人随声附和，也叫道：“对，站在前面！”但是我不想就三位诗人的高下和前后的比较说什么。然而后来却出了这样的事：《市场报》上有一位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①]在给青年的信中谈到涅克拉索夫的作用时说道，好像有个什么人（那是指我）在涅克拉索夫墓前“忽然想到要把他和普

① 亚·斯卡比切夫斯基（1838—1910）：俄国文学批评家，有民粹派倾向。

希金、莱蒙托夫的排名分个高下，你们异口同声全体（这是指全体青年学生）大合唱似的高喊：‘他站在前面，站在两人前面。’”我大胆地提醒斯卡比切夫斯基先生一句，他转述的情景与我所记住的（但愿我没有记错）并不一样。开始时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喊：“站在前面。站在他们两人前面，”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拜伦的追随者”——这句话出自一人之口，表达一个人的意见，比起出自全体之口，而且是同一时刻，即千人的大合唱，更有特殊性，更加自然得多。因此，当然，这一事实证明我所供述的这件事情的真相是确实无误的。因此在第一个人喊了一声之后，紧接着有几个人叫了起来，但一共只有几个人，我没有听到千人的大合唱，我重申这一点，但愿我没有记错。

我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是因为我见到我国的全体青年都犯了这样的错误，一直觉得于心不忍。对于已经作古的伟大的名字抱有崇敬之情，应当是年轻的心所不可缺少的内容。毫无疑问，关于拜伦的追随者这种冷嘲热讽的叫喊，和“站在前面，站在前面”这种起哄之所以发生，绝对不是想要在亲爱的死者尚未封土的墓穴前挑动文学上的争论，那未免太不明智了。这种事只不过是一种热情的冲动，尽量发泄一直积郁在心头的对这位使我们深受强烈震动的大诗人的同情、感激和喜悦之情罢了。这位诗人虽然已躺在坟墓里，但离我们依然很近，（唉，过去那些伟大的老人却同我们离得那么遥远啊！）不过这个插曲在那天当即使我打定主意要在以后几次《日记》里更加明确地说明我的想法，更加详细地叙述我如何看待我们生活中和诗歌中像涅

克拉索夫这种突出的非同一般的现象，以及我认为这一现象的实质和意义何在。

1877年12月

普希金、莱蒙托夫与涅克拉索夫

首先，拿“拜伦的追随者”这种字眼来骂人是不可以的。拜伦体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在欧洲人的、甚至可以说在全人类的生活中，都是一个伟大的、神圣的和必然的现象。拜伦体是在人类感到极度的苦闷、失望、几乎是完全绝望的时刻出现的。自从法国，当时欧洲人最先进的民族，于上个世纪末宣布了新的理想，引起一片欢腾，对新的理想产生了新的信任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如此出乎意外，如此辜负人们信任的局面，这在西欧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苦闷的年代。重新树立起来的偶像顷刻之间倒下了，不只是由于外在的（政治的）原因，而且也由于它们本身的脆弱，凡是感觉敏锐的心灵和先进的头脑都看得清清楚楚。新的局面还没有定型，新的阀门还没有打开，万物仍在从前笼罩着人们的低矮狭小得可怕的天幕下喘息。旧的偶像已成为一地碎片。于是就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伟大豪迈的天才，热情洋溢的诗人。他的声音中喊出了那时人类的苦闷和对本身的使命以及对骗人的理想的悲观绝望之情。这是复仇和悲哀的缪斯，诅咒和绝望的缪斯，是那时新出现的，前所未闻的。拜伦体的狂风突然之间似乎刮遍了全

人类，引起了全人类的反响。这正像打开了一个阀门，至少，在普遍的、甚至大多数是不自觉的低声呻吟之中，这却是一声强劲的呼喊，他的呼喊汇合了所有人的叫喊和呻吟，融成一体。那么，在我们国家，怎么可能没有人起而响应呢，何况是像普希金这样一位伟大的天才的领袖群伦的人物？任何一个坚强的头脑，任何一颗博大的心，那时候在我们国家里都不可能躲开拜伦风。这不单是因为要从远处对欧洲和欧洲人表示支持，而且也因为在咱们俄罗斯，正好在那个时代之前，暴露的新的没有解决而令人烦恼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旧的使人失望的事也实在太多了……而普希金，作为天才的领袖人物，他的伟大就在于他很快地，并且置身在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的人群中间，找到了一条坚实的道路，为咱们俄罗斯人找到了一条宽广的期待已久的出路，并且指明了这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人民性，尊重俄罗斯人民的实际。“普希金是一个伟大的独特的现象。”普希金“不单是俄罗斯人，而且是第一流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不懂得普希金，就没有权利称作俄罗斯人。他理解俄罗斯人民，他所理解的俄罗斯人民的使命，其深刻的程度和所包含的内容之丰富，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所不可企及的。关于他以属于全人类的天才和他对欧洲人精神上各个不同方面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几乎可以再现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特殊风貌的能力，来证明俄罗斯精神具有全人类性及其包容之广泛，似乎可以借此预言作为普遍联合、普遍和解与不断振兴的基础的俄罗斯特性未来在全人类的使命，这一点我不去说它。我甚至也不去说普希金是我们之中在苦闷时以他的预见最先喊出这两句话的人：

我将要看见的不是解放了的人民，

便是在沙皇挥手间倒下的奴隶！①

我在这里只说普希金对俄罗斯人民的爱。这是一种包容极广的爱，在他之前，还没有任何人表达过这种爱。“你别爱我，你爱我的东西吧。”——人民总是这样对你们说，如果他们想要证实你们对他们的爱是真诚的话。

爱他们，即可怜他们的穷苦、贫困和苦痛，任何一个老爷都是可以这样做的，特别是富于人道精神和受过欧洲式文明熏陶的人。可是人民所需要的不是单由于他们的痛苦而去爱他们，而要爱他们本身。什么叫做“爱他们本身”？“你爱我之所爱，你尊敬我所尊敬的。”就是这个意思。人民会这样答复你们，否则，他们绝对不会把你当作自己人，无论你发表了多少文章去宣传他们。假的也总会被看穿的，无论你说了多少甜言蜜语去取悦他们。普希金正是像人民所要求的那样去爱人民，他并没有去揣测应当怎样爱人民，事先也没有准备，没有学习，因为他猛然觉得自己就是人民。他尊重人民的实际，他把人民的实际面貌当作他自己的实际面貌。尽管人民有各种缺点和许多丑陋的习惯，他也能从中识别他们精神上的伟大的本质，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像他这样看待人民；他并且把人民的这一本质悬为自己心目中的准则。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正有一些深受欧洲文明熏陶、充满人道思想因而对俄国人民怀着爱意的人公开表示遗憾，认为我们的人民如此低下，简直没有办法提高到巴黎街头的群众那样的水平。实际上这些对

① 这两句引自普希金的《乡村》一诗，但与原诗不完全相符。

人民怀着爱意的人总是轻视人民。他们主要认为人民是奴隶；人民的低下是由于被奴役所造成，可以原谅，但奴隶却是不可能去爱的，奴隶毕竟是令人厌恶的。普希金首先声称俄罗斯人并非奴隶，也绝对不是奴隶，尽管几百年来一直受到奴役。曾受奴役，但非奴隶（当然，这是从整体、从总的方面，而不是从个别例外的情形来说）——这是普希金的论题。他甚至根据一个俄罗斯农民的外形和走路的姿态作出论断，认为他并非奴隶，也不可能成为奴隶（虽然他处于受奴役的地位）——这是一个特点，表明普希金对人民怀有发自肺腑的深厚的爱。他认为我们的人民具有高度的自尊心（仍然是从整体而言，撇开常有的不可避免的例外不论），他预言我们的人民会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优点，后来他们就是凭着这种优点来接受农奴解放的，——而俄国的那些学识渊博满腹经纶的欧洲化人士，在普希金之后多少年都理解不到这一点，而且所期望于我国人民的完全是另一种行动①。啊，他们对人民的爱的确真心实意，热烈之至，可是按照他们独有的方式，即欧洲的方式进行。他们叫喊说身受农奴制压迫的人民处在猪狗似的状况下，猪狗似的地位中，但他们也一心一意地认为我国的人民实际上就是猪狗。而这样的人民忽然之间以他们的这一坚毅的品德得到了自由，对过去的主子所加的侮辱却没有丝毫反感："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要是你高兴，就上我家来坐，为了你的好意，我总不会亏待你。"是的，

① 作者指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希望农民起来革命，他们认为改革之后必定会发生。

对许多人来说，我国的农民在解放以后变得叫人奇怪，不可理解。许多人甚至认定农民身上这种东西是由于落后和愚昧所造成，是过去的奴役的遗迹。这是现在的观点，那么在普希金时代又如何？我在年轻时可是亲耳听到先进人物和“权威”人士说过，普希金在《上尉的女儿》中描写的萨维利奇，地主格里尧夫家的奴仆，他曾经跪在普加乔夫面前乞求饶他的少爷一命，“要是为了杀鸡给猴子看，那最好把我这个老头子绞死吧。”——这个形象已经不单是奴隶的形象，而是对俄罗斯奴隶制的颂扬了！

普希金之爱人民，不仅仅因为他们遭受苦难。因遭受苦难而引发怜悯之心，而怜悯常常是与轻视结伴同行的。普希金爱人民之所爱，重人民之所重。他热爱俄罗斯的大自然，令人感动之极。他热爱俄罗斯的乡村。他不是仁慈博爱的老爷，看到农民悲惨的命运而怜悯他们。他是凡人，他的心已转化为平民，与他们的本质相通，几乎变成了他们的形态。贬低作为诗人的普希金是错误的，没有什么意义，他对人民的忠实已非现实，而是历史，已成为古董。在这历史的古旧的音调之中，响着这种爱，这种对人民的评价；它们是永远属于人民的，永远，既指现在，也指未来，不只是指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上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是爱护自己的历史的，主要是因为它记载着神圣不可动摇的事迹，时至今日他们对它仍然怀有敬仰之心，尽管也记载着他们的灾难和痛苦。从《鲍里斯·戈都诺夫》中形象高大的历史学家开始，到普加乔夫的同伴们的描写，在普希金笔下都深刻地表现了人民，而且都为人民所理解，被认为是人民的本质所在。仅仅如此而已？普希金的作品中还洋溢着

俄罗斯精神，随处跳动着俄罗斯的脉搏。在似乎是西斯拉夫人的不可摹仿不可比拟的伟大诗篇中——但它们显然是伟大的俄罗斯精神的产物，流露了俄罗斯人对斯拉夫兄弟们的全部观点，流露了俄罗斯人的心，表达了至今仍然散见在民间的诗歌、故事诗、传说、故事中的人民的世界观，说明了人民之所爱和所敬，表现了他们理想中的英雄、国王、人民的卫士和忧国忧民之士，表现了坚毅、谦恭、忠于爱情和敢于牺牲的形象。而普希金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滑稽的作品，例如两个醉汉的闲聊或者关于打死了一只母熊的熊的故事①，在他对人民的观察中已经有了一种爱慕的、亲密的和令人感动的东西。假如普希金能够多活几年，那么他留给我们的可供了解人民之用的艺术珍品，以它们的影响，一定可以使我们那些以欧洲式文明自傲、至今仍然高踞在人民之上的知识分子缩短时日和过程，早日倒向人民的实际、人民的力量一边，认识人民的作用。而这种对人民实际面貌的尊重，我在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在他最使人激动的作品中也见到了一部分（哎哟，我大概也是他的崇拜者了）。我重视、非常重视他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的仁人志士”以及他为人民的疾苦写了许多热情的诗，而更使我感到可贵的是他在一生中痛苦而又兴奋的重要时刻，尽管有各种相反的影响，甚至有他本身的信念，仍然尊重人民的实际，毫不懈怠。他的优秀作品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从这方面来看，我认为他是继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出

---

① 此处提到普希金的两部作品，前者指《亲家伊凡，咱们喝起来吧……》一诗，系仿民间的幽默风趣的风格而写；后者指故事诗《母熊的故事》。

现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新的语言的诗人，与他们两人一样（因为普希金的“语言”至今对我们仍然是新的语言。岂只是新，而且还无法辨认，无法理解，被人认为是陈旧不堪的废话）。

在谈涅克拉索夫之前，先说几句莱蒙托夫，以便证明我也认为他是尊重人民的实际的诗人此言不虚。当然，莱蒙托夫是拜伦的追随者，但是就他所独具的强大的诗歌力量而言，他是个特殊的拜伦派——一个可笑的、调皮的、常出怨言而绝不相信自己的灵感、不相信自己的拜伦气质的人。不过假如他不再花费许多力气去写俄国那些为欧洲文明所苦恼的知识分子病态的个性，那么他最后一定会像普希金那样从尊重人民的实际中找到出路的，这方面有的是明确的可靠的标记。可是死亡又在这里设置了障碍。实际上他在诗中显得阴沉，变化不定；他想要说出真情，却常常在撒谎。他本人知道这一点，为撒谎而感到痛苦，但只要他一接触到人民，立刻大放光彩，明朗而清晰。他爱俄国的士兵，哥萨克，他敬重人民。因此他曾经写过不朽的诗篇歌颂年轻的商人卡拉什尼科夫杀死沙皇的侍卫基里别耶维奇以雪耻。商人被带到沙皇面前，在伊凡雷帝怒目而视之下，坦陈他杀死皇帝的近卫基里别耶维奇是“出于蓄意的预谋，并非无意中失手所致”①。先生们，你们还记得“奴隶希巴诺夫”吗？奴隶希巴诺夫是库尔布斯基公爵的家奴。这位公爵于十六世纪逃出俄国，在国外找了个安全的

① 此处说的是莱蒙托夫所著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1838）中的一个情节。——译者注

藏身之地，从那里不断地给伊凡雷帝写信申述他的反对的立场，近乎破口大骂。每写成一封信，便命令奴隶希巴诺夫来见，吩咐他把信送到莫斯科面呈沙皇本人。奴隶希巴诺夫依令而行。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广场上拦住了在护卫簇拥之下步出教堂的沙皇，呈上主人库尔布斯基公爵的信。沙皇提起权杖，用力一挥动，把尖端刺进希巴诺夫的足背，全身靠在权杖上拆开信来读。希巴诺夫脚上血如泉涌，但他一动不动。沙皇后来在给库尔布斯基公爵的回信中写道："你应该为你的奴隶希巴诺夫感到羞愧。"① 这就是说他本人曾经为奴隶希巴诺夫感到过羞愧。大概是这个俄国"奴隶"的形象使莱蒙托夫的心灵受到震动，他的卡拉什尼科夫在沙皇面前直认不讳，为基里别耶维奇的事既没有埋怨，也没有责备，明知等待着他的是确凿无疑的绞刑，仍然向沙皇坦陈"全部实情"，是他出于"蓄意的预谋，而并非无意中失手"，杀死了皇上的宠臣。我再说一遍，假如莱蒙托夫依然活着，我们就会有一位同样能认清人民实际的伟大的诗人，也许还是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仁人志士"。可是这个称号落到涅克拉索夫头上了……

我仍然不把涅克拉索夫与普希金相提并论，我也不用一根尺子来量他们谁高谁矮，因为这里不可能进行任何比较，甚至不存在比较问题。普希金就他作为俄国天才的广度和深度来说，至今仍像太阳一样照耀在我们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之上。他是一个伟大的并且还不可能理解的

① 俄国作家尼·卡拉姆津在所著的《俄罗斯国家史》一书第九卷(1821)中写过奴隶希巴诺夫的事迹，诗人阿·康·托尔斯泰曾据此写成叙事诗《瓦西里·希巴诺夫》(1858)。

预言者，涅克拉索夫与他相比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圆点，从这个伟大的太阳里出来的小小的行星。而如果撇开各种尺度不分谁高谁低的话，那么涅克拉索夫仍然是不朽的。他完全当之无愧，我已经说过理由了，那是因为他尊重人民的实际。这在他身上并非来源于对某一个人的模仿，甚至也不完全出于自觉，而是由于一种需要，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这在涅克拉索夫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他一生都处在这样一些人的影响之下，他们虽然爱人民，虽然关怀人民的疾苦，而且很可能十分真诚，但从不承认人民的实际状况，常把自身的欧洲式文明凌驾于人民的真实的精神面貌之上。他们既不了解俄罗斯的心灵，也不明白它所需要和期待的是什么，却一有机会就以他们对人民的全身心的爱，希望我国人民让他们直接为消除人民的灾难服务。在最近两年的俄国人民运动中①，不就是他们吗，几乎完全不承认人民的情绪已十分高涨；这样高涨的情绪大概还是第一次如此充分而有力地显示出来的，因而证明在同一伟大的思想指引下可以达到健康、强大、至今不可动摇的生气勃勃的团结，并且几乎可以预知自己未来的使命。而他们不但不承认人民运动的实际状况，甚至把人民运动看成与反动相去无几，表明俄罗斯人民完全缺乏觉悟，处于几百年来的愚昧之中顽固不化。涅克拉索夫虽然有异乎寻常的健全的头脑，聪敏过人，但他缺乏认真的教育，至少是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他一辈子都没有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也

① 此处指当时巴尔干各国斯拉夫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俄国的革命者和农民参加。

没有摆脱的力量。不过他内心中有他独有的力量，从没有消失——这就是对人民的真正的热烈的爱，而主要是直接发自肺腑的爱。他为人民的苦难感到痛心，但他在人民身上所看到的不只是被奴役所损害的如同猪狗的形象，而且还能够以他的爱的力量差不多是不知不觉地看到人民的美，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人民的饱含着痛苦的温顺的性格；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人民未来的作用具有信心。啊，涅克拉索夫在许多方面是会自觉地犯错误的。不久前在第一次发表的一篇即兴之作中，以一种不安的责备的眼光观察从农奴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人民时，他竟然高喊了一句：

……但人民幸福吗？①

他心中那强烈的感应使他想到了人民的苦难。不过假如要问他："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怎样才能遂其所愿？"那么他的回答也许是极其错误，甚至是非常有害的。自然，对他不必加以责备，因为我们的政治理性少得可怜，而涅克拉索夫呢，我再说一遍，他一辈子都处在别人的影响之下。但是他以他的那颗心，以他的伟大的诗人的灵感，在他的一些伟大的诗篇之中不可阻挡地去表现人民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人民的诗人。任何人，只要他来自人民之中，即使识字不多，都能从涅克拉索夫的诗中理解到很多东西。不过必须要认得字。至于现在的俄国人能不能直接读懂涅克拉索夫，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可思议

① 此句引自涅克拉索夫的《哀歌》一诗。

的。“一般的老百姓”从他的代表作《瞬间的骑士》、《宁静》、《俄罗斯妇女》中能理解到什么？即使是他的名篇《弗拉斯》，老百姓也许能读懂（但他们绝不会被感动，因为这毕竟是诗，早已从他们的切身生活中远离而去），他们大概会认出两三处虚假的细节①。而在他的激昂慷慨的长诗之中的一部《伏尔加河上》，老百姓会理解到什么呢？这是真正的拜伦的精神和音调。不，涅克拉索夫现在——还只是俄罗斯知识界的诗人，他怀着一腔爱心和热情向同样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叙述人民及其苦难。我不说将来——将来的人民是会纪念涅克拉索夫的。人民到那时候会明白，从前有过一位好心的俄罗斯老爷，曾经为他的人民的痛苦而哭泣，流过悲伤的眼泪，什么好办法也想不出来，只是躲开了他的财产和贵族生活的罪恶的诱惑，在非常艰难的时刻却想到了他们，想到了人民，以对人民的不可遏止的爱来洗净自己受尽折磨的心——因为涅克拉索夫对人民的爱只不过是他的自伤身世的一种解脱而已……

但在说明我如何理解我们所尊敬的这位已故诗人的“自伤身世”之前，我不能不注意到一种特别的有趣的情况，在涅克拉索夫去世之后立刻在我们的几乎所有报纸、几乎所有议论他的文章中显露了出来。

1877年12月

① 此处指涅克拉索夫写弗拉斯之所以动身去为教堂化缘，是因为他大病一场后，

看到了人世的出现，
看到了地狱里的罪人……

诗人与公民。对于作为凡人的涅克拉索夫的总的看法

由于涅克拉索夫的去世和安葬，所有报纸只要一谈到他，只要一开始议论他的作用，毫无例外地立刻就会添油加醋地写上几句关于他的什么“务实能力”、关于他的什么缺点乃至恶习、关于他留给我们的形象的两面性等等想当然的东西。有些报纸只在这些方面稍微作点暗示，写这么两三行，但重要的在于毕竟作了暗示，看来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是无法回避的。在另外的一些出版物上，涅克拉索夫的事谈得比较广泛些，结果也更加奇怪。事实上他们出于对死者的深切而真诚的尊敬之情，并没有详细地说出对他的指责，似乎也避免这样做，却仍然想来……为他辩护，所以弄得更加不可理解。这自然而然就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为他辩护什么呢？如果你们知道什么事，那是无法隐瞒的，我们想问一问，他还需要你们的辩护吗？”这就是提出的问题。可是他们不想加以指责，又急于进行辩护和修正补充，仿佛希望尽快抢在什么人的前面，而主要的是，又是主要的——仿佛无法避免这样做，虽然想的也许是那样。总的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事。不过如果细加研究的话，那

么无论你们，无论别人，只要稍一思考，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种事完全是正常的，一谈到作为诗人的涅克拉索夫，的确无法避而不谈作为一个凡人的他。因为在涅克拉索夫身上，诗人和公民之结合，两者之缺一不可，两者之不可分割地互作说明，使得你一提起作为诗人的涅克拉索夫，就不能不谈到作为公民的涅克拉索夫。你会感到不可能回避，仿佛强迫你必须这样做。

不过我们究竟能够说些什么，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些什么呢？有人说了一句"务实能力"，即能够把自己的事办得有利可图，如此而已。但又赶紧出来辩护："据说他一直是不幸的，从小就受到环境的压迫"；他年轻时在彼得堡吃过很多苦，无栖身之地，形同弃儿，因此变得"实际"起来（即好像不得不发生这种变化一样）。另外有些人走得更远，他们暗示说，假如涅克拉索夫没有这种"务实能力"，他大概不可能办成如此明显地为公众造福的好事，比方说，把杂志办出来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怎么，为了达到正当的目的，使用卑鄙的手段都不妨事了？这是在说作为一个凡人的涅克拉索夫，他用自己的诗打动别人的心，使他们兴奋，引他们向往善和美。当然，说那些话是为了原谅他，但我觉得涅克拉索夫不需要这种原谅。在这类问题上表示原谅，常常包含着一种仿佛是轻视的成份，被原谅的人也仿佛脸上暗淡无光，他的形象也几乎要缩小到不足挂齿的地步了。事实上，我一开始原谅一个人的"两面性和务实能力"，就好像我因此硬要认为这种两面性在某些情况下是正常的，简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人的形象就完全不必计较了，例如他白天在家乡的教堂里

石板地上叩头如捣蒜，悔恨交加，大叫“我垮了，我垮了”。这是写在流芳百世的诗里，诗要在当天夜里开始写，到第二天，差不多过了一夜，眼泪也干了，于是又来搞他的“务实”；据说，除了别的一切东西之外，“务实”是必不可少的。那么那时候的悔恨和大叫，还要写进诗里的，能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是为艺术而艺术，甚至是最庸俗的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罢了。因为他本人经常吹嘘这些诗，自己很欣赏，自己很得意，把它们发表出来，指望它们会给刊物增光，会激动年轻人的心。不，如果这些做法无须经过解释便可表明是无可指摘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犯很大的错误，引起怀疑，并会提出问题：“你们埋葬的是什么人？”——我们为他送葬的人不得不回答说，我们埋葬的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他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不，事实的确并非如此，我们埋葬的确实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的人”，是常常为自己的身世感到痛苦的人；常常，一贯如此，从不让自己有平静的时刻，稍有容忍即起反感，悔恨不已。

必须把事情说明白，真诚地不偏不倚地加以说明；一旦真相大白，便可还它以本来面目，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以后会有什么想法。这里应当尽可能地说明事情的实质，以便尽量准确地从中了解死者的形象，他的面貌。我们的良心要求这样做，目的是不要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丝一毫对他的怀疑，它无意之中会污染我们的记忆，会常常在高尚的形象上投下不光彩的阴影。

我本人对死者的“务实活动”知之甚少，因此我不能够来谈这件事的荒唐可笑的部分。不过即使我能够，我也

不愿意谈，因为我会直接陷进旋涡里，表明我承认那些流言蜚语是事实。因为我坚信（从前也同样坚信）对死者的议论，至少有一半，也许有三分之二，是十足的谎言。谎言，诬蔑，诽谤。像涅克拉索夫这样一个杰出的刚强的人物，不可能没有仇人。假如真有仇人，假如真有什么事，那么有时也不可能不被夸大。但是我们承认有这种事，仍然可以看到只不过是这么一件事而已。这算是什么事呢？一件阴暗的、不愉快的、确实叫人难过的事，因为——他的这种悔恨和叫喊，这种眼泪，这种"我垮了"的自言自语，这种对着母亲的阴灵所作的热情的忏悔，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这是自我谴责，自我惩罚吗？我仍然不想去谈事情的荒唐可笑的方面，但我认为我们这位诗人生活中不愉快的叫人难过的一面，其实质早已由他本人说出来了，那还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在最初写的一首诗中表露了出来，那时他大概还没有认识别林斯基（这首诗后来经过加工，才成了发表时这个样子）。诗是这样的：

夜晚的灯光如炬，
刮着风，下着小雨；
我从波尔塔瓦省
走进了首都的市区。
手里拿着长棍，
挑着空的背包；
肩上披着羊皮小褂，
袋里有十五个铜毫。
没有钱，没有名，没有好出身，

个头不高，样子很可笑，
一晃过了四十年，
百万元装在口袋里边。

一百万元——这就是涅克拉索夫的恶魔！怎么，他这样喜欢金钱、富贵和享受，为了拥有它们，竟然变得“务实”起来？不，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性质的恶魔；这是最阴暗最屈辱的厉鬼。这又是高傲的恶魔，渴望着自己保护自己，要求用一道坚固的城墙与人类隔离开来，不受约束地安静地观看人类的逞凶施暴，威胁恫吓。我想，这个恶魔还钻进了一个孩子的心里，这个孩子已有十五岁，差不多是从父亲身边跑走的，正在彼得堡的大街上闲逛。他那颗羞怯而又高傲的幼稚的心受到打击，受到侮辱，但他不愿寻求庇护，也不想与这一群陌生人保持一致。并不是他早就在心里对人们产生了不信任，而是他过早地（因而是错误地）对人们有了怀疑感。即使他们不是恶人，即使他们不像人们所说的（他大概想到过）那么可怕，他们仍然统统是虚弱而胆怯的坏蛋，因此只要一触动他们的利益，即使无冤无仇，他们也会杀人。大概在那个时候涅克拉索夫就开始了他的想象，大概在街上那时候就写成了这首诗：《一百万元装在口袋里边》。

这是对于阴暗、忧郁而独立的自我保障的渴望，目的是不依赖任何人。我认为我并没有错，我想起刚认识他时的一些事。至少在我后来一生中看来都是如此。可是这个恶魔始终是下等的恶魔。涅克拉索夫的心灵会追求这样的自我保障吗？他的心灵能够对所有神圣的东西产生感应，从

不对它们失去信心，难道这样一颗天赋的心能拿这种自我保障把自己封闭起来吗?这样的人物赤着脚空着两手上路，心里却是清楚的，明亮的。他们的自我保障并不在于黄金。黄金是粗野，是强暴，是专横！黄金在涅克拉索夫所轻视的那一群虚弱而胆怯的人眼中可能是一种保障。难道强暴的图景以及随之而来的贪淫好色的欲望能在这样的人心中占有一席地位吗？这个人能够号召大家走别的道路："丢掉一切，拿起长竿，跟我走。"

为了所爱的伟大事业，
引我向阵亡者营地走去。

但是恶魔取得了胜利，人仍然困守在原地，无处可去。

为此而忍受着痛苦，一生的痛苦。事实上我们只知道诗，关于他在内心中同恶魔的斗争，持续了整整一生毫无疑问是十分痛苦的斗争，我们又知道什么呢？我且不说涅克拉索夫做过的好事，关于这些事他没有公开说过，但无疑是有的，大家正开始说明这位"务实"的人物的仁爱和温情的方面。苏沃林先生[①]已经发表了一些东西，我相信会有许多同样有利的证据被发现，不可能有别的。"啊，它们会告诉我，你们也会证明是无辜的，而且比我们的说明更加轻而易举。"不，我不为他辩护，我只是说明事实，我想达到的目的是能够提出一个问题——一个最终能全面解决的问题。

① 阿·苏沃林（1834—1912）：俄国出版家。1874年接办彼得堡的《新时代日报》，立场保守。——译者注

对涅克拉索夫有利的证人

一个优伶朗诵他那个角色的台词，为一个叫做赫卡柏的女人哭泣，哈姆雷特对他流泪感到诧异："赫卡柏与他有什么相干？"——哈姆雷特问道①。有一个问题直接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涅克拉索夫就是这个优伶吗？也就是能够真诚地为自己和被自己抛弃的精神上的圣洁而哭泣，因而在蕴含着永恒的美的诗中倾泻了自己的悲痛（真实的悲痛！），到第二天却能够因诗中的这种美而……感到真正的心满意足。单单因为诗中的美。不仅如此，甚至把诗中的美看成"务实"的东西，能获取利润、金钱、荣誉，并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它。是这样吗？还是与此相反，诗人的悲痛在写了诗以后并没有消失，并不因为写了诗而被抵消；诗中的美和所表现的力量使他本人感到压抑和痛苦，而如果他没有力量控制自己身上那寸步不离的恶魔，克服那终身支配着他的激情，他又会垮掉，那么他在暗中忏悔的神圣时刻，还能够平心静气地听任自己垮掉，不再发出更加

① 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赫卡柏是希腊神话中可怜的女人。——译者注

响亮的呻吟和叫喊声吗？——他每一次忏悔时，会不会在心里重复他的悔恨，会不会提高声音，使他本人最终能够清楚地看到身上的恶魔对他究竟有什么价值，为了从它那里得到好处，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昂贵。总而言之，如果他既能够立刻与他的恶魔言归于好，又能够在同人们的谈话中证明自己的“务实”是正当的，那么这种言归于好和心安理得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或者相反，它们立即从心中消逝，留下的是更加剧烈的疼痛、羞愧和自责？那时候，——假如这个问题能够解决，——那时候我们又能怎么办？我们只能责怪他因为没有力量约束自己的欲望而以一死谢天下，比方说，如同古代那个住在洞穴里受尽煎熬的人一样，他无力对付折磨他的那条情欲的毒蛇，既然不可能把身上的恶魔逐走，当然就败在它手下，于是便把自己活埋，土填到齐腰深时即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身，即我们每一个人，不知不觉间都会陷入尴尬而可笑的境地，假如我们敢于扮演审判官的角色，作出这样的判决的话。因为诗人已经写过他自己：

你不一定能成为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①

因此他似乎已经承认了作为“公民”的人们对他的审判。当然，作为一般的人，我们来审判他是会感到羞愧的。我们本身，我们每个人，又怎么样？我们只是没有把自己的隐私说出来，隐瞒了我们的见不得人的东西，藏在心里，完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与公民》一诗。

全听之任之。诗人也许是为他所做的那些事哭泣，假如这些事是我们干的，我们可能连眉头也不会皱一下。我们可是从他的诗中知道他的堕落，知道他的那个恶魔的。假如没有他这些敢以忏悔式的真诚公开披露心迹的诗，那么对作为一个凡人的他，对他的“务实”等等的种种议论，——所有这些议论都将不攻自破，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流于诽谤，因而任何辩护对他来说都将成为毫无必要。说到这里，我要指出，对于讲求实际而又如此善于经营自己的事务的人来说，宣扬自身的悔恨和啼哭，实在是不实际的，因而他也许根本不像某些人对他所作的判断那样是讲求实际的人。但是，我再说一遍，他应当去接受公民审判，因为他本人承认这种审判。因此，如果我们上面所提的问题：诗人对于自己洒满了泪水的诗感到心满意足，于是十分坦然地迁就自己，再次允许自己轻松地去动手搞他的“务实”呢；还是与此相反，对自己的迁就只是暂时的，结果也许因为这种可耻的迁就而看不起自己，然后忍受着更加深重的痛苦，终其一生都是如此？——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如果能够得到解决，表明后一种假设是事实，那么，不言而喻，到那时我们立刻可以与“公民”涅克拉索夫言归于好，因为他身受的痛苦会当着我们的面洗净我们对他的记忆。显然，这时会有人起而反对：如果你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谁能够解决它呢?），那就不应当把它提出来。可是事情是这样：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证人在。这位证人就是——人民。

这也就是他对人民的爱啊！首先，一个“务实”的人对人民怀着这样强烈的爱会有什么目的。每个人都忙着自

己的事：这个人在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个人在为人民而忧伤。好吧，假定这是闹着玩的念头，那么玩一玩就放下吧。可是涅克拉索夫一辈子都没有放下。有人说，人民对他来说就是那个“赫卡柏”，是流泪的对象，这种眼泪在他的诗里流成了河，是会弄到一笔收入的。但是要装出一副像涅克拉索夫的诗里所流露的真诚的爱（关于这一点可能有无休止的争论）的样子，是十分困难的，这一点我且不去说它；我只想谈一谈我所了解的涅克拉索夫为什么这样爱人民，为什么他在一生的艰难时刻中还这样心向着人民，为什么他走到人民中去，他在人民中寻求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因为涅克拉索夫怀着的对人民的爱，似乎可以为他的自伤身世找到出路。请你们注意这一点，同意这一点——你们也就会明白作为诗人和作为公民的涅克拉索夫的全人。当他全心全意并以他的全部聪明才智为人民服务时，他始终在清洗自己的污垢。人民是他内心真正的需要，并不是单为了写诗。他在对人民的爱之中寻找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他以自己对人民的感情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但是主要的是他在周围的人中间没有找到他去爱的对象，或者没有发现他们所尊重和所崇拜的是什么。相反，当他对经常无精打采而且心不在焉地过的这种生活产生反感时，他就离开了这些人，走到被侮辱的、受苦的、纯朴的、处于屈辱中的人们中去；他走向农村简陋而亲切的教堂，在石板地上叩头，医治自己的创伤。假如他不相信人民，他不会选择这样的出路。他在对人民的爱中寻求一种稳妥的东西，一条摆脱他的一切痛苦的稳妥而神圣的出路。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他已找不到可以使他倾心的更加神圣、更

加稳妥、更加真诚的东西。他也不可能仅仅在描写人民的诗中为自己进行辩护。而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会尊重人民的实际。如果除了人民之外，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找到任何更值得去爱的东西，那么他就会承认人民的真理和人民中间的真理，承认只有人民中才有真理，才保存着真理。如果他的承认并非出于完全的自觉，并非出于他的信念，那么是他的心在承认，是无法阻止，不可抗拒的。在这个有缺点的汉子身上，人民被侮辱受歧视的形象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因而他要寻求他不能不表示尊敬的、他的整个心灵不能不产生感应的一种真诚和神圣的东西。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在前面谈到他在文学上的作用时已经说过，我把他也归入尊重人民的实际的那些人的行列之内。长期地探寻人民的实际状况，长期地渴望去了解，长期地去追求，我再说一遍，这清楚地表明他的内心有一种超乎一切之上的要求，引导他走向人民。因此，这种要求之产生，必定也表明他的内心里长期存在着一种苦闷，是用任何巧妙动听的理由，任何花言巧语，任何谋取实际利益的借口都不可能驱除和消解的。而如果是这样，那么他自然要忍受一辈子的痛苦了……在此之后我们算是他的什么审判官呢？即使是审判官，那也不能是原告。

涅克拉索夫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典型；在我们可悲的过渡时期，一个俄国人在道德和信念方面能造成什么样的矛盾，什么样的分裂，他可算是显著的范例。但是这个人仍然活在我们心里。这位诗人的爱情的突发常常是真诚的，纯洁的，淳朴的！他对人民的向往是十分高尚的，因此应当把他看作诗人而放在崇高的位置上。至于作为一个凡人，

一个公民，那么他本人仍然可以证明自己对人民怀有热爱，关心人民的疾苦，如果真的需要什么将功补过的话，他是有许多功绩可以去弥补的……

1877年12月

普 希 金

——1880年6月8日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

果戈理说过，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也许是独有的现象①。我个人补充一点：是一种带启示性的现象。的确，他的出现对于我们所有俄罗斯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件具有启示性的事情。普希金正好是在彼得一世改革② 整整一百年以后，我们社会刚刚开始和刚刚兴起正确地进行自我认识的初期到来的，他的出现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以便用新的指路明灯照亮我们黑暗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是启示，是方向。我把我们这位伟大诗人的活动分成三个时期。我现在不是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说话，在谈到普希金的创作活动时，我只想说明我认为他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的一点想法，以及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但是，我也想顺便指出，普希金活动的三个时期之间，我认为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开始写《奥涅金》时，按

① 见果戈理的《略谈普希金》(1832) 一文。

② 彼得一世 (1672—1725) 在位的25年间，仿效西欧国家，进行了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改革，史称彼得一世改革。

我的想法，还只属于诗人活动的第一时期，而当普希金在祖国的土地上发现了自己的理想人物，并以他的充满热爱而富有预见的整个心灵去理解并喜爱他们时，《奥涅金》便在第二时期结束了。通常也可以说，普希金活动的第一时期是在模仿欧洲的几个诗人：帕尔尼、安德烈·谢尼耶①和其他人，特别是拜伦。是的，毫无疑问，欧洲的诗人对普希金才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并且在他的一生中都保留着这种影响。然而，普希金最早的几首长诗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这些诗里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才能，非凡的独创精神。模仿是永远不可能产生那么独特的痛苦的感受和那么深刻的自我意识的，像普希金在，比方说，《茨冈》这首长诗里所表现的那样。我完全认为这首长诗是属于他的创作活动的第一时期。如果他只是单纯地模仿，我就用不着谈创造力和表现得那么快的成长速度了。长诗《茨冈》的主人公阿乐哥这个典型，已经流露出了强劲而深刻的、完全是俄罗斯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在《奥涅金》中表达得不露丝毫痕迹，几乎是同一个阿乐哥，已经不是处于虚无缥渺的世界里，而是置身在可以触摸的现实和可以理解的状态中了。在阿乐哥身上，普希金找到了并富有独创性地描画了祖国土地上那个不幸的流浪汉，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俄罗斯受苦人，在我们这个脱离人民的社会里，他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普希金不只是在拜伦的笔下找到这种人。这是个真实的、描写得十分准确的典型，是长期扎

① 埃·帕尔尼（1753—1814）、安·谢尼耶（1762—1794），均为法国诗人。

根在我们俄罗斯土地上的常在的典型。这些无家可归的俄罗斯流浪汉直到现在仍继续在流浪，似乎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消失。如果他们在现代不到茨冈人的宿营地去从茨冈人独特的未曾开化的生活中寻找理想的世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安慰，以摆脱俄国知识分子社会那种混乱而荒谬的生活，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会闹起阿乐哥时代还没有的社会主义来，并怀着新的信念到新的土地上去，在那里勤奋地工作，像阿乐哥那样相信自己那不切实际的事业会达到目的，不仅为个人，而且也为全世界谋得幸福。因为俄罗斯的流浪汉要想得到安慰，必须实现全世界的幸福，他不能轻易地就歇手不干了，——当然，目前事情只停留在理论上。他们是同一个俄罗斯人，只不过出现在不同的时代。我再说一句，这个人正好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第二个一百年之初出生在我们这个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力量的知识分子社会里。啊，在普希金那个时代，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俄国知识分子怡然自得地当着官，在国家财务部门或者在铁路和银行里工作，或者干脆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赚钱，甚至也进行科学研究和讲课，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大家按部就班，懒懒散散，心平气和，拿拿薪水，玩玩纸牌，没有任何意愿要跑到茨冈人的营地或者更适合于我们时代的其它地方去。至多不过对“带有欧洲社会主义色彩”的事物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而这种社会主义却被赋予某种柔和的俄罗斯性格，——不过这只是时间问题。事情在于，一个人还没有开始操心，另一个人却已经赶到紧闭的大门前用前额使劲地撞门了。如果不走上与人民谦虚地交往的自救的道路，那么每个人总有一天都会遇

到同样情况的。但愿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只要“出类拔萃之士”，只要有十分之一开始操心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就行了，别让其余绝大多数人由于他们而感到不安。当然，阿乐哥还不会准确无误地说出自己的苦恼，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还是抽象的，他只渴望大自然，对上流社会不满，追求和平的生活，为在某个地方被某个人遗失而为他永远无法找到的真实的本性而哭泣。这里有一点卢梭的思想。这个真实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它能够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出现，它究竟在什么时候被丢失的，当然，连他本人也说不出来，但他真诚地为此而苦恼。富于幻想而又没有耐性的人大多只希望暂时从表面现象上得到解脱，这也是应该的，因为，据说，“真实的本性是在他身外的什么地方，也可能在别的国家，譬如说，在欧洲的某个地方，那里有巩固的历史制度，有已经定型的社会生活和世俗生活”。他完全不明白，真实的本性首先存在于他自己的内心里，他怎么能够明白呢，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如同外人，完全脱离劳动，没有文化，像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一样在四面封闭的高墙内成长，按照组织严密的俄国社会所划分的十四个等级[①]内他所属的某一个等级，履行他那不由自主的荒诞的职责。他现在只不过是脱离了土地飘浮在空中的一根草。他也感觉到这一点，并为此而苦恼，而且经常这样地痛不欲生啊！也许他属于世袭贵族，甚至非常可能拥有农奴，他出于贵族的一种自由放任的习性，允许自己生出一种小小的古怪的念头，去喜欢那“无法无天”的人们，因

① 1722年彼得大帝下令把文官分为十四个等级，十月革命后废除。

而在茨冈人的营地住上一个时期，并且把熊牵出来耍一耍，问题是在这里吗？当然，女人，按照一个诗人的说法，“一个粗野的女人”，很可能会燃起他摆脱苦闷的希望，于是他轻率地但怀着热烈的信念奔向真妃儿，说什么“我的出路就在这里，也许我的幸福就在这里，在这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远离上流社会；在这里，在没有文明和法律的人群中间！”其结果是：在他第一次和这个原始的大自然的环境接触时，他就经受不住，并且双手染满了鲜血。不但就世界的和谐而言，即使对茨冈人来说，这个不幸的幻想家都是不中用的，于是他们将他赶走，没有报复，没有愤恨，不失自己的尊严，又出于一片诚心：

离开我们吧，骄傲的人；
我们是粗野的，我们没有法律，
我们不折磨你，也不处死你。①

当然，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是这么一个“骄傲的人”，现实中是存在的，抓得很准确。他第一次被我们的普希金抓住，这一点应该牢记。只要，只要稍为有点不合他的意，他就凶狠地折磨人，惩罚人，以消心头之恨；或者，这种事做得更加简便，当他一想起自己身属十四个等级之中，可能会亲自诉诸（过去发生过这种情况）用以折磨和惩处的法律；他利用法律只不过是为了发泄他的心头之恨而已。不，这首天才的长诗不是模仿！这里已在暗示用俄国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该死的问题”，而且要按照人民

① 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中的诗句。阿乐哥和真妃儿是长诗中的两个人物。阿乐哥因真妃儿另有所爱而杀死了她。——译者注

的信念和本性，那就是："顺从吧，骄傲的人，首先摧毁你的傲气吧。顺从吧，游手好闲的人，首先在家乡的田地里劳动吧！"这就是按照人民的真实本性和人民的智慧的解决方式。"真实的本性不是在你的身外，而是在你自己身上，在自己身上去找回自己，自己服从自己、自己掌握自己，你就会看到真实的本性。这个真实的本性不是在你身外之物里，不是在你身外，也不是在大海之外什么地方，而首先在于你的自我修养上。战胜自己，控制自己——那样你就会获得从来都想象不到的自由，去着手干一番伟大的事业，你就会使别人也成为自由的人，你就会看到幸福，因为你的生活是充实的；最后，你就会理解人民和他们的神圣的真实。如果你本身首先损害了世界的和谐，凶狠，骄横，要求过不劳而获的生活，甚至根本不想为生活付出一点代价，那么无论是在茨冈人那里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世界的和谐。"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普希金的长诗中已有了强烈的暗示，而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则表达得更加清楚。这首长诗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相当现实的，它以绝无仅有的创造力和精湛的手法表现了俄国真正的生活，这在普希金时代是空前的，大概也是绝后的。

奥涅金来自彼得堡——必定来自彼得堡，这在长诗中无疑是必需的，而且普希金不可能放过他的主人公经历中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的特点。我再说一句，这就是那个阿乐哥，特别是后来，当他在苦闷中大喊：

为什么我不瘫在床上，

像图拉的一个陪审官？①

现在，在长诗的开头，他暂时还是半个花花公子，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在世上实在没有过上太长的日子，就对生活完全失望。然而，

苦闷这高贵的魔鬼悄悄地

开始缠上他，并扰乱他的心。

他住在偏僻的地方，在自己祖国的腹地，当然不是在自己家里。他不知道在这里应该做什么，并且感到自己总像在家里做客。最后，当他怀着苦闷的心情在国内外流浪时，他作为一个公认的聪明的人和公认的诚实的人，更加感到自己在异乡人中间是连自己也不认识的异乡人。确实，他也爱自己的乡土，但不信任它。当然，他也听说过本国的道德准则，但不相信。他只相信在祖国的田野上任何劳作都将一事无成；如果有人相信能够办到，——过去和现在这种人都不少，——他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笑的眼光看他们。他把连斯基打死了，只不过由于闲得无聊罢了，谁知道呢，也许根据世上最高的准则来说是由于闲得无聊，——这完全是我们的想法，这是可能的。达吉雅娜却不是这样的人，她是一个坚定地站在自己土地上的坚强的典型。她比奥涅金深沉，当然，也比他聪明。她单凭自己高贵的本能就预感到真实的本性在什么地方，这在长诗的结尾已表现了出来。如果普希金拿达吉雅娜的名字而不是奥涅金的名字为自己这部长诗命名，甚至会更好一些，因

① 见《奥涅金的旅行》（片断）。图拉是莫斯科正南的一座城市。

为她是诗中无可争辩的主要人物。这是积极的典型，而不是消极的典型。这是积极的美的典型，这是俄国妇女崇拜的神，诗人预先安排在达吉雅娜和奥涅金最后会面的著名的那个场面来向她们说出长诗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俄罗斯妇女这种积极的美的典型几乎没有再次出现过，也许只有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丽莎的形象除外。但是，奥涅金那傲视一切的态度，使得他在乡下第一次遇见达吉雅娜时，在这个纯洁无邪、一开始就在他面前显得十分羞怯的姑娘那质朴的形象中，根本认不出她是个什么人。他识别不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子身上那完美无缺的美德，也许他确实把她当作一个“精神上的萌芽”。她是萌芽，但是在给奥涅金写信以后！如果长诗中有什么人是精神上的萌芽，那么，不言而喻，这个人就是他，就是奥涅金本人。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他根本不理解她，难道他了解人的心灵吗？他是一个虚浮的人，一生都不安分的幻想家。即使是后来，在彼得堡，她成了一个显贵的夫人，按照他在给达吉雅娜的信中说的话，“用心灵了解她的完美”时，他仍然不了解她。然而这只是他说说而已，因为她在他的生活中擦肩而过时，他始终没有认清她，没有正确地评价她；他们爱情的悲剧也就在这里。啊，如果当他在乡下第一次遇见她那时候，从英国来一个恰尔德·哈罗尔德①，或者想法让拜伦勋爵本人亲自跑来，发现了她的娇羞而纯朴的魅力后，点醒他一下，该有多好！奥涅金立刻会大出意外，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平静地忍受着痛苦的

① 拜伦所著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的主人公。

人，在精神上有时竟有那么多的奴性啊！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发生，这位追求世界和谐的人便给她作了一番说教。他的举止仍然非常光明正大，又怀着极大的苦闷，两手还染着因一时的愚蠢和凶残而使别人流的鲜血，前往祖国各地流浪，对她毫不在意，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满腔怨愤地高喊：

我年轻，精力充沛，
我等待什么？苦闷，苦闷！

达吉雅娜懂得这一点。在这部小说不朽的几节诗中，诗人描述了她去看望使她感到纳闷的这样一个怪人的住宅。我且不谈这几节诗的艺术性、无与伦比的美和深度。她在他的书房里，仔细地看他的书籍、摆设、什物，想从它们身上努力猜出他的心灵，为自己的谜寻找答案。最后，"精神上的萌芽"终于陷入沉思之中，奇怪地微笑着，预感到已解开了心中的谜，双唇轻轻地翕动着：

他莫非是个伪劣的仿制品？

是的，她应该轻声地把这句话说出来，她猜中了。以后，过了很久，当他们重新在彼得堡见面时，她已经完全了解他了。顺便提一下，好像有谁说过，接近宫廷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损害了她的灵魂，并且贵夫人的头衔和上流社会的新观念成为她拒绝奥涅金的一部分原因。是这样吗？不，并非如此。不，她仍然是达尼娅，仍然是从前那个农村里的达尼娅！她没有受到腐蚀，相反，彼得堡的这种奢侈的生活使她抑郁不欢，使她消沉、烦恼；她憎恨自己的贵夫人的名分，谁要是对她另有看法，那他就完全不了解

普希金说的是什么。下面是她斩钉截铁地对奥涅金说的：

> 但是我已委身于别人
> 我要永远忠实于他。

正是作为一个俄国妇女，她说出了这种话，她之受人尊敬也在于此。她说出了长诗的真谛。啊，我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她的宗教信仰、她对于合法婚姻的观点，——不，我不想谈这些。但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她拒绝跟他走吗，尽管她亲口对他说过“我爱您”？是因为她“作为一个俄罗斯妇女”（而不是南方的或者法国来的哪个女人），没有能耐迈出勇敢的一步，没有力量扯断束缚自己的绳索，没有力量拒绝荣誉、财富、上流社会的地位等等的诱惑，冲破道德的约束吗？不，俄罗斯妇女是勇敢的。俄罗斯妇女敢于为她所认定的目标而勇往直前，她们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她“已委身于别人，要永远忠实于他”。她要忠实于谁？忠实于什么？是在尽什么义务？对于这么一个年老的将军[①]，她是不可能去爱他的，因为她爱的是奥涅金。她之嫁给他，只是因为“母亲流着泪苦苦地哀求”她，而那时她那受委屈的千疮百孔的心里却只有绝望，没有任何希望和光明。她要忠实于他吗？是的，她忠实于这个将军，她的丈夫，一个诚实的人，爱她、尊重她并为她而骄傲的人。就算是“母亲哀求”她，但不是别人，是她本人答应了；是她，是她本人向他发誓要做他忠实的妻子。就算她由于绝望而嫁给了他，但现在他是她的丈夫，她的变节将使他蒙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达吉雅娜的丈夫是“年老的将军”，曾引起学者的异议，他们认为他是与奥涅金同龄的青年。

受耻辱，败坏他的名声，会置他于死地。难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吗？幸福并不单纯是享受爱情的快乐，而且也表现为精神上高度的和谐。如果背后隐藏着不诚实的、毫无怜悯之心的、不人道的行为，精神上又能得到什么安慰呢？只因为出走才有她的幸福，她就应当出走吗？但是，如果这种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又会是什么样的幸福呢？对不起，请想一想，如果你们亲自来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以便在落成后为人们造福，最终给他们以和平与安宁；那么又请你们想一想，为了这件事却必须、不可避免地必定要使一个人，总共是一个人，受到痛苦，尽管这个人并不那么值得尊敬，在某些人眼里甚至是可笑的；也不是什么莎士比亚，只不过是一个诚实的老汉，一个年轻妻子的丈夫，尽管他根本不知道她的心，却盲目地相信她的爱情，尊重她，为她感到骄傲，以她为幸福和安宁。那么单让他蒙受羞辱，名誉扫地，痛苦万分，却用这个丧失了名誉的老汉的泪水建造你们的大厦，你们能同意在这种条件下去做这座大厦的建筑师吗？这就是问题。你们为人们建筑了这样一座大厦，如果大厦是建筑在痛苦的基础上，比方说，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但受到残酷而蛮横地摧残的小人物的痛苦的基础之上，人们会愿意接受你们给予的这种幸福，而且在接受这种幸福以后会永远感到幸福，你们能有这种想法吗？哪怕只有一分钟。请告诉我，达吉雅娜以她那高尚的灵魂、那颗破碎的心，能作出另外的选择吗？不，因为一个纯洁的俄罗斯灵魂只会作出这样的选择："让我，让我一个人失去幸福，让天大的不幸落在我的身上，别让这个老头再受到痛苦；最

后，永远别让任何人，连这个老头在内，知道我作出了牺牲，别去议论它，我可是不愿意害死别人以求得自己的幸福!”这是一场悲剧。她是这样做的，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已经太晚了。于是达吉雅娜把奥涅金打发走了。有人会说：奥涅金也并不幸福呀，因为她救了一条命，也害死了另外一条命呀！请原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甚至也可能是长诗中最重要的问题。附带说一下，有这样一个问题①：为什么达吉雅娜不跟奥涅金一走了之？这问题在我们中间，至少在我们文学界，仿佛是一件十分特别的事情，因此我想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从品德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长期受到怀疑，这尤其显得特别。我是这样想的：假如达吉雅娜获得了自由，假如她的年老的丈夫死了，她成了寡妇，即使是这样，她也不会跟奥涅金走。要不要理解这种性格的全部本质呢?因为她看出了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终身漂泊不定，突然发现过去被他轻视的女人却处在高不可攀的显赫的环境里，——大概就是这样的环境，成为事情的全部本质所在。他几乎要嗤之以鼻的这个小姑娘，现在受到上流社会的崇拜，——上流社会，它在奥涅金心目中是可怕的权威，尽管他有各种美好的追求，——这就是他眼花缭乱地向她扑去的缘故！他激动地叫喊：这就是我的理想，这就是我的救星，这就是我摆脱烦恼的出路，它从我的眼皮底下漏过去了，而“幸福那时是可能到手的，离得这样的近!”奥涅金一心一意想着达吉雅娜，就像从前阿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显然是针对别林斯基的意见而发，别林斯基认为达吉雅娜这种守节的思想是不足取的。

乐哥对待真妃儿那样，在新的离奇的幻想中寻找自己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难道达吉雅娜没有看出他这一点，难道她以前没有把他看透吗？因为她明明知道他实质上只爱自己新的幻想，而不爱她温顺如故的达吉雅娜！她知道，他把她当作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并没有把她当作她这个人；他爱的甚至也不是她，也许他谁都不爱，甚至不会爱什么人，尽管他经受着百般的痛苦！他爱的是幻想，甚至他本人就是一个幻想。如果她跟着他走了，第二天他就会感到失望，并会嘲笑自己的多情。他没有任何根基，他是随风飘荡的一根草。她绝不是这样：即使在绝望中、甚至在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要牺牲自己的一生的时刻，她身上仍然有一种坚定的、毫不动摇的、她的心灵赖以依托的东西。这是她对童年的回忆，对家乡、偏僻的农村的回忆，她在那里开始了她的朴实的纯洁的生活——这是“她可怜的奶妈坟上的十字架和树枝的荫影”。啊，这些回忆和过去的形象现在对她都是极为宝贵的。留在她的记忆里的只是这些形象，然而正是这些东西使她的心灵从彻底的绝望中解脱出来。这就不少了，不，这里已经有很多了，因为这里有全部基础，这里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牢不可破的东西。这里有与祖国、与祖国人民、与人民的最珍贵的东西的联系。而他身上有什么，他是个什么人呢？只是为了使他一时开心，出于无穷尽的爱怜之心暂时给他一个幸福的幻影，而且事先明明知道到第二天他就会嘲笑自己得到的这种幸福，她当然不应该因为怜悯他而跟着他走。不，天下是有深沉的坚强的灵魂的，它们决不会让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蒙受耻辱，尽管有无限的同情。不，达吉雅娜不能跟奥涅金走。

于是，普希金以他这部不朽的、不可企及的长诗《奥涅金》，成为前所未有的伟大的人民作家。他以最准确最敏锐的方式，一下子指出了我们、高踞在人民之上的我们当前的上流社会的最深刻的本质。普希金描写了俄国流浪者的典型，我们之前以及我们当前的流浪者的典型，以他的异乎寻常的敏锐的感觉，首先发现了它，并且认清了它的历史命运和在我们未来命运中的巨大意义；与此同时，他又描写了一个俄罗斯妇女，把她塑造成一个积极的无可争辩的美的典型。当然，在俄国作家中他也是第一人，在他创作活动的这一时期所写的其他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从俄国人民中发掘出来的具有积极的美的俄罗斯人的典型。这些典型的美主要在于它们的真实，不容争辩的、可以触摸的真实，因此要否定它们是不可能的，它们如同石头雕像那样屹立不动。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不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发言，因此，也就不准备对我们这位诗人天才的作品从文学方面进行详细的讨论，以说明我的思想。比方说，关于年复一年编写着自己历史的俄国僧侣的典型，是可以写出厚厚的一本书来讲解这个重大的俄国形象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及其全部意义。这个形象是普希金在俄国大地上发现的，由他描写出来，雕塑出来，现在树立在我们面前，它的精神美是永远无可争议的，谦逊的，庄重的；它是人民生活中强大的精神的见证，这一精神可以从自身产生出上述那无可争辩的真实的形象。这个典型已被塑造出来，它存在着；不容许对它提出异议，说它是虚构的，只是诗人的幻想和理想化。你们亲身冷静地观察以后，会表示同意：不错，它是存在着，因而是人民的精神，是人民

创造的；它是存在着，因而也是这种精神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是强大而不可限制的。在普希金笔下到处流露出对俄罗斯性格的信心，相信它的精神上强大的力量，而如果有信心，也就有了希望，为了俄国人的殷切的希望。

希望获得光荣和幸福
我无所畏惧地直视前方

这是诗人在另一首诗里说的，但他这些话可以直接用来说明他的全部民族的创作活动。无论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从来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像普希金那样诚挚、亲密地和人民结合在一起。啊，在我们作家中间，有很多人了解我们的人民；他们非常出色、非常准确、非常热情地描写过人民，然而，如果把他们和普希金相比，那么，老实说，至今为止，在他最后的追随者当中，除了一个、顶多两个以外，他们只不过是拿人民来写作的"老爷"。他们当中最有才干的人，甚至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个人，他们的笔下有时会突然冒出一种傲慢的东西，一种从另一个生活方式和另一个世界来的东西，一种想把人民抬举到与自己并列，并且以这种抬举使人民感到幸福的东西。而在普希金身上正好有一种实实在在与人民亲近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他身上几乎达到了某种非常朴实使人大为感动的程度。就拿关于熊和农夫怎样打死它的母熊的故事①来说吧，或许你们会想起这句诗：

亲家伊凡，咱们喝起来吧，

那么你们就会明白我想说什么。

---

① 普希金于1830年写过一部题为《母熊的故事》的故事诗。

我们这位伟大的诗人留下的所有这些艺术瑰宝和可贵的艺术洞察力，似乎可以作为未来的、他身后的艺术家以及同一领域内未来的工作者的指针。可以肯定地说，假如没有普希金，也就没有随他而来的一群天才；即使他们具有深厚的天赋，充其量也不会表现得这么有力，这么鲜明，像他们后来即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表现的那样。但问题不仅在于诗，也不仅在于艺术创作，因为假如没有普希金，也许我们不可能用这种不可动摇的力量（后来表现了这种力量，虽然不是所有人，而只是极少数人）来确立我们对于俄国的独立自主精神的信心，我们现在对于人民的力量自觉的期待，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我们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之中未来独立自主作用的信心。如果深入谈到我称之为他的艺术活动的第三时期，普希金这一功勋就显得特别清楚。

我还要、还要重说一遍：这三个分期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比方说，即使是第三时期的一些作品，也可能是在我们这位诗人的诗歌创作活动的最初阶段写的，因为普希金始终是所谓不可分割的完整的有机体，他身上各种初生的幼芽早已齐备，是从体内生长的，不是从外部移植的。外部的东西只唤起他内心深处已经包含的东西。但是这个有机体在逐渐发育，这种发育的各个时期确实可以作出标记和划分，其中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特点和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渐进过程。因此，可以把他的那一类作品，即大多闪耀着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反映了其他民族的诗歌形象并体现了他们的独特风貌的作品，归入第三个时期。其中有些作品是在普希金去世后问世的。在他活动的这一时

期，我们的诗人甚至成了一种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神奇之物。实际上，在欧洲各国文学中有大量的艺术天才——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席勒。但是请你们告诉我，在这些伟大的天才之中，有哪一个像我们的普希金那样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的，哪怕说出一个也好。正是他与我们的人民分享着这样的才能，我们民族最重要的才能，因而，也是最主要的，他成了人民的诗人。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从没有像普希金所表现的那样，用那么大的力量体现出别国（也许是他们的邻国）人民的特殊风貌，人民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中蕴藏在最深处的内涵和人民所感受的忧伤。相反，欧洲的诗人在对待别的国家人民的民族特点时，常常把它们转变为自己的民族特点，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即使在莎士比亚笔下，比方说，他写的意大利人几乎全都是像他那样的英国人。普希金是全世界诗人中唯一拥有充分再现别国民族性的特殊能力的诗人。例如《浮士德》中的几个场面，例如《吝啬的骑士》和叙事诗《上流社会的可怜骑士》。请你们读一读《唐璜》，如果不是署上普希金的名字，你们绝对不会看出这部作品不是西班牙人写的。长诗《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中的形象是多么深刻、多么富于幻想呀！然而在这些富于幻想的形象中，却表现了英国的风貌；这是长诗主人公关于瘟疫的一首奇妙的歌，这是歌中梅里唱的两句诗：

> 喧闹的学校里传来我们
> 那些可爱的孩子的声音

这是一个英国人的歌，这是一个不列颠天才的忧伤，他的

哭泣，他对自己前途的痛苦的预感。请回想一下这句奇怪的诗：

有一天我在荒凉的山谷中漫游① ……

这是古代英国一个教派的信徒以散文形式写的一本神秘主义的奇书中前三页几乎是一字不差的转述，——难道这只是转述吗？在这些诗句忧郁和兴奋的音调中可以感觉出北方的新教、英国异教徒的首领和极端神秘主义者的心灵，他的执拗的、阴暗的、不可遏止的追求，以及无法收敛的神秘主义的理想。在读这些奇怪的诗句时，你们似乎感觉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的精神，你们会逐渐明白这个初露锋芒的新教那好战的激情，最后也会了解历史本身，不单是在观念上，而仿佛是亲历其境，从全副武装的教派信徒面前走过，和他们同唱他们的赞歌，和他们共享神秘的欢乐而一起流泪，并和他们共同信奉他们所信仰的东西。顺便说一下，除了这个神秘的教派之外，还有可兰经或是《仿可兰经》中的宗教诗段：难道这里不也是穆斯林？难道这不正是可兰经的神灵和它的宝剑，纯朴而庄重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那可怕的浴血的力量吗?这就是古代的世界，这就是《埃及之夜》②，这些就是世上的神，作为人民的神坐在他们头上，蔑视人民的才干和他们的愿望，更不相信人民，真的成了高高在上的神，并在自我封闭中失去理智，在临终前的寂寞和苦闷中用极端残忍的奇异的暴行取乐，以

---

① 此句原出英国诗人和传教士约翰·班扬（1628—1688）的《天路历程》一书，普希金曾作了改动。

② 普希金所著的中篇小说。——译者注

发泄如同昆虫的淫欲，吞食公蜘蛛的那只母蜘蛛的淫欲。不，我肯定地说，没有一个诗人像普希金那样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而且这里的问题不只是反响，而在于这种反响的令人惊异的深刻内涵，在于把自己的精神转化为异国人民的精神，几乎无可挑剔，因而妙不可言。因为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哪一个作家身上，都没有重复这种现象。这只出现在普希金身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再说一遍，他是一个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现象；而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是具有启示性的现象，因为……因为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他的最富于民族性的俄罗斯的力量，也就是表现出了他的诗歌的人民性，继续不断发展的人民性，孕育在现在之中的我们未来的人民性。这种表现具有启示的意义。因为，俄罗斯人民性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它最终的目标不是趋向世界性和人类性。作为完全的人民诗人，普希金在他刚一接触到人民的力量时，立刻预感到这种力量在未来的伟大作用。在这里，他是个未卜先知者，是预言家。

事实上，彼得一世的改革对我们来说算是什么呢？不仅是在将来，而且是在过去已经有过，发生过，在我们眼前出现过的，这种改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它对我们来说，总不会只是穿上欧洲的服装，了解欧洲的风俗习惯，吸收欧洲的科学发明吧。就像过去做过的那样，我们要深入，要看得更认真些。是的，很可能彼得最初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只图实利、只求近期见效的意义上，开始实行改革的。但到后来，在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后，彼得无疑受一些隐藏在内心的感觉的驱使，在改革的事业中向未来的目标走去；这个目标比起只图近期的实利来无疑要宏伟得多。

俄国人民也同样不单是为了实利而接受改革的，他们无疑以他们的预感几乎立刻意识到今后某种与眼前的实利不可比拟的更崇高的目标，——当然，我再说一遍，意识到这个目标仍然是不自觉的，只不过是直接的、完全是从亲身体验中得来的。那时候我们可是一下子都去关心最重要的重新联合和全人类的团结呀！我们不是以敌对的态度（似乎过去必定会发生的），而是友好地、充满爱慕之心把别的民族的特色吸收到我们心里，兼容并蓄，不考虑民族优劣的差别，几乎从一开始就本能地善于识别优劣，善于消除矛盾，善于体谅和调和差别，从而表现出我们对于大雅利安人种①各民族的普遍的全人类范围内的重新联合的意愿和倾向，这种意愿和倾向是刚对我们宣布并说明的。是的，俄罗斯人所肩负的无疑是全欧洲和全世界的使命。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成为一个彻底的俄罗斯人，或许就意味着只有作为（你们最终会强调这一点的）所有人的兄弟，也即"世界人"才行，如果愿意的话。啊，我们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在我们这里都只是一种天大的误会，虽然从历史上来看是必要的。对于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欧洲和大雅利安民族的命运如同俄罗斯本身一样宝贵，如同他的故乡的命运一样宝贵，因为我们的命运就在于它的世界性，这不是用利剑割取而来，而是依靠博爱的力量和我们对于人类重新联合的亲善的愿望这种力量获得的。如果

---

① 雅利安人是远古时居住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叫作雅利安语。后来操雅利安语的人被某些人认为是"高等民族"，到希特勒时更成为对犹太人等"非雅利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借口。——译者注

你们想研究我国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后的历史，如果愿意的话，你们会在我们与欧洲各民族交往的性质中、甚至在我们国家的政策中发现这种思想、我的这种幻想的痕迹和标记。因为，在这两个世纪内，俄国按照自己的政策，除了为欧洲服务之外——或许比为自己服务得更多——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我不认为这只是由于我们的政治家无能所致。欧洲各国人民并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重视他们啊！因而我相信这一点，就是我们，当然不是现在的我们，而是将来的俄罗斯人，无论男女老幼全都会明白，要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那就是意味着要彻底地调和欧洲的矛盾，要在俄罗斯人的心中，在"世界人"和大联合的人的心中，为消除对于欧洲的烦恼指明出路，要怀着兄弟般的爱心在内心里记住我们所有的兄弟。而在最后，也许要说一说关于各民族按照基督福音书的条文所达到的伟大的共同的和谐和最终兄弟般的和睦的话作为结束吧！我知道，我知道得太清楚，我的话会显得过于热烈夸大，异想天开。但随它去吧，话已说出口，我不后悔。说过的话应当这样，特别是现在，在我们隆重纪念的时候，在我们向伟大的天才表示敬意的时候；他用艺术的力量加以表现的正是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已是老生常谈，我说的没有一点新东西。主要的是，所有这一切会显得过于自信，好像在说："我们，我们贫穷的没有完全开化的土地，不就是这样的命运吗？在人类中，不就是注定我们要说前人没说过的话吗？"怎么，难道我说的是经济方面的成就？是刀剑或者是科学的成就？我说的仅仅是人类的博爱，是俄罗斯那颗向着全世界和全人类兄弟般的团结的心。在各个民族之中，也许它是天生如

此，我在我国的历史上、在我们富有才干的人物身上、在普希金的艺术风采中，看到了它的痕迹。就算我们的土地贫瘠，但是“基督走遍了这块被奴役的土地，还为它祝福”。① 为什么我们容不下他最后的一句话？难道他本人不是在马槽里出生的吗？我再说一遍，至少我们可以指出普希金，指出他的天才的世界性和全人类性。因为他能够在心里容纳别的民族的特色如同本民族的特色一样。至少他在艺术上、在艺术创作中不容争辩地表现了俄罗斯精神所向往的世界性，而这中间就有重大的指示方向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想法是一种幻想，那么，至少对普希金是有一点从幻想出发的。假如他能多活几年，也许他会写出为我们欧洲各国兄弟所能理解的俄罗斯灵魂那不朽的伟大的形象，引起我们的注意比现在更多、更密切；也许他还来得及向他们说明我们各种追求的全部真情，那么他们就会比现在更加了解我们，事先就能猜出我们的心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用怀疑的高傲的眼光看待我们。假如普希金能多活几年，那么，现在大家所见到的我们之间的误解和争吵，也许可以减少一点。然而上帝却作了另一种判决。普希金在他精力充沛之时去世了，他毫无疑问也把某种重大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因此我们现在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来寻思这个秘密。

1880年6月8日

---

① 引自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诗《这些穷苦的村庄，这个贫瘠的土地……》。

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

第一章

代　序

我的朋友们，几个月来你们一直劝说我赶快把我在国外的观感写出来给你们，却没有料到你们这个要求会使得我束手无策。我给你们写些什么呢？能有什么并非人云亦云而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可说呢？在咱们俄国人中间（也就是读一点报章杂志的人中间），对于欧洲的了解，哪个人不是两倍于对俄罗斯的了解呢？我这里说两倍，是出于礼貌，实际上恐怕是十倍。而且除了一般的看法之外，你们也一定知道，我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何况又要写得条理清楚，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看出这中间的条理来。如果说看到了一些东西，那也来不及细看。我到过柏林、德累斯顿、威斯巴登、巴登-巴登、巴黎、伦敦、卢塞恩、日内瓦、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维也纳，有的地方还去了两次，而这些地方我正好是在两个半月之内走完的！两个半月之内走了这么多的路，难道能有什么东西让我看清楚吗？你们知道，我的路线是我还在彼得堡时早就拟定的。我以前没有出过国门，几乎在幼年时代就有了这种热望，那时在冬日漫漫的长夜，我还不能识字，在入睡前听父母读

拉德克利夫① 的小说，又兴奋又恐惧，弄得目瞪口呆，毛骨悚然，因此睡下后还激动得说梦话。到了四十岁，我终于跨越了国界，自然，我不只是尽可能地想多看，甚至什么都想看到；尽管有一定的期限，也要把一切都看遍。而且我也绝对没有办法冷静地选择地点。天哪，对这次旅行我抱着多么大的期望啊！我想："就算什么也没有看仔细，但什么都要看一看，什么地方都得去一去，因此我看到的东西就会合成某种整体，某种总的全景式的概念。整个'神奇的国土'② 刹那间就会在我眼下出现，如在空中鸟瞰大地，如在高山之巅远望乐土。总而言之，将会得到某种新奇的强烈的印象。"现在我坐在家里，回想夏天的漫游，我感到最可惜的是什么呢？并不是我没有进行任何详细的观察，而是每个地方都只是走了一走。比方说，我没有去罗马，即使到了罗马，我也许会错过去见教皇的机会的。总而言之，我有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我渴望见识新事物，游历新地方，追求普遍的、综合的、全景式的、透视般的印象。那么在作了这一番表白之后，你们还能对我抱什么期望呢？我能告诉你们什么？描写些什么？全景图？透视图？某种鸟瞰图？不过你们也许首先会同我说，我飞得太高了。除此之外，我自认是个讲良心的人，根本不想撒谎，即使写游记也不愿信口开河。如果我要为你们记述并描写完全是一个全景式的经历，那么我非撒谎不可，其原因绝不在于我是一个旅人，而在于我所处的环境迫使我不得不撒谎。

---

① 安·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以写作恐怖小说闻名。

② 语出霍米亚科夫的诗，指西方的各国。下文的乐土指迦南，用《圣经》上摩西登山望迦南的典故。

请你们自己来分析吧：比方说，柏林给我的印象是最糟糕的，我在那里只住了一昼夜。现在我知道我错怪了柏林，我不能断然肯定地说它给我的印象是酸不溜秋的，至少酸中有甜，不完全是酸的。为什么我会犯下这种令人痛心的错误呢？那绝对是因为我，一个病人，肝脏有病的人，乘着火车在雨里雾里奔驰了两个昼夜才抵达柏林，到站后又因睡眠不足，面黄体弱，困惫不堪，突然间一眼看见柏林与彼得堡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笔直的街道，同样的气味，同样的……（其实，全部列举相同之处是不可能的！）我心中暗想：真糟糕，天哪，为了看这个与刚离开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城市，值得在车厢里受两天两夜的罪吗？即使是菩提树[1] 我也不感兴趣，而为了保护这些树，柏林人牺牲了他们最宝贵的一切，可能连宪法也在所不惜。在柏林人的心目中，还有什么东西比宪法更宝贵的呢[2]？而且柏林人无论老小看起来都是十足的德国人。我连参观考尔巴赫[3] 的湿壁画都不想去了（真惨！），赶快往德累斯顿一走了之，心里抱着这样一个极为坚定的信念，即必须深入了解德国人，否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极难忍受的。而在德累斯顿，面对着德国的妇女，我甚至有负罪的感觉，因为我刚一出门，忽然认定天下再没有比德累斯顿这号女人更讨厌的了，即使是爱情的歌手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4]，俄国诗

---

① 指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

② 1862 年普鲁士政府违反宪法，利用上院通过军事预算，下院许多议员只能无力地表示抗议。

③ 威廉·考尔巴赫（1805—1874）：德国画家。

④ 作者对这位诗人（1840—1895）常有色情之作颇有微辞。

人之中最自信最快活的人，到这里来也会完全不知所措，也许连自己的天赋也会怀疑起来。当然，这时我感到自己说的是废话，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怀疑自己的天赋的。过了两个钟头，我全明白了，因为回到旅馆的房间以后，对着镜子伸出舌头，我相信我对于德累斯顿妇女所持的观点无异于最恶毒的诽谤。我的舌头是黄色，是恶毒的……我想："作为自然界的主宰的人，难道，难道要完全依赖自己的肝脏吗？多么没有出息！"我带着这些自我安慰的想法前往科隆。坦白地说，我对大教堂期望甚高；年轻时学习建筑①，我曾经怀着敬意描述过它的形状。归途火车经过科隆，即一个月以后从巴黎归来时，我第二次看到大教堂，记起第一次看见它时没有领略到它的美，就想向卡拉姆津②学习，"跪在地上请求它的宽恕"，他出于同样的动机曾向莱茵河上的瀑布下跪。不过第一次见到时，大教堂完全不对劲，在我眼中它只是花边、花边、清一色的花边，如同七十丈高的一张写字台上的吸墨器那样的小摆设。"缺乏大家风度"，我评论说，有如我们的祖先早年评论普希金那样："写来毫不费工夫，高雅之作却不多。"我疑心最初作的评论是受两种情况的影响：第一，香水。让-马里亚·法里纳③就在大教堂近旁，无论您在哪家大饭店下榻，无论您的心情如何，无论您怎么样摆脱您的敌人、特别是让-马里亚·

---

① 作者1843年毕业于彼得堡工程学校。

② 尼·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他在《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书简》一书中曾以这样的词句描写他第二次见到莱茵河瀑布的印象。这道瀑布在瑞士的沙夫豪森附近。

③ 法里纳（1686—1766）：意大利化学家。最先办厂生产香水，在科隆设有分店。

法里纳的追踪，他的代理人一定会把您找出来，摆在您面前的就是："要香水，还是要性命"；两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选择。我不能太肯定地说，他们喊的是不是这几个字："要香水，还是要性命！"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是这样喊的。记得我那时听到的似乎是这样。第二种情况是科隆新落成的大桥① 惹怒了我，使我产生偏执之心。当然，桥造得是极好的，这座城市理应为它而骄傲，可是我觉得未免骄傲得太过分了。自然，我立刻火冒三丈。加之站在漂亮的大桥桥头收费的人向我收取明文规定的钱数时摆出这样一副派头，好像是我触犯了什么我所不明白的规矩而来付罚金一样。我不明白，但我觉得德国人是在摆架子。"一定料到我是外国人，特别是俄国人。"——我想。至少他的眼神似乎在说："可怜的俄国人，你见到我们的大桥了，你在我们的大桥面前，在任何一个德国人面前，就像一条虫，因为你们没有这样的桥。"你们都会认为这是在欺侮人吧。当然，德国人根本没有这样说，甚至压根儿不这样想，但是没有什么两样：我那时坚信他想说的就是这些话，以至怒不可遏。"去你的吧，"我想，"我们也发明了茶炊② ……我们有报纸杂志……我们正在制造军官的用品……我们……"总而言之，我生气了，买了一瓶香水之后（这件事可没有办法躲开），急急忙忙前往巴黎，希望法国人要可爱一些，有趣一些。现在你们不用说也明白：如果我能克制

① 科隆横跨莱茵河的大桥，1861 年 4 月启用。

② 屠格涅夫在长篇小说《烟》(1867) 中似对这句话作出反应，他借波图金之口说，"连茶炊、树皮鞋、马轭和鞭子、……都不是我们发明的"。

自己，在柏林住上一个星期，而不是一天；在德累斯顿也住一个星期，在科隆哪怕住个三天或者两天，我一定会用另一种眼光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待同样的事物，并对它们作出更加合乎礼仪的理解的。即使是阳光，普通之极的太阳光，在这种场合也说明很多问题：如果它像我第二次来到科隆时那样照射在大教堂顶上，这座建筑物一定会在我眼前现出它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像那个阴暗的乃至细雨绵绵的早晨那样，只会引起我的受到刺激的爱国心的发作，虽然绝对不应该根据这一点认为天气坏会激发爱国心。因此，朋友们，你们心里明白，在两个半月之内是不能够把所有事物看得一清二楚的，我也不可能向你们提供准确无误的材料。有时我不得不说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

说到这里，你们把我拦住。你们说，这一次不需要准确无误的材料，不得已时你们可以从莱哈尔德① 的导游手册中查到。相反，如果每个旅行者所追求的不是绝对准确的材料（这几乎是永远无法办到的），而是真实的感情；有时敢于坦陈某种个人的观感或者意外的事件，即使这种事件不会为他增添光彩，并且无须劳动某些权威来检查他的论点是否正确，那么，这也是无可指摘的。总而言之，你们只需要我独有的但是真诚的观察。

“啊！”我喊道，“你们需要的只是平平常常的闲谈，轻松的随笔，个人随时随地生发的观感。”这我同意，并且马上去翻我的笔记本。我要尽力做到胸怀坦白。只不过请你们记住，我现在动手给你们写的东西，可能包含着许多错

① 亨利希·莱哈尔德（1751—1828）：德国作家。

误。当然，不是所有东西都有错误。有些事实，例如巴黎有个圣母院和马比耶舞厅，特别是后者，凡是记述巴黎的俄国人都证明属实，几乎不容怀疑①。我在这方面也许不会有错，虽然严格地说我也不能保证。又如有人说，到了罗马不可不看圣彼得大教堂。可是请你们想想，我到了伦敦，却没有去看圣保罗大教堂。不错，没有去。没有去看圣保罗大教堂。当然，圣彼得和圣保罗是两码事，但对于旅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体面的。这就是要告诉你们的我的第一起不会给我增添光彩的事（就是说，我大约只是在两百丈开外远远地望了望，便匆匆忙忙赶到彭顿维尔街去，挥挥手就走了）。不过，离题太远，言归正传吧！你们知道吗，我并不是只顾赶路，对所有事物都作鸟瞰式的一瞥（鸟瞰并非居高临下。这是建筑学上的术语，你们是明白的）。除去我在伦敦花费了八天以外，整整一个月我都住在巴黎。现在我就给你们写些巴黎的事，因为比起圣保罗教堂或者德累斯顿的妇女，我对它总归看得认真些。那么，就开始吧。

第二章

在车厢里

“法国人没有理性，他们还认为有了理性是他们最大的不幸。”这句话还是上个世纪冯维辛②写的。我的天，这

---

① 巴黎的马比耶舞厅，有女子跳康康舞。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都曾在文章中提到过它。

② 德·冯维辛（1745—1792）：俄国作家。1778年9月间他在写给帕宁元帅的信中说：“法国人没有理性，有了理性反会认为是一生的不幸，因为当他正过得快活时会逼他去思考。”

句话他大概是快快活活地写下来的。我可以打赌，他写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一定非常得意。谁知道呢，在冯维辛之后，我们接下来的三四代人来读它，也许不无几分快意。这一类糟蹋外国人的句子，即使在今天，仍然可以见到，对咱们俄国人来说，包含着某种无法抗拒的高兴劲儿。当然，那是非常隐蔽的，有时连自己也无法捉摸。这里可以感觉到对于不堪回首的过去的一种报复心理。这种感情恐怕也是不好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认定咱们每个人身上几乎都存在。自然，如果在这一方面我们受到怀疑，是要骂人的，而且根本无法加以掩饰。不过，我以为，别林斯基在这方面也是个隐蔽的斯拉夫派。我记得那时候，大约是十五年之前，我认识别林斯基的时候，记得那时这一批人怀着虔敬的心情，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拜倒在西方、主要是法兰西的脚下。那时候法兰西是最时髦的[①] ——那是 1846 年。但他们不是仰慕如乔治·桑、蒲鲁东，或者敬重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②] 等人的令名。不，他们所钦佩的却是一些懦弱无能、微不足道的庸人，如果日后有事烦劳他们，立刻会显出心虚胆怯；而对这种人却评价甚高，还期待他们在未来为人类服务时做出一番大事业来。一谈起其中某些人时，特别放低声音，异常恭敬……怎么回事？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比别林斯基更加热情的俄罗斯人，虽然在他之前也许只有一个恰达耶

① 指当时俄国先进思想界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兴趣。
② 路易·勃朗（1811—1882）、赖德律-洛兰（1807—1874），两人均为法国政治活动家，在 1848 年革命中均起过重要作用。

夫① 十分勇敢地、但有时也像他一样盲目地对咱们本土的东西表示愤慨，看样子是轻视俄国的一切吧。由于某些情况，我现在时常想起并考虑这一切。因此，谁知道，也许冯维辛这句话连别林斯基有时也会觉得并不那么肮脏。有时候甚至仪表堂堂的法定的监护人都并不十分招人喜欢。啊，千万别以为爱国就是把外国人大骂一通，也别以为我也这么想。我根本不这么想，也不打算这么想，而且恰好相反……只可惜我这回没有工夫作更加明白的解释。

我补充一点：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讲巴黎而谈起俄国文学来了？我是在写批评的文章吧？不。我这只不过是因为闲得无聊罢了。

根据我的笔记本的记载，我现在应该是坐在车厢里，准备明天到达埃德库宁②，即准备获得第一个外国的印象，甚至时不时还觉得心在突突地跳。我终于要看到欧洲了，我曾经思念它几近四十年之久而毫无结果，我从十六岁开始就非常认真地，像涅克拉索夫笔下的别洛普亚特金③ 一样，

想望奔赴瑞士，——

但是没有去成，而现在我终于要进入“神奇的国土”，进入我长期痛苦地期待着的国土、对它固执地坚持着我的信念

---

① 彼·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政论家。1836年在《望远镜》杂志发表《哲学书简》第一封，抨击农奴制度，遭到迫害，杂志也被查封。

② 普鲁士境内的一个小火车站，离俄国边境不远。

③ 见《饶舌者。彼得堡居民别洛普亚特金札记》一诗。

的国土了。在这个时刻，就在这节车厢里，我的头脑中有时闪过这样的想法："天哪，我们算是什么俄国人？我们是货真价实的俄国人吗？为什么欧洲对我们，不分男女老幼，保持着这样强大、神奇而富于号召力的影响呢？我现在不是说的那些留在本土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拥有五千万之众的俄国平民，我们这十万人时至今日对他们仍然高傲地不屑一顾，我们高明的讽刺杂志时至今日仍然嘲笑他们不刮胡子。不，我这里说的是我们拥有特权和专利的一小撮人。要知道我们身上的一切，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切，我们的一切进步、科学、艺术、文明、人道主义，一切，这一切都是从那里、从那些神奇的国土上来的！要知道我们的全部生活，从人之初以来，就是按照欧洲的方式构造的。难道我们有一个人能顶住这种影响、号召力和压力吗？我们怎么还没有重新投胎彻底做一个欧洲人呢？我们之没有重新投胎做人——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不过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显然不高兴，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重新投胎做人的程度。但这是另一回事了。我现在只谈这样一个事实，即甚至在外来的影响不可抗拒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重新投胎做人，这个事实我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并不是我们的奶妈和我们的亲娘护住我们不让重新投胎。以为没有普希金的奶妈阿里娜·罗吉奥诺夫娜，说不定我们就没有普希金，这是可悲而又可笑的。这是不是无稽之谈？难道不是无稽之谈吗？如果不是无稽之谈，又是什么？现在有许多俄国的儿童送到法国去受教育，那么，如果又出来一个什么普希金，也送到那里去，而那里却没有阿里娜·罗吉奥诺夫娜伴他，他在摇篮里也不开始说俄国话，那会怎么

样？那普希金就不是俄国人了！他是个少爷，却了解普加乔夫，深入他的内心世界，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他是个贵族，心里却容纳得下别尔金①。他凭借艺术的力量摆脱了他的环境，并通过奥涅金从民族精神的观点出发对他的环境作了伟大的批判。他真是先知，预言家。难道现实中有什么化学药剂可以把人的精神与故土黏合在一起，绝对无法分开，即使一时脱落，照旧会黏回去吗？要知道斯拉夫派实在不是从天上掉到我们这里来的，虽然它后来变成了莫斯科的一种游戏，但这种游戏的基础要比莫斯科的公式宽广得多，埋藏在某些人心里也许比初看起来要深入得多。而且在莫斯科人心中所占的位置也许比他们的公式要宽广得多。甚至为自己解说，最初也是很难说得明白的。有些生动而强有力的思想，过了三代都没有说清楚，有时候弄得结尾和开头完全不一样了……”我坐在车厢里，在进入欧洲之前，头脑中转的尽是这些不着边际的思想，连我自己也管不住。不过，其原因有一部分是无事可做觉得枯燥之故。我应当有什么说什么吧！在我们这里，至今只有闲得无聊的人才会有这些胡思乱想。枯坐在车厢里是多么乏味啊，就像住在咱们俄罗斯而又无事可干那么乏味一模一样。虽然在运送你，照顾你，有时甚至使得你昏昏欲睡，仿佛已别无所求，可仍然觉得枯燥乏味，其原因就在于你闲得无聊，在于对你照顾得太过分了，让你坐着，等待着，直到旅程结束。不错，有时真想从车厢里跳

---

① 普加乔夫是俄国十八世纪农民起义中的领袖，普希金曾著有《普加乔夫史》（1834），并把他写进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别尔金是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平民或小人物的形象。

窗而出，用自己的两只脚，挨着车厢向前跑。就让它出乱子，就算因为不习惯弄得筋疲力尽，困惫不堪，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总算用自己的脚走路了，总算找到事情干，并且我亲自动手干了。因此，如果车厢相撞，仰翻在地，我也不会被关在车厢里束手无策，由于别人的过失而受罪……

天知道有时由于闲得无聊会想出些什么来！

不过天色已黑，车厢里点上灯了。我对面坐着一对夫妇，年纪不小了，是地主，看来是好人。他们要赶到伦敦去参观博览会①，一共只有几天时间，把老小都留在家里了。我的右手边是个俄国人，他在伦敦一口气住了十年，在一个机关里办理商务，现在有事来彼得堡，只住了两个星期就回去，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怀恋故土的概念。左手坐的是土生土长的地道的英国人，一头棕发，按照英国的发式在头上分开，板着脸，十分严肃。他一路上没有同我们任何人用任何语言说过一个字，白天里一直在读一本用最小号的英文字母印成的小册子，这种字母只有英国人才能耐心读下去，也只有他们才称赞读起来方便；而一到晚上十点钟，他就立刻脱下靴子，换上便鞋。大概他一生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在车厢里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习惯。大家很快都打起瞌睡来；汽笛声和机器的撞击声催人欲睡，无法抗拒。我坐着，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就想到了本章开头的“法国人没有理性”这句话。你们知道吗，在我们前往巴黎途中，我老是想告诉你们我在车厢里的思考所得，那

---

① 指世界博览会，1862 年在伦敦举行。

么请你们发点慈悲之心读下去；因为我在车上太无聊，现在就让你们也无聊一下。不过别的读者应当除外，为此我有意把这些思考另外写成一章，称之为“多余的一章”。现在你们就来无聊它一下吧。其余的人，因为它是多余的，可以跳过去不读。对读者们应该慎重，讲点良心；而对朋友们么，就可以干脆一点。那么：

第三章

即完全多余的一章

不过这些东西不能算是思考，而是某种旁观所得，随心所欲的想象，乃至“不三不四，最终什么都不是”的幻想。第一，我进入古老的年代，首先想到了制作前面所引有关法国人理性问题的警句的那个人；正是因为这个警句才想起他，没有别的缘故。此人在当时是个大自由派，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一辈子都穿着法兰西长袍，使用香粉，背后挂一把短剑，以表示他的骑士出身（咱们这里根本没有这玩意儿），以便在波将金[①]的接待室里维护自己的尊严，可是一当他把鼻子伸出国门之外，立刻开始搬用圣经上的词句祈祷上帝让他远远避开巴黎，并且断言“法国人没有理性”，有理性反而是他们最大的不幸。说到这里，你们是不是认为我提出短剑和天鹅绒长袍是在贬损冯维辛呢？根本没有的事！他身上是不穿粗布短衫的。从前，现在也如此，当某些先生想要做个俄国人，并同人民打成一片的时

① 格·波将金（1739—1791）：俄国政治家，陆军元帅；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宠臣。——译者注

候，他们也不穿短衫，而发明一种舞蹈服装[①]，有点像俄罗斯民间歌剧中那个爱上头戴小帽、脑门上扎着抹额的柳德米拉、名叫乌斯拉德的小伙子出场时通常所穿的那样。不，至少法兰西长袍在那个时候更能够为老百姓所理解，他们说："看得出是位老爷，老爷是不穿短衫的。"不久前我听说现时有个地主，为了同人民打成一片，也开始穿俄罗斯的服装，并且时常以这身打扮去参加集会，农民远远看见他就交头接耳地说："这个人化了装到这里来干吗？"这个地主终究没有同农民打成一片。

"不，"另外一个先生同我说，"不，我可是寸步不退让的。我要故意把胡子剃掉，必要时把燕尾服也穿起来。事情我是要做的，但我不想在外表上装得和他们一模一样。我要当主人，我要精打细算，节俭度日，甚至应该贪得无厌、敲诈勒索的时候也不手软。他们就会更加尊敬我。而关键在于一开始就应当使他们真正尊敬我。"

"见你的鬼！"我想，"简直像准备去攻打异族似的。不折不扣的军事会议。"

"是啊，"第三个但是极为可爱的一位先生说，"万一有人把我归到哪个方面去，突然间在大会上由于什么事，根据村社的判决要打我多少鞭子，那可怎么办？"

"即使是这样，"我突然想说，可是因为胆怯没有说出口。"怎么回事，为什么直至今日有些想法我们有时候还不敢说？即使是这样，"我暗自想，"即使打你鞭子，又怎么

---

① 斯拉夫派中有人当时曾这样做，例如作家康·阿克萨科夫就穿上长靴、斜领衬衫，头戴十八世纪以前常戴的平顶帽，成为西欧派人士长期取笑的材料。

样？美学教授把事情的这种转折叫作人生的悲剧，如此而已。难道为了这件事就得与世隔绝吗？不，如果要和大家合在一起，那就完全打成一片；如果要单独过，就彻底独来独往。在别的地方，不但要作出判决，甚至软弱的女人和孩子都会这样提。”

“对不起，这里跟女人孩子没有关系！”我的对手向我吼叫道，“村社也许不为这不为那，单单为了一头奶牛钻进别人的菜园子而抽他一顿鞭子。这种事在你们那里是普遍得很。”

“是啊，这种事当然是可笑的，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笑，不干不净，我不想弄脏自己的手。甚至提起它来都觉得不光彩。滚他们的吧，让他们统统去挨鞭子，别打着我就行。我这方面倒是想为村社的判决作点保证的：我那位可爱的论争对手肯定一鞭也不会挨着，即使按照村社的判决可能对他下手时：‘乡亲们，罚他几个钱吧，因为他是上等人的问题，没有这个习惯。咱们这些人的屁股是专门挨鞭子的。’村社就会用谢德林①《外省散记》里一个村长的话作出决定……”

有人读到这里，会大喊道：“反动观点！居然主张使用鞭子！”（天哪，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我是主张用鞭子。）

“对不起，您扯到哪儿去了。”另外有人说。“您想谈巴黎，却扯到鞭子上去了。巴黎在哪里呢？”

“是呀，这是怎么回事，”第三个人补充了一句，“这些

---

① 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作家。著有特写集《外省散记》（1856）等。

事您亲笔写着说是前一阵子听来的，可是旅行是在夏天。那时您坐在车厢里怎么能想这些事呢？”

“您提出的确实是个问题，”我回答说，“不过请您原谅，这是冬天回忆夏天的印象。所以冬天的印象也掺和到冬天的回忆里去了。同时，在前往埃德库宁的路上，我记得我特别认真地思考了咱们俄国的事，那是因为要去欧洲而被我丢在脑后的；还记得我的一些幻想也有这种性质。我思考的问题是：欧洲在各个不同时期是怎样影响我们的？是怎样利用它的文明坚持不懈地侵入我国，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文明？至今为止我们有多少人完成了接受文明的过程？现在我明白，这些问题好像完全是多余的。我事先也告诉过你们，整个这一章就是多余的一章。但是，我说到哪里了？噢！说到法兰西长袍。是从这里说开了嘴的！”

那么是这样，穿法兰西长袍的人里面有一位在那时候写了一部《旅长》。《旅长》在当时是一部人人称奇的作品，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德尼斯[1]，你可以死了，你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东西了，”——波将金亲口这样说。大家似乎在睡梦中被惊动了。“怎么，莫非那个时候，”我继续听任我的旁观者的胡思乱想发展下去，“人们就已经因为无所事事并且套着别人的吊裤带而感到厌烦了吗？”我讲的不只是那时的法国吊裤带；并且顺便想补充一句，我们是个特别容易轻信的民族，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的心地太善良而造成

① 即冯维辛，他于1769年写成喜剧《旅长》。但据为冯维辛写传记的诗人彼·维亚泽姆斯基称，这句话是波将金于1782年观看了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的首场演出后说的。

的。比方说，我们坐着没有事干，忽然觉得似乎有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闻到了咱们自己的气味，听说找到了事干，于是大家就冲动起来，坚信马上就要动手了。飞过去一只苍蝇，我们就以为牵来了一头大象。幼稚无知，加上饥不择食，这种现象几乎在《旅长》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当然，那时候还不易觉察，因而一直顽强地持续到现在：找到事情，就高兴得大叫；叫过以后，又高兴得口出狂言——这是咱们的头等大事；瞧着吧，过不了两年，一个个垂头丧气，四散而去。但是我们并不气馁，哪怕失败一百次也要重新再来。至于别的吊裤带，在冯维辛时代，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怀疑那是最神圣的货真价实的欧洲吊裤带和最可爱的监护人。当然，即使是现在，也没有多少人怀疑。我们这里所有极端激进的人，拥护外国的吊裤带已到了狂热的程度。可是那时候，啊，那时候对无论什么样的吊裤带都深信不疑，使人感到奇怪，为什么那时我们没有去移山倒海，竟然让咱们的这些阿拉翁台地、帕尔戈洛夫山峰、瓦尔达伊山峰①仍然留在原地。不错，那时有一位诗人在歌颂一位英雄时曾经写道：

他躺上高山，高山开裂②

还有：

他只手托塔，抛上云霄

---

① 彼得堡周围以及与莫斯科之间的地名。——译者注

② 指杰尔查文写的《为罗姆尼克河伯爵苏沃洛夫1794年大捷献呈叶卡捷林娜二世之颂歌》一诗，但引文与原诗稍有不同。

可是，这看来只是一种隐喻而已。这里要说一说，先生们，现在我只是谈文学，而且只是谈高雅文学。我想从文学方面探寻欧洲对咱们国家所产生的渐进的良好影响，即那时候（《旅长》出版之前及出版之时）出版的和流行的都是些什么作品，想起这些情况，我们是不能不怀着几分高兴的心情引为骄傲的！现在咱们这里有一位作家，极为出众，是我们时代的光荣，他就是叫作科齐玛·普鲁特科夫的那一位。他的唯一缺点就是谦虚得不可思议，至今为止还不肯印行他的作品全集。你们看，很久以前，有一次他在《现代人》杂志的“杂记”栏中发表一篇《家祖父的回忆》。你们想一想，这位见多识广、出席过宫廷招待会并在奥恰科夫城下打过仗[①]、回到自己的领地上来开始写回忆录的胖胖的年已七旬的叶卡捷林娜时代的老大爷，那时候能回忆些什么来吧。那回忆一定是很有趣的。这个人什么事没有见过！看吧，他写的全是下面的这些趣闻：

> 德·蒙巴宗骑士应对有方[②]　从前，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当着国王的面向蒙巴宗骑士冷冷地问道：“先生，是狗吊在尾巴上，还是尾巴吊在狗上？”这位善于巧妙应对的骑士毫不慌张，反而用镇定的语调回答道：“小姐，无论什么人，抓狗的尾巴，同抓它的头一样，都是可以的。”他的回答使国王异常满意，骑士因此得到了奖赏。

---

① 奥恰科夫是乌克兰境内一小城，十六世纪以来为土耳其所占。1788年俄土战争中被波将金指挥的俄军包围并夺取。——译者注

② 普鲁特科夫的原题是：《哪个吊在哪个上面》。

你们以为这是吹牛，无稽之谈，世上绝没有这样的老大爷。但是我向你们起誓，我小时候，十岁那一年，曾经读过叶卡捷林娜时代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也有下面的一个趣闻。那时我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因为它使我着迷——至今还没有忘记：

> 德·罗昂骑士巧于应对　　大家都知道德·罗昂骑士口臭得厉害。有一天德·孔德王子一觉醒来，发现他随侍在身边，就说："德·罗昂骑士，请您回避吧，因为您身上臭得厉害。"这位骑士随口回答说："无上仁慈的王子，不是我身上臭，是您身上臭，因为您刚从床上起来。"①

你们只要设想一下，有这么一个地主，当过多年兵，也许丢掉一条胳膊，身边有地主婆陪着，有百来个仆人，有米特罗方那样的孩子住在一起，每逢星期六进澡堂，在蒸气里熏得昏头昏脑的；瞧他鼻梁上架一副眼镜，像煞有介事地在那里逐字逐句地读这一类趣闻，并且把它当成根本大事，差一点把它当成他应尽的职责了。那个时候认为阅读这一类欧洲的新闻是合理而必要的，这种观念是多么天真啊。他们说："知道了德·罗昂骑士口臭得厉害"……谁知道？知道了有什么用？坦波夫省里面哪些傻大个知道这种事？又有什么人想知道这种事？然而这一类具有自由思想性质的问题，没有引起这位老大爷的警觉，他怀着天真幼稚的信念，认为这种《妙语大全》在宫廷里是尽人皆知，

---

① 此处所述系德·罗克洛公爵（1617—1676）的轶事，陀斯妥耶夫斯基误为德·罗昂（1579—1638）。

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当然，那时候我们是很容易想到欧洲的，无疑，那是在物质方面。至于精神方面，当然，没有皮鞭是不行的。套上丝袜，戴上假发，挂上短剑——就是个欧洲人了。这一切不但不碍事，而且还讨人喜欢。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照旧把德·罗昂骑士放在一边（对他的了解只不过是口臭得厉害而已），摘下眼镜，把奴仆狠狠收拾一顿；照旧对家里人摆出家长的架子，照旧把土地少而敢出言不逊的邻居吊在马厩里打个半死；照旧在达官贵人面前卑躬屈节。连庄稼汉都比他明白，如果对他们放尊重一些，对他们的习惯少挑剔一些，多了解他们一些，他们就会更多地把他当作自己人，不把他看成德国人。至于在他们面前摆架子——因为老爷不摆架子，那还当什么老爷呢。即使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老百姓仍然觉得似乎比新式的老爷可爱一些，因为更像是自己人。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老爷都是普通的身材粗壮的人，他们不会去问清底细，拿呀，打呀，偷呀，把你压得弯腰驼背，还会表现出同情的样子，然后“在诚心诚意而幼稚无知的腐败之中”度过他的宁静而富裕的一生。我甚至觉得所有这些老祖父，即使在对待德·罗昂和蒙巴宗之类骑士方面，也绝对不是那么单纯的。

也许他们有时表现为非常狡猾的骗子，而且对待那时候自上至下所散布的欧洲的影响是另有算计的。整个这种奇妙的梦境，整个这种化装舞会，这些法国式长袍，活动套袖，假发，短剑，所有这些套着丝袜的粗壮而笨拙的小腿，这些戴着德国假发、裹着德国绑腿的当年的小兵，所有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可怕的骗局，是自下而上奴颜婢膝

的摇尾乞怜的吹嘘，连老百姓有时也能觉察，也能明白。自然，作为一个书吏，一个骗子，一个旅长，同时却非常天真地而且非常感动地深信德·罗昂骑士是"登峰造极"①的人物，也是可能的。不过这并不碍事，格沃兹季洛夫②之流照旧打人，我们的波将金以及他的每个同僚几乎都把我们的德·罗昂们吊在马厩里打得血肉横飞，蒙巴宗们则不顾死活地横征暴敛，伸出套袖里的拳头往后脑打，用穿着丝袜的脚往脊梁上踢，而侯爵们在宫廷招待会上常常假装跌倒在地，

不惜牺牲后脑勺③。

总而言之，整个欧洲，民间和官方定做的欧洲，那时候从彼得堡开始，即从这个拥有地球上所有城市之中最富于幻想的历史的、最富于幻想的城市开始，在我们这里处得很舒服，出奇地协调。

不过今非昔比，彼得堡也得另眼相看了。现在我们已完全是欧洲人，长大成人了。现在格沃兹季洛夫需要打人的时候，也变得老练了，会保持体面，成了法国的资产者；而再过一阵子，就会像南方各州的美国人一样，开始引用法律条文为黑人买卖的必要性进行辩护了。不过，引用法律条文进行辩护，现在也已从美国各州风靡到了欧洲。所以我想要到那边去亲眼看一看。书本里绝对学习不到亲眼

① 语出《死魂灵》第四章，鲁迅译为"尽纤细之极致"，那是指女人的手，意为完美之至。——译者注
② 冯维辛的剧本《旅长》中的人物。——译者注
③ 此句出自格里鲍耶陀夫的剧本《智慧的痛苦》第二幕第二场恰茨基语。

看到的东西。说到这里，我要谈谈格沃兹季洛夫。为什么冯维辛不让喜剧中那个代表高尚的、人道主义的欧洲发展水平的索菲娅说出他的剧本《旅长》里一段最精辟的话，而让愚昧无知的旅长太太来说呢？他把她写成一个愚昧的女人；还不是一般的愚昧，而是愚昧到了极点，变得反动，以致什么话都说得十分透彻。她说的所有蠢话，都好像不是她说的，而是隐藏在她背后的另外有个什么人说的。可是当需要说出真情的时候，仍然不找索菲娅，还是叫旅长太太来说，因为他不但把她写成个十足的愚昧无知，甚至把她写成了坏女人。要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的索菲娅说出这些话，他似乎仍然觉得害怕，甚至认为在艺术上是不可能的；而由一个普通的愚蠢的女人来说，他认为似乎更自然一些。下面就是这段话，值得回味。正因为这段话写来似乎毫无任何用意和弦外之音，天真无邪，也许还是一种闲笔，就显得格外有趣。旅长太太对索菲娅说：

……我们团里面一连有个上尉，叫作格沃兹季洛夫。他的太太是个相当相当年轻的女子。他有时为了什么事情生气，大多是喝醉了酒的缘故。我的妈呀，你信吗，他打人呢，打她呀，常常打得死去活来，也不说为了什么。我们嘛，本来没有我们的事，但瞧着她那样子，你就要掉眼泪。

索菲娅　太太，请您别再说这种叫人生气的事了。

旅长太太　妈呀，瞧你这种事连听都不想听，那上尉太太怎么能受得住呢？①

① 见《旅长》第四幕第二场。此处着重号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加。

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索菲娅以她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感情在一个普通的女人面前显得畏缩不前了。这是冯维辛所作的令人惊奇的回答（也就是反驳），他笔下没有比这写得更加准确、更加人道、也更加……无意的了。在我们先进的活动家之中，至今还有多少这样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他们对于自己长于温室之中非常之满意，此外别无所求。可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格沃兹季洛夫至今仍然在痛打他的上尉太太，而且比以前感到更惬意。不错，确实如此。据说以前干这种事还更加诚心诚意呢！说是我爱她，就得揍她。据说，当妻子的不挨打，她们心里还会起疑；不打她，就是不喜欢她了。但是这总是原始的、自发的、祖传的东西。现在连这种东西也有了发展了。现在连格沃兹季洛夫打人几乎都是有原则作为根据的，而且这样做是因为他还有点犯傻，就是说他没有跟上时代，不懂得新规矩。按照新规矩，不用拳打脚踢是可以更好地对付的。我现在之所以大谈格沃兹季洛夫，是因为至今为止有不少极其深刻又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文章在议论他，其数量之多，已惹得读者厌烦了。尽管有这许多文章，格沃兹季洛夫在我们这里活得好好的，甚至会长命百岁的样子。是的，他活着，身体健康，酒足饭饱。他现在失去了一只手一只脚，像戈贝金大尉[①]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洒了热血的”。他的太太早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相当相当年轻的女子”了。她老了，脸色憔悴，苍白，脸上刻满皱纹和痛苦的痕迹。但是当她的丈夫即上尉卧病在床，没有手，她守在床边寸步

①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

不离，夜夜不合眼地坐到天明，安慰他，为他伤心流泪，把他叫作心上的好汉，雄鹰，赞美他是勇敢的军人。从一个方面来说，这种事是会让人感到气愤的。去气愤吧，气愤吧！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俄罗斯妇女确实伟大，在咱们俄国土地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她们那无限宽容的爱更加美好。就是这样，难道不对吗？尤其是格沃兹季洛夫现在处于清醒状态，有时不打老婆，就是说，打的次数减少了，他保持着体面，甚至有时还用好言好语同她说话。他到了年老的时候感觉到没有她是不行的；他成了资产者，会算计；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打了她，总归是喝醉了酒，或者手痒难耐，使他非常烦躁之故。嘿，无论怎么说，这是一种进步，聊可告慰。我们总是喜欢得到安慰的……

是的，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安慰自己，自己安慰自己。虽然我们周围的一切还不是那么美妙，但我们本身已经是这样如花似锦，这样文明开化，这样像欧洲人，甚至老百姓一看见我们就觉得恶心。老百姓现在已经完全把我们当作外国人，对我们说的任何一句话，写的任何一本书，表达的任何一个思想，都不理解，——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一个进步。现在我们轻视老百姓和老百姓的原则到了这样深重的程度，甚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厌恶情绪对待他们，即使是在咱们的蒙巴宗和德·罗昂时代也决计没有这种情绪。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无论我们现在多么自信地认为我们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居高临下地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是这样的一些问题：缺乏根基，没有人

民；民族性只是一种捐税制度；灵魂是一张白纸[1]，是一块蜡[2]，可以随时拿来捏成一个真的人，全世界共同的人，或者炼丹术士曲颈瓶里的小精灵——只要运用欧洲文明的成果，并且读它两三本小册子就行了。我们现在又多么平静，平静得出奇，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一切都解决了，都签字画押了。由于这种平静而感到洋洋自得，我们就把，比如说，屠格涅夫拿来痛骂一顿[3]，说他胆敢破坏大家的平静，对我们完美的个性表示不满，拒绝把它当作自己的典范，而去寻求比我们更好的什么玩意儿。老天爷可怜可怜吧，比我们更好的玩意儿！天底下还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更加完美无缺的呢？瞧，他还为了巴札罗夫，那个虽然一身都是虚无主义但并不安分守己、多愁善感的巴札罗夫（伟大的心灵的象征）吃了点苦头。我们甚至还痛骂他写了个库克希娜[4]，这是屠格涅夫从俄罗斯现实的头上梳出来拿给我们看的一只进步的虱子，并且还加上一条罪状——他反对妇女解放。不管怎么样，这些总都是进步吧！现在我们以一种小班长的骄横跋扈，像一身文明的事务长那样骑在老百姓的头上，真够好看的：双手插腰，两眼喷火，威风凛凛，——我们这样站着，不时吐出几个字："民族性，人民性，实际上只不过是反动和分摊税款而已，岂有他哉。乡巴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向你学习什么！"老天保

---

① 英国经验论哲学家约翰·洛克的用语。
② 亚里士多德的比喻。——译者注
③ 作家马·安东诺维奇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屠格涅夫利用《父与子》诽谤青年一代。
④ 巴札罗夫和库克希娜都是《父与子》中的人物。

佑，别滑到偏见的泥坑里去！哎呀，我的天啊，现在正好……先生们，我们暂且假设我已经出游归来，回到了俄罗斯。请允许我说一件有趣的事。今年秋天，有一次我读到一张最进步的报纸，看到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标题是“野蛮时代的遗风犹存”(或者是类似的字眼，非常激烈，可惜现在手边没有这张报纸)。事情说的是今年秋天，有个早晨，莫斯科街上停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媒婆，身上披着彩带，嘴里唱着歌。马车夫身上也结着彩带，也喝得大醉，也在嘟嘟囔囔地唱着歌呢！甚至那匹马也披上了彩带，只不过不知道它喝醉没有？大概也喝醉了。媒婆手里拿着一个包袱，那是她从显然度过了幸福的一夜的新婚夫妇那里拿来给人看的。这里面不用说放的是几件贴身的小衣，按照民间的习俗，通常是在第二天要送给新娘的父母过目。人们看着媒婆都笑了：简直像淘气的孩子。这份报纸在报道这件事时盛气凌人地痛斥：“甚至到了今天，在普遍的文明进步的时日，我们还保留着这种前所未闻的野蛮时代的遗风！”先生们，我向你们坦白，我着实笑痛了肚子。啊，请别以为我是在为原始的人吃人以及小衣、被单等等辩护。这些东西是丑恶的，不洁净的，野蛮的，是斯拉夫式的，我明白，我同意；虽然做出这种事显然并无恶意，相反，其目的在于庆贺新婚之喜，一片至诚，不知道有更好的更高明的欧洲的方式。不，我笑的是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我忽然想起了我们的太太小姐和我们的时装店。当然，文明的女士现在已经不把小衣送去给父母过目了，可是，比方说，当她们需要向裁缝定做衣服的时候，却那么有分寸，那么老练，考虑得那么细致，在漂亮的欧

洲式的服装的某些部位塞上棉花!干什么要塞上棉花呢?自然，是为了优雅，美观，为了表现……而且她们的女孩儿，刚离开寄宿学校的天真纯朴的十七岁的小姑娘，连她们也知道棉花，什么都知道：棉花做什么用，在哪些地方、哪些部位使用棉花，为什么使用棉花即目的何在……我笑着想，这算什么，有这些操劳，费这些心思，在开拓棉花的用途方面自觉地费这些心思，比起被怀着一片至诚送去给父母过目、深思这样做才必要才合乎礼仪的倒霉的小衣来，总是更加干净、更加合乎道德、更加纯洁，是这样吧！……

朋友们，看上帝份上，请不要以为我现在突然想要滔滔不绝地来论证文明并不是进步，相反，欧洲近来常常用皮鞭和牢狱来对付任何一种进步！请不要以为我想来证明在咱们这里把文明和正常的真正的发展规律粗暴地混为一谈，证明文明在西方也早已受到了谴责，那里只有私有者(虽然那边所有的人都是私有者或者希望成为私有者)才赞成文明，其目的在于维护他们的钱财。请不要以为我想来证明人的灵魂不是白纸，不是用来捏成共同的人的一块蜡；证明首先需要的是自然，其次是科学，然后是独立的、有根基的、不受拘束的生活，以及对本民族的力量的信心。请不要以为我会向你们说好像我不知道咱们的进步人士（虽然绝不是全部）根本不赞成棉花，并且像痛斥小衣那样地痛斥它。不，我现在只想说一件事，即那篇文章指责并痛骂小衣并非没有用意的，并非简单地说这种做法是野蛮，而是明显地在揭露民间的、民族的、自然形成的野蛮，以与我们上等的、高尚的社会中欧洲的文明作对比。文章是在装腔作势，它好像不愿意了解我们只不过是把一种偏见和

陋习换成另一种更深的偏见更恶劣的陋习而已，而进行这一揭露的人本身也许更要卑鄙和恶劣一百倍。文章好像也没有发觉我们本身所存在的偏见和陋习似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两手插腰，口出狂言，威风凛凛地骑在人民头上啊！……要知道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相信自己有权利作这种揭露，是可笑的，极其可笑的。这种自信或者是干脆对老百姓耀武扬威，或者最终就是对于各种形式的欧洲文明作盲目的奴颜婢膝的崇拜。这些就更加可笑。

说什么呢！这种事每天会遇到上千件。请原谅讲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不过，我有错误。我可是有错误的！这因为我从老爷爷直接跳到了孙女一辈，未免太快了。中间有一段空白。请你们回想一下恰茨基。他不是单纯狡猾的爷爷，也不是威风凛凛得意洋洋地站在人前能主宰一切的后代。恰茨基是咱们俄罗斯欧洲的完全特殊的典型。他是一个可爱的热情的典型，他忍受着痛苦，并且呼吁面向俄罗斯面向本土，而在必须寻求

为受凌辱的感情安排个角落① ……

的时候，又照旧向欧洲走去了。总而言之，是一个在当前毫无价值而在过去某个时候却是大有用处的典型。这是个好空谈而不干实事的人，但是诚心诚意地空谈，诚心诚意地为自己的没有价值而发愁。现在他在新的一代中再生了，而我们是相信年轻的力量的，我们相信他不久会重新出场，

---

① 语出《智慧的痛苦》第四幕第十四场。恰茨基及以下提到的法穆索夫都是此剧的人物。前者是倾向进步的贵族子弟，后者是莫斯科的官僚。

但已不是那个在法穆索夫家的舞会上歇斯底里发作的人，而是一个骄傲、强大、温和而又充满爱心的胜利者。此外，到那时候他会认识到，为受凌辱的感情所安排的角落不是在欧洲，说不定就在鼻子底下；他会找到事情，并且动手干起来。你们知道吗，我相信现在咱们这里并非清一色的都是满身文明的事务长和欧化的骄横跋扈的家伙；我相信、我认定后起之秀已经出现……但这问题以后再谈。我想就恰茨基多说两句。我有一点不明白：恰茨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找不到事情干？这样的人都找不到事情，已经接连两三代没有找到了。这是事实，无视事实似乎没有置喙之地，但由于好奇提出问题是可以的。因此，一个聪明人竟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找不到事情做，我就大惑不解了。据说这一点是有争论的，但在思想深处我绝对无法相信①。既然聪明，就会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如果是在向着目标前进，不走几里地，哪怕只走一百步，也是好的，总算是在向目标靠近。而如果一定想要一步登天，那么我以为这根本不叫做聪明。这简直可以叫作坐享其成。我们既不爱劳动，又不习惯一步一步地走，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步登天，或者立地跻身于英雄雷古卢斯②之列了。可是这些都是坐享其成的想法。但恰茨基作得很漂亮，那时候他又偷偷地溜到国外去了——不过只要稍微

① 作者在此处反驳赫尔岑的观点。后者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在尼古拉一世反动时期，有两种人，一是“多余的人”，一是无事可干的人，必须加以区别。

② 公元前三世纪时古罗马统帅，曾击败迦太基的舰队，并率兵登陆非洲。后被俘，英勇不屈而死。

耽搁一会，他就不是往西，而是往东走了①。咱们这里都喜欢西方，喜欢，在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之际，大家都往那边跑。于是我也到那里去了。“我可是另外一回事。”我在那边见到了所有的人，就是说，非常之多，你数也数不过来，他们所有人似乎都在为受凌辱的感情寻求一个角落。至少是在寻求某种东西。恰茨基那一代人不分男女，在法穆索夫家的舞会结束之后，或者一般地说当舞会结束之际，他们就大批地涌到那边去了，像海滩上的沙子那样多；还不只是恰茨基的一代人，莫斯科那些人全涌向那里。这时候那里有多少列彼季洛夫，有多少斯卡洛祖勃，他们已经退休，不中用了，被打发去与温泉相伴度日。纳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同她的丈夫是那边必不可少的角色。甚至赫列斯托娃伯爵夫人②每年也必定往那里去。所有这些先生连莫斯科都感到厌倦了。只有一个莫尔恰林不在，他另有安排，留在家里，他独自留在家里。他献身于国家，也就是说献身于祖国……现在你不容易见到他，现在连法穆索夫都不让进他的前厅了，说是：“乡下来的邻居，在城里不必同他们多礼。”他忙于事务，找到了事做。他在彼得堡，并且……并且得志了。“他知道俄罗斯，俄罗斯也知道他。”③是啊，他是会被牢牢记住，永久不忘的。现在他甚至打破沉默，与以前相反，只见他一个人在说话。他是权威了……他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说起他们这些人都在欧洲

① 暗示恰茨基可能与十二月党人一同被流放西伯利亚。

② 此处提到的都是《智慧的痛苦》一剧中的人物。下文的莫尔恰林也同，他是以阿谀奉承而飞黄腾达的典型。

③ 语出尼·波列伏依为长篇小说《临终的盟誓》（1832）写的自序。

寻找快乐的角落，而且我的确想过他们在那里要好得多。不过他们竟然这样愁容满面……可怜的人啊！他们经常有一种不安，有一种病态的愁苦的表情，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他们全都拿着导游手册在跑来跑去，到了每个城市都如饥似渴地奔去参观稀世之宝，不错，简直像在履行职责，简直像在继续办他们的公务：凡是有三扇窗子的宫殿，只要导游手册上有记载的，一个也不放过；任何一所市长官邸，哪怕同莫斯科或彼得堡的普通民居一模一样，也决不放过。他们随便看一眼鲁本斯[1]画的牛肉就相信那是古罗马的三女神[2]，因为导游手册上是教你这样相信的。他们又向《西斯廷圣母》[3]奔去，在它面前呆若木鸡地期待着，似乎很快就有什么新鲜的事发生，有个什么人会从地板底下钻出来，驱除他们的无名的烦恼和疲劳。结果他们疑惑不解地离开了，因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与英国来的男女旅客那种自得其乐的完全是刻板的好奇心不同，他们不大留意稀世之宝，大多在查看手上的导游手册，无论是什么新奇的事概无兴趣，只是对照着核对导游手册上的说明是否准确，实物是否有多少英尺高或多少磅重？不，我们所有的却是一种粗俗的、急躁的、如饥似渴的好奇心，而且事先心中早已认定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什么新鲜的事发生，在第一只苍蝇飞来之前就明白了；苍蝇飞过去了，就是说，马上又开始……现在我这只是在说聪明人。至于别的人，用不着操

---

① 彼·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② 指美丽、优雅、欢乐三女神。

③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所作名画，收藏于德国德累斯顿市塞姆佩尔美术馆。

心，他们时刻有上帝保佑。这里也不涉及在那边永久定居，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并且开始接受天主教神甫传道的人。不过关于这一大批人，只能说这样两句话：只要咱们大家一旦越过埃德库宁，立刻会变得同流落在街头那不幸的丧家的小犬一模一样。你们也许认为我以嘲弄的笔调写这两句话是在责备什么人，“在目前，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居然跑到国外去！正在提农民的问题，你们却往国外跑！”如此等等。啊，绝对没有的事。我算是什么人，我敢责备吗？凭什么责备，责备谁？“我们很高兴做事，可是无事可做；即使有事，没有我们也在做了。位置都已坐满，看不到会有空缺。愿意插上一手，但是人家不欢迎。”这样一推托就完了。这种推托之辞我们早已听惯了。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到哪儿去了？我怎么能在国外见到俄国人？我们还没有到达埃德库宁呢……什么，已经过去了？真的，连柏林、德累斯顿、科隆，统统都过去了。不错，我一直坐在车厢里，我们前面不是埃德库宁，而是阿克林，我们就要进入法兰西了。巴黎，巴黎，我本想谈谈巴黎，却把巴黎忘在脑后了！关于咱们俄罗斯的欧洲思考得太多，当你亲身来到欧洲的欧洲作客的时候，这是一件很抱歉的事。不过何必过多地请求原谅呢，我这一章本来就是多余的。

第四章

对旅客并非多余的一章

真的“法国人没有理性”吗？

最终的解答

但是，慢着，为什么法国人没有理性？我一边打量着

刚刚走进我们车厢的四位新来的旅客，法国人，一边问着自己。这四位是我在他们的国土上最先见到的法国人，如果不把阿克林海关上的关员计算在内的话，我们是刚从那里开过来的。关员都显得特别谦恭有礼，办事非常利索，我走进车厢时对于这跨入法兰西的第一步非常之满意。在抵达阿克林之前，我们的设有八个位置的包厢只坐了两个人，即我和一个瑞士人，一个朴实的中年人，和他聊天非常愉快，我同他已经滔滔不绝地谈了两个钟头了。现在坐的是六个人，使我奇怪的是我那位瑞士人在新来的四个旅客面前突然变得十分不愿意说话，我曾经想同他继续把先前没有说完的话说下去，可是他赶紧阻止我，搪塞几句，便冷漠地、甚至有点烦躁地转身向着窗外去欣赏风景；过了一分钟，又掏出德文的导游手册，全神贯注地读起来了。我当即也不理睬他，默默地看着新来的旅伴。这几个人是有点奇怪，出门旅行不带行李，根本不像走远路的人。没有大包小包，甚至也不带衣服，没有一点出门的样子。他们都穿着轻便的紧身短大衣，破旧肮脏，一塌糊涂，只稍为比咱们军官的勤务兵或者乡下土财主家的仆役穿得好一些。他们的衬衣也很脏，领带的颜色很鲜艳，可是也非常邋遢。其中有一个还缠着一小段断掉的丝巾，使用它的人因为长期围着它，历时十五年与脖子的接触，已经积下了重达一磅的脂肪。缠着它的这一位身上还有几颗核桃般大小的仿钻石的纽扣。不过他们都显得非常潇洒，甚至虎虎有生气。这四位好像都是相同的年纪，三十四五的样子；虽然相貌各有不同，但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面容憔悴，颏下留着一撮千篇一律的法国式胡子，彼此也没有差别。看

得出来这些人闯过刀山火海，脸上终年带着虽然是不满的但是老练的神色。我也觉察到他们彼此都很熟识，但不记得他们相互之间说过一个字没有。他们对于我们，即我和那个瑞士人，似乎不愿意瞧上一眼，漫不经心地吹几声口哨，随随便便地坐在座位上，冷淡地但是目不转睛地向车窗外面望着。我点了一根烟，闲坐无事，便仔细观察他们。我确实想过一个问题：这几个到底是什么人？工人不像工人，资本家不像资本家，莫非是退伍军人，领一半的薪水，或者类似的这种人？不过我并不怎么太在意。十分钟之后，我们刚开进下一个车站，他们四人立刻接连奔出车厢，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我们又启动了。这一路几乎没有人在车站等候，少则两分钟，多则三分钟，又继续往前开。车子走得很不错，也就是说，非常之快速。

当车厢里又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瑞士人立刻啪的一声合上他的导游手册，丢在一边，得意地看着我，显出十分愿意再继续同我聊天的样子。

“这几位先生坐的时间不长呀。”我开口说，不解地望着他。

“他们本来就只坐一站。”

“您认识他们吗？”

“他们吗？……他们可是警察……”

“怎么？怎么是警察？”我问，吃了一惊。

“就是……我刚才一下子就看出您没有识破他们。”

“这……不就是密探吗？”（我始终不愿意相信。）

“一点不错；为了我们才坐到这里来的。”

“您未必连这个也知道吧？”

“啊，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我这条路已经跑了好几趟了。在海关上查验护照的时候，就把我们指给他们看了，把我们的名字还有别的什么都通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上了车，陪着我们走了一趟。”

“不过既然他们已经看见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陪一程？您不是说过，在上一站就已经把我们指给他们看了？”

“一点不错，把我们的名字也通知了他们。可是还不够，现在他们对我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面貌，衣着，提包，总而言之，您的全部特征。连您衣服上的纽扣都记下了。您刚才掏出一只香烟盒，连这只香烟盒也注意到了。您知道，任何一个细节，特点，就是说，他们要注意尽量多的特点。您在巴黎说不定会躲起来，改名换姓（就是说，假如您是个可疑分子的话），那么，这些细节就会有助于进行搜寻。所有这些东西在上一站早已经及时打电报通知了巴黎。巴黎有那么个地方保存这些东西以备万一。而且各个旅馆的老板都必须报告外国旅客的全部情况，一个细节都不许漏掉。”

“但是他们为什么来这么多人？他们来了四个啊。”我继续问他，一直感到有点困惑不解。

“噢，他们在这里人数是非常多的。可能这一趟车外国人比较少，要是外国人多，他们会分散到每一节车厢去的。”

“不对，他们根本没有瞧我们一眼。他们眼睛老看着窗外。”

“哎呀，您别替他们发愁，全看清楚了……专冲着我们来的。”

“好哇，好哇，”我想，“‘法国人没有理性’原来是这么回事，”并且（我惭愧地承认）不信任地横了瑞士人一眼，“老兄，连你也不怎么样，只不过更加善于装扮罢了。”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但只是闪了一下，请你们相信。毫无道理，却叫我怎么办呢，不由自主地这样想……

瑞士人并没有欺骗我。在我投宿的那家旅馆里，毫不迟延地把我所有细小的特征都登记了下来，向应当报告的地方报告上去。在登记你的特征时，把你观察得那样准确，那样细致入微，由此可以推断你在旅馆里今后的生活，也就是说，你今后的每一步脚印，都会受到精密的观测和计算。不过我最初住的旅馆倒没有怎么找我的麻烦，而且是在暗地里把我的情况登记上的，自然，除了登记簿上必须有的项目向你提出问题而你必须把你的回答填入登记簿之外，例如姓名，职业，从何处来，事由，诸如此类。但在去了伦敦八天之后回来，原先的贝壳旅馆全部客满而改住第二家旅馆的时候，对我的态度就直率多了。这家旅馆叫作帝皇旅馆，无论在哪一方面，总的来说似乎是相当保守的。老板和老板娘的的确确是极好的人，非常客气。两夫妇都已过了中年，对旅客显得格外殷勤。我登门的这一天傍晚，老板娘在前堂里拦住了我，请我进到账房间里去。她的丈夫也在，可是管事的显然是老板娘。

“对不起，”她非常客气地开始说，“我们需要登记您的情况。”

“可是我已经告诉您了……我的护照在你们这儿。”

“是的。不过……您的社会地位是？”

这个所谓"社会地位"是非常复杂的东西，随便到哪儿去都不招我喜欢。在这里该怎么写呢？旅客吗，太抽象了；文学家吗，谁都瞧它不起。

"我们最好把它写成私有者，您的意见怎么样？"老板娘问我。

"这样写最好不过了。"

"是的，这样写是最好的。"她的丈夫附和说。

"写上了。现在是：您来巴黎的原因？"

"我是旅客，路过。"

"嗯，是的，为了看看巴黎。对不起，先生：您的身量？"

"身量是怎么回事？"

"您的身材有多高？"

"您看，中等个儿。"

"是这样，先生……不过想知道得更详细些……我想，我想……"她有点难以往下说，拿眼睛看着丈夫，让他开口。

"我想，到底有多高。"丈夫断然说，用目光测量我的身高合多少公尺。

"你们干吗要这个数字？"我问。

"啊，这是很必要的啰。"老板娘回答了一句，亲热地把"很必要"三字的声调拖得很长，照样把我的身高登记上了。"现在，先生，您的头发？淡黄色，嗯……颜色相当浅……平直……"

她把头发也登记了。

"对不起，先生，"她放下笔，从椅子上起来走到我身

边，显得非常亲热地继续说，“请您过来，走两步，到窗子这边来。需要看清楚您眼睛的颜色。嗯，浅色……”

她又转过眼睛去看她丈夫，让他发表意见。这两位显然是非常相亲相爱的。

“应该是灰色，”丈夫说，装出一副特别认真甚至严重的神气，“这儿，”他向妻子使了个眼色，在自己的眉毛上边指了指。我完全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我的额上有一小块疤痕，他想让妻子注意这个特殊的标记。

“现在请允许我问您，”我对老板娘说，当所有的测试都进行完毕之后，“真要你们提交这样的报告吗？”

“噢，先生，这是很必要的啊！……”

“先生！”丈夫装出特别叫人感动的样子跟着也喊了一声。

“可是在贝壳旅馆却没有这样问我。”

“不可能。”老板娘急忙接口说。“他们这样做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说不定他们暗地里把您从头到脚看了个一清二楚，但肯定、肯定是看清楚了的。我们对待旅客要随便些，也真诚些，我们把旅客当作亲人看待。您会对我们满意的。您会看到的……”

“啊，先生！……”丈夫一本正经地补上一句，脸上甚至流露出叫人感动的神色。

这是一对非常诚实、非常可爱的夫妇，至少据我后来对他们所作的了解是这样。可是“很必要的”这个用语却并非以一种请求原谅或者谦恭的声调，而是包含着极为必要并且与他们本身的信念几乎是一致的口气说出来的。

就这样，我进了巴黎……

第五章

太阳神①

就这样，我进了巴黎……但是不要以为我就巴黎这座都市本身会跟你们说许多话。我想，你们已经翻阅过不少有关它的俄文书籍，弄到后来都感到厌烦了。而且你们也亲身到过这座城市，各个方面大概比我看得更加清楚。何况我在国外最不愿意按照导游手册、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旅客的义务来旅行，因此许多地方漏掉了一些东西，甚至都不好意思说出来。在巴黎也漏掉一些东西。所以我也不说究竟漏掉了什么，不过我要说我给巴黎下了一个定义，给它预备了一个形容词，并主张使用这个形容词，这就是：世界上最高尚最有道德的城市。多么良好的秩序啊！多么明智、多么确切无误而又牢不可破的关系啊！一切是多么的有保障而又循规蹈矩，大家是多么的心满意足，努力使自己相信满足而又幸福到了极点，最后，大家又多么努力地达到了目的，真正相信心满意足而且极其幸福，并且……并且……就此止步不前。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你们不相信会就此止步，你们会大声叫喊，认定我是夸大其词，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爱国心的恶毒的诬蔑，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停止不前的。但是，朋友们，我在这本回忆的第一章里就早已有言在先，我可能会撒谎，弥天大谎，所以请你们别打断我。你们一定也知道，如果我在撒谎，那

---

① 太阳神，又称“巴力”，是古代腓尼基、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崇奉的生育之神，众神之神，后传入西方。本文喻指猎取暴利之神。——译者注

也是自认并非撒谎而撒了谎的。而依照我的意见，有这一条也就足够了。所以请给我自由吧。

是的，巴黎是一座令人惊奇的城市。它使所有人感到舒适，使那些有权享受便利的人感到应有尽有的方便；又是那种秩序，那种，不妨说，多么叫人心安的秩序。我又回到了秩序这个话题上。不错，再过一阵子，这个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巴黎就会变成德国的在安宁和秩序中麻木的教授城，比方说，像海德堡那样的小城。似乎有这种趋势。似乎不会出现规模更大的海德堡吧？这是一种什么规定啊！请理解我，这里说的不单是外部的规定，那是微不足道的（自然，比较而言），而是内部的、精神上的、发自内心的许多规定。巴黎正在缩小，好像是自愿地、甘心乐意地收缩范围，可怜地蜷缩成一团。在这方面，例如伦敦，就办不到！我在伦敦总共住了八天，至少从表面上看，我记得它是一堆广阔的画面，鲜明的平面图，独特的、不能按照同一标准加以调整的平面图。它的独特之中呈现的一切是这样的庞大而威武，这种独特性甚至会造成错觉。每一种威武的和不能调和的特征，与它们的对立面同时并存，寸步不离地携手同行，互相矛盾，却似乎一点也不互相排斥。所有这一切好像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且彼此间似乎互不妨碍。同时这里面又隐藏着一种同样顽强的、无声的、根深蒂固的斗争，整个西方的个性原则与哪怕是某种形式的共同生存并在同一个蚂蚁窝之中建立村社的必要性之间的殊死斗争。哪怕是变成一个蚂蚁窝，只要安顿下来，不要互相残杀吞食，否则，就成了食人的野兽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就这一点而论，巴

黎也有同样的情形：同样由于绝望而不顾死活地力图维持现状，活生生地扑灭自己身上所有的希望和期待，诅咒自己的那也许连进步的领袖对它还没有信心的前途，并且跪倒在太阳神面前。不过，请不要为崇高的言辞所陶醉，因为所有这一切只有在已经觉悟的先进的人们的心灵中才能有意识地觉察到，也可以在全体群众的生活实践之中不自觉地本能地体会到。但是，比方说，巴黎的资产者几乎自觉地认识到可以心满意足，并且深信一切都是应该如此；如果你对应该如此表示怀疑，他们甚至会动手把你痛打一顿；他们要打你，是因为尽管有这样的自信，至今仍然有一些担心害怕。伦敦虽然也是这样，但是它拥有多么广阔的重重叠叠的画面啊！甚至从外表上看与巴黎也大为不同。这座日夜忙忙碌碌如大海那般辽阔的城市，机器的轰鸣和怒吼，这些铺设在房屋上空的铁轨（很快又要铺设在房屋底下了①），这种大胆的进取精神，这种看来似乎没有秩序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最高的秩序，这条被污染的泰晤士河，这种弥漫着煤烟的空气，这些叹为观止的街头绿地和公园，这些栖息着衣不蔽体、没有教育的饥饿的居民如同白礼拜堂区② 那样可怕的城区。拥有数百万人口、掌握全世界贸易的商业区，水晶宫，世界展览会③ ……是的，展览会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你们会感觉到一种惊人的力量，它在这里把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合成一群的不计其数的人统统联合

① 伦敦最初的一条地下铁道于1860—1863年铺成，长约四公里。
② 白礼拜堂区是伦敦东城一个街区，居民大多为穷苦的犹太人。
③ 水晶宫是1851年伦敦世界工业展览会的展览馆，在钢铁结构上镶嵌玻璃而成。后改为艺术博物馆。

在一起；你们会认识到一种意义重大的思想；你们会感觉到其中有一些东西已经应验为现实，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成功。你们甚至会开始觉得有些害怕。无论你们多么自由自在，但是必定有什么缘故使你们感到害怕。你们会想，这实际上不就是已经实现的理想吗？就是这样的结果吗？这就确确实实地"合成一群"[1]了吗？非得承认这一个事实，并且把它当成完全的真理，永远不能再置一词了吗？所有这一切是这样的傲然自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你们会开始觉得憋气。你们看着这成千上万人，这几百万人从地球上各个角落低声下气地汇聚到这里来，这些人都是抱着同样的目的，安静地、顽强地、默默无言地聚集在这座宏大的宫殿里，你们会感到在这里已经彻底完成了一件事业，完成了，因而也宣告终结了。这是圣经上的某种景象，关于巴比伦的某种景象，亲眼所见的《启示录》中某个天启的应验成为现实。你们会感觉到在精神上需要许多抵制和否定的力量，以便保持独立自主，不为印象所动摇，不为事实所左右，不为太阳神所控制，也就是不承认现存的秩序是自己的理想……

但你们会说，这是一派胡言，是神智不清时的胡言，是神经质，夸夸其谈。没有人会这样谈，也没有人会把这当作自己的理想的。同时饥饿和奴役是个难题，并且最能引起否定和怀疑。而饱食终日、以消遣为乐的那些艺术的门外汉，自然可以根据《启示录》炮制出各种景象以安定自己的神经，不惜夸大其辞，为了寻求刺激而拼命从任何一

---

① 语出《圣经·约翰福音》。

种现象中搜罗出强烈的感觉来的……

“这样，”我回答说，“假定我是被这种场景迷住了，全部事情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们见到了创造这一巨大场景的这种强大的精神是多么的不可一世，这种精神多么洋洋得意地坚信自己获得了胜利和成功，那么，你们也会为它的这种骄横、顽强和盲目而颤抖，为体现、为流露这种骄横的人而颤抖的。”面临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精神那种无处不在的骄横跋扈，以及这一精神的创造物最终所获得的胜利，饥饿的灵魂常常会安静下来，表示妥协和服从，而在花天酒地中去寻求发泄，并且开始相信一切命该如此。事实在施加压力，群众变得麻木了，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①；或者，如果产生了怀疑，那就悲观消极，怨天尤人，从摩门教之类的信仰中去寻找出路。而在伦敦，可以见到许多人处在这样的格局和这样的环境之中，是你在任何别的地方所无法实地见到的。比方说，有人告诉我，每个星期六傍晚，有五十万男女工人拖儿带女像海潮一样把整座城市都淹没了，有些地区人数聚集得最多，整整闹腾一夜，直到早上五点钟，欢度周末的安息日；就是说，大吃大喝，像牲口一样，吃足一个星期。所有人都带着每个星期用繁重的劳动和诅咒挣来的积蓄。肉铺和食品店里点着煤气灯，粗大的光柱把街道照得通明，仿佛在为这些白色的黑人举行舞会。人们挤在门户大开的小酒馆里，挤在街道上，在这里又吃又喝。啤酒店装饰得像宫殿一样。大家都喝醉了，却

---

① 十九世纪中期使用这种字眼，是指一个国家政治上停滞、下层居民奴颜婢膝地服从专制统治的状态。

并不快活，脸色阴郁，心情沉重，不说话，有点捉摸不透。只不过有时候要骂人，打架流血，才破坏了这种叫人纳闷、使人忧郁的沉默。大家急急忙忙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做妻子的也不比丈夫逊色，跟着男人一起喝；孩子们在父母中间四处乱跑，钻来钻去。有一次，在这样一个夜晚，一点多钟，我迷了路，在这个阴沉的不计其数的人群中间，在街上，闲逛了很久。我差不多是靠着手势来问路的，因为我一个英文字也不认识。我找到了路，但是我所目睹的情景在此后的两三天里仍使我感到痛苦。人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一样，但在这里，他们的数量是这样的多，是这样的显眼，使你似乎触摸到了以前仅仅是在想象中存在的东西。你在这里看到的甚至不是人，而是意识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经常发生、不作抵抗并受到鼓励的。看着这些社会的贱民，你还会感觉到，对他们来说，天启在很长时间内还不能应验，棕榈枝和白衣服在很长时间内还不能拿给他们，他们在很长时间内还要向至高无上的神求助："主啊，要等到几时呢。"[①] 他们本身明白这一点，暂时就加入那些秘密的摩门教、震颤派、遁世派[②] ……而向社会进行报复。我们为愚蠢地加入那些震颤派、遁世派而感到奇怪，却没有领悟到这样就从我们社会的公式中分裂出去了，这种分裂是顽强的，无意识的，是为了努力寻求解脱而产生的本能的分裂，是怀着对我们又厌恶又惧怕的心情的分裂。这些被遗弃的、从人间的盛筵上被逐出又被他

---

① 这一段话的典故出自《圣经·新约·启示录》第一、七章。

② 震颤派是美国基督教一个派别，主张独身、财产公有、共同生活。遁世派是俄国旧教中一派，号召不纳税，遁入山林逃避一切义务。

们的兄长投入黑暗的地牢的千百万人，他们拥挤在那里，互相推撞着，摸索着去敲开随便哪一扇门，寻找出口，逃出黑暗的地牢以免窒闷而死。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绝望的举动，企图挤成一堆，合成庞大的一群，从总体中分裂出去，哪怕抛弃人类的形态也在所不惜，只要实现自己的意愿，只要离开我们……

我在伦敦还看见过类似的一批人，任何别的地方都见不到像伦敦那样多的人数。他们也有自身的一幅场景。凡是经常来到伦敦的人，大概总会有一次在晚间去逛草市①的。这个地区有几条街道每到晚上挤着几千名妓女。街道被煤气灯的光柱照得雪亮，这种灯在咱们那边还没有见过。咖啡馆用镜子和金线装饰得富丽堂皇，随处皆是。这里是聚集之地，也是栖身之所，挤在这群人中间甚至觉得可怕。其中千奇百怪，什么人都有。这里有老太婆，也有使你惊奇得不能掉头而去的绝色女子。人世间决计没有像英国女人这样美丽的女人。大家都使劲挤在街道上，密密麻麻，没有转身之地。人行道上容不了这么多人，就拥挤在街面上。这些人全都像饿疯了似的想抓住猎物，最容易抓住什么，就撕下面皮，不顾羞耻地直扑过去。这里有穿着熠熠生辉的豪华服装的，也有穿着一堆烂布似的破衣的；老的太老，小的太小，什么人都混杂在一起。这个可怕的人群里挤着喝醉了的流浪汉，也穿行着享有爵称的富豪。听得到叫骂、争吵、拉客的声音，也传来还显得娇羞的美人儿那轻轻的带着恳求的低语。这里面有时会遇见多么美丽的女子啊！脸

① 草市是伦敦西区商业性剧院集中之地。—— 译者注

孔长得如同百美图上画的那样。记得有一次我走进一家俱乐部，里面乐声大作，舞兴正浓，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室内陈设是豪华的。可是英国人即使在欢乐的时刻也依然是那种阴郁的性格，他们跳舞时也板着脸孔，甚至一脸的哭丧相，勉强踩着舞步，好像是在履行义务一样。在楼上的走廊里，我看见一位姑娘，吃了一惊，不由得站住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绝顶漂亮的女子。她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坐着，作伴的是一个年轻人，好像是富有的绅士，并且看得出是不大习惯进俱乐部来消遣的。他大概是找过她多次，最后终于在这里见面或者约定在这里见面的。他同她说话不多，一直好像是有一句没有一句，而且好像在说不是他俩想要说的话。谈话中常常出现长久的冷场。她也非常忧郁。她面貌柔和娟秀，她的美丽而稍藏锋芒的目光里有一种隐约可见的忧郁的神色，一种思考的和忧虑的神色。我觉得她患着肺病。她的素养已经超出、也不可能不超出所有这些不幸的女人之上，否则，要这样一张人的脸孔何用呢？这时候她一端杯子喝了一口杜松子酒，由年轻人付了钱。最后他站了起来，握了握她的手，二人便分别了。他走出了俱乐部，她由于喝了酒，苍白的两颊泛出斑斑点点的红晕，也走开了，消失在一群挣钱的妇女之中。在草市我见过带着未成年的女儿来挣钱的母亲。小姑娘们大约十二三岁的样子，抓住你的手，求你跟她走。记得有一回在街上的人群里，我碰见一个小女孩，顶多只有六岁，衣不蔽体，肮脏不堪，赤脚，骨瘦如柴，又遭人毒打，破烂的衣服中露出了身上青紫的伤痕。她心情激动地走着，又不急于到哪里去，天知道为什么在人群里闲逛，也许是饿坏

了。没有人关心她。但是最使我吃惊的是她走路时脸上那种痛苦至极、那种完全绝望的神气，叫人看见这样一个小小的孩子竟然怀着如此强烈的仇恨和绝望，甚至觉得似乎违反常情，极为痛心。她一路走一路摇着她的乱蓬蓬的头，好像在考虑什么问题。她伸出两只小手，做着手势，然后突然两手一捏，紧紧按在裸着的胸口上。我回过身来，给了她半先令。她接过银币，然后害羞地、惊异之中带点胆怯的表情正视了我一眼，突然撒腿跑走了，生怕我把钱夺回来一样。总的来说都是给人寻开心的对象……

另外，有一个夜晚，在这群堕落的女人和寻欢作乐的男人中间，有个女人匆匆忙忙从人群中挤了过来，拦住了我。她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帽子，差不多把整张脸都遮住了。我几乎来不及看清楚她的面目，只记得她那专注的眼光。她说了句似通非通的法国话，我也没有听清，她在我手上塞了一张小纸条，很快就走了。我借着咖啡馆窗口明亮的灯光仔细看了看这张纸条：这是一张小方块的纸片，一面印着几个法文："你信仰这个吗？"另一面也用法文印着"我是复活和生命……"[1] 之类为大家所熟知的几行句子。你们会同样认为这是件相当奇特的事。后来有人详细告诉我，这是天主教的一种宣传，它渗透到各个角落，非常顽强，不知疲倦。她们在街头散发的有时是这些纸条，有时是小册子，从福音书和圣经里摘录几句话编辑而成。她们免费散发这些宣传品，非要你拿着不可，硬塞在你手里。发宣传品的人不计其数，男的女的都有。这是一种巧妙而

① 这是《约翰福音》中耶稣的话。

富有心计的宣传。天主教的神甫还会亲自寻踪登门进入一个工人的穷苦的家庭，比方说，他会发现家中有病人，衣衫褴褛地躺在潮湿的地面上，身边围着几个因饥寒交迫而羞于见人的孩子，经常还站着个喝得醉醺醺的妻子。他就会拿食物给他们吃，拿衣服给他们穿；给他们柴火烧炉子，给病人治病，买药，成为这一家的朋友，最后把他们全家都拉入天主教。不过有时候把病人治好以后，他也会挨一顿臭骂和拳脚，给逐出门外。他并不气馁，又到另一家去，他又被赶了出来。这一些他并不计较，总会有人上钩的。英国国教的神甫却不到穷人家里去，教堂也不放穷人进门，因为他们没有钱买一个长条凳上的位置。在工人乃至一般穷人中间，常常可以发现非法的婚姻，因为在教堂中举行婚礼的费用昂贵。这里我顺便说一说，这样方式结婚的丈夫，有许多人经常毒打自己的妻子，打得鼻青脸肿，死去活来，而且大多用拨火的铁钳子来打，它已经成了他们打人的固定的工具。至少在报纸上对家庭的争吵、毒打致残以及酿成命案等等的描写中，铁钳子是经常被提到的。他们的孩子还没有成年，经常流落街头，混迹在人海里，最后就离开父母不再归家了。英国国教会的神甫和主教们都显得傲慢，阔绰，住在富裕的教区里，心里绝无不安的感觉，以致都发福了。他们大多是满腹经纶，极有教养，对于自身具有坚定的品德，有权宣讲安定的、自以为是的教训，有权在这一方为富人谋利益并发福，都是坚信不疑，而且十分严肃认真的。这是丝毫不加掩饰的富人的宗教；至少是合理的，并没有骗人。这些执迷不悟、顽固不化的宗教学教授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游戏，那就是传教。他们的足迹遍

及全球，为了感化一个野蛮人入教而深入非洲腹地，却把伦敦成千上万的野蛮人忘诸脑后，因为后者没有钱支付费用。但是有钱的英国人和那些地方所有富贵人家都是忠实的信徒，他们信教时都是板着脸，郁郁寡欢，与众不同。英国的诗人们历来都喜欢歌颂外省在百年古橡树和老榆树浓荫覆盖下的牧师住宅的优美景色，歌颂他们品德高尚的妻子和金发碧眼貌似天人的女儿们美丽的姿容的①。

可是当夜晚消逝、白昼降临时，这同一位骄傲而板着面孔的神灵又重新在这座庞大的城市上空气宇轩昂地疾驰而过。它并不为黑夜中发生过的事心忧，也不为白日里所目睹的身边的一切而不安。太阳神在主宰一切，却并不要求人们俯首听命，因为它对此坚信不疑。它充满了无限的自信。只是为了避免麻烦，它轻蔑地然而从容不迫地进行有条不紊的布施，因此要动摇它的自信就是不可能的了。太阳神并不回避生活中某些羞于见人又令人不安的可疑的现象，如同，比方说，巴黎有人所做的那样。群众的贫穷、痛苦、不满和愚昧，它丝毫不为所动。它若无其事地听任所有这些可疑的和有害的现象与它并存，实实在在地站在自己身边。它不像巴黎人那样吓得竭力促使自己别去相信这一切，强打精神，并且安慰自己一切平安，万事大吉。它不像巴黎人那样找个地方把穷人隐藏起来，别让他们毫无意义地惊扰它的好梦。巴黎人像鸵鸟一样喜欢把自己的头埋在沙里，以为这样就可以看不到追踪的猎人走过来了。在巴黎……但是，我这是干什么啦！我又离巴黎很远了

① 此处似指哥尔德斯密斯的长篇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6)。

……先生们，这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学会遵守规矩呢……

第六章

试论资产者

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是缩肩拱背的，为什么所有这些人都想跑腿打杂，遇事往后退，不愿出头露面，“这世界上没有我，根本没有我，我躲在路旁边了，您打从我身边过去吧，请别瞧我，装作没有看见我的样子，您过去吧，走过去吧！”

“您这是在说谁？谁缩肩拱背来着？”

“在说资产者呢。”

“您错了，他是主宰，他是一切。第三等级是一切。您居然说他缩肩拱背！”

“是，您哪。那为什么他躲在拿破仑皇帝的羽翼之下？为什么他忘记了以前所那么醉心的议会里的高雅的陈词？为什么当人家向他提起过去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屑一顾，置之不理？为什么当别人在他面前大着胆子提出某种要求的时候，他立刻显得六神无主，手忙脚乱？为什么当他一时糊涂，没有深思，突然想要放纵一下，却立即吓得一跳，避之唯恐不及：‘天哪！说到底终究是我啊！’事后很长时间之内仍然忐忑不安，以加倍的努力和俯首帖耳来弥补一念之差，为什么？为什么他看在眼里，却差一点说出口来：‘瞧，今天小铺里卖得一点钱；老天爷开恩明天再卖得一点钱；如果老天爷帮个大忙，后天也许会再卖一点……那么，那么，只要赶快攒起几个钱，——我死后哪怕它洪

水淹天！[①]’为什么他把穷人全都赶到一边去，却要人家相信根本没有穷人？为什么他有了御用文学就感到了满足？为什么他极力想让自己相信他的报刊没有被收买？为什么他答应拿出这么多钱豢养密探？为什么他对远征墨西哥不敢说一个‘不’字[②]？为什么戏台上演的丈夫总是一种家财万贯的豪门贵族的派头，而情人总是那种衣衫褴褛、既无地位也无靠山的雇员或者画家，百无一用的书生？为什么他总以为做妻子的始终如一地忠实到了极点，家庭是美满的，汤在炉子上用文火煮着，帽子的颜色[③]是所能想象到的最美的？”关于帽子的颜色，那是已经明确地作了解决，已经商定，不必再费唇舌，是自然而然商定的，虽然不断地有拉着窗帘的出租马车在林荫道上驶过，虽然到处都可以为一切美妙的需要提供安全的场所，虽然太太在衣着上的花费常常大大超出丈夫的钱袋所能供给的数目，可是已经作了这样的解决，已经商定，你还有别的什么可说呢？那么为什么这样解决，这样商定呢？您这是怎么啦，如果不这样，人家也许就会以为还没有达到理想境界，巴黎还不是地上的完美的天堂，也许还会提出什么要求来；因而会以为资产者本身对于他所维护并强加给所有人的秩序也不是完全满意，社会中还存在着必须加以修补的缺陷。这也是资产者用墨水把靴子上的窟窿涂黑的原因；老天爷保佑，只要没有人发现就行！太太们嘴里嚼着糖果，手上戴着手套，

---

① 据传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名言。

② 1861年法国伙同英国、西班牙出兵墨西哥逼债，军费支出庞大，引起法国人民不满。

③ 暗指绿帽子，即妻子的外遇问题。

使得远在彼得堡的俄国的太太们羡慕得想要发疯，竟然在林荫道上提了提垂地的长裙，露出纤纤的玉足。幸福已到了极点，此外还需要什么呢？怪不得在目前的状况下，长篇小说已经不用《妻子、丈夫和情人》[①]这一类字眼做题目了，因为情人已经消失，也不可能再出现。而即使在巴黎他们多得如海边的砂子（他们在海边也许会更多），在那里依然是没有而且不可能再有的，因为已经这样解决，这样商议妥了的；因为一切都闪耀着美德的光辉。应当让一切都闪耀着美德的光辉。如果夜晚来看一看罗耶尔宫里面的大院子，直到深夜十一点钟，那么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直流。不计其数的丈夫和不计其数的太太，手挽着手在散步，身边是优雅可爱的孩子在嬉戏，喷泉在哗哗地响，水柱落到池子里的单调的击水声使得你想起海德堡[②]那一年到头始终不变的安宁的静悄悄的某种气氛来。但巴黎并非只有一个地方的喷泉有这样的响声，喷泉是很多的，到处的喷泉都一样，都使你感到赏心悦目。

巴黎对美德的追求是永不停息的，现在法国人显得严肃、庄重，甚至常常使你打心眼里受到感动。因此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直到如今他们还是这样胆怯得要命，非常胆怯，尽管法兰西在军事上享有声誉，并且老实人雅克[③]为此付出了如此昂贵的代价。巴黎人爱做买卖，爱之如命。不过，他在店铺里做买卖，把你全身上下口袋里的钱掏得精光，似乎不像从前那样单纯为了赚钱，而是出于一种美德，一种

---

① 法国作家查理-保罗·科克（1793—1871）的小说。
② 德国西南部一城市。——译者注
③ 法国农民的外号叫做老实人雅克。

神圣的必要性。聚积财富，掌握更为雄厚的物力，这已经成为巴黎人最主要的道德准则，基本的信念。从前也是这样，但现在，现在已具有某种，这样说吧，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从前除了金钱之外，总还有别的可取之处，因此一个人即使没有钱，而具有别的品质，也能指望得到哪怕是一点点的尊敬。可是现在呢，绝对的不行了。现在必须要聚积钱财，掌握更为雄厚的物力，才能指望得到别人的一点尊敬。否则，不要说别人的尊敬，即使是本身的自尊，也是不可能有的。巴黎人如果感觉到自己的口袋里空空如也，就会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而且是自觉地、心甘情愿而又毫不动摇地这样做的。只要你有钱，天下的奇珍异宝你都可以轻易弄到手。可怜的苏格拉底只不过是个愚蠢而有害的空谈家①，只有在戏台上才获得人们的尊敬，因为资产者仍然喜欢尊重戏台上的美德。这个资产者是古怪的家伙：他直截了当地宣称金钱是最高的美德，人的义务，但同时又非常喜欢表演一下无以复加的正人君子的风度。每个法国人都有令人称奇的君子风度。一个卑鄙无耻到了极点的法国人，为了两角五大洋可以把生身父亲出卖给你，还可以主动地捎带着再给你添补一点别的，而就在他把自己的父亲出卖给你的同时，他表现出的那种动人的神态，足可以叫你大惑不解。当你走进一家店铺去买东西，一个学徒就可以压倒你，单凭他那不可名状的君子风度压倒你。这种店员就是为我们的米哈伊洛夫剧院②那些登峰造极的人

①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幸福取决于他的灵魂的好坏，财富和权力不是真正的好东西。——译者注

② 彼得堡小歌剧院的前身。

物充作模特儿的。你被镇住了，你简直觉得在这一位店员面前无地自容。比方说，本来你只想消费十法郎的，可是人家把你当作德文郡[1]的一位爵爷那样来接待，于是你不由得感到心中不安，你想赶紧让他明白你根本不是德文郡来的爵爷，.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微不足道的旅客，进来只想买十法郎的东西。可是这位年轻人满脸堆着幸福的笑容，心地里充满绝对无法描述的高尚的感情，一看到他这样子你就恨不得把自己当作混蛋（因为他是这样的高尚啊!），他开始为你展示价值几万法郎的商品，转眼之间把柜台全堆满了；你立刻会想到，当你离开之后，他这个可怜的人儿还得把这许多东西重新归置起来，他可是格兰迪森，是阿尔西比亚德，是蒙莫朗西[2] 啊。那么是在谁离开之后呢？是你，你是个其貌不扬、行为粗鲁的家伙，全身上下一无是处，揣着你那讨厌的十个法郎，居然来打扰这样一位侯爵——当你一想到这里，立刻不由自主地在柜台前面一百个看自己不起。你后悔莫及，诅咒命运，为什么现在你的口袋里只装着一百法郎，你把它全掏出来，看了他一眼，请求原谅。人家可是宽大为怀，把卖给你的那毫不起眼的一百法郎商品给包扎起来，原谅了你在店铺里所引起的一阵折腾和打扰，于是你急急忙忙赶紧溜走拉倒。回到家里，你奇怪得要命，本来只想花十个法郎，结果用掉了一百。有多少次经过林荫道或者维文路的时候，那些地

---

① 英国的地名。——译者注

② 格兰迪森是英国作家萨·理查逊(1689—1761)所著同名长篇小说中品德高尚的绅士。阿尔西比亚德（451—404，公元前）是雅典威名显赫的统帅。蒙莫朗西（1493—1567）是法国陆军统帅，三朝元老。

方的大百货公司随处皆是，我暗自想，要是让俄国的太太们到这里来，并且……但是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奥洛夫省、坦波夫省还有其他几个省地主庄园的管事和村长是知道得最清楚的。总的来说，俄罗斯人极其愿意在店铺里摆阔，他们的钱多得不得了。可是世界上也有这样恬不知耻的人，比方说，像英国的女人，当某位阿多尼斯、威廉·退尔① 为她把商品摆满了柜台，把整个商店弄得天翻地覆时，她们不但不觉得难为情，甚至还要——啊，真要命！——为区区十个法郎讨价还价。但威廉·退尔也并不傻，他会从你那里捞回一大笔，一条一千五百法郎的头巾，他会让这位太太掏出一万两千法郎，而且还使得她觉得捡了便宜。不过尽管如此，资产者是极其喜欢那种不可名状的君子风度的。在戏院里你一定得给他表演正人君子的角色。居斯塔夫②身上闪耀的只应当是正人君子的光辉，资产者将会因此感动得痛哭流涕。如果没有这种不可名状的君子风度，他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至于一千五百法郎的货他要拿一万两千法郎，那甚至是一种义务，因为他拿这笔钱是受美德的指使。偷盗是肮脏的，下贱的，偷盗者应当罚去划船③。资产者可以原谅许多种罪恶，但对偷盗决不宽恕，哪怕你或者你的孩子会活活饿死。可是如果你是出于一种美德而去偷东西，啊，那么就会把你所有的劣迹一笔

---

① 阿多尼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威廉·退尔是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

② 居斯塔夫是法国男子常用的名字，本文常作为情夫的同义词来使用。——译者注

③ 法国在 1789 年革命之前，刑事犯被发配军中充当战船的划桨手。

勾销了。显然，你是想要发家致富，聚积财物，也就是说，是在履行自然界的和人类的天职。这就是法典上明确无误地区分出于卑劣的目的即为了一块面包而进行偷盗和出于高尚的美德进行偷盗两种条文的原因所在。后一种情况受到极为完备的保障，加以鼓励，并且被组织起来，以永存不朽。

说到最后，为什么——我又旧话重提了——说到最后，为什么资产者至今似乎依然有些害怕，好像情绪不佳？它在担心什么？在担心夸夸其谈空话连篇的家伙吗？他现在是可以把他们踢到鬼门关去的。在担心纯粹理性的论证吗？可是理性在现实面前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了。而且除此之外，连富有理性的人，连学者本身，现在都开始开导说，没有纯粹理性的论证，世界上也没有纯粹的理性①；抽象的逻辑不适用于人类，只有伊凡的理性，彼得的理性②，居斯塔夫的理性，根本不存在什么纯粹的理性，那只是十八世纪毫无根据的空想而已。那么，在害怕什么人呢？工人吗？可是工人从内心倾向来说也都是私有者。因为他们的全部理想在于成为私有者，掌握尽可能多的物力，本性如此。本性不是随便可以改变的。它是经过几百年的培养和几百年的教育而成。民族性也不会轻易改变，不会轻易摆脱已化为血肉的几百年沿袭的习惯。害怕农民吗？可是法国的农

---

① 十九世纪 30 至 60 年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的观点遭到实证主义哲学家的猛烈批判。

② 1860 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写道："……可以认定伊凡是善人，彼得是恶人；但这种判断只适用于个别人身上，不适用于总体的人。"

民是第一流的私有者，是死心塌地的私有者，也就是说，你所能想象到的最优秀的、达到最完善的理想境界的私有者。害怕共产主义者吗？还有社会主义者吗？但这些人在当时就已经输得很惨了，资产者从心里一百个瞧不起他们。瞧不起他们，同时却又惧怕他们。是啊，他至今还怕这些人。那么，是在怕什么呢？西哀士教士[1] 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里已预言资产者是一切。"第三等级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切。"事情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发生了。那时候说了许多话，只有这几句话应验了，只有这几句话留了下来。而资产者似乎一直不相信，尽管在西哀士说了这几句话之后，所有胡说八道的话都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事实上，在他之后，很快宣布了 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2]。好得很，您哪。什么叫做 Liberté？自由。什么样的自由？——每个人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有同等的自由做他所想做的事。什么时候才能做他所想做的事？当你的口袋里有了一百万的时候。自由能给每个人口袋里装一百万吗？不能。口袋里没有一百万的是什么人？没有一百万的不是那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人，而是任别人随意摆布他的人。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除了自由之外，还要有平等，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关于这种法律面前的平等，只需要说一点，即从它目前所表现的形式来看，每个法国人都能够而且都应当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的人身侮辱。这个口号还剩下什么？博爱。嗯，这一条是最滑

---

① 埃·西哀士（1748—1836），法国教士。著有《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一书。

② 自由，平等，博爱。

稽的；而且应当承认，在西方，它至今为止一直是个主要的难题。西方的人士把博爱说成是人类巨大的动力，却没有想到，假如现实中没有博爱，它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怎么办？想尽办法也要造成博爱。但博爱是不可能制造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生长，出之于天性。而在法国以至整个西方的人的天性之中，却没有它的存身之地；那里只有个人的原则，自立门户的原则，这种自立门户加强了自我保护，自我经营，促使自己决定自身的“我”，并把这个“我”与天性和别的所有人对立起来，作为和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完全平等、价值相同的一个自主的单独的原则。可见，从这种自行对立之中不可能产生博爱。为什么？因为在博爱、真正的博爱之中，不应当是单独的个人，不应当是“我”，去为自己谋求同别的所有人价值相等、分量相同的权利，而应当是别的人自动地来找提出这种权利要求的个人，来找这个单独的“我”，不需要他请求，应当自动地承认他与自己即与世界上所有别的人是价值相同、权利平等的。不仅如此，这个起来反抗、提出要求的个人，首先应当把整个的“我”、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社会，不仅不要求自己的权利，相反，应当无条件地把自己的权利交给社会。可是西方的个人对事情的这种进展并不习惯，他拼死地要求，他要求权利，他想要分享，——这就没有博爱了。当然，本性不是可以改变吗？但这种改变是要经历数千年才能完成的，因为这一类思想先要深入人心，化为血肉，才能成为现实。怎么回事，你们会对我说，必须抛弃个人，才能得到幸福吗？难道出路就在于抛弃个人？我说，相反，正好相反，不但不应当抛弃个人，反而应当成为个人，甚至

比西方现时所认定的更要高级得多的个人。请你们理解我的意思，为全体的利益而完全自觉自愿地、不受任何人强制地作自我牺牲，我认为是个人达到了最高发展水平、个人的力量发挥得极为充分、自我克制到了极点、个人意志享有最大自由的标志。为全体而自愿地牺牲性命，为全体去赴汤蹈火，只有个人的发展达到最成熟的时候才能够办到。一个发展成熟的个人，对于有权利作为个人而存在抱有充分的信心，不再存有任何恐惧之心，已绝对不可能丧失独立性变成另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用途，除了把自己全部奉献给全体以使其余所有人成为同样自主的幸福的个人之外。这是自然规律，人通常总是被拉着向这方面走。但是这里有一根头发丝，一根极细的头发丝，不过假如它掉进机器里，立刻会引起爆炸和毁灭。具体地说，在这种情况下，稍微计较一点个人的利益，是极为常见的事。例如，我在为全体奉献并牺牲自己的一切，那么，我就应当完全彻底地牺牲自己，毫不计较私利，根本不考虑我为社会牺牲了一切，社会应该补偿我所作的牺牲。应当有这样的牺牲精神，即奉献一切，根本不希望因此有任何回报给你，不要让任何人因为你而受到损失。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正像叫人不要去想白熊一样。请你们试一试，给自己一个任务，别去想白熊，你们就会明白这只该死的白熊每分钟都会浮上你们的脑海。怎么办？毫无办法，只有听其自然，自生自灭，不知不觉地融合在它那一种类的自然本性之中。总而言之，要有博爱的、爱人的原则，即应当去爱别人。应当本能地驱使自己走向博爱，走向一个共同体，走向和谐，驱使自己走去，尽管民族经历了千百

年的苦难，尽管民族内部深藏着野蛮、粗鲁、不文明的东西，尽管遭受过百多年的奴役和异族的入侵，——总而言之，人的本性中应当要求一个博爱的共同体，他生来就应当有博爱的胸怀，或者自幼就养成这样的习惯。如果把它换成一种富有理性的自觉的语言叙述出来，那么这个博爱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每个单独的个人在毫无强制、毫不考虑私利的情况下自动地向社会宣称："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我们才能强大，如果你们需要我，就请把我的一切都拿去吧。你们制订法律的时候，别考虑我，丝毫不要想到我的利益，我把自己的一切权利都献给你们，就请你们指挥我吧。为你们大家而牺牲，你们又不致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失，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只要你们的兄弟般亲密的博爱繁荣昌盛，我愿意自行消失，把自己无声无息地腌起来。"反过来，博爱中的人们应当说："你给予我们的太多了。你给予我们的，我们没有权利不接受，因为你说这是你的全部幸福之所在。可是当我们不断地为你的幸福感到心痛的时候，又能怎么办呢。请你也把我们的一切拿去吧。我们将时刻不停地尽一切力量让你得到尽可能多的个人自由，尽可能多的自我表现。现在你不要害怕任何敌人，无论是人还是自然界，都不要害怕。我们大家都支持你，我们大家都保证你的安全，我们尽力守护着你，因为我们是兄弟，我们大家都是你的兄弟，我们的人数很多，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请你完全放心，振作起精神，什么也不要害怕，信赖我们。"

自然，在此之后，就没有什么可分的了，这里所有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分掉了。彼此相亲相爱，对你们来说，这

一切也都迎刃而解了。

先生们，这实际上是乌托邦啊！一切都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本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对于理性来说，这简直像是一种侮辱。你们认为如何？这是不是乌托邦？

但是，如果西方人身上没有博爱的原则，相反，只有个体的、个人的、不断分离的、明火执杖地要求权利的原则，社会主义者又该怎么办呢？社会主义者看到没有博爱，便开始宣传博爱。由于博爱并不存在，他就想把博爱造出来，编出来。为了焖一锅兔肉，首先应当抓一只兔子。可是兔子没有，也就是说，能够产生博爱的本性，信仰博爱的本性，自然而然地倾向博爱的本性，这些本性都没有。在绝望之中，社会主义者就来制作、规划未来的博爱了。他们计算它的重量和面积；以利诱人，反复地议论、开导，告诉大家，从这个博爱中谁可以得到多少好处，谁可以赚到多少钱；确定每个人是什么态度，对此有多大的兴趣，并且预先计算出人间能享受到的福利；谁将获得多少福利，每个人由于获得这种福利而应当为共同体牺牲自己的多少利益。可是如果预先作了分配并且规定谁得到多少，每个人应当做什么，那叫什么博爱呢？于是提出了一个口号："每人为大家，大家为每人。"当然，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因为这个口号是从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上照搬的①。但一当把这个口号付诸实践，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兄弟们就

① 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艾·卡贝（1788—1856）写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扉页上的题词。

把博爱的创办人卡贝[1] 拉上了法庭。据说傅立叶的信徒们从资金中提出最后的十万法郎，一直在试验如何建立博爱[2]。毫无结果。当然，哪怕不是在博爱中生活，单单在理性的基础上生活，也就是说，你的一切都有了保障，只要求你工作，保持协调，好好地生活，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难题：一个人的一切似乎都有了保障，答应包他吃喝，给他工作，为此只要求他为了共同的福利而牺牲一点点个人的自由，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自由。不，这个人却不愿意为了这些算计而生活，他把一点点的自由都看得很严重。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这是住在监狱里，还不如自由自在地好一些，因为他有完全的自主。即使住在外边有人会揍他，没有人给他工作，会饿死，也没有任何自由，这个古怪的家伙仍然觉得还不如有自己的意志好些。自然，社会主义者必定会朝他吐口水，对他说，他是个傻瓜，没有长进，不知好歹，不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一只蚂蚁，一只渺小的不会说话的蚂蚁也比他聪明，因为在蚂蚁窝里一切是这样的美妙，这样的秩序井然，大家都吃得饱饱的，幸福之极，每只蚂蚁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总而言之，这个人还远远不如一只蚂蚁呢！

换句话说，即使社会主义能够实现，也是在别的地方，决不在法兰西。

于是在最后感到绝望之时，社会主义者终于又宣称：自

---

① 卡贝于1847年集资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伊加利亚公社，因发生内讧受到指控。

② 指维·孔西德朗（1808—1893）于1853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共产主义公社，不久也告失败。

由，平等，博爱，或者是死亡。那么，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资产者彻底地胜利了。

而如果资产者大获全胜，那么西哀士的口号中每个字都会因此丝毫不差地成为现实。既然资产者就是一切，那他为什么又忐忑不安，缩肩拱背，他害怕什么呢？所有人在他面前都低声下气，显得软弱无力。比如，从前在路易·菲利普[1]时代，资产者决不是这样忐忑不安和提心吊胆的，那个时候他是天下的主宰。是的，那个时候他还在奋斗，预感到他有敌人，并在六月的街垒上动用火枪和刺刀最终地结果了他们[2]。但是，战斗结束后，资产者却突然发现这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没有别的东西比他更好，他就是理想。现在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要说服全世界相信他是理想，而只要不慌不忙大模大样地向全世界装出一副样子，表示他集中了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和美德就行了。尽管如此，地位仍然是让人不安的。拿破仑三世[3]在危急之中帮了大忙。他好像从天上掉到资产者那里去似的，提供了摆脱困境唯一的出路，提供了当时别无选择的可能性。从那个时候开始，资产者交上好运了，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且害怕一切，这正因为他得到了一切。当你得到了一切的时候，失去**一切**就变得非常痛苦的了。我的朋友们，从这里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哪个人害怕得最厉害，哪个人就是最走运的。请别见笑。那么现在资产者又是什么呢？

---

① 法国国王，1830年即位，1848年二月革命时被推翻。

② 指镇压1848年6月巴黎的无产阶级起义。

③ 拿破仑三世（1808—1873）：拿破仑一世的侄子。1852年登位为法国皇帝，1870年被废黜。——译者注

第七章

前一章的续篇

为什么资产者之中有这么多走狗，而且其貌堂堂？请不要责怪我，请别喊叫，说我夸大其辞，诬陷好人，说我心怀仇恨。恨什么？恨谁？所为何事？只不过说有许多走狗，如此而已。走狗的奴性必将越来越厉害地侵蚀资产者的本性，并且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目前的状况下，必将如此。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主要的，主要的是本性所促成。我还没有谈到，比方说，资产者身上还有许多天生的密探作风。我的意思是，法国的密探作风非同一般，已出神入化，具有天赋的才能，达到了艺术的高度，又拥有一套科学的方法。这种密探作风之所以得到空前的发展，是由天生的奴性而来。有哪一个理想的道貌岸然的居斯塔夫，如果他身无长物的话，不会为了一万法郎而立刻交出情妇的密信，把情妇出卖给她的丈夫呢？也许我有点夸张，但是我的话恐怕是有事实作为根据的。法国人极其喜欢往前面跑，设法让当权者赏识，甚至完全不是出于利己之心而向当权者献媚，甚至并不期待当场给予奖赏，可以欠着，记在账上。请你们回想一下，比方说，过去法国政府频繁更换时那些谋求职位的人吧。请你们回想一下这些人所玩弄并为他们本人供认不讳的那些把戏和花样吧。请你们回想一下巴比埃[1] 为此写的一首抑扬格的诗吧。有一次我在

---

[1] 亨利・巴比埃（1805—1882），法国诗人。此处指他的《分赃》（1830）一诗。

咖啡店里拿到7月3日的一份报纸，我一看，有维希通讯。那时皇帝正住在维希，自然，有宫廷侍从护驾；大批男女骑着高头大马在郊野上寻欢作乐。记者描写了这一切，开头他这样写道：

> “此间优秀之骑手云集，但一眼即可望出其中之超群绝伦出类拔萃者仅有一人。陛下每日在侍从护卫下出外漫游”云云。

写得十分明白，让他去为他的皇上超群绝伦的品质陶醉吧。可以去崇拜他的智慧，他的勤俭，他的完美等等。对这样一位陶醉着的先生，决不能当面指出他是在弄虚作假借以骗人。“我的信念如此，不必多说。”他会这样回答你，如同我们现在有些新闻记者回答你的一模一样。你们明白吗，他是有恃无恐的；他有话回答你，能堵住你的嘴巴。信仰自由和奉行信念的自由是世界上最主要最根本的自由。可是在这里，在这种场合，他能回答你什么呢？他不顾现实生活中的规律，连任何一点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没有，并且是蓄意这样做的。那么为什么蓄意这样做呢？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骑手本人大概也不会读到这则报道，如果读到了，那么写这则报道的法国佬，刊登这则报道的报纸以及报纸的编辑部，难道他们全是傻瓜，竟然不明白统治者根本不需要法兰西第一骑手的荣誉，他到了晚年也根本不会指望获得这种荣誉吗？如果有人恭维他是全法兰西最矫健的骑手，他当然也不会相信。据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啊。不，您哪，这里有另一种考虑：就算它是虚假的，可笑的；就算统治者本人看了后感到讨厌，嗤之以鼻，就算

是这样、这样吧，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到盲目的服从，看到无限的忠诚，奴性的，愚昧的，好像是不真实的，但是，忠诚，这是最主要的。现在你们来判断吧：如果这种做法不符合民族精神，如果这样一种庸俗的吹捧不被认为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怪，完全合乎常理，甚至是合乎礼仪的，巴黎的报纸能登载这样的报道吗？除了法国之外，你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的报纸上看到这样的吹捧？我之所以提到民族精神，是因为不只一家报纸在这样议论，差不多所有这一类报纸在用同样的方式在议论，除了两三家没有完全丧失独立性的报纸之外。

有一天我坐在那里吃份饭，——这时我已离开法国到了意大利，但是吃份饭的人之中有许多法国人。他们在议论加里波第[①]。那个时候到处都在议论加里波第。这是在阿斯普罗蒙特事件[②]发生之前两星期。自然，谈话是隐晦的；有些人不愿意开口，根本不想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另外一些人则在那里摇头。这些议论总的意思是加里波第在干一件冒险的甚至是轻率的事。当然，这种意见是吞吞吐吐说出来的，因为加里波第这个人的水平是任何人所不能企及的，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即使是过分冒险的事，在他也许是认为万无一失的。谈话慢慢转到加里波第的人品上去，开始列举他的各种优点——结论对这位意大利英雄是相当有利的。

“不，他身上只有一点叫我奇怪，”一个法国人大声地

---

① 朱·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运动领袖。

② 1862 年 8 月加里波第在阿斯普罗蒙特与教皇及法国入侵的军队作战中受伤被俘。

说，他显得轻松愉快，外表很惹人注意，年纪大约三十岁上下，脸上流露出你在所有法国人身上都会发现的那种道貌岸然近乎狂妄的气派，“他身上只有一个地方叫我非常之奇怪！”

显然，大家都对这位说话的人来了兴趣。

在加里波第身上发现新的优点，大家之感到兴趣是理所当然的。

“六〇年有个时候，在那不勒斯，他掌握的权力大得没了边，不受任何人的约束①。他手上有一笔两千万之多的公款哪！他没有向任何人报告过有这么大数目的款子！他可以挪用、侵吞这笔款子，要多少拿多少，谁也不会过问！他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侵吞，全部清清楚楚地交给了政府。这几乎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当他提到两千万法郎的时候，他的眼睛甚至都热得发亮了。

关于加里波第，当然，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可是把加里波第的名字与挪用公款的人相提并论，这种事显然只有法国人才干得出来。

而且他说这件事的时候是多么的天真无邪，多么的纯洁真诚。显然，凭着他的纯洁真诚，什么都可以原谅，即使丧失了对于真正的荣誉的理解能力和感觉能力；可是看了一眼他的脸孔，那张一提到两千万就容光焕发的脸孔，我不由自主地想：

---

① 1860年9月，加里波第率军解放南部意大利，成为当地实际上的主宰者。

“老弟，假如你那时候处在加里波第的位置上掌握着公款，会怎么样呢？”

你们会对我说，这又是无稽之谈，所有这些事只不过是个别的情况，咱们这里也时常发生，而且我不能认定所有法国人都会这样做。当然，是这样，我也没有说所有法国人都如此。到处都是不可名状的正人君子的派头，而在咱们这儿，也许远远不如吧。不过为什么要把它抬举成一种美德、一种美德呢？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即使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也许还保持着一种荣誉感。而在这里有许多正直的人却完全丧失了荣誉感，因此吹牛拍马，不知道身怀美德的人是怎么行事的。当然，前一种人的缺点比较多，但后一种人，不管怎么说，却更叫人鄙视。这种关于美德的基本信念成了民族生活中一种病态。好吧，关于这一类个别情况，我不想与你们争论了。整个民族甚至都是由这些个别情况组成的，对不对？

我甚至在这样想。我说资产者缩肩拱背，一直在提防着什么，也许是我错了。说缩肩拱背，他事实上是缩着肩拱着背，也有点提心吊胆，但总的来说，他是非常走运的。哪怕他自己欺骗自己，哪怕他时时刻刻让自己相信万事大吉，却丝毫不影响他在表面上装得十分自信。更有甚者，即使在他感到紧张的时候，他在内心里也是极为自信的。这两种东西怎样会在他身上同时并存，实在是个问题，但事实如此。总的来说，资产者一点也不傻，但他的见识有点短浅，好像是零零碎碎的。他储存的现成的概念特别的多，好比过冬的木柴一样；他又非常认真的打算带着这些概念活它一千年。不过说到这个一千年，资产者是很少谈一千

年的，除非发表演说。“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句话说得更多，并且常常拿来应用。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没有兴趣，或者提不起多大兴趣。在巴黎我有机会经常出入社交场合，在一所房子里，我去的时候许多人先后来到。除了日常琐事之外，他们似乎都害怕谈别的东西，害怕谈大事，谈普遍关心的事件，就是说，害怕在那里谈具有社会意义的事。我想，这种地方不应该害怕有密探出现吧，大家在这里只不过忘记了严肃地思考和交谈而已。然而在这里时常也碰到一些人，他们非常想知道我对巴黎的印象，我对它有多少好感，它使我吃惊、自惭形秽乃至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有。法国人至今仍然以为他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别人，使人自惭形秽，五体投地，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我特别记得一位可爱的亲切善良得无以复加的老人，我真心实意地喜欢他。他逼视着我的眼睛，询问我对于巴黎的看法，发现我没有特别高兴的表示，就非常伤心。他那张善良的脸上甚至现出了痛苦的表情——确确实实是痛苦，我毫不夸大。啊，亲爱的先生，先生！你绝对不可能说服一个法国人，也就是一个巴黎人（因为所有法国人实质上就是巴黎人）相信他不是整个地球上最优秀的人。不过说到整个地球，除了巴黎之外，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且他一点也不想知道。这是一种民族性，甚至是最突出的民族性。但是法国人最突出的特点是卖弄口才。他们之喜欢辞令是久盛不衰，而且与日俱增。我极想知道这种对辞令的热衷在法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显然，从根本上来说是从路易十四开始的。妙得很，法国的一切都从路易十四开始，确实如此。而更妙的是，欧洲的一切也是从路易十四

开始。这位国王有什么神通，我真闹不明白！他比以前的几位国王并不特别高明，除了他最先说“朕即国家”这句话之外。这句话极受欢迎，当时传遍了整个欧洲。我想，他就是凭着这么一句话而出名的。甚至连咱们这里也莫名其妙地很快都知道了。这位路易十四是极富民族特点的国王，全身浸透着法兰西精神，以致我简直无法理解法国怎么能够出现这些小小的折腾……比如说上个世纪末的那些事①。闹了一阵，又恢复昔日的精神；又向那方面发展；但是辞令，辞令——啊，这是巴黎人不可逾越的障碍。他准备忘掉过去的一切，一切，一切，准备实事求是地说话，做一个最听话最用功的好孩子。可是辞令，唯有这个辞令，他至今无论如何不能忘掉。他日思夜想，依依不舍。他经常想起梯也尔、基佐、奥迪隆·巴罗②。那时候的巧言善辩真叫人向往啊，他有时在这样自言自语，并陷入沉思。拿破仑三世懂得这一点，立刻决定不应当让老实人雅克去沉思，逐渐把如簧之舌鼓动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议会里放上六个自由派的议员③，六个固定的、可靠的、死硬的自由派议员，也就是说，是这样的人物，如果你想要收买他们是收买不动的，无论如何总保持着六个——从前是六个，现在是六个，将来依旧是六个；不会增加一个，你放心吧，也

---

① 指1789至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 梯也尔(1797—1877)，曾镇压巴黎公社起义，任过总统；基佐(1787—1874)，曾任政府的教育大臣和外交大臣；巴罗(1791—1873)，曾任法国政府首脑。三人均娴于辞令，以辩才见称。——译者注

③ 拿破仑三世时对反专制人士实行镇压，法国议会选举是在恐怖的气氛中进行的，因此直至1863年，议会里一直设有五名主张共和的反对派议员。作者此处误为六人。

不会减少一个。乍一看来，这是极为复杂的游戏，可是实际运作时却非常之简单，而且是依靠普选权来对付的。自然，为了不使他们说走了嘴，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不过稍为胡扯几句是允许的。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内讨论国家大事，巴黎人甜滋滋地就来了劲了。他知道会有一番唇枪舌战，就高兴了。自然，他也非常明白，这一番唇枪舌战只不过是白费唇舌而已，没有其他意义，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这些空话绝对没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仍然觉得非常、非常之满意，而且他本人首先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之合乎理性的。这六个议员之内，有几位的发言特别受到欢迎，而议员也随时准备着为了取悦公众而发表演说。这实在是件怪事，因为他本人也完全明白，他的演说是毫无结果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游戏，游戏而已，岂有他哉；是一种无害的游戏，一场假面舞会，但他还是在说，接连几年都在说，说得很漂亮，甚至说得眉飞色舞。至于聆听他演说的议员们，也感到心满意足，甚至口水都流了出来："这家伙说得真棒！"于是总统和整个法兰西都口水横流。等到这位议员演说完毕，这些可爱而品行优秀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就站了起来。他庄重地宣布，命题为《日出》的一篇作文被尊敬的议员作了巧妙的发挥和锤炼，他说，我们对尊敬的演说者的才能、他的思想和从中所表现的高尚的行为，深为惊叹，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所有人都得到了一次享受……虽然尊敬的议员应当获得一份"品行优秀、学业有成"的奖状，受之无愧，虽然如此，但是，先生们，从某些深远的考虑来衡量，尊敬的议员这番演说是极其糟糕的。先生们，我相信你们是完全同意我的话的。这

时他转向全体议员，目光中流露出严厉的神色。口水横流的议员们立刻狂热地向家庭教师鼓掌，同时又立刻跑过去向那位自由派议员握手致谢，感谢他使他们得到了满足，情形十分令人感动；他们又请求下一次在家庭教师的允许下再让他们得到自由主义的满足，家庭教师慨然表示同意。描写“日出”的这位做作文的学生满脸是功成名就的得意之色，走开了；议员们也舔舔嘴唇，四散回家，高兴得一个晚上都挽着太太的手臂在罗耶尔宫游逛，美丽的喷泉那水柱的飞溅声声入耳。而那位家庭教师向某一位人物汇报了所有情况之后，就向全法兰西宣布一切平安。

不过有时候事情比较重要，游戏也玩得更加认真。有一次会议把拿破仑王子① 弄进来了。拿破仑王子突然开始扮演反对派，把这些小学生完全给吓朦了。教室里一片肃静。拿破仑王子以自由派面貌出现。王子不同意政府的立场，按照他的意见应该如何如何。王子指责了政府，总而言之，所说的（推测起来）正是这些可爱的孩子在教师稍为离开教室一会儿时就会说出口的那些话。自然，这里是有分寸的；那种推测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有这些可爱的孩子极有教养，即使家庭教师离开他们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也不会动弹一下的。所以，当拿破仑王子发言完毕之后，家庭教师站了起来，庄严地宣称命题为《日出》的作文由尊敬的发言者作了出色的发挥和锤炼，我们对于德泽广被万方的王子的天才、以如簧之舌表达的思想和他的品德深

① 指约瑟夫·波拿巴（1822—1891），拿破仑一世的侄子，1848年革命后选入国民议会，被指定为拿破仑三世的继承人。

为叹服……我们准备为他学习的勤奋和优异的成绩发给奖状，但是……云云，也就是重复一遍前次说过的那些话。自然，全班学生热烈鼓掌，盛况空前。王子被领回家去，品行优良的小学生们如同真正品行优良的一群听话的孩子，也离开课堂作鸟兽散，傍晚时分就挽着太太的手臂在罗耶尔宫里闲逛，美丽的喷泉那水柱的喷溅声声入耳，如此等等，如此等等，如此等等，总而言之，秩序稳定，一切平安。

有一次我们在法院的中央大厅里走错了路，本来应该到刑事审判庭去，却误入民事审判庭。一位穿长袍戴帽子满头卷发的律师正在发表演说，妙语如珠，如天花乱坠。庭长、法官、律师和听众正在欢乐的波浪中飘浮，一片恬淡宁静之态。我们踮着脚走了进去。这是一宗遗产继承案件，牵涉到几个看破红尘的教士。原先那些与世无争的教士，现在不断地涉讼，大多是遗产继承问题。揭露出了最为丢脸、极其卑鄙无耻的丑事，可是公众一言不发，几乎没有人敢出头闹事，因为看破红尘的教士现在拥有很大的权力，而资产者又是非常之品行优秀的。教士们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当个财主比什么都强，比这些幻想和别的一切都好；你只要攒了钱，你就会有势力，嘴巴上会说话又有何用！现在你单凭能言善辩是没有用的。不过，据我看，就后面这一点而言，他们有点失算了。当然，当个财主是件大好事，但对法国人来说，能说会道是可以办出很多事情的。太太们主要是听从教士的劝导，这种情况现在比过去更加明显。资产者也有转向这方面的可能。在审案过程中揭露，看破红尘的教士长期以来怎样以巧妙的甚至是科学的（他们有一

种科学来办这类事）方法引诱一个富豪之家美貌的女子，使她入迷；他们又怎样把她骗到修道院里住下来，怎样有预谋有步骤地使用各种恐怖的手段威胁她，弄得她神经错乱，弄得她生病，最后终于把她吓出了病，吓成神经错乱。于是又警告她与家属相见是上帝所不容的最大的罪恶，逐渐就把她同家里人完全隔绝起来。"甚至连她的侄女，一个童心未脱的小姑娘，十五岁的纯洁无瑕的天使，甚至连她都不敢进入她所热爱的姑妈的房间。姑妈爱她胜过尘世上的一切，却因为中了奸人的诡计，不能去拥抱她，吻她的处女的前额，那是纯洁的白衣的天使栖息之地"……总而言之，都是这一类话。说得真是妙极了。看来，发表演说的这位律师高兴得人都软了，他居然说得这么动人。庭长人软了，听众也软了。看破红尘的教士宣告败诉，唯一的原因就是不善于辞令。当然，他们并不泄气。失败一次，会赢来十五次。

"这位律师叫什么名字？"我问热心的听众中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听众中大学生很多，品行都是极为优秀的。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朱尔·法弗尔① 啊！"他终于回答说，那神气是轻蔑中带着可怜，当然，使得我大窘。但因此却使我得到机会在所谓主要的发源地见识了法国能言善辩的花朵了。

可是这种发源地是数之不尽的。资产者之卖弄口才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有一次我们进入先贤祠②瞻仰伟人。

---

① 法国著名律师，是议会中五名反对派议员之一。

② 巴黎的一座建筑，原为圣吉纳维夫教堂，1789 年后改作先贤祠，存放法国伟人的棺木。——译者注

我们来的不是开放的时间，因而收了我们两个法郎。然后一位令人起敬的残废的老人拿了钥匙，领我们向教堂中低于地面的墓室走去。一路上他一直像平常人那样说话，只因为缺了几个牙齿，有点含糊不清。但是一走下墓道，把我们领到第一座坟墓前面，他立刻唱歌似的说了起来：

"此处安葬着伏尔泰。——伏尔泰，这是美丽法兰西一位伟大的天才。他根除偏见，扫荡愚昧，反对黑暗的精灵，高举启蒙的明灯。他的悲剧创作也达到了化境，虽然法兰西有了高乃依①。"

显然，他是按照背熟的稿子说的。有人以前给他把解说词写在纸上，他背得滚瓜烂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他开始向我们显示他那高雅的词句时，他那和善而衰老的脸上甚至露出得意之色。

"此处安葬着让·雅克·卢梭，"来到另一座墓前，他接着又说，"让·雅克，是一个喜爱自然和真实的人！"

我忽然觉得可笑。高雅的词句可以把任何事物弄得庸俗不堪。显然，这位可怜的老人在使用自然和真实两个词的时候，根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真奇怪！"我向他说，"这两位伟人之中，有一位一辈子把另一位叫作撒谎的人和坏蛋，另一位又把那一位叫做傻瓜②。可是他们在这里却几乎并排躺在一起。"

---

①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开创了古典主义戏剧。——译者注

② 伏尔泰和卢梭长期不和，互相攻击。伏尔泰把卢梭当作反面人物写进他的讽刺作品《日内瓦的内战》里，卢梭则在《山间来信》中揭露伏尔泰是"不信基督的人"。

"先生，先生！"残废人想反驳我的论调，但没有说出口，只喊了两声，急忙把我们引到下一座墓前。

"此处安葬着拉纳，拉纳元帅①。"他又一次朗诵起来。"法兰西英雄辈出，他是法兰西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不仅是伟大的元帅，用兵如神的将领，仅次于伟大的皇帝②，而且还享有最大的荣幸。他是一位伟人的朋友……"

"是呀，他是拿破仑的朋友。"我说，想快一点结束他的演说。

"先生！请让我来说。"残废人打断我的话，口气中似乎有几分不高兴。

"您说吧，说吧，我听着。"

"而且他还享有最大的荣誉，他是伟大皇帝的朋友。其余元帅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幸成为伟大人物的朋友，唯有拉纳元帅获得这种殊荣。当他血战沙场为国捐躯处于弥留之际……"

"是呀，炮弹炸断了他的两条腿。"

"先生，先生！请让我来说，"残废人大叫起来，简直要发怒了，"这些事您也许都知道……不过请让我来说！"

这个古怪的家伙非常喜欢由他来叙述，虽然这些事我们早就知道了。

"当他处于弥留之际，"他又重复一句，"在保卫祖国的沙场上，皇帝心中万分震惊，为沉重的损失而悲痛

---

① 拉纳（1769—1809），法国元帅。
② 指拿破仑一世。——译者注

……”

“就来同他诀别，”我忍不住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于是立刻感到自己干了一件傻事，羞愧万分。

“先生，先生！”老汉说，用责备的眼光直视着我，不满地摇着他那花白的头发，“先生！我知道，我相信所有这些事您都知道，也许比我更清楚。但是是你们自己要把我找来作向导的，那就请让我来说吧。现在我只有几句话就讲完了……

“那时候皇帝心中万分震惊，为沉重的损失而悲痛（唉，已于事无补），他、军队和全法兰西都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他走到他的病榻前作最后的诀别，以此来减轻几乎当着他的面死去的他的统帅所受到的非人的痛苦。——先生，现在完了。”他补充了一句，又用责备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继续向前走去。

“这里也是一座坟墓；这里是……几位元老院的议员。”他冷冰冰地补充了一句，朝着不远处几个坟墓随便地点了点头。他的滔滔不绝的口才在伏尔泰、卢梭和拉纳元帅身上用尽了。这是一个可说是从民众中出现的喜欢卖弄口才的直接的例证。国民大会、国民议会和各个俱乐部，以及人民几乎直接参与并从中得到潜移默化的那些地方，发言者的长篇大论对人民所产生的影响，难道仅仅是培养了他们为辞令而辞令的爱好吗？

第八章

小鸟和“我的宝贝”

太太是什么？前面说过，太太们的生活是幸福的。说

到这里，你们会问：为什么我写成太太，不写作妻子？这是高雅的称呼，先生们，这就是为什么。资产者如果使用高雅的称呼，通常总是说“我的太太”。虽然在别的社会阶层，称呼起来非常简单，到处都在说“我的女人”，即我的妻子，但是以遵循大多数和高雅的表达方式的民族精神为好。这种方式更富有特色，何况还有别的一些称呼。当资产者内心受到感动或者想欺骗妻子的时候，他总是称她“我的宝贝”。反过来，恩爱的妻子在撒娇的时候就把她那位可爱的资产者叫作“小鸟”，叫得资产者非常开心。“小鸟”和“我的宝贝”始终兴盛不衰，现在则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流行。此外，根据约定俗成（几乎不费任何口舌），“我的宝贝”和小鸟在我们现时繁忙的社会中应当成为美德、和睦以及理想境界的榜样，借以谴责荒谬绝伦而一无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那卑劣的妄想。除此之外，小鸟在夫妻关系中一年更比一年通情达理了。他逐渐明白，不管你怎么费口舌，怎么安排，“我的宝贝”总是掌握不住；巴黎的女人天生要偷情，没有哪个丈夫能不戴绿帽子的。自然，当他手里攒的钱还少，家产也还不多的时候，他只能一声不响。当两者都达到目标以后，小鸟的管束大体上就变得比以前严格得多，因为他开始极为重视自己的名誉了。这时他对居斯塔夫也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特别是如果这一位既穿得褴褛不堪又家无恒产的话。总的来说，巴黎的男人，凡是有一点钱的，如果想结婚，都要挑选一个有一点钱的新娘。不仅如此，他们事先都算过一笔账，如果双方的法郎和物力相等，那么两人就成其好事。这种情形到处都是，而钱袋的重量相等的原则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的

风尚。比方说，如果新娘方面哪怕多出一分钱，家里就不愿把她下嫁给少一分钱的求婚者，另去物色钱多的小鸟。除此之外，基于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几乎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这种钱袋的重量必定相等和金钱结合的良好风尚，几乎从未遭到破坏，而且我认为比起别的地方普遍存在的情形来更加难于被破坏。资产者掌握了妻子的钱，就会给自己弄到很多好处。这就是为什么他准备在很多场合对于“我的宝贝”的外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及对于别的不愉快的事情不愿加以追究的缘故。因为那样一来，也就是一旦发生争执，难免要提出令人尴尬的嫁妆问题。而且如果“我的宝贝”有时候过分奢侈地打扮起来，那么小鸟虽然全都看在眼里，也只好暗中宽慰自己：妻子以后不大会向他要钱做衣服，到那时候“我的宝贝”就会更加容易被说服了。最后，由于婚姻大多是金钱的结合，对双方的志趣很少加以关心，于是小鸟就不反对把眼睛从自己的宝贝身上移到旁的什么地方去。所以最好是互相不要妨碍。那么家庭就更加和睦，夫妻之间越来越多地使用亲热的口气和亲热的名字如小鸟和“我的宝贝”来称呼了。结果，如果把话说穿，那么小鸟在这种情况下是能够为自己获得非常安全的保障的。警察分局局长随时来为他效劳。而且完全根据法律办事，这些法律是他为自己制定的。在紧急情况下，如果当场抓获奸夫淫妇，他可以把他们两人全都杀死，不受任何处罚。“我的宝贝”知道这一点，还满口加以称赞。“我的宝贝”由于长期受到监管，已毫无怨言，如同在某些野蛮而荒诞的国度里那些女子一样，也丧失了比如进大学念书或者去俱乐部和议会开会的幻想。她宁愿

保持现有轻松的、所谓金丝雀似的状态。她被打扮起来，戴上手套，带去消遣；她跳舞，她吃糖果，她在表面上被当作皇后看待，男人在她面前装得一钱不值。各方面关系的这一形式制造得非常成功，非常得体。总而言之，维持着一种骑士的关系即可，此外还需要别的什么呢？她的居斯塔夫也不会被弄走。至于生活中美好的崇高的目标之类，诸如此类，她也并不需要，因为就实质而言，她也是资本家，一毛不拔的家伙，与她的丈夫无异。当金丝雀似的年代逝去，也就是说，到了再也无法欺骗自己、再把自己看成是金丝雀的时候，即使充满了狂热的自命不凡的幻想而生活中出现新的居斯塔夫的可能性已成为绝顶荒唐的时候，“我的宝贝”突然之间很快变成了另外一个其丑无比的女人。娇媚之态消失了，穿着打扮随便了，快乐活泼的神色也没有了。她基本上变成了个横眉怒目的管家婆。各个教堂之间来回地跑，同丈夫一起攒钱，突然之间全身透露出一种蛮不讲理的态度，突然之间显得疲倦、委屈，表现出粗暴的本性；盲目地度日，粗俗地谈话。其中有些人甚至变得邋里邋遢。当然，不完全都是这样；当然，另外也有比较光明的现象；当然，这种社会关系是到处可见的，不过……在这里带有更多的土生土长的特点，更有特殊性，更有自己的特色，表现得更充分，在这里更富于民族性。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源泉和萌芽，这种形态现在作为一个伟大民族永久的仿制品统治着全世界。

是的，“我的宝贝”在表面上是皇后。她在社交圈子里、在大街上到处受到的礼遇是多么的无微不至，受到的关怀是多么的令人心烦，是很难想象的，其登峰造极的程度实

在惊人。有时甚至弄得像玛尼洛夫[1]再世似的，腻得叫一些正直的人无法忍受。这种矫揉造作的明显的两面手法，实在是对她们极大的侮辱。但是“我的宝贝”本身就是个大滑头，而……她所需要的就是这一点……她经常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愿意经常要点滑头，不想于心无愧地笔直地走路。说得更确切一些，按照她的意见，就是要多玩点花样。玩点手腕，要些诡计，对于“我的宝贝”来说就是一切，就是天大的事。于是她们穿着打扮起来，于是她们招摇过市。“我的宝贝”卖弄风骚，失去常态，一身的别扭，但这样却能迷惑人，特别是那些想换换口味的和有些荒淫无度而对新鲜的天然的美丧失了辨别能力的人。“我的宝贝”变得很坏了；她们有小聪明，小心眼，可是打扮得娇滴滴的，又掌握了玩弄把戏和制造绯闻的无数技巧，你不得不拜倒在她的裙下，跟着她走，好像追逐一种新奇的刺激一样。她们的模样甚至非常美丽，世间少有，那张脸甚至是恶狠狠的；但这没有关系，因为这张脸孔表情丰富，眉飞色舞，掌握了极其逼真地伪造感情、伪造自然的技巧。也许你喜欢她的不只是她伪造得天衣无缝，而是这种成功地伪造的过程使得你着迷，艺术使得你着迷。对于巴黎大多数的男人来说，真正的爱情也好，伪造得可以乱真的爱情也好，都是一样的。也许伪造的爱情更觉得有趣一些。东方人对女人的看法在巴黎越来越流行，茶花女越来越时兴了。对茶花女的要求是：“把钱拿去，骗得像样一点；也就是说，装个爱情出来吧！”对太太的要求也不过如此，这样至少也感

---

①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一个人物。——译者注

到心满意足，因此居斯塔夫也就被宽容地默许了。而且资产者心里明白，“我的宝贝”渐渐年老，会了解他的重要性，会全心全意帮着他攒钱。即使在年轻时也在竭力帮助他。她有时掌管买卖的全过程，引诱顾客上钩。总而言之，是他的左右手，是他的大伙计。有那么一个居斯塔夫，在这时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妇女在大街上是不可侵犯的。没有人敢侮辱她，所有人都为她让路，不像在咱们这里，稍为年轻一点的女人在大街上走不了两步路，就有一个军人或者好色的家伙斜着眼睛从帽子底下看她，并且要求同她认识。

不过，尽管会有居斯塔夫插足的可能，小鸟和“我的宝贝”之间的关系，从日常和喜庆时表现的形式看来，是相当亲密的，甚至常常是纯朴的。总的说来，外国人——我一眼就可看出他们——几乎都比俄国人纯朴，无可比拟。这一点很难说清楚，需要自己去观察。“俄国人喜欢怀疑，又喜欢嘲笑人。”法国人在这样议论咱们①。一点不错。我们大多是厚颜无耻的人，不重视自己，甚至不爱自己的东西，至少是不尊重到了极点，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大谈欧洲和全人类的利益，不分哪个民族，因此对一切自然而然就表现得更为冷淡，好像是为了尽义务，并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显得更加脱离实际。不过，我也脱离本题了。小鸟有时是非常纯朴的，比方说，绕着喷泉散步的时候，他会向他的宝贝解释为什么泉水向上喷，向她说明自然界的

① 作者此处指法国作家阿·居斯蒂纳在《俄罗斯，1839》一书中所写的旅俄观感，继《彼得堡纪事》一文之后再度予以批评。

规律，向她描述布洛涅森林公园①的美景，凡尔赛大喷泉的虹彩和嬉水，拿破仑皇帝的伟烈和光荣的战功，心头涌上一种民族的自豪感；引起她的好奇和满足，觉得是一种享受，而且从中得到许多乐趣。“我的宝贝”是非常狡黠的，也含情脉脉地抚爱自己的丈夫，就是说并不是做作的，而是出自真心的温柔，尽管已经给丈夫戴了绿帽子。自然，我并不奢望把一座座屋顶都掀开，像勒萨日②笔下的魔鬼那样；我只是叙述我所目睹、我所感觉到的东西。“我的丈夫还没有去过海边。”有一位宝贝在对你说，声音之中流露出真诚的朴实的同情。这说明丈夫既没有到布勒斯特也没有到布洛涅③去看大海。应当了解，资产者有某种极为天真又极为严肃的要求，这种要求几乎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普遍的习惯了。比如，资产者除了敛财和炫耀辞令的要求之外，还有为普遍的习惯所尊重以及他们极其认真地对待、几乎令人为之动容的两大十分合乎情理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是voir la mer，即观沧海。巴黎人一辈子居住在巴黎，有时或者做做生意，没有见过大海。为什么他要观沧海呢？他本人也不知道，但他有强烈的愿望，有切身的要求，只因平日有事务缠身，行期年复一年地往后推移。他记挂着大海，他的妻子真诚地为他发愁。总的来说，这里面甚至包含着

① 位于巴黎西郊。——译者注

② 勒萨日（1668—1747），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跛足魔鬼》，描写一个大学生解救了关在瓶子里的魔鬼，魔鬼带着他飞到马德里上空，把所有屋顶掀开，让他看每家隐秘的生活。作者假托西班牙的故事来描写法国社会，把资产者写成是“第三等级的盗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提到勒萨日，也不是偶然。

③ 布勒斯特，法国西部海港；布洛涅，法国北部港口城市。——译者注

许多令人同情的东西。我尊重这种感情。最后他终于抽出了时间，拿出一笔钱；他准备花它几天去“观沧海”。回来后他向妻子、亲戚、朋友大谈他的观感，兴高采烈，两分说成三分，整整一生都要回忆他曾经见过大海，心里乐滋滋的。资产者，特别是巴黎的资产者，另一个合乎情理的要求是在草地上打个滚，其强烈的程度不比前一个要求逊色。事情是这样的，巴黎人一来到郊外，特别喜欢在草地上打个滚，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天职，他履行这一天职时甚至带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这样做是与大自然融合成为一体了；而且特别喜欢这时候有个什么人看见他们。巴黎人到了郊外普遍认为刻不容缓的义务就是立即变得更加放肆一些，轻松一些，甚至年轻一些。总而言之，显得更加自然一些，是个与自然界的关系更加密切的人，是喜爱自然和真实的人！资产者身上的这种对自然的百倍的重视，是不是从卢梭开始的呢？但是，这两个要求——观沧海和在草地上打滚，巴黎人大多是在拥有财富以后，总而言之，只有当他开始重视自己的声誉、自视甚高，并且把自己当作一个人物来看待的时候，才允许自己提出来的。而如果这块草地是他用自己劳动所得的钱购买的，那么在那上面打个滚甚至有两倍的、十倍的乐趣。资产者在摆脱俗务之后，普遍地喜欢购买一块地皮，兴建自己的住宅、花园，围上篱笆，养鸡养牛。即使这些东西规模极小，也没有关系，资产者会像孩子似的惊喜地大喊：“我的树，我的墙。”他会时刻向自己以及所有应邀来家的人重复这句话，并且一辈子都会自言自语个不停。在自家的草地上打个滚比什么都快乐。为了履行这个天职，他必定在住房前面整出一片草

地。有人曾经告诉过我，有个资产者那块预定充作草地的地段上说什么都不长草。他施肥、浇水，铺上别的地方挖来的草皮，沙土上仍然寸草不长，草影全无。结果住房前面就成了这么一块不毛之地。后来他好像买了一块人工的草皮；为这件事他专门去了巴黎，在那里定购了直径约摸一丈大小的一捆草皮，每天午后把它铺开来，以假作真，聊以自慰，总算满足了自己合乎情理的要求，在草地上打个滚了。资产者在享受到拥有私有财产的狂喜的最初时刻，也许是会这样做的，因此从他的内心世界来看，这一点丝毫不必怀疑。

但要就居斯塔夫说两句话。当然，居斯塔夫与资产者是一回事，也就是店员、商人、小官吏、文人、军官之类。居斯塔夫是未婚的光棍汉，但同样是只小鸟。不过问题不在这方面，而在于居斯塔夫现在是什么打扮，现在仪表如何，现在身上披的羽毛怎么样。居斯塔夫的典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通常在戏台上表现出来的他的形象同社交场合中所出现的并无二致。资产者特别喜欢看通俗笑剧，但更喜欢情节剧。廉价的快活的通俗笑剧是唯一的几乎不可能移植到别的土壤上去、只能活在它的出生地巴黎的艺术作品；通俗笑剧虽然能够吸引资产者，但不能使他得到完全的满足。资产者仍然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他需要高级的、需要不可名状的正人君子风度，需要激动人心的东西，而情节剧包容了这些东西。巴黎人如果没有情节剧便无法活下去。只要资产者活着，情节剧便不会消亡。有趣的是现今连通俗笑剧也脱胎换骨了，它虽然仍旧同从前一样趣味无穷，但现在开始掺进了大量别的成份——劝善

惩恶。资产者非常喜欢说教，现在并且认为在任何一个适当的场合为自己和自己的宝贝宣读箴言是最神圣最必要的事。而且资产者现在掌握的权力是没有限制的，他就是力量；而编写通俗笑剧和情节剧的总是一些走狗，历来谄媚权势。这就是为什么资产者即使被描写得很可笑，现今仍然得势，最终总是听到禀报说天下太平的缘故。应当想到这种禀报对资产者是极大的安慰，任何一个对本身事业的成功缺乏信心而胆怯的人，都需要劝慰自己，鼓励自己，安抚自己。他甚至会去相信祥瑞的出现。在这里也不例外。情节剧中指出了崇高的品格和深奥的教训。其中没有幽默，其中有的是小鸟所极为喜爱、极为关心的一切事物的令人激动的胜利。他最为关心的是政治上的安定和聚敛财富的权利，其目的在于安排一个更加安定的内部。现在写的情节剧都是这种性质。现在连出场的居斯塔夫也都是这种性质。从居斯塔夫身上时常可以检验出小鸟们当前把哪些东西奉为不可名状的正人君子风度的标准。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了，居斯塔夫是某种诗人，画家，没有受到公认的才子，他遭到虐待，受尽排挤和打击之苦。他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结局总是：一位秘密地热爱着他而为他所不屑一顾的子爵夫人，把自己的养女塞西尔介绍给他。她本来一文不名，忽然间有了数不尽的钱。居斯塔夫通常总是表示抗拒，瞧不起钱。可是恰好他的作品在展览会上大受欢迎，有三位可笑的贵族立刻闯进他的住宅，愿意每人付给他十万法郎预购他今后新作的画。居斯塔夫对他们报以轻蔑的一笑，在痛苦的绝望中宣称这些人都是坏蛋，不值得他动笔；他不能把艺术、神圣的艺术拿去叫不足挂齿之徒任意糟蹋，他

们直至今日仍然有眼不识他的伟大。但是子爵夫人又闯了进来，宣称塞西尔爱他爱得快要死了，所以应当作画。这时居斯塔夫方才明白，子爵夫人从前曾经和他作对，他至今没有一幅画在展览会上展出，都是因为她从中作梗之故。她秘密地爱着他，出于妒嫉之心才对他进行报复。自然，居斯塔夫把三位贵族又痛骂了一顿之后，当即从他们手上接过了钱，这使得他们也非常之满意。然后他跑到塞西尔那里去，同意接受她的百万家财，原谅了那位回到自己领地上去的子爵夫人，于是履行合法的手续成就了好事，开始生儿育女，穿上法兰绒衣服，戴上棉帽，每天晚上伴着"我的宝贝"在美丽的喷泉旁边散步，自然，那水柱轻轻地喷溅声使他想起了他的人间幸福的长存、持久和宁静。

有时候是另一种情况：居斯塔夫不是什么店员，而是某个受尽虐待不敢反抗的孤儿，但他在内心里充满了不可名状的正人君子的气质。忽然之间发现他并不是什么孤儿，而是罗思柴尔德①一个亲生的骨肉。他名下有几百万财产。但居斯塔夫傲慢地不屑一顾地拒绝了几百万财产。为什么？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于是有一位博普莱太太闯了进来；这是一位银行家的太太，早已钟情于他，他就在她丈夫手下服务。她宣称塞西尔爱他爱得快要死了，让他快去救她一命。居斯塔夫推测是博普莱太太在爱着他，他收集起那几百万，用尽所有不堪入耳的言词痛骂天下人完全没有他那样的不可名状的正人君子风度之后，就到塞西尔那里去与她成就了好事。银行家太太前往自己的领地。博

① 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欧洲一个著名的银行家家族。——译者注

普莱取得了胜利，因为妻子从毁灭的边缘转过身来，一直保持着洁白无瑕；而居斯塔夫生儿育女，每到黄昏都在美丽的喷泉旁边散步，那水柱的喷溅声使得他想起了如此如此云云。

现在不可名状的正人君子风度也特别经常地表现在作战的军官身上，或者军队中的工程人员身上；或者表现出类似的一种气派，只不过军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经常，而且一定是佩带着荣誉团①的标帜的，那标帜是"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这里我要说一说，这个标帜可怕极了。佩带的人因为有了它而不可一世，几乎不能向他迎面走去，不能跟他同坐一节车厢，不能一起看戏，不能同在馆子里吃饭。他简直可以往你脸上吐口水。他可以肆无忌惮地任意摆布你，他可以放肆地喘气放屁，最后使得你恶心大吐，弄出了黄疸病，不得不请医生救命。但是法国人非常喜欢这个玩意儿。更妙的是现在舞台上对博普莱先生特别另眼相看，至少比以前要重视得多。博普莱显然攒了许多钱，弄到了非常多的财产。他坦率，纯朴，由于他那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以及他作为一个丈夫而显得有几分可笑；而在怀疑"我的宝贝"对他不忠而深感痛苦的那幕戏里，他却表现得正直善良，心胸宽阔。但他仍然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她。自然，结果表明她是洁白的，像一只鸽子那样；她之所以爱上了居斯塔夫，只不过是闹着玩罢了。而以他的宽阔的心胸使她受到感化的小鸟，则是她最宝贵的人。自然，塞西尔同以

---

① 拿破仑一世于1802年创立的一个荣誉社团，对法国有殊勋者得列名为会员。——译者注

前一样穷苦之至，但只是在第一幕里，后来她有了百万家财。居斯塔夫像往常一样地傲慢，非常正派，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只不过更加放肆了，因为他是军队的栋梁。他在世上看得最宝贵的是他那用鲜血换来的十字勋章，以及“家父的一把佩剑”。关于他父亲的这把剑，他随时随地不分场合总要说个不休，你甚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破口大骂，唾沫横飞，而大家对他都诚惶诚恐，观众却痛哭流涕，热烈鼓掌（确确实实是痛哭）。自然，他没有钱，这是必要的条件。自然，博普莱太太爱上了他，塞西尔也爱他，但他没有料到塞西尔会爱他。塞西尔在接连五幕戏中一直为爱情而忍受着痛苦。最后下了雪或者发生了类似的什么事，塞西尔想要往窗口奔去，但是窗下响了两下枪声，大家都跑了过来。居斯塔夫脸色苍白，一只手吊着绷带，慢慢地走到舞台上。用鲜血换来的勋章绶带在他的紧身短大衣上闪光。诽谤和勾引塞西尔的人受到了惩罚。最后居斯塔夫忘记了塞西尔爱着他，也忘记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博普莱太太闹的把戏。但是博普莱太太吓得脸色发白，居斯塔夫猜想她在爱着他。然而又响起了枪声，这是博普莱因绝望而自杀。博普莱太太尖叫着向门口奔去，但是博普莱本人出现了，手上拿着被打死的一只狐狸或者别的什么野物。作了一番说教，他的宝贝要永远牢牢记在心里。她偎依在小鸟的怀里，他一切都不再计较。可是忽然之间塞西尔有了百万家财，居斯塔夫又一次进行反抗。他不想娶她，居斯塔夫执意不肯，居斯塔夫用不堪入耳的词句破口大骂。一定要让居斯塔夫用不堪入耳的词句破口大骂，唾弃这百万家财，否则，资产者就不会原谅他；不可名状的正人君子

风度就将所剩无几了。但请不要以为资产者会自相矛盾。请放心吧，这幸福的一对是不会与百万家财擦肩而过的，它注定了最终必将成为一种对美德的奖励。资产者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的。居斯塔夫最后收下了塞西尔的一百万，因而又开始了老一套的喷泉，棉帽子，水柱的喷溅声等等，等等。于是出现了许多动人的场面，一大堆不可名状的正人君子风度；出现了以在家庭生活中表现的美德获得称赞并征服了所有人的博普莱。而主要的，主要的是出现了那百万家财；它是天意，是自然规律，全部荣誉、光荣和尊崇等等都属于它。小鸟和“我的宝贝”走出戏院大门时都是满心的欢喜，无忧无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居斯塔夫陪着他们出去，把别人的宝贝搀上出租马车，轻轻地吻着她的小手……一切都十分得体。

1863 年

译 后 记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国读者中早已以他的长篇小说享有盛誉。他的姓名的全称是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 年 11 月 11 日（俄历 10 月 30 日）生于莫斯科，父亲是医生。1838 年前往彼得堡进入工程学校就读，1843 年毕业，在工兵部队一个工程局的绘图室充当工程师。1844 年 10 月辞职，以写作为生。1846 年发表长篇小说《穷人》。1847 年 4 月写作一组题为《彼得堡纪事》的小品文，并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1849 年 4 月 23 日被捕入狱，11 月中宣判处以死刑。12 月 22 日押赴刑场枪决，正当束手待毙时却逢特赦，改判劳改四年，两天后即发配西伯利亚的小城鄂木斯克服苦役。1854 年刑满，被移送另一小城塞米帕拉金斯克当兵。1856 年 10 月获升为准尉。1857 年 2 月与玛丽娅·伊萨耶娃结婚。1859 年退伍，离开西伯利亚，迁至特维尔城（位于莫斯科与彼得堡之间）居住。同年年底获准重返彼得堡。1860 年 9 月协同胞兄筹办《当代》月刊，撰写征订启事在几家报刊上发表，创刊号于 1861 年 1 月出版。1862 年 6 月赴德、法、英、意

等国旅行，写成长篇游记《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1863 年 5 月《当代》月刊遭查禁。1864 年另办《时代》月刊。不久妻子和胞兄相继病故，《时代》月刊也因经费无着而于 1865 年 6 月宣告结束。1867 年 2 月与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斯尼特金娜结婚，旋即旅居国外，至 1871 年 7 月回到彼得堡。1873 至 1874 年编辑《公民》杂志（每周出版一两期），开辟“作家日记”专栏；1876 年后沿用这一名称另办一份独立的杂志，专门刊登本人写的杂感、评论、随笔和回忆录等。从 1874 年开始曾四次前往德国的小城巴特埃姆斯温泉疗养，写了《车厢里的俄国人》、《不可思议的怪事》等文。1879 年在彼得堡的文学晚会上曾两次朗诵《在耶稣身旁过圣诞节的小男孩》。1880 年 5 月由住地旧鲁萨城抵达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办的大会上发表题为《普希金》的演说。1881 年 2 月 9 日（俄历 1 月 28 日）因肺部大出血于彼得堡寓所逝世。一生著有长篇、中篇小说各八部，另有短篇小说、报告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文章。

二

本书收作者的散文二十九篇，计二十万字，大多选自上述的《作家日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的海洋中，这只不过是一捧水珠、一串浪花而已。那么，这二十九篇文章是根据什么标准挑选的呢？坦白地说，要把作者的字数以百万计的散文全部收集起来从头至尾通读一遍，再从中细加选择，我们自愧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和条件。我们只能用一点取巧的办法，向朋友们请教，向书本请教，以

决定取舍。现在收集在这里的二十九篇散文，可分为三类：一是作者的名篇（如《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农民马莱》等），二是表达了作者的某一方面观点而引人瞩目乃至招来批判的（如《征订 1861 年〈当代〉月刊启事》以及评论《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等），三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回忆（如回忆青年时代生活及与几位作家的交往等）。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们在这里稍作介绍。《彼得堡纪事》是作者年轻时为《圣彼得堡新闻报》的专栏撰写的小品文，那时作者风华正茂，他在文中广泛描写了彼得堡的市民生活和世态，热情充沛，文笔泼辣，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的风俗画。他笔下的“幻想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典型；他拿德国人和俄国人作对比而刻划的不同的国民性，令人大开眼界；他抓住的一个名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公务员的形象，据学者研究，在以后他的两三部作品里一再出现，显示了他年轻时观察力之敏锐和艺术概括力之深厚。他批评一个法国旅客对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不同的观感，表现了他既反对一味崇洋又不赞成盲目地尊古、区别于当时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独特的见解，这种态度终其一生而未变，可见他早年的思想对他终身的影响。二十六年以后，他又为彼得堡的生活画了一幅素描，这就是《小小的图景》。这时他的年龄正好翻了一番，历经沧桑，笔底的热情渐见收敛，而诙谐如旧。他以苍凉而凝重的笔法写彼得堡冬季街头的马车，假日傍晚在户外闲逛的工人，生活是暗淡的，气氛是沉闷的，与《彼得堡纪事》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关于一个工人带着孩子走亲戚归来的描写，大为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所称道，认为他的观察和想象都

是令人惊奇的。《带着一只手的男孩》和《在耶稣身旁过圣诞节的小男孩》也写彼得堡的生活，作者把注意力转向了儿童。它们完全来自想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坚实的基础，阴冷的地下室和院子里柴堆背后雪地上悲惨的事件的发生在当时是必然的。两篇文章早已被翻译成欧洲各国文字，翻译成中文恐怕还是第一次。《百岁老人》写的也是彼得堡贫民的生活，作者根据听来的一段对话写成了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这只是平凡的生活场景，却组成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们在无声无息地活着，又无声无息地死去。《再谈妇女》则描写了彼得堡一个纯洁高尚的少女形象，读后不禁使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女性。

作者于 1877 年曾拟了一个十年写作计划。其中包括一部回忆录，可惜未能遂愿。他留下的回忆极少，《信使》、《被捕之夜》和《农民马莱》等都只是片断，却十分珍贵。《农民马莱》是作者追记二十多年前在西伯利亚劳改队里回忆童年生活之作，回忆中套着回忆，写法别开生面。文章的主要思想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粗鲁的农民，心地却是善良而高尚的。《当代的一种伪善》是一篇论战的文字，作者以他年轻时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情况作为论据，谈到他的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们把它当作回忆录来看待。

德国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挖苦的对象，又是赞美的对象，这里有两篇文章很有意思：《车厢里的俄国人》和《不可思议的怪事》，作者又一次把德国人拿来与俄国人作比较。从他的毫不夸张的描写中，我们似乎也看到我们中间一些人的影子。

《征订1861年〈当代〉月刊启事》一文不妨说是广告，实际上应该看作他的文学宣言。启事中阐述了刊物的指导思想和宗旨，公布了编辑计划，同时也对时局发表了议论。他批评彼得一世的改革排斥了人民，主张知识分子立足于本土，改变脱离人民的状况，通过教育等手段使人民接受现代文明。他抨击文坛的积弊，宣称《当代》不依附于名家和权威，将批评不良倾向，不回避争论。这样一篇尖锐的文字，自然会招来激烈的反应。

《当代》曾发表欧美几位作家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写了几篇编者按，对它们作了精辟的评论。《略谈乔治·桑》一文虽非同时所写，因性质相近，就放在一起。

接下来的是文学回忆录和对俄国作家作品的评论。在《旧时相识》一文中，作者把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作了比较，对他们两人都有不敬的言词。《一件私人的事》叙述了作者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短暂的交往，并就他的中篇小说《鳄鱼》被诬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射”作了驳斥。《俄国的讽刺……》一文回忆别林斯基在他踏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对他的鼓励和帮助；写作这篇文章时别林斯基已去世二十余年，二人的分歧从未消除，但他对别林斯基一直怀着感激之情，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他和别林斯基的关系，更可以了解他的为人。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发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了一组文章加以评论，这里选译了一篇。文章中引起注意的是他对于人类犯罪问题所持的观点。他认为犯罪的根源是社会的不正常状态，但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仍然不能消灭犯罪，因为任何社会制度都避

免不了恶的存在；而恶也不是很容易铲除的，因为它隐藏在人的灵魂深处。那么如何解决犯罪问题呢？他也没有开出药方来。这篇评论自然也难逃挨批的命运。

关于涅克拉索夫，作者在四篇文章中不仅高度评价了他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就（认为他在俄国诗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对当时议论纷纷的涅克拉索夫的“务实”的一面（说明白了就是钻营弄钱），不计较与他长期的不和，挺身而出予以辩护，同时也从原则上批评涅克拉索夫脱离人民，是高踞在人民之上而怜悯人民的好心肠的老爷。

1880 年 6 月关于普希金的演说，是一篇重要的作品，当时曾在莫斯科的报刊上发表，同年 8 月间在自办的《作家日记》杂志上重新刊出全文，并针对一些人的批评加了一篇说明作为答复。这篇演说分析了普希金的作品及他的笔下“多余的人”产生的根源，指出普希金在文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开辟了通向人民的道路。据作者本人的概括，全文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一，普希金指出了俄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问题是脱离了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又对俄国失去了信心。二，俄国人民的积极的美的典型，只存在俄国人民身上，俄国人民中间，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三，普希金对世界各个民族都有一种感应的能力，他具有充分表现别的民族的民族特色的才能，这对俄国作家是一个重大的启示。四，这种才能是俄国所培育的，为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这篇演说赢得了许多人的赞扬，也惹来不少人的反对，特别是演说中的一句话：“顺从吧，骄傲的人”，本来是分析多余的人时说的，却被批判为呼吁放弃

革命斗争、与现存制度妥协的“绝望的狂叫”。

本书最后一篇散文是《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1862年初次出游欧洲五国后所写。全文八章，第一章记柏林、科隆和德累斯顿的印象；第四章写法国的警察对入境旅客的防范情况；第五章叙述伦敦的夜市所见，特别描写了工人贫困的生活景象；第七八两章分析法国社会及巴黎市民心态，他的笔锋深入到资产者的家庭，挑开了温情脉脉的窗纱，暴露了金钱在家庭关系中的威力。其余各章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议论。他对那时欧洲文明的批判十分具体，又相当尖锐，据某些学者研究，其程度接近于当时的民主思想；他在谴责西欧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后所得出的结论，又与斯拉夫派相去不远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斯拉夫派，他本人也不承认。不过他大力强调反对把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俄国的榜样；他大声疾呼面向人民，主张从人民中寻找社会进步的力量，这却是当时的西欧派所忌恨的。

反对以西欧为师，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主要思想，仅仅是这样一个思想，就够他受的了。大家知道，长期以来他一直被一些人当作反动作家看待；他的作品，包括小说和散文，虽然有几句赞扬之声，也一直受到批判，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了。前面已提到过他挨批的事，这里再举有关的两个例子。他在几篇文章中主张面向人民，把人民当作立足的根基，被批为“反对进步，主张倒退”，因为他所说的人民“是指人民身上的保守落后的东西”。他在游记里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者的揭露和嘲笑，被斥为“从右的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是“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必

然趋势，必将陷入极端的悲观主义”云云。批判的措词是严厉的，批判的逻辑是简单的，但问题显得比较复杂，而且越来越显得复杂。因为知人论世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在变化，它所依据的社会条件同样也不断地在发生变化，已令人有不知何去何从之叹了。我们是不称职的翻译者，没有可能表示更多的看法，其中的是非曲直还是让读者来评判吧。读者永远是高明的。

三

本书翻译时所依据的原书版本，有以下三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 10 卷本第 10 卷，莫斯科“艺文”出版社 1958 年出版；(2) 30 卷本第 26 卷，“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 1984 年出版；(3) 15 卷本第 2、4 卷，出版社同上，1988、1989 年出版。此外还参考了以下各书：《作家日记》，1873、1876 两卷，俄文，巴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部出版（年代不详）；《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莫斯科“艺术”出版社 1973 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俄罗斯文学》，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在选用版本方面，承蒙高莽、周秀凤、毛韵泽、阮珅、岳凤麟、叶·莫尔恰诺娃各位研究员、教授热情相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文的注释有两种。一是本书译者根据以上几个版本的编辑者所作的注释编译而成，注释的文末没有署名；二是本书的译者所作，注释的文末标明“译者注”，以示区别。但无论是哪一种注释，仅供读者参考，其内容如有不妥之处，自当由本书译者负责。

作者行文中常夹用外文词句（如英、法、德、拉丁等文字），遇到这种情况，如非必要，一概翻译成中文，不采取保留外文而另行加上注解的办法，以免造成大多数读者阅读时的麻烦，同时也便于排印和校对，减少出现差错的可能性。

本书所选译的二十九篇散文，除了《农民马莱》、《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两篇之外，似乎——因为孤陋寡闻，信息不灵，不敢肯定——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一文曾由满涛先生译成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对于他的首创精神我们是深怀敬意的。先行者功不可没，后来者自信也有立足的价值，读者如有兴趣，不妨拿两种译文对照比较，对于理解原作肯定是有益处的。我们之所以重译这篇游记，是因为在作者的“全集”之中被明确指为“散文”的唯有这一篇，号称“散文选”而不选散文，没有理由可说；而且文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写和议论（虽然被指责为“右”）是如此深刻生动，使人得到的印象绝不只是针对一百年前的西欧而已。

今年适逢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 175 周年，逝世 115 周年，谨以这个译本作为中国的两名译者对他的纪念。

译　者

1996 年 7 月于北戴河

1996 年 9 月修改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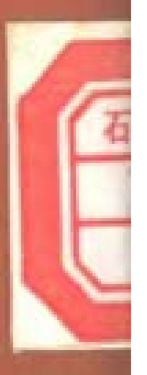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王书朋
责任编辑：董令生

已出书目

第五辑

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叔本华散文选
席勒散文选
黑塞散文选
布罗斯散文选
罗斯金散文选
伍尔芙日记选
达里奥散文选
永井荷风散文选
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ISBN 7-5306-2412-1
I·2154 定价：15.00元